

1968: The Year That Rocked The World

A Ballantine Book

Published by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Copyright © 2004 by Mark Kurlansky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International and Pan-American Copyright Convention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and simultaneously in Canada by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Toronto.

Ballantine and colophon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Random House, Inc. Owing to limitations of space, permissions acknowledgments can be found on pages 439 - 441, which constitute an extension of this copyright page.

www.ballantinebooks.com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is available from the publisher upon request.

isbn 0 - 345 - 45581 - 9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irst Edition: January 2004

24681097531

Book design by Carole Lowenstei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llantine Books,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1968: The Year That Rocked The World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949697

635.842 731



1968

撞击世界的年代

马克·科兰斯基 著 程洪波 陈晓 译 黄原竟 校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2949697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美) 科兰斯基著; 程洪波, 陈晓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10 (2010.4 重印)

ISBN 978-7-108-03292-8

I. 1… II. ①科…②程…③陈… III. 历史事件—世界—1968—通俗读物 IV. K15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9713 号

责任编辑 樊燕华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07-0269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

字 数 354 千字 图 34 幅

印 数 10,001—15,000 册

定 价 29.80 元



1968年6月，美术学校

(布鲁诺·巴尔贝 摄 / 马格南图片社)



献给我美丽的塔丽亚·菲格；
为的是让她明辨真伪，热爱生活，厌恶战争，
永远相信她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致 谢

我想对沃尔特·克朗凯特、吉恩·罗伯特和丹尼尔·肖尔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有大量珍贵的见解，还慷慨地跟我分享了各自不平凡的职业智慧，让我成就了这本书。

我还想谢谢我耐心的编辑南茜·米勒，她跟我一起为这本书付出了十年的思考和梦想；感谢戴尔德丽·兰宁，是她帮助我度过了计算机的梦魇；感谢我无与伦比的助理夏洛特·宣得，一个典型的 60 年代的人，一个我引以为荣的朋友。

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艾丽丝·多德的帮助与合作，感谢玛丽·哈斯科尔慷慨地与我分享她的海报收藏，感谢朋友汉娜·柯德维奇在波兰时对我的帮助。艾尔斯比塔·沃萨帮我翻译了其中的一些波兰语，对此我深表谢意，同时感谢朋友克里斯蒂娜·斯卡尔斯基和安杰伊·杜津斯基在华沙时的帮助。谢谢马克·塞尔加的协助以及达留什·斯托拉对波兰史的解读。感谢彼得·卡特尔、费尔南多·莫雷诺和蒂托·拉米雷斯·莫拉莱斯在墨西哥城给予我的帮助。感谢巴黎的尚塔尔·西里和尚塔尔·勒尼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琳·阿德勒，广播博物馆的让·克莱因，以及同样对我的研究提供帮助的

萨拉·香农。还有德伯拉·科诺普里克，如果没有她的热情相助，我不知道是否能完成这本书。

谢谢我的妻子玛丽安·马斯的莫大帮助，她博大的心胸使我恢复了对这个世界的信心，也以此纪念她的姐姐珍妮特·菲普斯，我想她会喜欢这本书的。

我也要对阿道夫·阿吉拉尔·青泽尔等人表示深深的谢意，尤其要感谢马克·鲁德，他不吝时间，坦诚好客，还慷慨地让我引用了他尚未出版的手稿。

同时也感谢所有曾经对我说过“不！”的人，尤其是那些至今还持此态度的人。

目 录

导言 撞击世界的年代

一、我们冬日的不满

1. 1968年的第一个星期 3
2. 与蚊帐争辩的人 25
3. 舒展开令人畏惧的浓眉 38
4. 对着波兰人的耳朵轻语 65

二、布拉格之春

5. 在可憎的机器的齿轮上 83
6. 英雄们 107
7. 一个波兰人的绝对命令 123
8. 诗、政治和艰难的第二段 134
9. 新国土上的儿女们 149
10. 一场时尚先锋派革命的瓦格纳式弦外之音 164

- 11. 四月里的浑蛋 288
- 12. 先生，我想您已经堕落了 221
- 13. 理想之地 258

三、夏季奥运会

- 14. 禁足之地 275
- 15. 乏味政治的花招 284
- 16. 肉类加工厂旁幽灵般的警察 291
- 17. 东布拉格之殇 311
- 18. 惨淡忧郁的笑容 335
- 19. 在阿兹特克人的地方 353

四、尼克松下台

- 20. 秋季学期的理论与实践 383
- 21. 最后的希望 405

参考书目 426

依我看，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是如此迫切，总有一天各国政府最好还是让路，让人民得到和平吧。

——艾森豪威尔，1959

有一天，这部机器的运转会变得如此可憎，让你们心里如此难受，以至于你们不能再参与下去……你们只能把自己的身体垒在齿轮上……你们必须迫使它停止运行。

——马里奥·萨维奥，伯克利，1964

路上遍布危险……首当其冲的便是无助感；面对世间万恶，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的无助感……然而……每当一个人奋起守护一个理想，抑或改进其他人的人生，或者反抗不义的时候，他就会激起小小一圈希望的涟漪，几百万个从勇气和力量的中心泛开的小涟漪交叠在一起，就会汇集成一股洪流，冲垮最强大的压迫之墙。

——罗伯特·F.肯尼迪，南非开普敦，1966

我们的规划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的：人类不仅有能力认识这个世界，同时也是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的。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波希米亚演讲》，1968年5月16日

我们批判一切使人民处于被动状态的社会。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特，伦敦，1968年6月

沉默有时是一种耻辱。

——叶甫图申科，1968年8月22日

青年造反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的现象。政府想让我们相信他们会息事宁人，在而立之年当个广告主管，但我不相信。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早已厌倦了建立在废话上的浅薄无用的政府。

——威廉·伯勒斯，《君子》杂志，1968年11月

这是些有魔力的字眼：“起来对墙站着，狗娘养的，这是持枪抢劫！”

——勒鲁瓦·琼斯（阿米里·巴拉卡），《黑人！》，1967

导言 撞击世界的年代

中年的乐事之一便是发现自己曾经是对的，而且一个人在像 17 岁或 23 岁这种年纪时，其实比自己想象中正确得多。

——埃兹拉·庞德，《阅读入门》，1934

1968 年是那么独特，它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并且也不会再有。在那个时代，各个国家和文化尚且各自独立、互不相同——同 1968 年相比，今天的波兰、法国、美国和墨西哥已大大同化了——但是世界各地却不约而同地爆发了反叛精神。

历史上也有过其他的革命年份，比如 1848 年，但与 1968 年相比，1848 年革命仅局限于欧洲，所针对的事情也几乎是相同的。其他的全球性的事件也是有过的，那是全球帝国体系的结果。悲惨而波及面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其中的一例。1968 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们反叛所针对的对象多种多样，共同点只剩下叛逆的欲望和方式、对现存秩序的疏离以及对任何形式专制的深恶痛绝。在有共产主义的地方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在有资本主义的地方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反叛者拒斥绝大多数制度、政治领袖和政治团体。造反的矛头指向了绝大多数机构、政治领导人和政党。

造反没有计划也没有周密的组织，往往是通过仓促的会议决定的。一些最重要的决定只缘起于一时心血来潮。因为这些运动反对的是专制，所以它们没有领袖，就算有，也没人承认自己是。意识形态经常是模糊的，很少能在什么问题上都达成广泛共识。1969 年，当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八名激进

主义分子与1968年芝加哥的示威有联系时，其中的一个激进分子阿比·霍夫曼在论及其所在的团体时这样说：“我们甚至在午餐的意见上都不一致。”世界各地都在造反，但这些造反者并没有联合起来，凝成一股力，即使有，也只是为了一时的方便，很快便瓦解了。比如，美国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运动，法国和意大利的劳工和学生运动，都曾经有过昙花一现的联合。

有四种历史因素共同促成了1968年：在当时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起了典范作用；这一代人自视与上一代人截然不同并有着强烈的疏离感，因而拒斥一切权威；一场受全世界共同憎恶的战争为所有叛逆者提供了一个叛逆的理由；还有当所有这一切发生时，电视正方兴未艾，但尚不成熟，对电视的控制、精选和包装还没到今天这样的程度。1968年，当天能收看到来自世界另一地的电视本身就是一个扣人心弦、崭新的技术奇迹。

美国的越战原本没什么特别，当然也不比包括早先法国在越南的战争在内的无数其他战争更应该受到谴责，但发起这场战争的美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霸权。当时正值殖民地奋起争取国家独立，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触动了全世界人民的理想主义，然而在越南这片贫穷脆弱、为独立斗争的土地上，却有个叫做“超级霸权”的新型主权对它小小的领土狂轰滥炸，所投掷的非核燃料炸弹比“二战”时期在整个亚洲和欧洲投的还多。在1968年战事最激烈的时候，美军每星期杀死的人数至少相当于2001年9月11日世贸大楼被攻击时的死亡人数。虽然美国、法国、德国和墨西哥等国的各派运动内部纷争不断，派系林立，但因为美国的霸权和傲慢以及越战的残忍和明显不公，每个人都反对越战。美国民权运动在1968年因为主张非暴力和主张黑人力量两派的分歧而分裂，但在反战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世界各地的运动立场泾渭分明，但仅凭反战就可以将他们凝聚在一起。

当他们抗议时，他们知道怎么做；美国的民权运动教会了他们游行和

静坐。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密西西比的做法，迫不及待地想亲自为自由而游行。

对出生在“二战”之后的那一代来说，“大屠杀”还是一个新词，原子弹也才爆炸，他们出生在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世界。“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与“二战”那代人以及更老的前辈们了无共同之处，他们甚至不会为同一个笑话而发笑，在“二战”这一代人中颇受欢迎的喜剧演员如鲍勃·霍普和杰克·本尼却让新一代人觉得完全索然无味。

1968年是一个现代主义令人瞠目的年代，现代主义总是让年轻人着迷，让老年人困惑。回想起来，那个年代又有一种几乎奇异的纯真。想象一下，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生和相距遥远的巴黎大学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的经历是相似的，然后他们怯生生地走近，想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共同点。在惊奇和激动中，人们发现不管是在布拉格、巴黎、罗马、墨西哥还是纽约，他们用的竟然是相同的策略。有了通讯卫星和廉价的可洗录影带，人们得以通过电视清楚地了解到其他人都在干什么，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头一次能身临其境地接触当日遥远的大事件，实在是激动人心。

这种新奇感不再会有了。“地球村”这个词是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发明的。地球变小已不能让我们惊讶不置，第一次看到在月球上拍摄的照片、第一次听到太空广播的那种震撼，今日是不会再有了。在当今世界，我们对日新月异的突破已经习以为常。如果再有一个1968年代的一代人产生，各种运动都将开办网站，受着执法部门严密监管。他们会相互发电邮了解最新的变化。毫无疑问，还会有其他的工具被发明出来，但即使是发明本身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

出生于1948年的我是属于憎恨、抗议越战的一代，一想到当局二字，脑中就浮现出这样一幅图像：辛辣的催泪瓦斯，警察在进攻前不动声色地从侧翼缓缓包抄，先是棍棒，然后是屠杀。我从一开始就表明了 my 成见，因为即使是现在，时隔三十多年，想要客观地看待1968年也是不诚实的尝试。

我最近读了几份刊物——《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生活》、《花花公子》、《世界报》、《费加罗报》，一份波兰日报和周刊，还有1968年的几份墨西哥报纸——一些自称客观，另一些则直陈他们的成见——阅毕我确信，公平是可能的，但真正的客观则是不可能的。1968年的美国媒体以客观自居，它只是没察觉出自己有多么主观。

这本书的写作让我记起，有那么一个时期，人们秉心直言，无所畏惧——可自从那以后，已经有太多真相被湮没了。



墨西哥学生绢印海报，上面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的和平符号和古巴切·格瓦拉的口号“我们会赢！”

一、我们冬日的不满

该是让双眼休息的时候了
在被照明的黑表盘上
是新月的绿色密码——
一、二、三、四、五、六
我呼吸，无法入睡
天明接踵而来
说，“这就是夜晚。”

——罗伯特·洛厄尔《近视：一个夜晚》
摘自《写给联邦的死难者》，1964年

1968年的第一个星期

1968年的开端像所有正常年份一样——始于一个星期一的早晨。这是一个闰年，2月份有29天。《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这样写道：世界告别了一个动乱年；城市降雪。

在越南，1968年的开端很平静。教皇保罗六世宣布1月1日为和平日，为了他这天的和平，教皇说服南越人及其美国盟军在已有的24小时休战协定上再加12小时。南越的人民解放武装部队——一支通常被称为亲北越的游击队——宣布了72小时的停火协定。在西贡，南越政府强迫店主们打出横幅：“盟军将在1968年赢得胜利。”

在南越的湄公河三角洲，夜半，美托镇教堂的钟为新年而响起，10分钟后，当教堂的钟声还在响，一支越共小分队出现在稻田边，出其不意地袭击南越第二舰队官兵，杀死了19个水兵，另有17人受伤。

《纽约时报》社论说，虽然再次开战撕裂了和平的希望，但另一个机会即将来临，那就是在2月份越南新年中开战双方有望停火。

“*L'Année 1968, je la salue avec sérénité.*” 78岁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新年前夕说。“我祝愿1968年是祥和的一年。”戴高乐高而凛然，自1958年起，他一直在他发话的那个宝座上统治法国。他修改了宪法，使法国总统成了西方民主国家中最有权力的首脑。目前，他正进入第二个七年任期的第三年，

情况良好。他在镶金的宫殿里对法国人民（法国仅有的两个频道完全归国家所有）说，不久，其他国家将向他求援，他不仅将在越南，甚至将在中东谋求和平。“所有的迹象均显示，我们将在解决国际事务方面做出非常卓越的贡献。”近年来，他已经习惯于以“我们”来称自己。

这位法国人口中的“将军”或“大夏尔”通过电视向法国人民致新年贺辞的时候，显出“少有的温和，简直到了慈祥的地步”。他很少用严厉的词汇，甚至对此前被他认为是“可憎”的美国也不用。他的语调和他1967年的新年贺辞形成对比，去年他将美国的越战说成是“一个可恶的不公平的战争”，是一个“大国”摧毁一个小国。法国越来越在乎其盟国对自己的厌恶。

法国正处于一个平静而繁荣的阶段。“二战”后法国又进行了自己的越战，这一点戴高乐似乎已经忘记。胡志明——美国的敌人，与戴高乐同年，出生在当时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大半生都在反抗法国人。他曾经在巴黎生活，用的假名是 Nguyen O Phap，意思是“阮憎恨法国人”。“二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告诫戴高乐，战后法国应将独立归还给印度支那。但戴高乐却跟胡志明说，即使他在召集自己的人民反抗日本人，战后他还是设法重新建立法国殖民地。罗斯福说：“印度支那的人民理应得到比这更好的待遇。”戴高乐却决定他的自由法国军队要涉入在印度支那的任何行动，并说：“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流了血，这片土地就归法国人了。”

“二战”后，法国人和胡志明打仗，惨败。然后是与阿尔及利亚交战，再败。但自从1962年后法国就一直处于和平状态。虽然戴高乐对经济增长点的漠然出了名，法国经济还是呈现出增长势头。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到1967年期间，法国人的实际工资每年上升3.6%。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迅速上升，尤其是汽车、电视机。年轻人的大学就学率也明显上升。

戴高乐的总理乔治·蓬皮杜对来年也颇为放心。他指出，左派尽管未必能获得权力，但他们将更为团结，“今年反对派对政府进行干扰，”蓬皮杜说，“但他们不可能制造危机。”

受欢迎的《巴黎竞赛》认为蓬皮杜是少数几个可以在1968年掌控权力从而取代戴高乐的人选之一，但编辑们更多地将未来的焦点放在国外，而不是国内。他们预计，“美国将有一场罕见激烈的选战”。除了越南，他们认为未来的热点还包括黄金兑美元的汇率之争，苏联东边卫星国家持续增长的自由，以及苏联国内太空武器系统的建立。

“今日的法国不会像往日那样因危机而瘫痪。”戴高乐在新年致辞中说。

因为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所发起的清洁建筑物的运动，巴黎显得前所未有的干净。玛德莲教堂、凯旋门、先贤祠和其他的标志性建筑物不再是灰黑色，而是米色和浅黄色，并且这个月将用冷水喷射洗刷巴黎圣母院上已有700年历史的尘垢。水喷会损坏建筑物吗？会使得圣母院怪里怪气，七拼八凑，暴露出石头颜色的斑驳不一吗？

戴高乐在1968年前夕坐在宫殿里，平静乐观，“在这么多的国家政局不稳之际”，他保证“法国仍将井然有序，起到表率作用”。将军说，“我们没有敌人，”法国的终极目标是和平。

也许这种新式的戴式语气是因为诺贝尔梦在作怪。《巴黎竞赛》问蓬皮杜，将军身边的一些人对将军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感到愤慨，你是否有同感？蓬皮杜说：“你真的认为诺贝尔奖对将军有意义吗？他只在意历史，而没有任何评审团可以做出历史的判言。”

除了戴高乐外，美国的电脑产业也给寡欢的新年带来了少有的乐观，预示着1968年将是历史性的一年。20世纪50年代，电脑制造商估计整个美国用六台计算机就够了。1968年1月，美国已有五万台计算机投入工作，其中15000台是去年安装的。烟草业也很乐观地预计，1968年将保持1967年2%的销售增长率。一家主要烟草厂家的主管人员扬言：“他们越是攻击我们，我们的烟草就出售得越多。”

但从很多方面看来，1967年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年份，全国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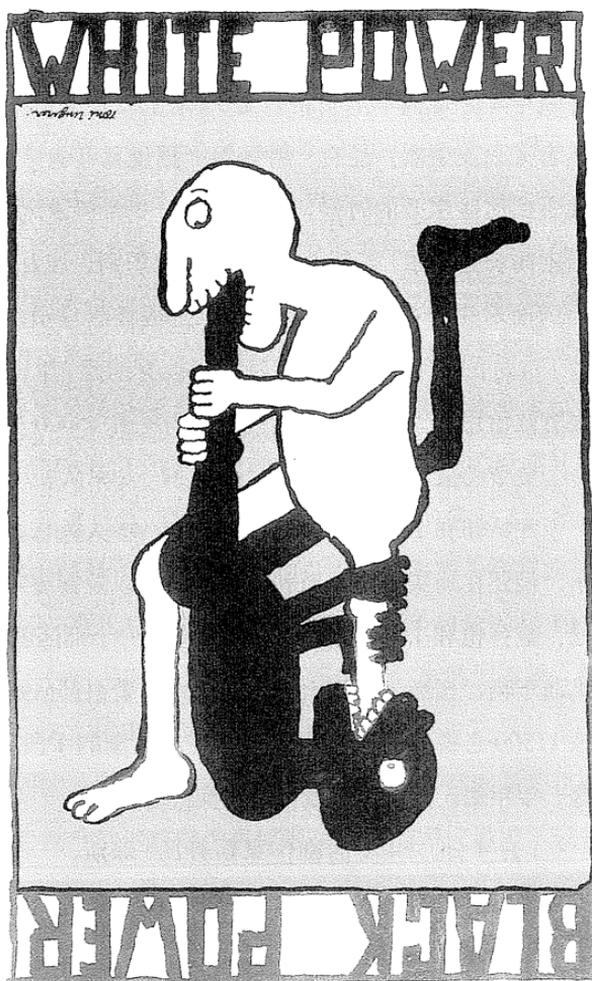
地黑人聚居城市的骚乱和破坏性暴动数量创下了纪录，包括波士顿、堪萨斯、纽华克和底特律。

1968年是“黑鬼”(negros)变成“黑人”(blacks)的一年。1965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的组织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发明了“黑豹”这个词，不久又衍生出“黑人力量”。1968年此词刚出台时是指黑人武装力量，到该年年底，这个词指整个黑人群体。“黑鬼”成为一个有蔑视色彩的词，用于指那些不站出来争取自身权益的黑人。

1968年的第二天，37岁的黑人教师罗伯特·克拉克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成为密西西比州众议院的议员，成为该州立法院自1894年以来的第一个黑人议员。

但是民权斗争的中心从口音较软的南部乡村转移到了做派强硬的北部城市。南部的黑人与北部的不同。马丁·路德·金的追随者大多是南方人，他们研究的是莫罕达斯·甘地的非暴力反英运动，而成长于纽约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却热衷于暴力反抗，像茅茅(Mau Mau)那样，后者在肯尼亚反抗英国人。卡迈克尔为人和善，思想锐利，还带着些许特立尼达人特有的戏剧气质。多年来，卡迈克尔在南方是监狱的常客，频频遭受威胁和虐待，就像所有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员所经历的那样。在那些年里，非暴力受到质疑。卡迈克尔开始用语言甚至行动以牙还牙，回击种族主义者对他的侵犯。金的追随者高唱“现在就要自由！”卡迈克尔的拥护者却高喊“黑人力量！”金试图让卡迈克尔改用“黑人平等”，但卡迈克尔坚持他的口号。

越来越多的黑人领袖想将种族隔离作为斗争武器，推行一种只有黑人的社会秩序，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也不允许有白人记者出现。卡迈克尔在1966年代替腔调柔和、持非暴力主张的约翰·刘易斯成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袖。自此，卡迈克尔将该组织改造成一个主张暴力的“黑人力量”组织，从而使“黑人力量”发展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运动。1967年5月，当时尚籍籍无名的休伯特·拉普·布朗代替卡迈克尔成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



托米·昂格雷尔设计的
1967年的海报
(玛丽·哈斯克收藏，
copyright©1994
Diogenes Verlag)

领袖，至此，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非暴力”就只是徒有其名了。在那个血腥暴动之夏，布朗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说你们最好弄一支枪。暴力是必需的——它和樱桃派一样具有美国特色。”

民权运动严重分裂，金渐渐失去了对其的控制，许多人认为非暴力运动已派不上用场。1968年，“黑人力量”眼看就要大行其道，警方也严阵以待。1968年年初，大多数的美国城市都在备战——建造兵器库，像在敌方

安插间谍一样地在黑人社区派人卧底，招募公民作为常备军。洛杉矶瓦茨区在1965年8月的一次暴动中有34人被杀，此时的洛杉矶市正在考虑购买防弹装甲车，每辆车上安装一支30毫米口径的机枪；选购烟幕弹、催泪瓦斯或者灭火发生器；还有一种警笛，据说其音量之大足以使暴乱者致残。“当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天啊，我希望永远不要用到它们，”洛杉矶警局副局长达里尔·盖茨说，“但我又意识到，在瓦茨这些东西该有多么宝贵，因为面对狙击枪我们毫无遮掩，无法救出伤员。”当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帕特·布朗在一年前因瓦茨城暴乱而被罗纳德·里根击败之后，这些言论已经很有政治用途。问题是一辆装甲车需耗费35000美元。洛杉矶州长办公室有一个更节约成本的办法——多余的M—8军队装甲车每辆只需2500美元。

底特律在1967年的种族冲突中有43人死亡，其警方原先就有五辆装甲车，但还在购买催泪瓦斯和防瓦斯面罩以及需要对付狙击手的来福枪、卡宾枪、霰弹枪和15万发子弹。底特律的一个郊区就购买了一辆轻型装甲军用机动车辆，相当于一辆坦克。芝加哥为警察部队购买了直升飞机，并开始训练11500名警察使用重型武器和控制人潮的手段，为1968年做好准备。从这一年年初，美国似乎就被恐惧支配着。

1月4日，34岁的剧作家勒鲁瓦·琼斯，一个秉性直言的“黑人力量”支持者，因在前一年夏天纽华克的暴乱中非法拥有两支连发左轮手枪而被判两年半到三年的刑罚，并罚款1000美元。当被问到为何重判勒鲁瓦·琼斯时，埃塞克斯县的法官利昂·W. 卡普说，他怀疑琼斯在被捕当晚“参与策划一个焚烧纽华克的计划”。数十年后，琼斯成了新泽西州的桂冠诗人，他的笔名是阿米里·巴拉卡。

在越南，美国官员永远都在告诉新闻记者这场战争即将结束，可它离终结仍然遥遥无期。1954年，法国从越南撤退，越南分裂为南越和北越。北越被胡志明控制，该地区本来也几乎尽在他掌管之下。南越则控制在诸反共派系手中。1961年，北越的共产党通过越共人员占领了一半的南越领土，

所到之处只遇到零星抵抗。那一年，北越开始将正规军输往南越以完成接管任务，其沿线就是后来著名的“胡志明小路”。美国进一步卷入战争，尽管它从来就没少插过手。早在1954年，美国就资助了法国战争耗费的五分之四。1964年随着北越势力的巩固，约翰逊使用海军攻击北越的东京湾，启动了战争。自那以后，美国每年都增加在越南的军力。

1967年，9353名美国人战死在越南，而之前数年美军死亡人数的合计也没超过此数的一半。美军死亡总数已达15997人，另有99742美国人受伤。报纸每周都有当地伤亡报道。战争也使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估计一个月花费20亿至30亿美元。到了夏天，约翰逊总统请求大幅增加税收以弥补不断增长的债务。“大社会”——约翰逊设立的以纪念已逝的前任总统的巨额社会花费项目——已严重缺钱，岌岌可危。1968年年初出版的一本名为《大社会导读：美国自由主义的衰败》认为“大社会”正和自由主义本身一起死亡。

纽约市长约翰·林赛，一个具总统职位野心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在1967年的最后一天说，在现行开支计划下，如果国家不能给各城市增加拨款，那么“美国就应重新考虑它自认在越南和世界其他地方负有的义务”。

正与苏联竞赛登月计划的美国政府被迫削减太空预算。甚至国防部也在精打细算，在年初请求国会批准延迟或取消可以延后购买的军火设施，以救急越战的费用。

这一年的第一天，约翰逊总统呼吁美国人减少去国外旅游，以挽回不断增长的外贸赤字，他认为造成赤字的部分原因是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国外旅游。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说旅游者必须“分担负担”。约翰逊要求人们至少在两年内延缓不必要的旅行计划。他也提出了削减在国外的商业投资和征收旅游税，此举被田纳西州的民主党议员艾伯特·戈尔称为是“不民主的”。

法国人看问题难免带着“法兰西中心主义”的立场，不过这也可以理解。许多法国人认为约翰逊是用这些措施来报复傲慢的戴高乐。巴黎日报《世界报》说，约翰逊的提议给了美国一个“拿法国发泄怨愤”的机会。

随着战争耗资的与日俱增和越来越不得人心，1968年的美国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希望美化战争。《纽约时报》的R.W.阿普尔报道：

“我前几天听了一个吹风会，”一个中产阶层的平民说，“给我们介绍情况的人跟我们说：‘大选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上层正在准备于11月让约翰逊总统再次当选。’”

急速推进这个新的公关活动的目的在于要使南越看起来值得为之战斗。美国政府要诱导美国民众相信南越军队精兵善战，就得让南越军队做出点像样的事来。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政府还必须尽力清除南越政府令人尴尬的腐败，不惜违背事实，将其头目阮文绍刻画成一个鼓舞人心的、正动员人民为正义而战的领导人。本就陷入困境的媒体和政府的关系到了1968年更是雪上加霜。

河内的官方报纸《人民报》在新年社论中说：在炮火的冲击下，“我们的通讯网络仍然畅通无阻，”并声称“人民加强了在政治和精神层面的团结”。

胡志明主席在新年致辞中说，北越人民和南越人民已经“团结如一人”。这位78岁的主席预言：“今年美国侵略者将陷入前所未有的被动和茫然的境地，与此同时，我们的军队将乘胜追击，勇往直前，取得更多更伟大的胜利。”他至少说中了一半。

他对所有的友好国家和“美国国内支持我们正义战争的进步人士”表达最衷心的祝愿。很显然，胡志明口中“进步人士”的运动在升级。据民意测验，不仅战争支持率在下滑，而且反战示威的人数也越来越多。1965年，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号召在华盛顿举行反战示威时，许多人，包括一些旧时的和平主义者批评他们偏袒共产主义者，并对其策略和语言也有诸多不满。但两万人的示威依然在4月进行，在当时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战游行。

到了1967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反战运动避免了老生常谈的冷战辩论，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国家终战动员委员会（Mobe），一个旧式的和平主义者、新老左翼分子、民权工作者和青年的联合体在旧金山上演了一场几万人的和平示威。在3月的纽约，他们召集了几十万人跟着马丁·路德·金从中央公园走到联合国总部。

在秋天的反对征兵周，约一万人在加州的奥克兰示威，其中大多为年轻的反战者，最后演变为与警察的街战。反战运动也逐渐脱离金的非暴力主张。示威者不愿老老实实被拖上警车。他们冲到警线内，又撤回到路上的临时路障后。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试图用最老的战术——几百名强壮者在校园内的一座建筑物内静坐，抗议陶氏化学公司招工。麦迪逊的警察没有把他们拖走，而是用上了梅斯催泪毒气和警棒，此举引起极大民愤，很快就汇聚了几千人和警察对抗。

陶氏化学公司是20世纪60年代的邪恶公司，该公司生产凝固汽油弹，用来对付越南的士兵、平民和土地。凝固汽油弹最初是“二战”期间被哈佛大学的科学家研制出来的，是军方利用教育机构研发武器的典型例子。起初，凝固汽油弹是指一种可以混合汽油和其他燃料的浓缩物。在越南，这种混合浓缩物本身就被称为凝固汽油弹。混合浓缩物将火焰转成胶状物质，在压力下射程可以很远。因为燃烧释放出巨大的热量，它会粘在目标物上，无论该物体是植物还是人。根据国家学生组织的统计，在1967年10月至11月间，全国62所大学发动了71次示威游行，其中有27次是针对陶氏化学公司的，只有一次是针对教育质量问题的。

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国家终战动员委员会在华盛顿组织了一次反战示威，示威者先在林肯纪念馆集合，然后穿过波托马克一直到五角大楼。杰里·鲁宾，一个从伯克利来的反战分子和他的朋友阿比·霍夫曼，一个来自纽约的民权运动成员也在其中。行进中，霍夫曼成功地引起了媒体注意，他声言要使五角大楼浮起并转动，以此来驱邪，但他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当

时，诺曼·梅勒也在那里，之后他将此写进了《夜之军》里面，该书成为1968年的畅销书之一。诗人罗伯特·洛厄尔，语言学家兼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和编辑德怀特·麦克唐纳也在示威的队伍中。这些示威者不仅仅是被宠坏和享有逃避兵役特权的孩子，也不似梅勒在他的书中更具同情色彩的描写：“迷幻药点着了美国中产阶级年轻人的革命热情。”这是一场群众基础广泛而且形式多样的运动。“加入我们！”示威者冲着护卫着被包围的五角大楼的士兵高喊，好像沉浸在他们突如其来的号召力中，这力量能召来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1968年的第一个星期，五个男人被控煽动年轻人违反征兵法，包括既是作家又是儿科医生的本杰明·斯波克和耶鲁大学的牧师小威廉·斯隆·科芬。斯波克医生曾在纽约说，他希望“有10万、20万甚至50万的年轻美国人要么拒绝被征兵，要么在部队遵纪守法”。斯波克的被捕引起了广泛注意，因为一直以来保守派们都认为，这一代人如此受宠溺和好争斗，罪魁祸首正是他这种“纵容的培养方式”。但是这些人被逮捕后，《纽约时报》又发表社论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反对征兵法的著名领导人，一个是儿科医生，一个是大学牧师，正是这样的人对现在美国年轻人的道德困境尤其敏感。”

1月4日，布鲁斯，一个来自长岛的有着披肩长发的13岁男孩，被控逃学。他的母亲有一家干洗店，布鲁斯在店里帮忙售卖迷幻药与和平符，他的父亲是一家管理咨询公司的老板。布鲁斯的父母说，布鲁斯是因为参加和平运动而被开除的。布鲁斯自己说他因为健康问题旷课11次，另有两次是因为参加和平示威。他母亲说布鲁斯自12岁起就参加了运动。

尽管对林登·约翰逊的声讨声势浩大，他却似乎极可能在五年任期之后赢得连任。1月2日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45%，也就是将近一半的民众认为卷入越战是错误的。同一天，新年停火协定结束前的1小时20分，2500名越共进攻美国步兵团位于西贡西北50英里的一个橡胶种植园的武器

供应基地，杀死 26 个美国兵，伤 111 名，这是 1968 年开始后第一起美国人在越南的死亡事件。美国政府公布有 344 名越共被打死。美国有一个汇报敌军阵亡人数的制度，是在越战中发明的一个被称为“清点尸体”的宣传新招，如果敌军的死亡人数足够多，美国就宣称打赢了这一仗。

共和党在各州轮番主持了一项调查，其年初公布的结果显示，让约翰逊下马的唯一希望是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共和党估计，理查德·尼克松将一如既往地以微小弱势失败，而密歇根州长乔治·罗姆尼已广为笑料，因为他宣称他从支持越战转到反对越战是因为被“洗脑”了。连乏味的明尼苏达州议员尤金·麦卡锡也调侃说，“我以为稍微‘涮涮’就够了呢。”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希望能趁机补罗姆尼的缺，但是他当州长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并且被认为太保守，容易像罗姆尼那样地被击败。共和党人深知落败滋味，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上一次竞选中，他们的参选人巴里·戈德华特与约翰逊竞争，结果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惨败。巴里·戈德华特一直也被认为太保守。像洛克菲勒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可能还有机会。

1967 年，一些民主党人讨论过找人替代约翰逊的事，但在美国政党内要替换当权者很难。像 ACT（候选人更换组织）这样旨在“甩了约翰逊”的组织也几乎不可指望。唯一有希望替代约翰逊的民主党人是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但这位纽约州资历不深的参议员却不想被牵涉进去。1 月 4 日，罗伯特·肯尼迪重申，尽管他与现任总统在对待越南战争上有不同意见，但他仍将支持现任总统连任。几年后，麦卡锡说，他估计肯尼迪认为自己不是约翰逊的对手，于是，1967 年 11 月，麦卡锡决定由自己来对付约翰逊。麦卡锡在华盛顿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他的参选。记者安德鲁·科普坎德引述麦氏的话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进行政治自杀……这很可能更像是判死刑。”他的这番言论被看做是美国总统竞选史上最低调也最乏味的竞选言论。

现在，新年的第一天，麦卡锡说尽管得不到公众的大力支持，但自己完

全没有受挫感，他坚持不通过“渲染战争”拉选票，而是用他干巴巴的语言论述道，越战“正在抽干我们的人力和财力，我想它还给许多美国人造成了极大的焦虑，削弱和分散了我们解决国内问题和国外其他潜在问题的精力”。

1967年11月，麦卡锡又说，他希望因为他的竞选而使持异见者能放弃不满和挫折导致的非法抗议，走向正当的政治诉求。但话音刚落，一个月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汤姆·海登、伦尼·戴维斯和其他反战人物开始了1968年的计划，首当其冲的是第二年夏天在芝加哥召开民主党会议期间的几场街头抗议。

“异皮士”成为“国际主义青年党”的缩写是这一年后来的事，根据官方的并不确凿的说法，该运动成立于那一年的新年前夕，在一次格林威治村的聚会上，并且是吸食大麻之后的产物。其创始人是阿比·霍夫曼和杰里·鲁宾。“我们在那里都人事不省，在地上打滚。”霍夫曼后来对联邦调查员说。甚至连名字“异皮”——就像反主流文化的“嬉皮”一样——也都表示了一种痴傻的智慧，这种东西唯有激进的年轻人欣赏。

这一年的第一天，联合国宣布1968年为“国际人权年”。联大也开始了一整年的观察，以开启世界性的和平努力。但是即使是罗马教皇也在1月1日和平致辞中承认“在越南有新的可怕的和平障碍”。

越战并不是对和平的唯一威胁。在西非新独立的国家中，最有前途、石油储备丰富的尼日利亚在过去的6个月里已经陷入了内战——执政者和伊博人的战争。在比夫拉这个小小的东部地区有1200万人口，伊博人占800万。而比夫拉恰恰是尼日利亚的石油重镇，有了它尼日利亚才有前途。

尼日利亚政府首脑雅各布·戈翁在圣诞节致辞中说：“我们很快就能有个转折，幸福已离这个地区不远了。”关于内战，他说：“让我们全力以赴，于3月31日前结束内战。”但实际上他很少致力于国家团结，从不离开拉各斯，也很少在拉各斯露面。来自东部的政府官员开始了一种类似于美国越战

报道的新闻运动，那便是报告在比夫拉的兵变次数。那年初，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让 81 名叛离东部投奔首都的警察出席，但记者们注意到这些警察中没有人是来自伊博族的。然后，政府又展示了小尺寸的比夫拉制服，以证明敌人在带领孩子打仗。

比夫拉人表现得相当出色，他们控制了大部分属于他们的领土，并给人数量远高于他们的政府军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1960 年，尼日利亚刚独立时，它被作为非洲国家民主成功的代表。但是地区之间以及 250 个不同语言的民族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到了 1966 年 1 月，伊博人推翻了政府、杀死了民选领导人，6 月，戈翁在第二次政变中上台执政，屠杀了数千名伊博人，这些伊博人因为他们能够适应现代技术的能力而遭仇恨。民主状况的恶化加剧了地区间的冲突，到了 1967 年 5 月 30 日，东部被伊博人控制的地区脱离尼日利亚，独立成为比夫拉共和国。

经过 6 个月的战斗，战争到了僵持状态。拉格斯只受过一次袭击，但那架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在城市上方被击落了。记者们发现医院里满是伤兵，军队设路障以强截重型、较好的汽车以作前线战斗用。战争开始时，国际观察家认为戈翁能够控制他的部队，减少平民伤亡的人数。但是到了 1968 年 1 月，据报道，有超过五千名伊博人被狂怒的暴民杀害，而尼日利亚军队只做旁观者。军队控制了比夫拉港口城市卡拉巴尔，打死了至少一千名伊博平民，还有报道说甚至多达两千。如果内战继续下去，必然会像其他内战一样演变成恶劣、血腥的冲突。

在西班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自内战后夺取政权以来已进入他的第 29 个“和平年”。虽然还是压迫人的专制，但比起邻国葡萄牙的安东尼奥·德奥利韦拉·萨拉查的独裁统治，西班牙的情形好多了。近年来，反对佛朗哥政权的叛乱都被血腥清洗，数千西班牙人被杀死或关进监狱。反抗被镇压下去之后，压制也相对缓和，一些内战时期的难民甚至回国。但

在1967年，年轻一代的学生开始游行，反抗政府，他们扔石子，高声呼喊“自由！”，“佛朗哥该死！”12月4日，在佛朗哥75岁生日那天，学生们打出了“佛朗哥，凶手，生日快乐”的海报。

1968年的开端，西班牙并不平静，马德里大学技术科学学院因为学生的反政府抗议而被警察关闭，第二天就有数百个医学院的学生进行示威，愤怒的学生向警察扔石头。到了1月中旬，因为反佛朗哥示威，政府已经相继关闭了哲学院、经济学院和政治学院。学生们在1967年赢得了结社权利，1968年他们要求政府释放在前一年学生运动中被逮捕的学生，并同意再也不允许警察进入校园。校园是具有不可侵犯性的区域，这也是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认可的条规。但是学生们也更加积极地参与校外事务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工会和工人权利方面的事务。

新年前夕，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呼吁中东的阿拉伯人“说出自己的意愿”，并要求阿拉伯领导人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1967年6月，以色列再次与其阿拉伯邻国交战。这令戴高乐很恼火，因为作为以色列的盟友和武器供应者，他一直要求以色列不要主动开战。但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已遭受了阿拉伯国家的几次三番的进攻，并且在埃及一度封锁亚喀巴湾之后，以色列坚信阿拉伯人马上就要发起新一轮联合进攻了，因此以色列就先发制人。烦恼不已的戴高乐从亲以转向了亲阿。他在1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这个新政策时说，犹太人是“精英民族，自信而专横”。直到1968年戴高乐还在试图解释他的这个论断，向诸位犹太领导人保证这不是一个反闪族人的言论，而是一句恭维话。这或许是真的，因为这些形容词分明是在描述他自己。

苏联——1956年之前以色列的盟友——也很烦恼，因为它为给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和战争计划，但由苏联撑腰的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却在六天之内被以色列轻而易举地击败，这让苏联很难堪。

以色列人开始玩起了新花样。在这次战争中，他们没收了叙利亚的绿色

戈兰高地，埃及境内多岩的西奈山和约旦河西岸，包括耶路撒冷阿拉伯人控制的地区。然后他们试图以此作为与阿拉伯国家谈判的筹码，希望他们以和平换回土地。让他们大失所望的是，阿拉伯人对此毫无兴趣。因此在新年前夕，阿巴·埃班在广播里用阿拉伯语说：“你们的领导人在过去20年里所采取的政策，给这个地区的人们带来无穷的灾难，现在该政策已告覆灭。”他坚持认为1968年应该是阿拉伯国家改变政策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从耶路撒冷的以前由约旦人控制的地区拨出了838英亩的土地，用于在老城建造犹太人的居住地，计划盖1400座房子，其中400座给一度离开老城的阿拉伯人。

正如“黑人”和“异皮士”这些词汇一样，“巴勒斯坦人”这个词自1968年才初次出现在大众词汇中。之前，这些人不被看做一个单独的文化体，也不被认为有他们自己的国籍。人们称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为“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的身份就更模糊了，因为这个地区被看做是约旦的，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人也就是约旦人，从文化认同上讲，他们也与东岸的约旦人一样。一家美国报纸报道来自西岸的消息时，日期栏内写的是：“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

1968年初，“巴勒斯坦人”指的是阿拉伯游击队成员，西方媒体常称他们为恐怖组织。这些组织用巴勒斯坦人作为标签，如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巴勒斯坦革命、巴勒斯坦革命青年运动、巴勒斯坦解放先锋、巴勒斯坦革命阵线、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等组织。在1967年战争前，像这样的组织至少有26个。这些组织被极左翼的反主流文化叫做“民族主义者”并得到支持，但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很少有支持它们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因为支持他们，其一度为主要民权组织的形象受到了削弱，并且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地。

1968年前的最后一周，艾哈迈德·舒凯里辞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领导职位，这一组织是阿拉伯人的一个重要组织。他最出名的是发誓要“将犹太人赶到海里去”，却又不能实现这一宏愿。巴勒斯坦人指责他不守

信，好欺瞒作巧，有时还无遮拦地撒谎，另一个同样有影响力的组织法塔赫（Al Fatah）就拒绝接受以舒凯里为首的“巴解”的领导。“法塔赫”的意思是“征服”，是由传奇人物阿布·阿马尔领导的。1964年法塔赫发起了第一次袭击，当时他们准备炸掉一个抽水机，但未能引爆炸药，当他们回到黎巴嫩时全部被捕。此后，阿布·阿马尔因为打游击战而成为阿拉伯人中的传奇人物。阿布·阿马尔是一个假名，其真人是38岁的巴勒斯坦人，亚瑟·阿拉法特。

1968年初，八个巴勒斯坦组织宣布成立联合指挥部指挥游击队与以色列作战。他们声称要加强袭击，但不会针对以色列平民。发言人巴勒斯坦心血管医生依萨姆·萨塔威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清算犹太复国运动者”，并且拒绝和平解决中东问题。“我们只相信枪杆子，要通过它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

1月份的《原子能科学家公报》封面登载了更多不幸的事。封面上的时钟指向11点53分，也就是离午夜只差7分钟。这只钟象征着世界正在逼近已近在咫尺的核战争，自1963年以来，这只钟一直处在离夜半差12分钟的位置。该杂志的编辑尤金·拉比诺维奇博士说，他们调整了时钟，以反映愈演愈烈的暴力和民族主义。

另一方面，1968年的第一天，艾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詹姆斯·乔伊斯重又流行的《贾科莫·乔伊斯》的书评，开头写道：“如果开端确实意味着什么的话，那么1968年应该是一个灿烂的文学年。”

经过1967年的大量争论，在1968年的第一天，英国就宣布由塞西尔·戴·路易斯接替约翰·梅斯菲尔德的桂冠诗人地位。前者是推理小说作家，牛津大学诗歌教授。桂冠诗人是皇室的官方成员，大致位列看管人之上，副总管之下。梅斯菲尔德当了37年桂冠诗人，他在5月辞世之后，许多人认为，到了60年代末期，皇家诗人这个概念已很陈旧了。

1968年的头一个星期，鲍勃·迪伦回来了。自从在一次摩托车祸折断脖子后，他消失了一年半时间。他的新专辑《约翰·韦斯利·哈丁》受到了评论家和歌迷的欢迎。自他开始用电吉他伴奏之后，就产生了“民歌摇滚”这个词。从1968年开始，鲍勃·迪伦回归到民谣之本，用吉他、口琴、钢琴、贝斯和鼓来伴奏。《时代》杂志评论说：“他的新歌是简单而安静的，一些是有道德含义的关于流浪者的歌，一些是有宗教意味的，包括《我梦见了圣奥古斯丁》和一支关于牧师犹大的寓意深长的歌。最动人的的是最后一首活泼的求婚歌《今晚我将是你的宝贝》。”但是，《纽约时报》的丹·萨利文指出，得克萨斯州的亡命徒约翰·韦斯利·哈丁的姓 Hardin 中本来是没有字母 g 的，他说，迪伦在省略了众多单词中的尾音字母 g 之后，“显然已意识到他应该归还一个 g”。

棒球在美国体育的主流地位受到足球的威胁。1968年1月1日，102946人观看了玫瑰杯橄榄球比赛，人数之多，史无前例。观众们看到了出色的加州大学运动员 O.J. 辛普森两次触地得分，加州大学队总共赢得 128 码，以 14 : 3 击败了印第安那队。

伯纳迪恩·莫里斯在《纽约时报》上写道：“1968年最大的风险是裙子的长度是否能冒险长到脚或者小腿部位，因为几个季度以来，裙子长度都被权威规定在膝盖以上。”这一年的1月流传着一则消息，联邦住宅供给委员会对手下员工颁布了一个冗长的指示：在寒冷的天气穿迷你裙容易导致腿部脂肪的堆积。结果证实该消息纯属虚构。

但是，英国政府正在失去来自迷你裙的税收却是真的。英国对女裙征收 12.5% 的销售税，为了不将童装包括在内，政府明示只有从腰到底部长度在 24 英寸的裙子才需要征税。1968年冬天，英国时髦妇人的裙子长度在 13 英寸到 20 英寸之间。

然而，1968年的时装观念即是没有任何禁忌。因循守旧已不合时宜，评论家们乐意看到人们正朝穿戴的多样化迈进。

1968 年对女性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不仅在于裙子的长度，更在于这一年 1 月 1 日一个名叫缪丽尔·西伯特的女子宣称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获得了一个席位，这是该所 175 年来头一次提供席位给妇女。西伯特是一个来自克利夫兰的 37 岁金发女子，朋友们都叫她“米奇”。她决定不听来自金融界的众多男士给她的建议：找一个男人买座位。“那是上星期四，”她说，“董事局同意了我的会员身份。我到证券交易所递上了价值 445000 美元外加 7515 美元入籍费的支票来买席位。然后，我买了三瓶法国香槟给我的同事。我至今不能相信那是我，我简直高兴得飘飘然不知所以了。”

1968 年是个充满争议的年份。好消息是，南非开普敦格罗特·舒尔医院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心脏移植手术，将一个 24 岁年轻人的心脏植入一个 58 岁的牙医体内。这是巴纳德做的第二次这类手术，也是世界第三次心脏移植手术，但该手术是头一次被医学界认为是成功的。巴纳德在 1968 年声名鹊起，大半年的时间都在当国际名人，他签名、接受采访，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嘴里说着名言警句，但这些话从年初起就颇受业内指摘。巴纳德说，尽管他盛名不期而至，但他依然只拿 8500 元的年薪。然而他的手术成功也被笼罩在疑虑中。一个德国医生将之视为犯罪行为。一个纽约生物学家显然把医生和律师弄混了，说应该“永久剥夺巴纳德的律师从业资格”。另有三个著名的美国心脏病专家呼吁暂停心脏移植手术，对此巴纳德立即表示他将不予理睬。

理论上，该手术涉及了两个病人膏肓的病人，一个捐出了心脏，死了，但即使不这样，他也是注定要死的，另外一个则被救活了。一些医生和外行人士就此质疑医生是否有权选择让谁死。难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发生奇迹吗？如何决定谁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心脏？医生能似上帝般地做决定吗？对此，巴纳德的言论只能引起更加激烈的争论。他在《巴黎竞赛》的一次访谈中说：“如果一个天生的白痴和一个数学天才同时需要一个心脏，而我必须做出抉择，那么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后者。”使这些争论火上加油的

是，巴纳德来自南非，一个因种族隔离而日渐臭名昭著的国家，而且之前他用一个黑人的心脏救活了一个白人。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在这一年度格外引人注目。

自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59年新年打了胜仗后，每年的1月2日，哈瓦那开阔的革命广场都要进行革命周年的庆祝活动。1968年，革命9周年，庆祝活动中多了一幅60英尺高的壁画——一个戴着贝雷帽的帅气的年轻人，阿根廷38岁的切·格瓦拉，他在两个月前在玻利维亚被杀，当时他正在贯彻古巴的新革命计划。

这次的古巴革命之路在一本叫做《革命中的革命》的书中有描述，作者是雷吉斯·德布雷，一个年轻的法国人，对古巴革命着了迷。该书于1967年被译成英文，是全世界学生的最爱，因为它符合狂躁的青年们的需求。在书中，德布雷认为应该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要循序渐进的理论，革命一开始就应从农民军开始。这正是卡斯特罗在其家乡东方省的山中所运用的策略，也是切在玻利维亚所做的事情。但是切失败了。11月流传着一张由玻利维亚空军上校展示的切的半裸尸体的照片。德布雷也被玻利维亚军队抓住了，但没有被处死，而是将他关在一个叫做卡米里的小镇的监狱里。1968年初，德布雷还在狱中，玻利维亚人允许他的委内瑞拉情人伊丽莎白·比尔戈斯到狱中和他结婚。

1968年，卡斯特罗的挚友和革命同志格瓦拉成了一个烈士，一个被神化的革命圣人——用鲍勃·迪伦的话说，格瓦拉是“永远年轻”的，蓄着胡子，戴着贝雷帽，眼睛含笑，不论言行还是装束，他都是个纯正的革命者。在哈瓦那若洛马蒂国际机场，印着格瓦拉照片的海报上写有这样的文字：“青年将吟唱机枪的噼噼作响和战场厮杀声的挽歌。直到胜利，永远。”

在古巴的所有地方都可以见到“直到胜利，永远”的字眼。六万个身着灰色制服的中学生正步经过卡斯特的观礼台，每组人经过时都热情地高

喊：“我们的责任是成为像切那样的人。”“Como che”——像切那样，有更多的切，像切那样工作的口号遍布全岛。对切的狂热崇拜已经开始了。

卡斯特罗宣布这一年的周年庆不会展示苏联武器，他解释说这样的阅兵仪式太昂贵，部分原因也包括苏式坦克也容易压裂哈瓦那马路上的人行道。

莫斯科又遇到了其他麻烦的征兆。麻烦始于这一年度的疲软经济和一次不受欢迎的对四个知识分子的审判，原因是他们散布反苏联的言论，支持反动作家安德烈·辛亚夫斯基和尤利·达尼埃尔——二人因为在西方国家出版著作而在两年前被关进监狱。中东的六日战争使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政策蒙羞，同时，集体农业走了下坡路，经济改革的尝试草草收尾，青年和知识界变得躁动不安，诸如鞑靼人掀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也不好对付。苏联集团的人民尤其是青年越来越排斥冷战姿态和语言。南斯拉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要独立的架势一直都是莫斯科的心病，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也开始有了同样的倾向。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尽管有对苏联忠心耿耿、俯首帖耳的领导人安东宁·诺沃提尼，人民却不安分。1967年4月，斯洛伐克党的机关报纸《布拉迪斯拉发真理报》做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令人震惊：大多数人反对党的路线。只有一半民众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了国际紧张局势，而28%的人说双方都有责任。最令人震惊的数据恐怕还属仅有41.5%的人将越战归咎于美国，要知道，即使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国的民众也不会对美国如此网开一面。到了秋天，捷克作家公开要求更多的言论自由，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学生开始上街游行。

1967年秋天，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委员会的一系列会议都对诺沃提尼不利。他对莫斯科的奴颜婢膝使他在1953年升任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1958年，他成为捷克总统。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反感他对捷克境内约占1/3人口（450万人）的斯洛伐克人的冷酷仇恨，觉得他应该让出一个位置给其他人。在12月的一次共产党主席团10人会议上，诺沃提尼几乎无招架之力，只得宣布“因圣诞”而休会。委员会决定在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

重新召开会议。

与此同时，诺沃提尼开始密谋。他试图散布苏联要插手保留他的职位的谣言来胁迫他的反对派，但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招致反对派的更强烈反对。他接着策划了一次军事干预以自保，准备逮捕他痛恨的反对派成员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但是一个将军将此消息透露给了杜布切克，诺沃提尼再次失败。

所以，诺沃提尼总统在新年通过广播向国人发表了意在妥协的讲话。他答应向来受轻视的斯洛伐克将成为所有经济规划的重点，他也安抚作家和学生，只要是进步的，即使是来自西方的，也会被允许。“我指的不仅仅是经济、工程和科学，还包括文化艺术领域的进步。”中央委员会在1月3日继续开会，拿掉了诺沃提尼第一书记的职位，取而代之的是杜布切克，在是否革去其总统职位的问题上虽有分歧，但诺沃提尼显然已受到了重创。捷克斯洛伐克人直到1月5日星期五才知道他们的世界即将发生改变。当布拉格电台宣布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由杜布切克继位时，捷克人还没意识到诺沃提尼的处境，大多数人不知道杜布切克是何许人。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最成功的政治家们是在公众的视线之外操纵政治的。

与此同时，奇怪的是，强硬的苏联领导人并没有什么反应。勃列日涅夫曾在12月访问过布拉格，被广泛认为是在挽救处于被围攻状态的捷克领导人的地位。但事实是，尽管诺沃提尼大事声张自己的忠心不二，却从未讨得勃列日涅夫的喜悦，当他被革职时，勃列日涅夫对他说：“Eto vashe delo.”——这是你的问题。

在华盛顿，国防部长罗伯特·S. 麦克纳马拉正在为国会准备年度报告，报告写道：“在60年代，我们所熟知的在‘二战’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形成的简单的两极结构开始解体。挚交和死敌不再那么容易被贴上标签，而过去曾经很派上用场的字眼，如‘自由世界’和‘铁幕’，似乎都越来越不合时

宜了，因为各集团内外既出现了利益冲突，也形成了新的共同利益的纽带，它们正在慢慢侵蚀着曾经被看做是不可逾越的分界线。”

在周五，也就是1968年的第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越南战场的周伤亡报告显示，185个美国人、227个南越人、37个盟军士兵阵亡。美国及其盟国总共消灭了1438个敌军士兵。

这就是第一个星期，就这样，1968年开始了。

与蚊帐争辩的人

人民不满意党的领导。我们无法改变人民，所以我们改变了领导人。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1968

1968年1月5日，杜布切克接任捷克共产党的领导，当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欢呼时，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却在为他的不幸而哭泣。

在苏联统治下的中欧历史上一个最富戏剧性的时刻，站着一个人。尽管有6英尺4英寸高，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一生都被说成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他并不像他的长相那么缺乏生气。直到他接替绰号叫“冰霜脸”的诺沃提尼职务的那一天，他们之间的敌意已持续了23年。

当杜布切克在46岁的年纪上任时，他并不显得年轻。他是个高个子，高深莫测，常常是个沉闷的演说者，但却是几百万激情澎湃的年轻人的灵感之源。杜布切克在某些方面很像议员尤金·麦卡锡。实际上，他差点儿就出生在美国中西部。

“我的父母是一对移民到芝加哥的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梦想家。”他写道。1910年，斯特凡·杜布切克，一个没受过教育的斯洛伐克木匠，因为厌倦了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毫无希望的斯洛伐克，于是沿着曲折的多瑙河走出了家

乡，到了到处都是拱顶建筑、绿树环绕的布达佩斯——他的压迫者的首都。在那里，在一个家具厂他建立了社会主义团体，梦想推翻君主政体，很快，他被工厂发现并开除。不久，他迁移到美国，一个传说中的民主、正义的国家。他居住在芝加哥北部的斯洛伐克人社区。

美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严厉的制度，并不像他听说的那么自由和正义，但至少他可以说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不必担心被捕，而且也不必被征入伍去打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君主卖命。美国卷入战争对其国内的社会主义者无疑是一记重击，这些人大都是反战人士，并且相信威尔逊不会令美国卷入战争的承诺。斯特凡，一个和平主义者——这种信念会在历史的某个关键时刻在他儿子亚历山大的身上体现——到了得克萨斯州南部城市拉雷多，在那里和贵格会教徒以及其他的和平主义者聚会，这些人可以帮他穿过国境到墨西哥待到战争结束。但是他被抓住了，罚款并被关进监狱一年半。出狱后，他回到了芝加哥，娶了一位年轻的斯洛伐克姑娘帕夫林娜。和他不同，帕夫林娜是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在她的敦促下，斯特凡开始研究马克思。当他听说他在斯洛伐克的姐姐快结婚时，他给她寄了一份很长的政治问卷，建议用它来筛选未来的新郎。斯特凡对俄国革命很兴奋，在1919年一封写往斯洛伐克的信中说：“在美国你可以拥有很多东西，但你不能拥有自由。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自由的国家是苏联。”

为共产主义奋斗近10年后，斯特凡对美国很失望，再加上帕夫林娜想念家乡，所以，1921年，斯特凡带着孩子和正在孕中的妻子回到了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几个月后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出世，这就是他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原因。在美国，他两家都有很多亲戚，但他们直到他晚年时才开始与他联络，那时共产主义已垮台。

这个新国家起初让斯特凡很兴奋，他立誓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名字是一个布拉格教授托马斯·加里格起的。最初，这个国家似乎是波希米亚人、摩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一个平等联盟。对斯洛伐

克人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巨大逆转，因为自10世纪起，斯洛伐克就一直是一个被强国践踏、蹂躏的国家。捷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在19世纪晚期就开始了工业革命并催生了知识中产阶级，他们当中的官僚和技术治国论者进入了新政府。但是经过匈牙利的马扎尔人统治了1000年之后，斯洛伐克就变成了一个贫穷的农业国，颇似与之临界的波兰地区，能用本土语言读写的人很少。大多数人是依赖贫瘠土地生存的农民。1848年斯洛伐克人首次起来反抗，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这一年与1968年很相似，只不过运动局限在欧洲。这年斯洛伐克人向匈牙利人要求平等权利的檄文《斯洛伐克的要求》成了斯洛伐克民族独立运动的范型，其作者路德维托·史都尔也自然地成了马萨里克之前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民族英雄。一种奇特的巧合是，当斯特凡和妻子帕夫林娜回到斯洛伐克时，他们住在一个村舍中，而这个村舍也就是当年史都尔在1815年的出生地，也正是在那里，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出生了。

斯洛伐克人一直被其主子匈牙利人和邻居捷克人轻视，如果斯洛伐克人细听马萨里克的话，会发现他其实也一样地轻视他们。他认为斯洛伐克人落后，缺少政治成熟度，是个“被神职人员所驱使”的国家——这都是典型的捷克人对斯洛伐克人轻蔑的成见。

但是马萨里克在捷克和斯洛伐克都很受欢迎。“一战”后期，他去了美国，得到伍德罗·威尔逊的支持；然后去了巴黎，于1918年10月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设法得到同盟国的承认，两个月后他回到了新成立的国家，成了国家英雄。

“斯洛伐克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斯洛伐克人要求称新国家为“捷克—斯洛伐克”，而不是捷克斯洛伐克，但是捷克人拒绝在两者之间加上那一短横。争论以斯洛伐克人的失败而告终，这是斯洛伐克人日后诸多失败的开始。小亚历山大对自己在斯洛伐克的童年几乎没什么印象，只对教堂后一只驯鹿和一条圣伯纳犬有印象，没能养那条狗伤了他的心。他第二次来到斯

洛伐克时应是 17 岁。如果当时的斯洛伐克是落后的话，那么还不至于像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那么不发达。杜布切克一家在 1925 年迁居到吉尔吉斯，在那里抚养孩子，搞农业合作社。

苏联吉尔吉斯，现在叫做吉尔吉斯斯坦，距斯洛伐克 4000 里，与中国临近。那里还没完全进入铁器时代，没有充足的金属打造犁头。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文盲，因为吉尔吉斯语不是一种书写语言。杜布切克一家没能到达计划中的目的地。在颠簸了 27 天之后，火车轨道在一个叫做皮什彼克的荒芜的地方终止了，他们就住在了一个残破废弃的兵营里。在那里他们帮助当地人建立合作社，并且引进了拖拉机。当地人从没见过这物什，跟在它后面喊“撒旦”。杜布切克记得刚去的那几年，因没有什么粮食，他们吃的是带壳的生雀蛋。他们从那里去了俄国的工业中心高尔基，斯特凡一直没有带亚历山大回到斯洛伐克，直到 1938 年斯大林下令外国人要么成为苏联公民，要么离开。

亚历山大现在已经 17 岁了，令人激动的新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也已成立 20 年，充满了混乱和幻灭。他继承了父母的意识形态，但在很长时间里在他身上似乎找不到父母的叛逆性格。他是一个正统的苏联教育下的共产主义者。“二战”时他是扬·齐什卡游击队的队员，该游击队得名于 15 世纪的一个勇士。他们在后方打德国人。这段战时经历在若干年后被官方党史大加渲染。他的腿受伤两次，他的哥哥被杀害。1945 年，他父亲斯特凡被德国人作为共产主义分子驱逐到毛特豪森集中营，在那里他遇到了安东宁·诺沃提尼，一个同样被驱逐到那里的著名的捷克共产党人。诺沃提尼嚷嚷着发誓说，如果他能活着回去，他再也不搞政治了。

1940 年，亚历山大在父亲藏身的一所房子里遇到了安娜，他说“我想我对她是一见钟情”。1945 年他们结婚，亚历山大一直爱着安娜直到 1991 年她去世。少见的是，作为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杜布切克却在教堂举行了结婚典礼。1968 年当杜布切克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时，他是欧洲共产主义国家中唯一一个在教堂举行婚礼的领导人。

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经过民主投票而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很不幸，就像民主国家经常发生的那样，政客们在撒谎。1946年，刚被苏联红军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投票选择了共产主义政府，它保证不建立集体制、小企业不会被国有化。但到了1948年，共产党已经完全控制了国家，1949年，政府开始接管经济，所有的企业都被国有化，农田收归国有。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是一个勤奋、认真的斯洛伐克党员干部，他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斯洛伐克的国家主义这一问题。他的斯洛伐克血统足以让他在国内被接受，但还不至于让布拉格的党总部提防他。1953年，他成为中央斯洛伐克地区书记，那一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到处着手废除过度严厉的斯大林主义，但只有捷克斯洛伐克除外。同年，“冰霜脸”诺沃提尼被任命为共产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所接受的教育有限，政治前途一直渺茫，直到在斯大林肃反运动中展露了他编造伪证的才能，比如编造伪证反对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党的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斯兰斯基是一个残忍的独裁团体的成员，很可能犯有多项罪行，但是他却以犹太复国罪被审判并被处死。其实斯兰斯基远非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曾反对苏联在早期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个词并不是指以色列的支持者，而是指犹太血统者，斯兰斯基正是出身于犹太家庭。

在斯兰斯基被审判之前，诺沃提尼和他的妻子曾受邀到当时的外交部长弗拉迪米尔·克莱门蒂斯家中做客，诺沃提尼的妻子十分眼红克莱门蒂斯家中的瓷茶具。后来克莱门蒂斯因为是斯兰斯基集团分子而被处死，诺沃提尼捏造的伪证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克氏死后，诺沃提尼为妻子买了他家的瓷茶具。

几百万册充满西方危险思想的书籍被熔成了纸浆搞建设，人民被秘密警察严密地监听，同时周围还有为革命而履行爱国责任的告密者。国内居民几乎与西方世界隔绝，与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联系也很有限。

杜布切克的工作在于发展落后的斯洛伐克经济。他很耐心地侍立一旁，

但他所提出的最简单的意见也遭到拒绝。他和他所在的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城的其他领导们一起，谦恭地建议党领导在一个新址设立一座水泥厂，一则可以避免污染城镇，二则此地有丰富的水泥原料，石灰石。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城甚至提出可以自己出资建厂，其花费并不是很大，这点在杜布切克的详尽谨慎的计划中体现出来。但该建议被拒绝，并被贴上多管闲事的“比斯特里察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标签。工业化是如此重要，以至不能让一小撮落后的斯洛伐克人插手。水泥厂照原计划进行，跟许多处于工业化项目中的斯洛伐克其他城镇一样，这一项目使城市淹没在漫天的尘土中，入口处是运输石灰石的高架铁路。

杜布切克什么也没说。他很少批评政府或政党，即便他们无能而残忍。1955年，他在莫斯科党校谋得一个位置。他看起来为此殊荣激动不已，并将其视为弥补自己薄弱的教育背景的一个机会。他认为自己缺乏“意识形态训练”，但最终他在莫斯科的三年高级意识形态课程证明这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学科，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开始谴责斯大林，学校茫然得不知道该教些什么。杜布切克从改革中的苏联回到了依然是斯大林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此时的诺沃提尼已成为国家总统。因为诺沃提尼同时也是政党的领袖，所以这个国家第一次处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

学生和年轻人并不惧怕表达他们的不满。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两个城市的文化节上，他们公开要求应有更多的政党，能阅读西方书籍、杂志，并且解除对自由欧洲电台和BBC World Service的干扰。

自党校回来后的杜布切克被提拔为布拉迪斯拉发的地区书记。他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斯洛伐克人了。他依然盲目地相信党，但是相信谁呢？从莫斯科回来后，他很清楚赫鲁晓夫和诺沃提尼说的不是一回事。杜布切克谨慎地不表现出对诺沃提尼的厌恶，尽管诺沃提尼并不掩饰他对斯洛伐克的厌恶。按照杜布切克的说法，“诺沃提尼几乎对每一件关于斯洛伐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关系的事都很无知，这当然使我很郁闷。”1959年的宪法修改使斯洛伐

克自治政府的最后一丝痕迹荡然无存。斯洛伐克人民愤怒了，与此同时，斯洛伐克领导只是一味地讨好诺沃提尼，巴结布拉格。

杜布切克对诺沃提尼为党的官员所特别设立的周末娱乐场所很不满意。“这些地方本身很好，坐落在美丽的伏尔塔瓦河盆地上，”他回忆道，“但我厌恶这一套想法，这是一个在警察的保卫下为领导人而设的奢华孤僻的场所。”他对诺沃提尼始终怀有一种印象，即他热衷于一种叫做“结婚”的扑克游戏。梦想升迁的官员们热切盼望着被邀与诺沃提尼玩“结婚”，而后者则在居所前面放了一个特制的巨大的啤酒桶盛放扑克。杜布切克不玩扑克，他喜欢周末与孩子们一起玩，或者长时间地在森林里散步。

偶尔，他也会和诺沃提尼公开争执起来。“这些争执，”他后来写道，“产生于我对斯洛伐克投资的重点，所提出的不同想法，后来在恢复50年代镇反运动中的受害者的名誉问题上与他又意见迥异。”但是作为第二把手，杜布切克几乎不能改变政府，而且他谨言慎行，是一个深怀抱负的共产党员。

60年代早期，杜布切克在科尔德委员会工作，任务是负责纠正政府在50年代所犯的错误。这个工作使他难忘。“我当时目瞪口呆，”他后来写道，“被50年代早期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圈子在布拉格的所作所为惊得目瞪口呆。”至今不清楚他之前是否真的不知道这些事，但他看起来确实是被这些材料吓了一跳，其他许多官员也一样。诺沃提尼在巨大的压力下重组他的政府。1963年，因为科尔德委员会发现的新材料，斯洛伐克中央委员会得以革除第一书记的职务，此人被视为诺沃提尼集团分子，一个卖国贼。之后，委员会推选了沉默寡言的杜布切克为第一书记。他们做这一切时没有理会诺沃提尼的咆哮，后者在会议中摔门而出，从此再也没参加过斯洛伐克中央委员会的会议。

60年代中期，诺沃提尼的日子更难过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经历惨重的转折时，他的朋友赫鲁晓夫被自己老谋深算的被保护人勃列日涅夫所取代。经济已经恶化了好几年，但因为捷克刚起步时的经济远好过苏联集团

的其他成员国，所以在此方面的管理不善一直到几年后方显露出其破坏性的结果。斯洛伐克因为缺乏捷克的优势，一直都苦不堪言。但现在甚至连捷克也开始出现食品短缺了，政府甚至发出了“无肉星期四”的指示。莫斯科的支援不可预测，再加上国内人民怨声载道，诺沃提尼就此放松了对这个警察国家的管制。审查制度放宽了，艺术家、作家和电影制作人有了更多的自由，有一些人甚至被允许到西方国家旅行。

但这依然是一个非常压抑的国家。文学杂志《脸孔》(Tvar)被关闭，言论、行动等都受到限制。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却因为这来之不易的少许自由而活跃了。随着西方不再被全然隔绝，捷克青年和西方充满活力的青年文化有了接轨，他们也穿牛仔裤，也去夜总会听摇滚乐，那时还叫“大节拍”。在布拉格，留长发、蓄胡子、穿沙滩鞋的青年比中欧任何一个地方都多。是的，在诺沃提尼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心地带，有60年代留着胡子的反叛青年，嬉皮士——或者他们是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叛逆青年？1965年5月1日劳动节，当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庆祝革命的时候，布拉格的年轻人却尊奉长发、蓄胡的奇装异服者，访问诗人艾伦·金斯堡为Kraj Majales，即“五月之王”。“Om——”金斯堡吟诵道。金斯堡由犹太教徒变为佛教徒，即使在信奉了东方宗教之后，他还是被布拉格的许多年轻人看成是令人兴奋的西方世界的化身。在他的加冕礼演说上，他敲着叮当作响的小钹，吟唱佛教音乐。秘密警察在市中心黑糊糊、花里胡哨的深街里巷里跟踪了他好几天，然后把他驱逐出境了。或者正如他在诗歌中所说的：

我被穿着捷克斯洛伐克制服的侦探用飞机从布拉格送出来
我是五月之王，性爱青年的动力，
我是五月之王，工于雄辩，大肆寻欢，
我是五月之王，是古老的人类诗歌，十万信众选择了我，
我是五月之王，几分钟后我就要降落在伦敦机场……

但正如斯特凡·杜布切克曾经指出的那样，人在美国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当金斯堡回到美国后，FBI 就将他的名字列入危险人物栏内。

尽管还是压制，尽管还有蓄胡子、穿捷克斯洛伐克制服的人出没，布拉格却正在变得受欢迎。1966 年，有 350 万人到这个国家旅游，五分之一来自西方国家。捷克电影诸如《严密监视的列车》、《大街上的商店》等在其他国家都能看到。一些捷克导演包括米洛什·福曼在国际上打响了知名度。像瓦茨拉夫·哈维尔这样的捷克剧作家享有国际声誉。哈维尔可能不是最具戏剧性的剧作家，但却是最有政治火药味的布拉格剧作家，上演了反极权主义的荒诞派戏剧，这在苏联是从未有过的。在《备忘录》里，官僚机构为了压制创造性思维，下令使用一种凭空编造出来的叫做 Ptydepe 的语言。哈维尔经常嘲笑共产主义语言。在他另一出剧里，一个角色声称：“一个和蚊帐争辩的人永远不会在伯踱摩基附近和一头山羊共舞。”以此嘲笑赫鲁晓夫编造毫无意义的俗语的习惯。

1967 年 11 月，一小组布拉格学生决定效仿传闻中西方学生的所作所为。他们示威游行了，起因是宿舍里可怜的暖气和微弱的灯光——为看似没什么出息的目的开始游行是学生运动常用的招式。正如西方学生那样，他们觉得示威很有趣。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进行，手上拿着蜡烛，象征他们被迫在微弱的灯光下学习。当游行队伍沿着狭窄的石子街道走到政府所在地赫拉德恰尼城堡时，看起来就像圣诞节的行列那么快乐。突然学生们发现警察将他们的路截断了，他们用棍棒将一些示威者赶到鹅卵石的人行道上，然后将他们拉走。大约有五十人被送进医院。新闻只报道说是“小流氓”攻击警察，但那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出这其中的秘密了，打人的消息在迅速传播，导致了更大的示威游行。到了 1967 年底，学生们散发传单，在街上与任何搭腔的人辩论，与柏林、罗马或者伯克利的学生的做法很相似。当然，他们被秘密警察监视，但这在美国和西欧也一样发生。

60年代，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和诺沃提尼对斯洛伐克的厌恶同时增长。1967年，斯洛伐克人以欢呼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的胜利来挑战政府和苏联。到了1968年，“中东”在苏联集团已经成为一个颇受垂青的政治隐喻。在波兰，波兰人没有表达对苏联的效忠之情，反而为犹太人击败了被苏联训练的部队而激动不已。1968年3月，当罗马尼亚想要宣布独立的同时，加强了与以色列的关系。

1月5日之后，诺沃提尼被解除党总书记一职，这给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希望、激动和谈资。人们最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是：为什么勃列日涅夫没有支持诺沃提尼。当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取代的时候，诺沃提尼为此十分沮丧，赫鲁晓夫是他的朋友——他们甚至在一起度假——诺沃提尼为此给克里姆林宫打电话，无论勃列日涅夫如何解释，诺沃提尼总是不满，最后气愤地摔掉了电话，将苏联领导人晾在了那里。勃列日涅夫对此耿耿于怀。

1968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都将希望和信任放在了一个高个子、有着一张愁苦的脸和惨淡微笑的人身上，这个人从没有显露出有什么大本事或者想象力，不过苏联本来也不希望他具备这些素质。杜布切克没有国外的经历，除了苏联，他只出过两次国，都在1960年，一次是在赫尔辛基待了两天，还有一次是去河内参加党的会议。

但是杜布切克和新政府里的许多同事都属于独特的一代。他们在纳粹占领下成长，将世界截然分成好和坏，苏联代表了好的力量和希望。兹德涅克·姆利纳日——杜布切克政府成员之一——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是那些渴望在战后同过去一刀两断的人的希望，当然，这些人对苏联的现实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那时的的问题不在于苏联为什么接受杜布切克，而在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什么接受他。经历了20年的斯大林主义之后，这个国家渴望改变，他们认为杜布切克能够拯救它。正如姆利纳日所指出的，在1968年以前，人们对其

领导人的性格从来都知之不多，所以，新的领导人如果很难解读，他们也已经习惯如此。正好，杜布切克很适合 1968 年的青年人的口味。他不独裁，这可以从他在公众场合的不自在和拙于言辞看出来。年轻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喜欢这种笨拙。这种性格最终会导致一种致命的优柔寡断，这是反独裁主义者经常有的一个弱点。但面对少数人的时候，他却会极有说服力。最令人兴奋的是，他习惯于倾听。杜布切克正好和路德维托·史都尔——一个被当局放逐的斯洛伐克民主主义者——生于同一所房子，他在三年前的一次不大符合主流的讲话中为什图尔辩护道：“他懂得他所处时期的所有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时代趋势，他知道必须改变一切。”也许，这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是对的。

杜布切克的家人很担心他的处境。他要说服斗志昂扬的人民他是个改革者，要让那些党和政府里的守旧派、原属诺沃提尼的人明白他是可以信赖的，与此同时还要让莫斯科对他掌控局面的能力感到满意，尽管这是个不可掌控的社会。

事实上杜布切克从来没有掌控过局势，他只是游走其间，用他在党内学到的手段来平衡反对的力量。他没有清除诺沃提尼的支持者，多年后他应该明白这是他最大的错误。常委陷入一半对一半的分裂，苏联将之称做政治局，是一个强迫给中央委员会投票的机构。这些权力机构充斥着效忠于诺沃提尼的旧党，他们并不喜欢杜布切克，甚至连司机和秘书处的人都是诺沃提尼的亲信。

斯洛伐克人的背景使杜布切克的处境更复杂，因为斯洛伐克人希望他为民族主义而战，但这种民族主义却被捷克人看做是“斯洛伐克的独裁”。

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充满了怀着各种要求和愿望的派别集团。记者们想知道审查制度的一些情况，杜布切克对诸如此类棘手的事情没有任何指导性意见。之后，历史学家们将此称做“一月的寂静”。杜布切克似乎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掌了权，只有一些模糊的想法：他想帮助斯洛伐克人，促进

经济，呼应群众要求自由的呼声。但他没有计划，而且要留心提防诺沃提尼的忠臣和克里姆林宫。

他在布拉格并不舒服；对他这样一个已经适应布拉迪斯拉发小城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太过宏伟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只有几条沿着多瑙河的街道，一座荒废的旧帝国的建筑，里面塞满了供人们居住的低天花板的斯大林时代的房屋，在野草蔓延的山坡上有一座孤独的城堡。寥寥无几的遗迹破旧不堪，新建筑也强不到哪里去。到了46岁的年龄，杜布切克突然在宫殿里上班，坐在由诺沃提尼的人驾驶的车上，穿行在一个庄严的欧洲城市。

杜布切克的沉默制造了真空，于是滋生了许多事物。1月27日，一个新的售报亭出现在该城的中心，在里面可以买到世界各地的从社会主义国家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报亭里设有阅览室并提供咖啡。晚上，小屋里坐满了阅报的人，他们看俄国、西德、法国和英国的报纸。没有审查，国家的印刷业欣欣向荣，报纸印次大大增加，一到清晨还是被售卖一空。这种自由的现象在苏联集团从没有出现过。报纸充满了关于政府腐败的报道。他们也攻击、曝光、嘲笑苏联政府。为了争取发行量，他们争相揭露苏联的肃反运动或者捷克的受贿。在此之前从没有曝过光的诺沃提尼也被报纸曝光了。据说他和他的儿子用政府的进口许可证买马赛地、阿尔法-罗米欧、捷豹和其他西方名车来讨女人的欢心。当他们对一辆车腻味了之后就将其卖给朋友，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这条丑闻给了诺沃提尼致命一击，他在3月22日被迫辞职，结束了任期，这其中杜布切克甚至没有施压。

第二天，杜布切克和其他领导人就被召到东德的德累斯顿参加华沙协约会议。当时的德累斯顿中心仍是被轰炸过后的一派疮痍。引人注目的是，罗马尼亚没被邀请与会。1968年的冬天，罗马尼亚对莫斯科来说比捷克斯洛伐克更棘手。当杜布切克想尽力做一个守纪律的共产主义者的时候，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却在“六日战争”以后日益表现出独立的倾向，当时罗马尼亚是苏联集团里唯一一个没跟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而捷克

斯洛伐克则是第一个跟随苏联与以色列断交的国家，在许多捷克人看来，诺沃提尼显得太过奉承。2月底，罗马尼亚人离开了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共产党国际会议。更糟的是，两星期后，在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举行的苏联军事同盟华沙协约国的一次会议上，罗马尼亚拒绝签署核准苏联和美国削减核武器的公报。罗马尼亚说此举是为了抗议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了对话而没有与小国进行协商。

所以，如果苏联在集团中与谁交恶的话，杜布切克没想过此人会是他。在几星期前他还为苏联《真理报》写文章，文中说：“与苏联的友谊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

杜布切克原以为德累斯顿的会议是一次经济会议。想不到的是，他突然感到被审问。一个接一个，波兰、东德的领导人责备他没有控制国内局势。杜布切克向他曾经的同盟匈牙利的亚诺什·卡达尔求助，国内布拉迪斯拉发的民族主义者若知道的话，肯定会嘲笑他居然向一个曾经压迫过他们的人求助。但即使是亚诺什·卡达尔也攻击他。对他们来说，尤其是对勃列日涅夫来说，最大的麻烦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疯狂报业，为所欲为，政府完全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苏联对其卫星国家的最首要的要求是他们要能控制局面。报纸直接导致了诺沃提尼的被迫辞职，并进一步要求他离开中央委员会，甚至退党。

他们是对的，即使在德累斯顿会议之后，当杜布切克首次意识到他令苏联烦恼的程度的时候，他依然不能控制报业。媒体自由以及可以接触到西方媒体对捷克斯洛伐克民众来说已是最重要的事情，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但是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捷克斯洛伐克不再是无人知晓的了。布拉格突然被瞩目，被谈论，甚至出现在许多国家的电视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1968年初所做的事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掀起了冲击波，并且吸引了西方国家年轻人的注意。一夜之间，一个从没见过世界其他地方的布拉格学生，蓄着胡须、穿着过硬过蓝的牛仔裤，突然感觉自己成了追求自由的世界青年运动中的一部分。



舒展开令人畏惧的浓眉

与其说社会是被人们交流的内容所塑造，倒不如说是被人们用以交流的媒介所塑造。

——马歇尔·麦克卢汉 / 昆廷·菲奥里，《媒介即按摩》，1967

就像森林中的一棵不被人注意的树倒下了，如果一次游行或者静坐没有被媒体报道，它还发生过吗？从马丁·路德·金、约翰·刘易斯、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到 H. 瑞普·布朗，虽然在民权运动的策略上有不同意见，但他们都同意应该吸引媒体注意。对主张暴力者和非暴力者都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是，暴力和暴力语言是得到报道的最有效途径。

莫汉达斯·K. 甘地，非暴力运动的鼻祖，对此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他克服重重困难，让印度、英国和美国的媒体报道他的每一次运动，他经常讲到英国人的暴力对于吸引媒体注意的价值，这与他所倡导的非暴力自相矛盾。抗议者可以是非暴力的，但他们必须引发暴力反应。如果双方都处于非暴力状态的话，那就没有故事了。马丁·路德·金曾经对此有过抱怨，但当他遇到一个叫做劳里·普里切特的人之后，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现实。

1962 年，当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将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选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营地时，普里切特是该城的警察局长。佐治亚州

西南的乡村地区因为种族隔离政策而臭名昭著，同时也是首批因违反1957年民权法案选举权条例而被联邦政府起诉的对象。只有75000人的小小的奥尔巴尼却是本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其中三分之一是黑人，所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为了鼓励本地黑人，决定在这里推行选民登记运动。该运动扩展到在公共场所废止种族隔离政策，包括巴士车站，马丁·路德·金也介入该运动。

短短几个月内，抗议者和执法者之间就发生多次对峙，大量人员被逮捕，其中包括金，但这个彬彬有礼、善于辞令的警察头目从没动过武。普里切特在奥尔巴尼黑人区内安排了线人，因而可以预知抗议者的每一次行动。因为没有暴力，所以金和其他的领导者无法让罗伯特·肯尼迪和司法部门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地干预。要知道，联邦政府的干预可以制造大新闻。更糟的是，普里切特讨媒体喜欢，他是个温和且令人愉快的家伙。他跟媒体说，他已经研究了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手段并且采用非暴力执法来对付他。民权分子批评金总是平安地置身事外，金对此做出回应，让自己在奥尔巴尼被捕，但此举却让他丧失了宝贵的上电视做“与媒体会面”的节目的机会。他的收获只是被普里切特亲自放出狱，后者说是“一个不明身份的黑人”交了保金和相关的罚款。许多人猜测保人是金的父亲，一个有身份的亚特兰大人，有时被人叫做金爸爸。在人们看来，金进监狱没关系，因为他爸爸会把他弄出来。而事实上，只是这个老谋深算的普里切特直接将他放了出来。

整个的奥尔巴尼运动是一场灾难。奥尔巴尼之后，民权运动领导者学会了避开普里切特一类的人，而是将目标设定在那些有着性急的警察头目或脾气暴躁的市长的城镇。“该运动本能地知道怎么才能上新闻和怎样留在新闻里。”吉恩·罗伯茨说，他来自北卡罗来纳，当时负责为《纽约时报》报道民权运动情况。1965年3月，美国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马丁·路德·金注意到《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弗利普·舒尔克放下相机去帮助一个遭警察殴打的人。之后，金就设法找到了他，对他说他们不需要他救助示威者，而是拍

摄他们。金说：“你的角色是摄下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

1965年的塞尔马，一个胖胖的叫做安妮·李·库珀的中年妇女挥拳猛击当地的治安员，许多摄影师注意到了，当三个警察抓住这个妇人时，摄影师们纷纷拿出相机拍照。然后她激怒治安员，治安员则挥舞警棍猛击她的头部，击打声甚至都被记者们注意到了。他们拍下了照片——克拉克警长挥舞警棍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这张照片上了全国各地报纸的头版。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玛丽·金说，“新闻媒体对大众的教育就好像是现代意义上的‘笔’，而这支笔的威力仍然比剑还强。”

当民权运动越来越注重媒体效应的时候，马丁·路德·金成了明星。他是第一个成为媒体明星的民运领导人，也因此比他的前辈或同辈更有名也更有影响力。拉尔夫·阿伯内西说，“我们明白我们实际上已成为象征。”金经常被自己人指责为抢曝光率，把荣誉都揽到自己头上，而实际上这正是他被民权运动利用的表现。他不怎么善于创新，但却是个雄辩家；多亏了他的魅力，民权运动才那么上镜。他并不愿意当明星，在教堂里要比在示威场所或记者招待会上自在得多。他曾经说：“我感觉有两个马丁·路德·金。我自己感到惊讶……我被自己的事业弄得莫名其妙。人们所谈论的马丁·路德·金对我来说就像是个陌生人。”

奥尔巴尼之后，吸引电视报道成了每次运动的整体策略之一。在金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上，安德鲁·扬担任媒体总顾问一职，至少负责由白人掌控的媒体。他知道，若要每天上电视，他们就得每天提供简短而富有感染力的言论，就是现在所谓的原声摘要播出，而且必须配上电视行业所称的“良好的视觉效果”。扬强调这一点，金很快就领会了，并认为自己每天的讲话应该在60秒以内。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都认为金为此已走得太远，他和他的组织过分使用媒体。他们相信他在制造短期新闻事件，反之，这些成员们希望他们能在南方社团里做更多的事情，以使局面有个基本的改变——总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远离摄像机的过程。

但事实是，到了1968年，民权运动、黑人力量、反战运动，甚至国会和保守政见者都已深陷于如何上电视这个问题，用CBS的记者丹尼尔·肖尔的话说就是，如何“按下按钮”。

电视技术上的两项革新——录像带和卫星直播彻底改变了广播新闻。两项革新都在60年代得到发展，虽然直到70年代才得到充分应用，但早在1968年它们就改变了新闻记者的思维。录像带不昂贵，而且可以多次使用，在广播之前也不需要经过处理。1968年，大多数的电视新闻还只是拍在16毫米的黑白胶卷上，经常是用架在三脚架上的相机拍摄，虽然也有手拿的相机。因为胶卷昂贵且需要时间处理，所以不可能什么都拍。摄影师通常是架好了相机等着记者的示意。当记者认为事件值得拍时，就会发出信号给摄影师，摄影师就会按下按钮开始拍摄。当然有时摄影师也可以自作主张。“你可以为了一分钟的效果拍十分钟的素材，”肖尔说，“但你不可以为之拍上两小时。”

肖尔发现，“事情的关键在于分贝……只要听到有人高嗓门地嚷嚷：‘你怎么坐在那里纸上谈兵，’——我就会按下快门，因为电视青睐戏剧和冲突，任何事情只要预示着冲突，就有可能被播放——被搬上那天晚上的‘克朗凯特秀’，而我们图的就是这个。”

摄影师的在场开始对辩论双方的礼节产生显著的影响。肖尔回忆拍摄参议院的情景，“他们无缘无故地提高嗓门，纯粹是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但不仅仅是参议院的政治家这么做，阿比·霍夫曼，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和马丁·路德·金也都这么做。1968年，在与媒体合作大约十年后，金对肖尔抱怨说电视只鼓励黑人领袖说出最暴力的火药味十足的话，而对非暴力却了无兴趣。“当黑人被激起暴力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是你们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金曾就此问过肖尔。

“我是不是在一直寻找火药味十足的原声摘要播出，好让我做的东西上

晚间新闻？”肖尔曾如此自省，“恐怕我正是这样的。”

改变电视的另一个发明是实况卫星转播。第一次卫星转播的是1958年12月1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录制好的圣诞问候。早期的人造卫星，例如“晨鸟”，与地球的相对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变化之中，所以只是在某一天的某些特定时段才能收到地球上某地的新闻。促成一次大新闻的卫星转播需要许多巧合的因素，所以在最初的几年内在技术上很难做到。在那些年里，欧洲新闻通常只能在次日早上才能在美国播出，因为要等胶片运到。欧洲新闻首次能在同一天在美国播出并不是卫星转播的功劳。1961年，柏林墙修建的第一天，因为清晨很早就动工了，又借助时差的优势，CBS及时将胶片空运到了纽约，赶上了晚间新闻。肯尼迪总统抱怨说只给了他半天的时间，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酝酿对此事的回应。

CBS新闻负责人弗雷德·弗兰德利知道即时的卫星转播最终将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实现，并且有朝一日这项棘手的发明不仅将改变电视新闻的实质，也将改变新闻本身。1965年，他希望能 在克朗凯特的晚间新闻里播一段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卫星实况转播。克朗凯特晚间新闻在每晚纽约时间7点播出，什么地方能在这个时候给“晨鸟”发信号呢？他把地点定在了柏林，一个几年来都是新闻话题的城市。肖尔被安排到柏林墙，那里绝对上镜，而且是实况的！肖尔一再说那天半夜在柏林墙什么也不会发生也无济于事，他没意识到重点，重点是那是一次实况转播。

“所以我站在那里，”肖尔回忆道。“这是一堵墙，墙的后面是东德，因为我们在这里开着灯，你可以听到狗叫声。狗开始叫了，‘你可以听到狗在追赶某个企图逃跑的可怜的东德人时发出的叫声。’——一堆废话！但它是实时的。”

CBS甚至说服了德国一家正在审讯一名纳粹战犯的法院，将一轮审讯改到半夜以后进行，使之得以实况转播，而不是在白天录好之后在晚上播放。实况电视新闻时代从此开始了。

根据美国军方发言人的说法，1968年的第二个星期，即总统发布国情咨文的那个星期，创下了战时一周敌军死亡人数的记录：2968人，之前的最高纪录是1967年3月25日结束的那一周，仅有2783人。这一周的最后一天同时也见证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旧金山的晚宴上面对着1500名友好宾客为自己的外交政策辩护，外面是警察用棍棒对付400名反战示威者。又有三名美国军人在1月12日星期五向瑞典申请政治庇护。在早前的星期二，有四名水手从“无畏”号航空母舰逃逸，获得了瑞典公民签证。

种族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公众情绪出现了变化，这被称为“白人的反击”，部分是对犯罪率增加和对年轻人及其反主流文化明星公开使用禁药的反应，但更多的是对北部城市黑人暴动的反应。诺曼·梅勒于1968年出版了三本书，其中的一本题为《迈阿密和芝加哥之围》。书中写到在一场民权领袖拉尔夫·阿伯内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阿伯内西晚到了40分钟。梅勒描写了在等待时自我发现的瞬间，既怪异又具有代表性。“这个记者开始感觉到一种怪怪的情绪，他以前从未意识到这种情绪的存在。”梅勒和夏尔·戴高乐差不多一样自大，经常以第三者的口气指代自己——“这是一种简单的很不愉快的感觉——他开始厌烦黑人和他们的权利。”但接着就有了更重要的揭示：“如果连他都稍有厌倦的话，那么全美国这种情绪的释放又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浪潮啊？”

起初，正如大多数南方人所预想的，民权运动正符合其他地方的人们对南方人的一种偏见。当运动向南推进，并与“公牛康纳”这类口音拖沓的野蛮人较量时，看起来有如英雄壮举。但到了1965年，马丁·路德·金开始在北方城市倡导“开放居所”运动，大多数美国白人就觉得无法接受了：他们不仅想在亚拉巴马上学和乘坐公交车，还想与我们做邻居。

金和其他领导人也开始投入更多的时间反对越战。1967年，当金成为一个直言的越战批评者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做这种事的主要的民权运动领导者，大多数的CORE（种族平等代表大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

员早在1965和1966年都已表明反战了。金的许多南方基督教领导联盟的顾问都不太愿意在战争时期批评政府。1967年，国家终战动员委员会及其领导人戴维·德林杰，一个“二战”征兵制度的反对者，竭力劝说金加入反战运动。也有人建议德林杰，反战运动里有太多的黑人领袖，对争取更多的反战支持者不利。许多白人认为黑人领袖加入反战运动逾越了民权领袖的合理界线，完全无视黑人虽只占美国人口比例的11%，却占越战美军中的23%这一事实。黑人现在是想支配外交政策了。重量级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可能是比金更懂得操弄媒体的黑人，他拒绝被征兵，说：“我跟越共没什么过不去。”他被判逃避兵役，在约翰逊发表国情咨文的一周后，阿里的上诉被驳回。

阿里原名叫卡休斯·克莱，据他自己说这是一个“奴隶的名字”。1963年他成为黑人穆斯林，同年改名为阿里。黑人穆斯林、黑人力量，尤其是支持暴力、掠夺和与警察枪战的声势越来越浩大的黑豹党，都使白人害怕，头一年夏天在黑人贫民区的火拼更打破了许多人的底线。金说像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这样的黑人力量的倡导者给白人提供了他们正需要的借口。“斯托克利不是问题，”金说，“问题是白人和他们的态度。”

对执政的民主党来说，对城市暴力的反应是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的一个助手跟《时代》杂志说：“如果今年夏天再暴乱四起，我们在秋天就真的下台了。”金反对约翰逊，对民主党也没什么好感，但他对由此而引起的对抗性反应却有深远的担忧。“若是接下来的两个夏天重蹈去年夏天的覆辙，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被右翼控制而成为法西斯国家。”金说。

1月12日，总统约翰逊发表国情咨文，史无前例地被电视台广泛播报。三大电视网外加PBS的前身——新国家教育台均对此给予播报，而且这四家电视台都撤下别的节目，留出时间让嘉宾对此进行讨论。CBS取消了《绿地》、《他和她》以及《乔纳森一家的冬季秀》的节目，用两个半小时的空前篇幅报道了发表国情咨文的情况。NBS则取消了阿兰·金的《卡夫音乐

厅》特辑和 *Run for Your Life*，用两个小时报道国情咨文。ABC 则推迟了由杜鲁门·卡波特写的剧目《劳拉》，该剧是为了捧红杰奎琳·肯尼迪的妹妹李·布维尔·瑞齐维尔。CBS 用参议院少数派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的评论代替埃迪·艾伯特和伊娃·加博尔的节目。但是对此做最广泛深刻的分析还属 NET，该台花了三个多小时来报道 1967 年度国情咨文，引领了潮流。到了播报 1968 年度国情咨文时，电视台取消了时长限制，这对商业电视台来说闻所未闻。此外他们安排了强大的明星阵容，包括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克利夫兰黑人市长卡尔·斯托克斯和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如果国情咨文是国家发展方向的风向标的话，那么显然对自由主义不利。“大社会”这个热词是约翰逊用以展示任期内政绩的一系列社会项目，可它只被提及一次。国会听众、内阁成员和高级军官例行公事地对演说报以适时的掌声。根据《时代》杂志的统计，总统的讲话被掌声打断 53 次，虽然这些掌声大多没有诚意。一次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来自于约翰逊讲到下面的话时：“美国人民受够了国内日益猖獗、无法无天的犯罪。”

关于新的社会项目方面，约翰逊宣布了《安全街道法》，这是一个新的反毒品法，用以重罚出售风靡校园的 LSD。他也要求对枪支控制进行立法，以此制止“邮购谋杀”案件的发生，这是在他的 52 分钟的演讲中唯一得到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鼓掌欢迎的一次。

约翰逊也回应了河内的谈判建议——谈判条件是美国停止轰炸和其他敌意行动——他说：“如果对话立即开启并确实有望获得建设性进展的话，那么轰炸将立即停止。”随即，他气愤地回忆了河内违反新年停战协定的一幕，说“对方不能利用我们的克制，像过去那样”。在新一轮要求在即将到来的越南新年之际停战的呼声中，该讲话显得很重要。

两天后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与里根或尼克松相比，更多的人将约翰逊看做是鹰派的。在人们更倾向于将政治人物分成鸽派或鹰派，反战派或主战派，而不是民主派或共和派的年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里根和尼克松

都被认为没有资格竞选总统，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他们都是鹰派的。

在《纽约时报》一篇题为《为什么 L.B. 约翰逊和国家之间有距离》的文章中，马克斯·弗兰克尔说，约翰逊的问题不是他处理与媒体的手法不高明，而是他不足以令人信服：

但是约翰逊先生的难处不仅仅是越南——甚至可能不是越南。他的问题是他对自己的战争策略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却说服不了多少国民。如果他拿得出说服力，即便敌对阵营的批评者，都至少会尊敬他做事的诚意。可事实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跟他理论是行不通的，他只不过是害怕承认“错误”，或者不敢冒险回撤……在许多公众场合露面，他常常会先练习，有些在事后还反复研究。他在电视上尝试过舞台效果中的每一种灯光组合，所有类型的政治演说都被他说了个遍。

弗兰克尔引用总统将他自己比做“波士顿红袜队”有名的外野手特德·威廉斯。尽管有骄人的记录和成绩，但当特德·威廉斯上场的时候总会遭到观众的嘘声。“人们谈论我，”约翰逊解释说，“是我把球击出栏外的——但他们就是不喜欢我站在本垒板上的那副样子。”《纽约时报》后续又刊登出五名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成员署名的《致编者信》：

另一方面，总统显然故意对他与此君的其他相似点视而不见：

(1) 波士顿红袜队的球迷不是因为威廉斯的站相嘘他，而是因为他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2) 威廉斯出问题往往是因为在同公众和媒体打交道时粗鲁、不成熟、缺乏运动员的风度；(3) 威廉斯从来打不了左外野；(4) 遭遇诸如波德鲁针对他的移防这种新困难时，威廉斯从来不上选择迎难而上，而是坚持收复右外野。

自约翰逊发表国情咨文之后，马丁·路德·金，一个民权运动领袖中最不愿谴责战争的人，号召于2月份在华盛顿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历史上最残忍和最无意义的战争”。

“在这个大选年，我们需要对国会两派的议员们、对美国总统讲清楚，我们无法再容忍，我们不会推选出继续将对越南人和美国人的屠杀看做是通向自由和东南亚民族自决之路的人选。”

传统上国会开会的第一天经常是马马虎虎的，但1月中旬的第19届国会的第二次会议的开端，却因为5000名大多身着黑衫的妇女边走边唱着抗议越战的歌曲而闻名。她们的领导是87岁的珍妮特·兰金，第一个女性国会议员。

1月21日的一场名为“百老汇争取和平的1968”的音乐会将在纽约爱乐大厅演出，他们的招贴上号称汇聚了“最强大的明星阵容”，其中包括了哈里·贝拉方特、伦纳德·伯恩斯坦、保罗·纽曼、乔安妮·伍德沃德、埃利·瓦拉赫、卡尔·赖纳、罗伯特·瑞安、芭芭拉·史翠珊，和当年最负盛名的电视明星汤米·斯玛瑟斯。演出所得将捐给反战的两院候选人作为选金，他们其中的许多人都到场了，在演出后与支持者见了面。

甚至华尔街也在反战。佩因·韦伯、杰克逊和科蒂斯三家经纪公司都在报纸上登了整版的广告，解释和平对投资者的好处，并称和平“于股市最为有利”。

国情咨文发表之后的第四天，肯尼迪出席在纽约的罗切斯特由商会举行的一个年度正式晚宴，他提议大家举手表示对继续战争的支持或反对，其中反战的大约有700人，支持战争的仅有30到40人。

然而，约翰逊依然被认为是11月竞选总统的热门人物。1月份盖洛普调查显示有48%的人支持他，维持了去年10月份38%低支持率之后的上升趋势。国情咨文发表后的第二天，距新罕布什尔州公开初选仅八个星期的时候，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约翰逊的民主党专家都同意共和党的预测：约翰

逊很可能以 5:1 击败尤金·麦卡锡。

在约翰逊发表国情咨文的同一天，北越和越共在经过 10 天最激烈的战争后全面停止了地面战，如同是约翰逊命令的一样。美国军方猜测敌人可能在准备部队和粮资的供给。兵役登记局宣布 1968 年将征兵 302000 人，比 1967 年上升了 72000 人。

由于美国的民主并不限制公民的夸大妄想，所以总有人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被邀请到白宫，你是会对总统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在公众面前有失风雅呢，还是会做个好人而浪费掉这个机会？

1968 年 1 月，艾萨·凯特，一个于 50 年代后期在时髦的巴黎左岸俱乐部走红的一个娇小、优雅的黑人酒店驻唱歌手遇到了这个问题。总统夫人伯德·约翰逊邀请她到白宫出席一个“女士晚宴”。为了支持总统新近出台的政策，晚宴的主题为“公民用什么来协助街道安全”。大约五十名女士坐在有着黄色墙壁的家庭用餐室，10 人一桌，用相配的滚金边的盘子和餐具，享用从浓蟹汤到第一夫人最喜欢的胡椒薄荷甜点。这些大多家境优越的白人女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表对街道犯罪的看法。当凯特倚着讲台用她特有的磁质声音发表看法时，在座的都被惊得目瞪口呆：“你们送往前线的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他们被打死或致残。他们上街反抗。他们吸毒寻乐，他们不愿上学，因为担心被从母亲身边掳走，送往越南战场。”

关于这次对峙，不同的记者听来的版本也有些微不同。在《时代》杂志的版本里，她的原话是：“难怪孩子们造反和嗑药——你们要是听不懂这行话，我指的是抽大麻。”

沉默了一阵之后，新泽西州民主党州长理查德·J. 休斯夫人说：“我觉得我有道义为战争说几句话。”她说她的第一任丈夫在“二战”中被杀，她有八个儿子，其中一个空军老兵。“我的儿子们没有谁想去越南，但是他们和他们的朋友都会去的。”她补充说，没有一个儿子吸大麻。在座的宾客

终于舒了一口气，为她鼓掌，凯特则交叉双臂瞪着她。

约翰逊夫人，明显白了脸，有人说是强忍着眼泪，站起来走到讲台，正像一个在鸡尾酒会上常“救火”的女主人那样，彬彬有礼地说：“我们不能因为战争在持续——我祈祷和平公正而真实地降临——就对反对街头犯罪、为我们的人民争取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这些责任视而不见。街头犯罪这件事是我们能解决的。很抱歉，关于贫民区的条件，我不能说得像你那样好、那样有激情，因为我没有住过那里。”

凯特是南卡罗来纳一个小佃农的女儿，从少年起就在纽约哈勒姆街区的血汗工厂干活，以贴补家用，她解释说：“我必须说出我的心里话。我住过贫民区。”

约翰逊夫人坦率而异常优雅地回答说：“很抱歉，我不能理解你所做的事情，因为我的生活背景和你的不一样。”

这就是美国的缩影——善意的白人自由主义者无法理解黑人的愤怒。每个人都想对这起被广泛报道的事件发表评论。许多人赞成凯特的勇气，也有许多人惊骇于她的无礼。马丁·路德·金认为她虽然是第一夫人的客人，她的举动也是“很得体”的，因为她“说出了许多人的感受”，并且他认为约翰逊一家的耳朵“是与人们所表达的心中真正的感受是有某种距离的”。

吉恩·罗伯茨在1968年初离开了《纽约时报》民权版而被派到西贡。相较于民权，越南的话题显得冷冷清清。“我觉得自己离开了热闹地儿。”在华盛顿他参加了几次美国政府发出的情况吹风会。在CIA的一次吹风会上，他问最近是否打了一次胜仗。CIA官员回答说：“有六个理由可以认为这是一次胜仗。”并详细说了这六个理由。罗伯茨又问：“有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一次败仗呢？”

“有八个理由认为这是一次败仗。”这位官员说，并又列举了这八个理由。在白宫，罗伯茨参加了当局一位高官的吹风会，他答应不透露该高官

的身份。“忘掉战争，”他对罗伯茨说，“战争结束了。现在我们要赢得和平。你应该关注的事情是”——他说这个就好像在说一个秘密代码——“IR8 稻谷”。

“什么？”

“IR8 稻谷！”美国政府已经做了大规模的实验，发现 IR8 稻谷一年能有两次高产量的收获。他对罗伯茨说这肯定是目前在越南最大的事情。

西方新年之后不久，罗伯茨就到了西贡，他打听 IR8 稻子的情况，但无人知晓。最后他听说在南越的一个最安全的省份正在举行稻谷节，实际上这是一个 IR8 稻谷节。村庄里搭起了简单的露天看台，几个村民正盘腿坐在一个角落，嘴里嚼着草片。世界各地的农民都会围坐着嚼草片。在农村长大的罗伯茨对此很熟悉，并断定这是一个很好的与农夫聊天的机会。他和翻译走过去，与农民们一起蹲下。

“你认为 IR8 怎么样？”

农民口中发出一串不连贯的、愤怒的音节。翻译说：“他对此有保留。”罗伯茨让译员以第一人称逐字逐句地译。他又问了一次同样的问题。音节再一次从农夫口中喷出，就好像是从自动化武器中喷出的一样。

“基本上来说，”译员说，“他说，‘操他妈的 IR8 稻谷。’”其他的农民点头表示赞同。译员接着翻译：“我父亲和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种的都是湄公河三角洲水稻，如果这么多代人都觉得这稻子好，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不一样的东西？”

其他的农夫们热切地点头。

“噢，”罗伯茨又问，“既然如此，那你们为什么还来庆祝 IR8 节呢？”

被询问的农民嘴中喷出更多的音节，“因为你们的总统”——他用手指着罗伯茨，但实际上指的是南越总统阮文绍，“你们的总统派了一批人拿着来福枪逼我们上了公交车。”

罗伯茨在想，这里面肯定有故事，但很难揭示。他已答应不泄露那个政

府知情人的身份，但这个计划——或者说这个计划的失败又摆在眼前。当他还在筹划 IR8 的报道的时候，他又被指派负责每日特大新闻。南越的北部海岸岘港爆发了战争，岘港靠近原省会城市顺化，离北越很近，一直有传言说北越要大举跨过边境线到南越。罗伯茨上了飞往岘港的飞机，低头看见西贡笼罩在战火中。他一直没写关于 IR8 的故事。

1月30日清晨，越南新年，岘港的空军基地被攻击，由67000人组成的拥护北越的部队在六个省会城市和五个主要城市包括西贡发起了进攻，岘港的军事攻击属于其中的一部分。

在前一天的半夜，由阮文六（Nguyen Van San）领导的11个人聚集在西贡的一个车库。阮文六是西贡郊区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夫，四年前被指派破坏西贡的军营，从此开始了他的事业。作为奖励，他最近被允许加入了人民革命党。他和他的手下人将枪支弹药藏在放西红柿的篮子里，悄悄地将它们转移到了车库周围的地方。这支一打多人的小分队远比67000人中的其他人做得更多，因为对世界而言，他们成为了越南“新年攻势”的象征。阮文六这支部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的进攻最成功地得到了媒体的报道。

阮文六的任务是攻击美国大使馆，许多驻扎在西贡的新闻人员就住在美国使馆附近，所以报道美国使馆很方便。在这之前，有关越南战争的报道都是滞后的，最快也是赶在一场持久战的中间。但美国使馆对外通讯顺畅，记者能在它附近把报道发给报社，胶卷可以很快地运走，而且他们还有时差的优势。攻击发生在1月30日，但在美国还只是1月29日，到了1月30和31日，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战争的照片和画面。人们看到美军在使馆的院子里找掩护，死亡的美军有的陈尸于地，有的被拖走，有的放在汽车后运走。越共的尸体叠得很高。接连几天内，美国民众一直看到美国兵或被打死，或躲在高墙之后的画面。

阮文六和他的人马钻进了一辆出租车和一辆标致小货车，迅速开往使

馆，并向门卫开火。美联社纽约站在 15 分钟之后最先报道了该事件，当时攻击者轰开了使馆的第一个缺口。他们冲进使馆猛烈开火，打死了两个警卫，阮文六似乎也是被这两人打死的。游击队员们进一步用火箭炮轰开了围墙。报道称这些攻击者是一群“敢死队”。那天早上 7 点 30 分，纽约时间是晚上 6 点 30 分，战事还在进行，NBC 的“亨特利-布林克利报道”报道了战事，虽然没有画面。据报道，20 个敢死队员强占了使馆。对究竟谁在使馆建筑内开火、谁在院子里开火，报道得并不清楚，但美国人多少知道一些。最后，警察用一辆吉普车撞开了前门，之前此门被门卫在第一时间锁上以防敌人冲进来。随后，记者们扛着摄影机跟着国会议员走进了使馆，拍下了尸体、弹眼和滚落的印章。9 点 15 分，使馆脱离危险，越战中最著名的一战也随之结束。八个美国人被打死。

阮文六小分队片甲不留，这是一次自杀式的行动，事先没有逃跑计划。67000 名越共游击队的对手是南越 120 万的兵力，其中 49.2 万人是美国兵。威廉·C·威斯特摩兰，这位经常用敌方死亡人数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将军，立刻宣布敌人在这次战斗中失败，并死伤无数。他总是说他看到了战争“黑暗中的曙光”，但是并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事实是，一星期后越共连一个城市都没有保住，并失去了约一半的兵力。此后的七年里，越共游击队因为在新年攻势中元气大伤，再也没能担当主力角色，战争转而是由正规军越南人民军继续，美国人称之为北越军。现在看来，当初越共的四星将领阮志清 (Nguyen Chi Thanh) 反对过新年攻势，认为用传统作战法去冲撞比自己强大的兵力是愚蠢的，但在最后敲定之前，他在一次美国的轰炸行动中被炸死。

这次攻击的成功之处可能是北越人没有意识到的，因为虽然在军事上它失败了，但在媒体上它却成功了。美国情报官员当时茫然地不知如何解释这种自杀式军事行动，便推断赢得媒体的报道一定是他们唯一的目的，北越人用新年攻势赢得了公关的胜利。结果是耀眼的。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电视上的即时战争报道，但在 1968 年这却是全新的事。这之前战争从没

有这么快地被带到起居室。今天的军队在操控媒体方面更有经验，但在新年攻势期间，美国观众在自己的客厅里看到的却是美国兵的蹒跚、惊慌和死亡的画面。

1968年2月，CBS的“克朗凯特秀”和NBC的“切特·亨特利-戴维·布林克利秀”创下了史上最高的收视率。当5600万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视的时候，收看“克朗凯特秀”的家庭达到了1100万，亨特利-戴维·布林克利则进入了1000万家庭。那个月里，全美三家电视网络都通过昂贵的卫星转播将片段从日本传到纽约，卫星转播还是头一次被如此频繁地使用。政府再也不能控制战争留给公众的印象。《纽约时报》电视评论员杰克·古尔德写道：“对广大的电视观众来说，上星期的严酷画面让人见识了越战的痛苦是巨大的，而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及国防部长罗伯特·S. 麦克纳马拉在昨天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超然事外的分析是断章取义的。”

平面媒体也越来越关注战争。《哈珀斯》杂志和《大西洋月刊》推出了越战特刊。《哈珀斯》在2月份就已面世的3月刊全部用来刊登诺曼·梅勒关于反战运动的文章，强烈批评美国政策。《大西洋月刊》的3月刊被全部用来刊登一篇丹·韦克菲尔德的同样是反战的文章。虽然两份杂志都有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也都从没有做过专题月刊，但两家杂志都声称他们在同一时间出版同一专题的特刊纯属巧合。

在这个2月份的媒体大爆炸中，照片的运用被发挥到以前罕有的水平。通常是黑白的《时代》杂志采用彩色的了。新年攻势的时间与《纽约时报》内部的一次争执刚好吻合，照片部要求报纸使用比以往更大的、没有被剪裁过的图片。经过多次争论，《纽约时报》同意，如果照片部能提供足够好的图片，他们可以印一张大照片在报纸上。

摄影师埃迪·亚当斯与NBC的一位员工在西贡的晨曦中散步，遇到一群越南水兵拖着一个男人，他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显然已遭毒打。突然，亚当斯看到了南越国家警察的头目阮玉柔（Nguyen Ngoc Loan）将军掏出他

腰中别着的枪。当阮玉栾将军伸直手臂向囚犯的脑袋开枪的时候，亚当斯看到了男人悲哀的眼神。他抓拍了这一切，随后洗出了照片并通过电子扫描仪将它们发往纽约和世界各地。《纽约时报》同意这些不寻常的照片需要不寻常的呈现方式。2月2日的头版头条是一个弱小的男人的照片，他被反绑着双手，脸因为被阮玉栾将军抬手射出的子弹击中而扭曲着。下面是另一张照片：一个南越士兵抱着被越共杀死的孩子，表情忧伤痛苦。在第12页上登着另外三幅照片，分别标着“囚犯”、“死刑”和“死亡”，以亚当斯排列的杀人顺序呈现出来。这些照片赢得了无数的新闻摄影奖，至今仍是那场战争中最令人难忘的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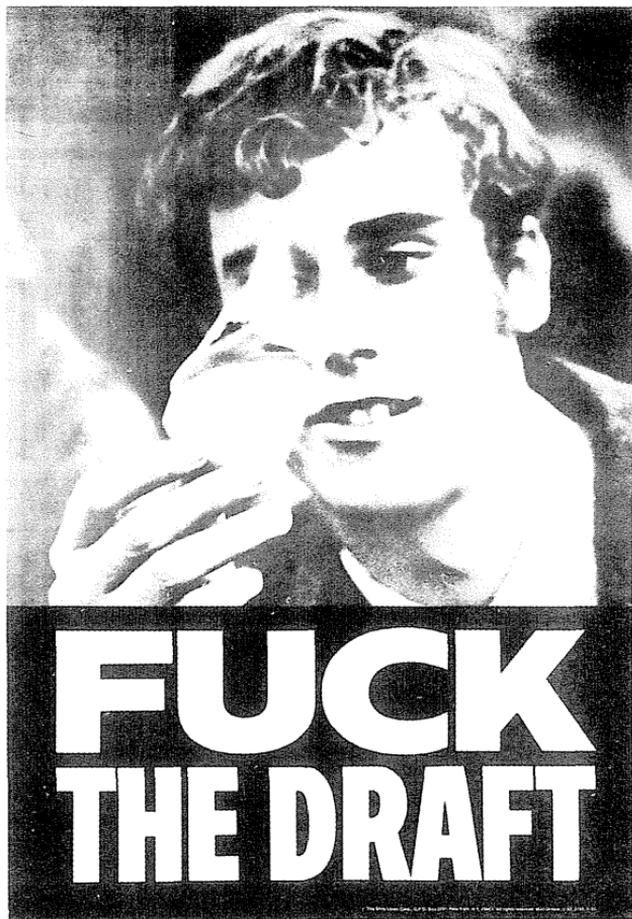
在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被如此细节化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当年年末，约翰·韦恩推出了一部反映越南的影片《绿色贝雷》，自己兼任主演和导演。雷纳塔·阿德勒为《纽约时报》写评论，称该影片“愚蠢”、“虚假”、“不可理喻”。理查德·席克尔在《生活》杂志中除了同意这些形容词之外，还说：“多亏了大众媒体的恪尽职守，我们所有人——无论是鹰派还是鸽派——认识了现实中的越战，它和影片中的战争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在此之前，无论是约翰·韦恩还是其他美国制片人都无须面对这种争议，因为此前多数的电影都不像真正的战事。但现在，即使战争爆发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人们也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样子了，因为人们已经在媒体上见识过战争了。

1968年，好莱坞的电影制片人第一次被允许不加限制地刻画暴力，电影审查制被分级制代替，因此，好莱坞拍摄的战争看起来也能像电视上的战争那么可怕了。但最早有此类暴力画面的影片都不是战争片，如1968年的警匪片《警网铁金刚》(Bullitt)和1969年的西部片《日落黄沙》(The Wild Bunch)。

另一个和战争片有关的问题是，公众每天都从媒体获得比好莱坞老套电影更好看的战争故事。布鲁克林的快评和《战后你要做什么》中波澜不惊的

场景，比不上像海军下士乔纳森·斯派塞那样的真实故事。乔纳森·斯派塞是一个迈阿密卫理公会牧师的儿子，风趣而又不守规矩。斯派塞拒绝上前线作战，所以被安排做了医护兵。起初同伴都瞧不起他，但嘲笑不久就停止了，因为斯派塞毫无畏惧，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密集炮火威胁下的伤员，将他们拉到安全的地方。溪山3月的一天，当医护兵试图转移伤员的时候，炮火开始了，斯派塞被命令躲到掩体中。在水兵们被困溪山时，只要他们试图疏散伤员，越共就会炮击。但当斯派塞看到一个同伴很难将伤员扛起时，他奋勇地跑过去帮忙，正好被炮弹击中。在只有几码远的战地医院，斯派塞被宣告死亡。这种战地医院一般不做大手术，只是将伤员进行包扎并将他们转到综合医院，但这个医生却认为他能救活斯派塞，打开了他的胸腔，按摩已经停止跳动的心脏，用手指堵住流出的血并重新缝合，使得这个年轻人起死回生。但这毕竟不是好莱坞电影，三天后，19岁的下士斯派塞被转移到日本的一家医院，终因伤势严重而死亡。

人们既然看到了战争，当然不喜欢战争。世界各地的几十万人的反越战示威成了司空见惯的事。2月11至15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大学、波士顿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三天的绝食抗议。2月14日，抗议者于倾盆大雨中在巴黎游行，法国警方说人数是一万人，但组织者说有十万。他们手中挥舞着北越的旗帜高喊，“越南是越南人的越南”，“美国人滚回家”和“约翰逊是凶手”。四天后，西柏林的学生模仿美国的示威，但做得更好，有约一万名西德人和从西欧各国来的学生高喊：“胡，胡，胡志明！”——让人想到美国的“胡，胡，胡志明！NLF就要赢！”胡志明称他自己所领导的组织为民族解放阵线（NLF）。德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奇克说：“告诉美国佬，除非摒弃帝国主义，否则被我们赶出去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游行者鼓动美国兵开小差，其实已经有美国兵这么做了。他们向瑞典、法国、加拿大申请庇护。2月份，多伦多的反征兵计划组织寄给美国5000册《应征时期移民加



美国反战海报：正在焚烧
的征兵卡
(帝国战争博物馆，伦敦，
海报底片号 LDP 449)

拿大手册》，共 132 页的平装本，由美国的逃避兵役者在加拿大的一个有着八间屋子的地下室里印刷。除了一些合法信息外，手册还提供了加拿大的一些背景资料。其中一章的标题是，《是的，约翰，还有一个加拿大》。到了 3 月份，即使是相对温和的墨西哥城的学生也举行了反战示威。

原打算每月征兵 40000 的义务兵役制，征兵数目上升到每月 48000 人。约翰逊当局取消了学生因攻读研究生而延缓被征的做法，宣布 15 万名研究生从财政年度开始的 7 月份起将被征入伍，这一决定不仅对准备攻读研究生

的学生是严重打击，就是对美国研究生院来说也是一记重击。被征对象包括比尔·克林顿，当年乔治敦政府学院大三的学生，他拿到了罗氏奖学金准备到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为此，美国研究生院将失去 20 万即将入学的学生。一位显然无视当今的“政治正确性”的大学校长抱怨说，研究生院将沦落为一个只有“瘸子、瞎子和女生”的地方。

哈佛大学法学院艾伦·德肖维茨开设了一门课程，教学生如何合法地抵制战争。500 个法学教授联名请愿鼓动法律界积极反对约翰逊当局的战争政策。在溪山，五千名美国水兵被两万敌军包围，这些敌军可以随时得到北部边境的替补和增援。七天的激战在 2 月 18 日结束，美国兵伤亡 543 人，创了每周伤亡的纪录。这其中包括已订婚的 101 空降队海军上尉理查·W. 珀欣，“一战”中美国远征军总司令的孙子。他是 2 月 17 日在找寻同伴的尸体时被敌军打死的。

约翰逊总统的民调迅速下滑，甚至理查德·尼克松这个共和党的长年失败者都赶上了他。尼克松在民主党内最害怕的竞争对手是纽约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罗伯特仍坚称自己是忠诚的民主党人。就是这个罗伯特在 2 月 8 日芝加哥的一次演讲中说，越战是打不赢的。“我们必须首先抛弃这种幻想：过去的两星期意味着某种胜利。”罗伯特说。“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据说越共不能保住城市，这有可能是事实。但尽管我们捷报频传，他们却显示出了政府的强大和敌人的软弱。我们有 50 万的美军加上 70 万的越南盟军，我们全面控制了海、空控制权，有强大的后援和最先进的武器，但我们没能使一个城市幸免于敌军的攻击，而对方的人数只有 25 万。”

新年攻势在持续，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军遭到了突袭？在新年攻势前 25 天，使馆已经截获一则消息，知道他们要在南方几个城市包括西贡发动新年攻势，但并没有做出应对。在新年期间偷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789 年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年，也是华盛顿将军宣布就职的一年，越南

光忠帝利用新年作掩饰向河内进军，这让中国人很吃惊。当时越南的兵力并不像现在的越共那么少，10万人外加几百头大象，他们暂时击退了中国人。难道威斯特摩兰不知道这个广为人知的事件吗？越南皇帝光忠的一个小塑像就立在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办公室里，是他的一个越南朋友送的。还有就是1960年，越共令人吃惊地在新年前夕发起了攻击并取得了胜利。节日攻势在越南几乎已是一个传统。北越将军武元甲在1944年的圣诞前夕对法国人发起了突袭，于此开始了他的事业。

现在，同样是这个武元甲将军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里面有好几个版面的彩照呈现死亡的美国士兵，这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杂志是一个不寻常的设计。

“到底出了什么事？”CBS的沃尔特·克朗凯特在节目之余问，他看到了来自西贡的报道。“我还以为我们就要打赢战争了。”

在一个没有中立地带的年份，沃尔特·克朗凯特却自得地站在中立的立场。他是堪萨斯州一个牙医的儿子，属于中西部的中产阶级家庭，他自信但并不傲慢地保持着客观中立的观点。猜测沃尔特·克朗凯特的政治观点成了一个受欢迎的字谜游戏。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克朗凯特并不是一个百事通，但却是恰巧知道某事的那种人。他是那么决然地中立，以至于人们研究了脸部表情，希望找到持某方观点的迹象。许多民主党人，包括约翰·肯尼迪，都怀疑他是共和党人，但共和党人又认为他是民主党人。民调专家研究过，克朗凯特在美国的声望远高于任何政治家、记者或电视名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贝利在看了民调之后说：“我担心的是，只要克朗凯特深沉的男中音变一个调，或者他那著名的浓眉一挑，就可以改变这个国家成千上万人的投票。”

克朗凯特是最不把自己当回事的电视记者之一。他想成为一个沟通媒介。他很珍惜人们对他的信任并认为这种信任来自于真实。他坚持是CBS

而不仅是他本人赢得了美国人民的信任。由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持的CBS晚间新闻自1963年推出以来便是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不同代人之间的“代沟”不仅分化了社会，在记者中也有很明显的体现。戴维·哈伯斯塔姆曾经是《纽约时报》驻越南记者，他回忆说，经历过“二战”的老记者倾向于相信军队。“他们认为我们不爱国，他们不相信军人领袖在说谎。”年轻一些的记者，像哈伯斯塔姆和吉恩·罗伯茨，却在公众和记者圈里制造一种感觉，那就是军人领袖在说谎。“然后还有更新的一代，”哈伯斯塔姆说，“他们吸毒，知道所有的音乐，我们管他们叫‘瘾君子’，这些人从不相信军人领袖说的任何一个字。”

沃尔特·克朗凯特属于经历过“二战”并相信军人领袖的一代，让哈伯斯塔姆在最初报道越战时深受困扰。但尽管如此，沃尔特·克朗凯特在他30分钟的晚间新闻中并没有透露个人的倾向，相反，克朗凯特却越来越怀疑美国政府和军人没有说出真相。他没有看到威斯特摩兰将军一直在保证的“黑暗中的曙光”。

为了弄清在越南究竟发生了什么，克朗凯特决定亲自去越南看看，这个决定让美国政府担心。他们可以在自己使馆的失守中幸存下来，但如果失去沃尔特·克朗凯特，美国人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CBS新闻总监理查德·萨伦特也很担心，是有记者被送到战场，但公司的宝贝可不能送去。

“我说，”克朗凯特回忆道，“我要去，因为我们要个新年攻势的纪录片。我们每天都看到报道，但我们不知道它发展下去会成什么样子。我们有可能战败；那样的话，我就应该在场，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新年攻势最后成功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撤退，我们后来也的确这么做了，但是我就要在那里看到这个场面。”

沃尔特·克朗凯特从不把自己当做一个什么重要的历史性的媒体人物或者国宝，这些只是别人对他的看法。终其一生，他都只把自己当做一个记者，所以不想错过任何一个重大事件。为合众国际社报道“二战”时，他与

盟军一起登陆北非，与第一支轰炸部队飞过德国，与部队在诺曼底登陆，与空降兵降落在荷兰。阿登战役爆发时也有他在。他总是想亲临现场。

萨伦特的第一个反应是可以预料的。克朗凯特记得他说道：“如果你需要去，要求去，我无法阻拦你，但若去那样一个地方有可能失去你，失去我们的播报员，这是愚蠢的，对此我要好好考虑考虑。”

但他接下来的反应让克朗凯特大为吃惊。“但如果你真要去，我想你应该把你的所见所闻拍成纪录片，说明你为什么要去，或许你还可以说一些你认为战争应该如何发展的话。”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记者们都知道迪克·萨伦特是不允许对新闻有主观评论的。克朗凯特评价萨伦特说：“他要是在某篇记者报道的哪个字里嗅出一点点个人见解的味道，就会死死反对——他坚决不允许出这种事。不仅仅是对我，对任何人的任何评论性文字都是这样。”

所以当萨伦特对克朗凯特说出这样的话时，克朗凯特当即回答道：“那将是一篇评论。”

“是，”萨伦特说，“我在想也许是时候了。你赢得了声誉，因为你和CBS 同人的共同努力，我们 CBS 建立了诚实、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声誉。你自己也说我们两面受敌，你自己也说过，在我们收到的信里，说我们是该死的保守派和说我们是可恶的自由派的一样多。我们支持战争。我们反对战争。你自己也说过，要是我们称称这些信，它们应该差不多重。我们认为自己是中立的、客观的。如果我们享有这般声誉，如果人们如此相信我们、相信你，也许说出你的观点是有裨益的。你从现场告诉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他们你的观点。”

“你变得越来越深邃了。”克朗凯特告诉萨伦特。

克朗凯特意识到他所获得的所有声誉也许会毁于一旦，因为他正在越过以前不敢越的雷池；CBS 也担心他们位于榜首的收视率会因为克朗凯特从斯芬克斯变身为时事评论员而下滑。但经过深思熟虑，克朗凯特和萨伦特都

认为在这个充满疑惑的时代，人们需要听到一个明晰的声音解释正在发生什么，将会发生什么。

当克朗凯特到达越南的时候，他由衷地高兴，他重又穿上了战地记者的衣服，头上戴着头盔，莫名其妙地做出翘起大拇指的手势。但从一开始克朗凯特和他的同伴就困难重重，很难找到一个友善的机场停机。当他们在2月11日最终到达西贡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战区。威斯特摩兰对他说过，他这个著名主持人是幸运的，因为他在一个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刻来到了越南，新年攻势的情况正如美军所愿。但事实是，威斯特摩兰跟他说话的那天是新年攻势的第12天，虽然美国已经收回了失地，但死了973个士兵。美军死伤的数目每星期都在增长。2月9日那一天，56个水兵战死在溪山。

美海军陷入了南北越交界处的溪山，战况很糟糕。河内和法国媒体开始将该地方比做奠边府，1954年越军在此地击败了陷于此的法军基地。法国媒体在将两者做比较中几乎和北越人一样高兴。

在华盛顿，有谣言盛传因为担心失去溪山和5000个水兵，美国可能使用核武器，以至有记者问厄尔·惠勒将军，美国是否考虑在越南用核武器。惠勒是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的回答根本没让人打消疑虑，他说：“我不认为守卫溪山用得上核武器。”此前该记者的提问中根本没有涉及溪山。

要去溪山的记者被列成一个名单，没有沃尔特·克朗凯特，因为那里太危险，美军不想失去他。他被安排到顺化，一个曾经是殖民时代的首都的地方，这里的华丽建筑已经被美军的炮火摧毁。克朗凯特被告知美军又一次占领了顺化。但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美军还在为收复顺化而战斗。2月16日，海军陆战队第5团第1营以死11、伤45为代价夺得了这个城市的200码地。正是在顺化这个地方让美国人初次领略了短而粗、轻量级的苏式武器AK-47的威力，它的效率相当于一支单发狙击枪，1秒钟能打10发子弹。这种武器在后来的中东、中美洲和非洲战事中被普遍使用。

最让克朗凯特这个老战地记者感到困惑的是，前线的士兵和低级将领告诉他的情况和西贡的指挥官们告诉他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这是许多报道过越战记者的共同感觉。“关于战争有那么多明显的谎言，”吉恩·罗伯茨说，“不只是今天所谓的‘美化’。我们被告知不真实的情况，前线的士兵所说的跟他们所说的事情完全相反。记者和美国政府之间有了明显的裂痕。”沃尔特·克朗凯特来自越南的报道在2月27日东部时间晚上10点播出，克朗凯特的无数的崇拜者激动地收看这个节目，他们看着他在越南，在他一直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应该在的地方报道战事。在最后一站播报之后，他回到了CBS认为他应该在的地方，穿着西服坐在一张书桌之后。他看着摄像机，眼神如此个人化、坦诚、不矫揉造作，他的九万观众几乎可以相信他是在一对一地跟他们单独说话。他坚持亲自撰写讲话稿，这更增加了他的真诚感：

如果在今天说我们快胜利了，那是无视事实，一味相信乐观主义者，而他们在过去是错误的。如果说我们已在失败的边缘，那是在向毫无道理的悲观主义臣服。说我们正陷在战争的泥潭中进退维谷似乎是唯一现实的结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军事分析家和政治评论员们说敌人是在谈判之前做垂死的挣扎，虽然被他们言中的几率相当渺小，但是如果他们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必须试探敌人的意图，以防此情况属实。但在本播报员看来，越来越清楚的是，我们唯一理智的出路便是谈判，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而是以一个守信用的民族的身份，这个民族履行了它捍卫民主的誓言，并且努力做到最好。

我是沃尔特·克朗凯特，祝大家晚安。

这不是一个激进的观点。大多数反战领袖都不能接受它的假定。但在一个或反战或支持战争的两极化时代，沃尔特·克朗凯特的表述是反战的。他不是60年代这一代，他属于“二战”这一代，他的事业建立在战争的基础

上。克朗凯特觉得支持民主、反对共产主义对他来说是那么义不容辞，所以他不认为公开支持冷战是对中立观点的违背。现在他说我们要从中跳脱出来。当然，在这个时候他不是孤立的，连保守的《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也在说：“越战注定要失败。”

尽管遭遇许多麻烦，但约翰逊似乎把克朗凯特的这番特别评论当做头一次遇到的真正的麻烦。关于约翰逊的反应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说，“如果我已经失去了克朗凯特，那就意味着我已经失去半个美国。”另一个版本是，“如果我已失去了克朗凯特，那就意味着我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这个节目据说对总统的影响很大。克朗凯特认为他的影响力被夸大了。“关于此事我从未问过约翰逊，虽然我们很友好。但毫无疑问，我的这个节目就好比给骆驼背上再添一根稻草，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这头骆驼——这头骆驼的脊背——已经要撑不住了。”



1968年2月，越南前首都顺化被美军轰炸之后满目疮痍

(图片提供：马克·里布/玛格南图片社)

对电视史同样意义非凡的是，这之后克朗凯特的支持率不降反升，克朗凯特和萨伦特对在新闻节目中添加少许主观评论的那种犹疑也从此在电视媒体中烟消云散。事实是，从1968年开始，演艺界、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和脱口秀主持人越来越多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一时间，所有的公众人物，无论他或她的公信力如何，都被要求发表观点，从越南到内地城市的困境。另一个新趋势是政治人物出现在电视的娱乐节目中，最著名的有约翰尼·卡森的“今晚”秀，另外还有“罗温和马丁的搞笑剧”和“斯玛瑟斯兄弟的喜剧时刻”。有些人并不喜欢将新闻和娱乐这样掺和在一起。《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写道：“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迟早要每晚穿上招摇的杂耍紧身衣跳双人舞，而克莱夫·巴恩斯”——当时《纽约时报》的剧评家——“则来点评新汉普郡的预选”。

新年攻势的特别报道过去几十年后，克朗凯特说：“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记者的责任。我们这么做是很自我中心主义的……对我和允许我这么做的CBS来说都是件很自我中心的事。”恐怕不会再有媒体明星像克朗凯特那样地自我解剖了。

对着波兰人的耳朵轻语

我想像你那样统治——总是秘密地进行。

——亚当·密茨凯维奇，《先人祭》，1832

商业和政治风格的一大特征是对立双方的交流，它使得反对与抗拒的表达同对话与交流本身隔绝开来。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4

没有人比那些学生们自己更惊奇地发现在“苏联阵营中的最快乐的营地”居然会发生学生运动。快乐大本营是波兰人的一则冷幽默。并不是说波兰人有多快乐，而是说他们从苏联阵营中获得了一些其他东欧国家所没有的权利，比如自由旅行。他们当然比诺沃提尼的捷克斯洛伐克快乐，波兰政府甚至将五美元的硬通货卖给想要出国的波兰人。

到了1968年，关于苏联阵营即将覆灭的说法在西方国家的学术圈中已流传多年。1964年夏，一组经济和商业专家在莫斯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讲关于苏联集团的解体问题。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也在其中，他察觉到了共产主义世界出了问题，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当他在秋天回到学校的时候居然面临学生起义，这是西

方学生第一次重要的起义。

许多人认为属于东欧集团的时代来临了。当杜布切克上台执掌捷克斯洛伐克，而勃列日涅夫匆匆忙忙赶到布拉格的时候，有经验的苏联观察者当即忆起了1956年10月，当时赫鲁晓夫赶到华沙面对已在政坛重整旗鼓且大受欢迎的哥穆尔卡，而后者一度很狼狈。尽管有赫鲁晓夫的干预，哥穆尔卡还是上台了。波兰的这次抵抗对于匈牙利反抗莫斯科是个鼓舞。勃列日涅夫布拉格之行的不成功是否意味着揭开了苏联集团动乱的序幕？

莫斯科对此颇为害怕。他们有新近造反的罗马尼亚和铁托的南斯拉夫，甚至连卡斯特罗的古巴也给他们带来麻烦。正在苏联和罗马尼亚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的时候，2月份在布达佩斯的一次世界共产党人大会遭到古巴的抵制，当时古巴正在政府内部进行反苏联的清算。1月份，古巴共产党“发现”了亲近苏联的“小集团”，并以“革命的叛徒”的罪名判处九个亲苏联的古巴官员。一个被判15年徒刑，八个被判12年徒刑，其他26个分别被判两到十年不等。

尽管波兰在东欧本来就有爱造反的名声，但是在1968年，让莫斯科劳神的国家越来越多，波兰在其中并不是高居榜首。63岁的哥穆尔卡在位时间虽然比赫鲁晓夫长久，但显然已失去了一些支持者。他知道他应该在波兰的民族主义和与莫斯科的关系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避免出现匈牙利1956年的崩溃局面。但是1956年入侵匈牙利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性谴责也让苏联人吃了不少苦头。哥穆尔卡知道克里姆林宫的弱处，同时也知道有让苏联让步的机会。苏联的经济表现很差，而且他们再也承受不起在1956年入侵匈牙利后在西方引起的那般敌意。所以莫斯科犹豫不决的时候，正好是个很好的试探底线的机会。这些底线究竟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但所有的集团领导人，包括杜布切克，都知道至少有两件事是莫斯科无法接受的：从华沙公约组织中撤退和挑战莫斯科的权力垄断。

哥穆尔卡是个谜，无论是CIA还是克格勃的特工想要分析他都束手无

策。他反对民族主义，但同时又有一点波兰民族主义的色彩；他有反莫斯科的历史，但又极力想和苏联搞好关系；反犹，但又跟一个犹太人结了婚。波兰的犹太人过去常打趣说，娶了那样一个犹太女人，谁都会变得反犹的。对此，玛利安·图尔斯基，一个在波兰周刊 *Polityka* 上对哥穆尔卡做了好几年报道的记者说：“哥穆尔卡与戴高乐有相似之处……都是十分自私并有着无限的自我的人。”

哥穆尔卡至少同时面对三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指向：国内因为经济的不景气而引起的不满，莫斯科的偏执，内部斗争——一个野心勃勃的将军几年来一直阴谋推翻哥穆尔卡并取而代之。据当时自由欧洲电台波兰语频道的台长扬·诺瓦克说：“内政部长莫恰尔早自 1959 年起就密谋推翻哥穆尔卡。”

莫恰尔没有读过马列主义和其他相关的书籍，其实，他就没读过多少书。虽然粗俗无知，但他懂得权力并希望将这个“快乐的大本营”变成一个由他控制的警察国家。他是波兰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的一分子，这个团体被称为“游击队员”（Partisans），曾在波兰国内共同对抗纳粹。该团体与支持哥穆尔卡的所谓莫斯科派势不两立，莫斯科派的人曾逃到俄国，与俄国人一起和德国人作战。被迫离开波兰的犹太人成为莫斯科派。为了使自己和“游击队员”掌权，莫恰尔玩弄了一个波兰历史上经常玩弄的把戏：打犹太人这张牌。

自 1492 年犹太人被从西班牙驱逐后，到了 18 世纪，波兰成为欧洲地区犹太人最集中的地方。但是波兰人却变得越来越反犹。“二战”时，很多波兰人虽然抵抗德国占领，却与德国人合作，几乎将居住在波兰的 330 万犹太人屠杀殆尽，仅有 27.5 万人幸存下来。战争结束后，犹太幸存者面临着来自波兰人的更大规模的屠杀。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像它所承诺的那样结束对犹太人的仇恨，一波一波的犹太人在阶段性的反犹运动中离开波兰。波兰政府鼓励他们移民到以色列，并给他们提供护照和交通工具到维也纳。当时在

波兰流行着一则犹太笑话：一个聪明的犹太人是如何跟一个愚蠢的犹太人对话的？答案是：通过维也纳的电话。

20世纪60年代中期居住在波兰的犹太人只有30万，其中大多数人认同共产党而不是犹太教。虽然排外主义在波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奇怪的是，这些犹太人却相当泰然，他们相信共产主义是建立一个公平社会、结束反犹的唯一希望。

1967年，莫恰尔发现哥穆尔卡政府已经被犹太人渗透。支持哥穆尔卡的莫斯科派的许多人都是犹太人，并且不少都高居官位。波兰的反犹人士想当然地认为犹太人是外国人，是不忠诚于波兰的，是外国政府的间谍。在波兰，一个波兰犹太人总被看做是犹太人，而一个波兰人则被看做是基督徒。犹太人经常被指责站在苏联人一边反对波兰人，或者站在以色列人一边反对苏联人。现在莫恰尔认为他们在同时做着这两件罪恶的事情。

所有这些在1967年都来了个大爆发。当年阿拉伯人在引人注目的“六日战争”中被以色列人击败，波兰人祝贺以色列。哥穆尔卡收到了有犹太背景的波兰高官对以色列使馆的祝贺电话的文字材料。当然这份文字材料是莫恰尔派捏造的，此类通话纯属子虚乌有，但哥穆尔卡却难以无视这个指控。

以色列使馆收到了来自波兰各地的贺信和鲜花，但并不是来自政府官员。祝贺也不是都来自犹太人。波兰人在问，这些以色列战士难道不是波兰人吗——那些通过维也纳离开波兰的犹太人？突然之间来自波兰的犹太人成了波兰人。以色列的国防部队哈加纳难道不是波兰人建立的吗？实际上它是由一个来自敖德萨的犹太人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建立的，但许多以色列士兵出身于波兰也是个事实。难道不是犹太胆小鬼（jojne）——反犹主义者对怯懦的犹太人的称谓——在战场奋战吗？“Jojne poszedl na wojne”——犹太胆小鬼上了战场——这句话在波兰语里还押韵哩。而这帮犹太懦夫居然赢了，在六天之内打败了苏联训练的军队。这是一个很精彩的笑话，每个人——不是犹太人，而是波兰人——都笑得有点过头。

哥穆尔卡并不喜欢俄国人，但他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嘲笑他们。苏联战败后，有消息说在“六日战争”期间，勃列日涅夫将核潜艇开到了地中海。然后他给约翰逊打热线电话，两人联合起来阻止以色列军队开到大马士革。与此同时，哥穆尔卡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都在参加勃列日涅夫主持的一个会议。根据哥穆尔卡秘书的记录，关于阿拉伯人失败的消息一点一点地传到了勃列日涅夫那里，当时他正在与哥穆尔卡以及其他领导人开会。对此俄国人不仅仅觉得是一个失败，还觉得这是一个羞辱。哥穆尔卡回到华沙，很烦恼，说这个世界离战争越来越近了。之后他接到了内政部长莫恰尔和秘密警察头目的报告说，波兰犹太人同情以色列人，但报告绝口不提非犹太教的波兰人也同情以色列。

1967年6月18日，哥穆尔卡在工商联会议的一次演讲上提及“第五纵队”的活动，此次演讲于是被解读成清算犹太人的一个信号，或者，正如大家所知的是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近在咫尺，要被连根拔除，不能让他们占据高位。工人民兵组织一直就乐于为政府效劳，这时便义不容辞地开始反犹游行。但是由于大家对“犹太复国主义者”（syjoninci）这个词并不熟悉，所以有些被喊上参加反犹游行的工人居然举着这样莫名其妙的标语：“犹太复国主义者滚回到暹罗去（Syjoninci do Syjamu）。”

当哥穆尔卡一边面对着莫恰尔的威胁，另一边又要应付莫斯科的时候，学生中爆发了波兰异议人士运动。大学生不大可能是一些对社会不满者，因为他们出身于优越的共产党家庭。这些学生的家长们在一个几乎是梦魇般的废墟社会上建立起了有社会正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对犹太后裔来说，这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

“二战”后期，苏联红军迅速将德国人逼退到西方，波兰军队在华沙起来抵抗德国人并希望红军尽快到来。但是红军并没有来，波兰自卫军连首

都一起被摧毁。苏联人说他们被德国人阻挡住了，波兰人说德国人希望见到一个被摧毁的、臣服的波兰。根据苏联人的说法，华沙被摧毁了80%，但波兰历史学家说95%的华沙沦为瓦砾。

当红军最终到达华沙的时候，只有13万人——原住民的1/10——居住在那里，或挤在远远的河畔，或居住在危险的不稳定的废墟中。对波兰共产党人来说，第一个任务就是要重建一个作为历史中心的华沙，要展现华沙的文化，要有彩色的建筑，有着高高的柱子和浮雕的威严的罗马式国家大剧院。大学要有花园和带门的校区，在那里，在黑色铁门后林荫茂密的校园中，在一个废墟上恢复的历史性建筑中，建设新波兰的那些共产党人的儿女们在和平安宁地学习。

这不是民主执政，也没什么言论自由，这有点像德国剧作家彼德·魏斯在1964年写的一出剧本《迫害与谋杀让-保罗·马拉》，由萨德勋爵执导，莎朗通精神病院的病人表演。自彼德·布鲁克在1966年将此剧改编成英国电影《马拉/萨德》后，该剧就为人所熟知。这出剧不仅开启了一个冗长标题的风尚，而且成为60年代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剧目。故事发生在1808年“巴士底监狱日”前夕，表现了世界大多数地方的年轻人共有的对自由的渴望。法国革命开始后不久，那时的人们不是很自由。最后，在一首叫做“光荣的十五年”的歌曲之后，囚犯们唱道：

如果多数人只有一点
少数人有很多
那就离我们的目标很近了
我们畅所欲言
无须偏袒或恐惧
我们不能说的
就对着你的耳朵轻轻说

波兰的共产主义青年并不总是与父辈们一致，他们认为这是“无自由”，正如 60 年代中期一个极受欢迎的德国作家、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说。波兰和大多数苏联集团的人都是马尔库塞理论的证明：与反对者的交流阻碍了话语。在波兰，要批评政府或者“制度”需要一种正事反说的本事。《政治》(Polityka) 周刊被认为是倡导思想自由的，在报道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时多采取批评的态度。它经常采取反说的办法。如果一个学生抗议，《政治》不会直接报道此事，它会说那个学生已经撤回了抗议信，很有可能还会列举他在信中所撒的谎，这样波兰读者就可以知道有一封抗议信甚至还能知道其中的一些内容。当《政治》的编辑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想要批评政府的时候，他会先写一篇文章表扬政府，一星期后他又会写文章批评之前的那篇文章。他总会对着你的耳朵轻轻说。此人在几十年后成了波兰共产党的最后一任书记。

当波兰年轻人越来越擅长做一个异议人士的同时，他们也掌握了传播信息的另一个技巧。他们会将希望波兰人民知道的情况透露给外国传媒。他们最喜欢把消息告诉《纽约时报》和《世界报》(Le Monde)，但只要第二天早晨设在维也纳的自由欧洲波兰语频道的扬·诺瓦克和他的同事能读到，其实任何媒体都行。波兰语频道和捷克语频道会一起合作，这样，双方的人民都可以了解对方的信息。1968 年，双方都知道对方有一个学生运动。他们知道美国也正在进行一场学生运动，他们毫不费力，甚至只通过波兰媒体就知道马丁·路德·金、美国南部的静坐和抗议越战的学生运动。波兰主要的官方报纸《人民讲坛》在 1968 年对波兰的报道很少，却大量地报道越战和中东，其中大多是关于以色列如何掠夺了大片土地并不想归还。他们还详细报道民权和美国的反战运动。美国校园的主要特征——静坐和游行被官方的共产党媒体报道。但刚进入 1968 年的时候，学生们是想象不到在波兰出现这种景象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快乐大本营”里外国媒体并没有受到压制，波

兰人可以到图书馆看《世界报》或者英国《卫报》。但由于语言限制，这些报纸只能给少数懂法语或英语的人看，包括很多学生，其他的波兰人只能等着收听自由欧洲电台。

学生、旅游者甚至是商人在国外的時候都会到在维也纳的自由欧洲电台停留，给他们提供信息。但很多人拒绝为该电台工作，因为冷战的这一代是在资本家是敌人的教育中长大的，是在由于数量有限而人满为患的学校中演练如何防御美国核武器攻击中长大的。波兰的学校太少，因为每个学校都得建造造价昂贵的遮挡核爆炸坠尘的掩体。

异议人士亚采克·库龙说，“我想自由欧洲电台是 CIA 办的，虽然我不肯定。但它是我唯一的消息来源，我想接触更中立的媒体，但没有啊。”尽管他对自由欧洲电台持有一些不好的看法，但该电台的工作人员还是对他有相当的好感并信任他。诺瓦克这样评价库龙：“他是我这一生见过的最高贵的人之一。”

除“自由欧洲”之外尚有《文化》(Kultura)，这是一份波兰语报纸，是由一群居住在巴黎的波兰人办的。《文化》在波兰的发行量可以达到 5000 份，但这通常远远不够，并且发行也很慢。

库龙说：“我最关心的是将消息传给波兰人民。谁被打了，谁被抓了。我是一个中立的信息点，我必须将这些消息传出去。”他指着他在华沙的一间小而黑的公寓中的一台白色电话机，“我用这台电话一天几次地给自由欧洲提供消息，因为他们会迅速地将其传回到波兰。一次，正当我告诉自由欧洲关于七个人被抓进监狱的时候，两个警察走进我的房间让我跟他们走。‘你知道你们在抓谁吗？’我问。‘我们抓的就是你，库龙。’他们说。”

库龙并没有挂断电话，于是这个被捕就被录了下来并马上得以广播。

“自由欧洲”在波兰的广播时间是清晨 5 点到半夜，一周七天，播音员是波兰人。内容有音乐、体育和整点新闻。该电台声称持严格中立的立场，没有任何主观评论。虽然很少人相信这一点，但对此几乎没人在意。听电台

的人希望听到西方观点，但电台关于波兰的消息都来自波兰本国。

波兰政府对电台进行干扰，但这反而成为一种信号。如果打开电台的波兰人听到了熟悉的轰轰的马达声，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目。如果仔细听，还是可以辨出内容的。“干扰是我们的伙伴，”诺瓦克说，“因为人们好奇地想知道到底他们隐藏了些什么。”

1964年的一天，一个中等个头、金发、典型的波兰年轻人在从巴黎返回波兰的途中，在维也纳的自由欧洲电台停留。他只有18岁，是两个著名异议人士——库龙和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的信徒。这个年轻人热情地想象着社会主义的前景：既是民主的也是人性化的；四年后的1968年，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将这种社会主义叫做“有着一张人性面孔的共产主义”。

诺瓦克回忆起这个叫做亚当·米赫尼克的年轻人：“他看起来还很孩子气，但在思想上，对于他这年纪来说，却是惊人地成熟。”米赫尼克出生在利沃夫大屠杀之后的一个犹太家庭，利沃夫现在属乌克兰，但在米赫尼克出生的时候还是属于波兰。战前，他父亲的家是个传统的犹太家庭，一贫如洗。他母亲来自一个被同化了的克拉科夫家庭。亚当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他父亲在战前因为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被逮捕过。亚当在一个共产主义世界长大，将两个碰巧都是犹太人的罗莎·卢森堡和列夫·托洛茨基作为自己的崇拜偶像。“当反犹分子叫我犹太人的时候，我才醒悟我是个犹太人。”米赫尼克说，言下之意就是在1968年之前他都没有太注意到自己的犹太身份。

1965年，米赫尼克是华沙大学历史系学生，是50个围着库龙和莫泽莱夫斯基转的学生成员之一，当时莫泽莱夫斯基是一个27岁的历史系研究员，也是个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米赫尼克这样评价库龙和莫泽莱夫斯基：“他们是英雄，是领袖。”

库龙和米赫尼克一样来自利沃夫，但他是在战前出生的。1965年他已经31岁。他母亲获得了法律学位，在怀上库龙时结了婚，她常常苦闷地抱怨自己“大材小用”。他父亲是一个机械工程师，波兰社会主义党的一个领

导，但他不喜欢苏联人，跟苏联人打交道使他更反对共产主义。1949年，当15岁的库龙决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爸爸激烈地反对。

刚开始时，库龙和莫泽莱夫斯基的讨论小组是获得政府支持的。共产主义青年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的官员，并且可以向小圈子里的好友提问。但到了60年代他们的问题变得如此尖锐，以至那些官员们都不想回答了。一次在莫泽莱夫斯基向一群年轻人发表演讲之后，政府关闭了社会主义青年联盟（ZMS）在华沙大学的一个讨论小组。被学校取缔之后，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继续在私人公寓开会，大概有五十个学生参加。

经过多次讨论之后，库龙和莫泽莱夫斯基认为波兰的制度并不符合马克思的要求，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是用了这个名字和许多标签来迷惑人民。1965年他们决定写一封匿名的公开信，宣称现在的制度是没有正义和自由的假马克思主义，并影印分发给群众。这两个年轻人之所以不署名是因为怕被送进波兰监狱。但不知何故，警察知道了他们的行动，并在他们正在复印的时候破门而入。警察只是没收了原件，并警告说，如果他们胆敢散发传单，就将他们投进监狱。

如果没有遭到进一步的惩罚，他们也许会听从这个警告。但库龙的妻子失去了大学副教授的工作，而且库龙和莫泽莱夫斯基不停地遭到骚扰。几个月后，他们决定公开抗议，开始公开辩论，并做好进监狱的准备。

库龙和莫泽莱夫斯基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并在旁边声明他们等着三年的监狱生活。“我们正好说准了。”库龙回忆说。

他们仅分发了20份复印件，但他们将一份复印件给了耶日·盖德罗伊奇，此人在巴黎出版有5000份发行量的《文化》。信先是被译成捷克文，然后是多种欧洲语言。在古巴能读到西班牙语的译文，在中国的读者能读到中文译文。在巴黎、伦敦和柏林的学生都能读到这封信。

19岁的亚当·米赫尼克被第一次关进了监狱，跟他在一起的是两个不情愿被他崇拜的人，库龙和莫泽莱夫斯基。

截止到1968年1月，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运动已经成为华沙大学学生运动中一股主要力量，但其影响仅限于华沙大学的校园内。莫泽莱夫斯基说他们被警戒在藩篱内，不得不爆发。他也一直警告说，如果他们爆发，就将遭到政府的攻击。

爆发的机会来自于19世纪初的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一出戏剧《先人祭》(Dziady)，毫无疑问，密茨凯维奇是最受尊敬的波兰作家。他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无可匹敌的声誉基本上来自于写立陶宛乡下生活的史诗《塔杜斯先生》(Pan Tadeusz)和戏剧《先人祭》。战后重建华沙的首要任务之一是重建1898年的带花园的广场，以纪念密茨凯维奇的百年诞辰。在玫瑰园中心的垂杨下矗立着诗人的铜像。在华沙上演《先人祭》就像在伦敦上演哈姆雷特和在巴黎上演莫里哀一样无可厚非。

正如之前的政体所做的一样，在共产党的制度下学习这出戏剧是儿童的必修课。《先人祭》有时英译做*Forefather's Eve*，以仪式召唤已亡故的祖先开始。男主角古斯塔夫死在监狱并化身为一个叫做康拉德的革命者回到世间。这出剧所表达的反独裁主义信息是很明显的，同时也强烈地传达了波兰的民族主义信息，因为戏剧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在俄国人压迫下的波兰政治犯的挣扎，但也有魔鬼、牧师和天使。这是一出很复杂的戏剧，很难搬上舞台，所以对波兰的导演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1968年对戏剧导演来说是个伟大的时代，传统受到挑战，但戏剧保留了重要的社会解读功能。在纽约，朱利安·贝克和他的妻子朱迪丝·玛利娜试图打破传统上演方式的最后屏障，他们做了个实时剧场，在曼哈顿上西区的起居室，他们开始导演一些由一批费解的现代作家所写的作品，包括加西亚·洛尔卡，布莱希特，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同时代的纽约荒诞派作家兼社会评论家保罗·古德曼的作品。他们住进剧场和阁楼，不售票却接受捐赠；他们到巴黎、柏林和威尼斯过自由公社的生活，名声大振却收入菲薄。朱利安用碎料搭建了壮观独特的布景，他偶尔也导戏，但通常都由朱迪丝导演。

她父亲是一个德国哈西德教派的拉比，母亲是个有抱负的演员。她经常在德国古典诗歌朗读会上读诗，尤擅诗剧。夫妇两人的戏政治性越来越强，最终宣称他们已打通了政治和艺术之间的障碍。1968年，他们的戏是一股强有力的反战力量，表演结束时常常是掌声连着诸如“停止战争！”、“废除监狱！”和“改变世界”的呼喊声。演员和观众的互动越来越多，有时演员给观众端食品。一次演出中，一幅抽象画在表演过程中被创作出来，随后当即画拍卖给观众。“机会剧场”以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观众的座位。肯尼思·布朗的反映海军陆战队监狱的残忍状况的作品《双桅船》在上演时允许演员临时发挥，以表现对犯人的虐待。

彼德·布鲁克对《马拉/萨德》的创造性的导演影响了整个戏剧世界。在纽约，汤姆·斯托帕德的《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滕死了》在1月份上演，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两个最不起眼的角色入手审视这部作品。与此同时，约瑟夫·帕普推出了在现代布景下、由马丁·希恩主演的《哈姆雷特》。克莱夫·巴恩斯在《纽约时报》中写道，“一部自以为是而又平庸的中产阶级推出的漫无目的的《哈姆雷特》，这些人想要大家同意莎士比亚是无用的。”小理查德·沃茨在《纽约邮报》中将此称为“疯疯癫癫的戏仿，有时有逗乐的讽刺，有时又毫无意义”。所有这些评论都可能是对的，但在一个冒险与大胆高于一切的时代，帕普还是得到了尊崇。4月份，他的作品*Hair: The American Tribal Love-Rock Musical*，一部没什么故事情节的关于嬉皮士生活的作品在百老汇由汤姆·欧霍根执导，汤姆·欧霍根让演员向观众撒花并向他们要钱。对此巴恩斯写了篇肯定的、热情的评论，他预告公众：“在某场戏中——也就是下文中亲切地提到的‘裸体场景’里——许多男女（我应该数数人数的）将展现正面全裸。”说到《头发》的裸体主义，《巴黎竞赛》指出，有人抗议在布鲁克执导的《马拉/萨德》中，观众可以看到马拉在浴缸里裸露的背部。

在杜布切克的捷克斯洛伐克，一度曾是地下剧作家的如瓦茨拉夫·哈维

尔和帕维尔·科胡特变成了国际明星，他们的作品结合了捷克式的卡夫卡荒诞派传统和危险的贝克式的艺术和政治的混合。共产主义官僚是他们最喜欢的嘲讽对象。帕普的公共剧场上演了由奥林匹娅·杜卡基斯主演的哈维尔的《备忘录》，在这出戏里，办公室工作人员都痛苦地用子虚乌有的语言说话。

在一个先锋派遍地开花，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先锋派尤其活跃的环境下，上演波兰名著的波兰国家剧场想要尝试新鲜事物也就不足为怪了。《先人祭》这出剧有政治的一面，同时也有植根于斯洛伐克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宗教的一面，在共产主义时代之前的波兰被作为宗教的、神秘主义的剧目而上演。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它被看成是一出政治剧。导演卡奇米日·戴梅克没有在政治和宗教中做选择，而是创造了一个植根于早期基督教仪式但同时又反映了为争取波兰自由而奋斗的复杂剧目。古斯塔夫/康拉德这个角色由古斯塔夫·霍劳贝克出演，他是波兰最受尊敬的演员之一，演活了人物的内心挣扎和变幻无常。

就像在一出老的为人所熟知的情节剧中每个人都知道好人和坏人的台词一样，《先人祭》也有它为人所熟知的部分，总能引起人们的掌声。大多数这类台词是民族主义的，比如：“我们波兰人为了这两个银卢比出卖了灵魂。”俄国官员的台词会是：“难怪他们这么恨我们：整整一百年来，他们看到的都是这条肮脏的从莫斯科流到波兰的河。”这些情节都是波兰人去看《先人祭》的感受的一部分。这出戏是反沙皇的，在这点上是接受了苏联的思维。它不是反共的，它对共产主义和苏联什么也没说，它的背景年代在共产主义和苏联之前。事实上，它经常被放在共产主义语境下教授给学生和搬上舞台是为了突出其政治性。这出戏不仅不是反苏联的象征，相反，在头一年秋天，庆祝十月革命后共产党在俄国掌权 50 周年时还上演过。

正是人们对该剧中的基督教信仰的关注惹恼了政府，因为共产党是不信教的，但没人认为它离经叛道。《人民论坛》报对这个作品的看法是否定的，但并不很尖锐，只是说神秘主义在该作品中的分量和政治一样多是个错误。

他说，这部剧要想成功，就必须把密茨凯维奇基本上看做一个政治作家。但是作品获得了成功，一连好几个月都吸引了很多观众。亚当·米赫尼克也去看了。“这是一部很棒的作品，令人激动。”

在这个时候政府做了件极其愚蠢的事：不允许该剧在国家剧院上演。更糟的是，它将禁演的时间1月30日提前两个星期透露给公众，好让每个人都知悉，1月30日要演最后一场，以后警察就不让演了。波兰人已经习惯了审查，但从没被提前通知过。政府这么做无异于是在邀请一次示威游行。政府是在寻找镇压的借口吗？或者是莫恰尔将军的又一个阴谋？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议。在所有这些阴谋和反阴谋的猜测中，人们通常认为这只是政府的一次愚蠢的行动。米赫尼克回忆道：“禁演该剧说明政府是愚蠢的，是不懂得波兰人的。密茨凯维奇是波兰人的惠特曼，是我们的维克多·雨果……这是没文化的共产党对密茨凯维奇的一次攻击。”

1月30日，在演出落幕之后，来自华沙大学和国家戏剧学校的300个学生在国家剧院前游行，走了几百码到了亚当·密茨凯维奇塑像前。他们不认为这是一次挑衅行动，他们是共产主义青年，只是在提醒父母们共产主义的理想。米赫尼克说：“我们决定将鲜花献给诗人的塑像。”米赫尼克作为一个被当局认定为“麻烦制造者”的人物并没有参加游行。

“我们以为事情会有捷克式的进展。”米赫尼克说。学生不怕暴力报复。“自从1949年开始，波兰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警察对付学生的事件。”米赫尼克也许太理性了。就在垂杨下，在玫瑰园密茨凯维奇右手按心作朗诵状的青铜雕像前，300个学生遭到几卡车的“工人”的殴打，这些所谓的“工人”装着要与他们交谈的样子，随即就以棍棒相加。35个学生被逮捕。

不奇怪，没有媒体报道这次事件。米赫尼克和他的同伴亨里克·施拉弗为了让波兰人知道此事，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与《世界报》的一个记者接触，此人在米赫尼克眼里是“一个极端危险分子，很反动并且很会搞自我宣传”。但是这两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要想让波兰人知道此事也没有其他途径。

通过《世界报》，消息能透给总部在维也纳的自由欧洲电台，从而在波兰广播。但是，记者采访他们时被秘密警察看见了，当消息登上《世界报》的时候，米赫尼克和施拉弗也被大学开除了。

所有这些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反犹运动”。米赫尼克和其他许多游行的学生都是犹太人。大学里的这些异议分子都来自优越的共产党家庭，父母教育子女说，他们有义务为争取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而奋斗。

但这并不是政府对学生运动中有很多犹太人的解释。政府一直都在将犹太人从官僚机构中排挤出去，给他们栽上从事犹太复国阴谋的罪名。现在，他们又说这个所谓的学生运动其实是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操纵的。这些被捕学生受到了审问。如果他们不是犹太人，问题便会是：“你是个波兰人，为什么跟犹太人混在一起？”并要求他们说出犹太领导人的名字。当审问到一个犹太人时，警察会问：“你是犹太人？”

学生回答：“不，我是波兰人。”

“不，你是犹太人。”

这是波兰的一则很老的对话。

二、布拉格之春

革命党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夺取通讯。拥有了通讯便掌控了国家。这个道理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

——威廉·伯勒斯 1968 年接受采访时说

在可憎的机器的齿轮上

雇员们将爱这一代人……他们容易被控制，不会闹事。

——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1963

我们有相当多的年轻人拒绝任何来源、任何形式的威权，他们依赖狂躁、不成熟的虚无主义，唯一的目标就是摧毁。这一时期代沟的巨大和潜在的危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显著。

——格雷森·柯克，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68

1968年春天，美国的校园示威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件，一个月大约有三十所学校爆发示威游行，甚至连初、高中学校都加入了进来。2月份，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史蒂文森区的258中学，几百个八年级的学生挤在大厅里，他们占领了教室，并报了火警。他们要求更好的饮食和更多的舞会。

示威者知道为了赢得报纸版面，他们要做除了举着标语游行之外更多的事情。他们必须抢占一幢楼，必须关闭掉些什么，闹出点动静。为了抗议哥伦比亚大学将哈莱姆的贫困黑人区拆建成一座新的校体育馆的计划，一个学生跳进了重型推土机的钢制铲子上以阻止工程的进行。3月中旬，哥伦比亚反战学生运动号召一整天罢课以抗议战争。总共有35000个学生和1000个

教职员工参加了罢课。当反战者在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行政楼附近的巴斯科姆山坡草地上插了400个白色十字架时，约三千名学生在旁观看一块牌子上写着：“巴斯科姆纪念公墓，1968届”的字样。约瑟夫·钱德勒当过学生，当时在位于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反兵役联盟工作，他说：“我们觉得校园看起来应该像个墓地，因为那是大多数高年级学生要去的地方。”那年春天的头一个星期，500至1000个学生控制了霍华德大学的行政楼并拒绝离开。霍华德大学是一所顶尖的黑人大学，他们抗议学校未开设关于黑人历史的课程。然后，黑人学生占领了位于康奈尔的一座楼，接着是位于科尔盖特的一座楼。

不仅仅是学生，《纽约时报》报道说，3月24日，嬉皮士们占领了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将一个春天的非正式集会演变成一个军事反战示威。”该报道的后面有一篇长文说，这些一直被主流社会当做是吊儿郎当的嬉皮士们，很有可能正在变成政治激进分子。其实这些嬉皮士都是阿比·霍夫曼的青年国际党“异皮士”的成员，一直都有很强的政治性。

在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学生们扛着红旗从一座楼走到另一座楼，抗议学校没有足够的教学设施，当时罗马大学正值因3月中旬的暴乱而关闭了12天后重新开学的日子。第一天，200个学生被警察打伤，第二天，教职员为抗议警察的残暴而加入了游行示威。有人要求校长辞职，因为他在第一时间召进了警察。学生们明确说他们要继续抗议。意大利共产党没有控制住学生运动。

1968年的早春，德国的一个学生组织在108所德国校园里成立，他们代表了三万名学生。他们抗议越战，之后进一步抗议德国国内的事务，例如要求承认东德，要求曾有纳粹污点的高官辞职，学生在教育中应享有更多的话语权等。

与此同时，沉寂了一代人之后，西班牙学生抗议明目张胆的法西斯政体在4月份批准一个在马德里纪念阿道夫·希特勒的群众集会。这一年春天开

始的时候，因为学生的游行导致马德里大学再次关闭，直到 38 天后，在 5 月下旬这所大学才重新开放。

在巴西，三个示威者在 1968 年头几个月的暴力镇压中被打死，但学生对持续四年之久的军事专政的抗议并没有停息。

日本学生暴力抗议美国在日本领土上设置准备与越南作战的军事设施。日本是唯一一个被核武器攻击过的国家。这一代学生的父母们因为实行军国主义而毁了自己的国家，所以学生们强烈反对军事政权。学生组织“全学联”发动了几千个成员，阻止美国将航空母舰运抵日本的港口。该组织也抗议日本国内的一些做法，有时还采用暴力方式，如反对没收成田农民的土地以建造国际机场。成田是一个距东京东 25 英里的地方。日本政府考虑要通过一项议案来施行强制性的安全法令以对付“全学联”。

正是“全学联”这个学生组织让沃尔特·克朗凯特明白 60 年代电视的重要性。1960 年，沃尔特·克朗凯特和 CBS 的员工一起到日本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日本的访问。但因为“全学联”的抗议规模庞大，艾森豪威尔决定不着陆了。然而，“全学联”很满意有 CBS 的员工在那里拍摄他们的抗议，他们并不想离去，整整一天，成千上万的人来到那里抗议，电视台员工是他们唯一的观众。因为总统不来，所以克朗凯特就想离开，但通向 CBS 车辆的路被学生挡住了，因为摄像机周围的人群最为密集。“我突发灵感，”克朗凯特回忆道，“到山顶上去最容易的方法是加入‘全学联’的行列。于是我拍完照片，将胶卷塞进兜里，走下卡车，挽起了其中一个人的手臂——他们彼此都手挽着手——他对我笑笑，然后挥舞手臂愤怒地大喊：‘前进！前进！前进！’我也跟着喊：‘前进！前进！前进！’然后我蜿蜒着走上山坡，边走边喊‘前进！前进！前进！’。他们与我在一起很开心，我到了山顶，那里停着我的车。然后我说：‘好了，再见。’他们回说‘再见’。我进了汽车，到了机场。”

在英国，学生们先是抗议美国的越战，然后是国内的问题，比如政府教

育基金的数额、对大学的控制制度等。到了春天，在牛津、剑桥和无数其他英国大学里都有了大型抗议。对英国政府来说，最大的担心不是反战运动，而是抗议者对政府人员的攻击。3月份，当英国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在剑桥作演讲的时候，学生们冲破了警察的防线，试图推翻他的车子。不久，内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被牛津大学的学生质问，他们还想把他扔进鱼池。科教部长戈登·沃克在曼彻斯特大学的演讲被阻止。演讲不成，他想出去，但已有学生卧倒，挡住了他出去的路，他只能从他们的身体上跨过去。美国的官员也不能幸免。当一个美国使馆的新闻官不小心在苏塞克斯大学前出现的时候，学生们用油漆攻击他。英国的抗议者也很有镜头感。4月份，他们将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喷泉变成了红色。

暴力很简单，不需要什么想法，但是非暴力抵制却需要想象力。这就是为什么非暴力不受欢迎的原因。美国的民权运动在很多次的教训中知道了这一点。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民权运动，尤其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让世界为它的想象力和大胆的见解而激动，甚至让远至波兰的学生也学着静坐。到了1968年，全世界的志士们都想学民权运动。皮特·西格的歌曲《我们要战胜》——一首来自民歌的劳动歌曲，后又被西格在静坐兴起时改编成了民权歌曲——响彻在静坐抗议的人群中，从日本到南非到墨西哥。

民权运动在1960年2月1日引起了世界的注意。起因是格林斯伯勒北卡罗来纳州农业和技术学院的四个一年级黑人新生在伍尔沃斯餐馆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坐在了标有“白人专座”的区域。其中的一个叫做小埃泽尔·布莱尔的学生要了一杯咖啡，但被拒绝，他们因此一直坐在那里直到关门。这个技巧以前已经被民权运动者试了多次，但是这四个没有任何组织背景的黑人学生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第二天上午他们又回来了，和20个学生一起从10:30开始坐了一整天。一个拒绝为他们服务的女招待跟媒体解释说：“这是我们店的规定——是个惯例。”学生们发誓要每天坐在这

个餐馆直到有人给他们提供服务。以后的每一天，越来越多的学生挤在餐馆。不久，他们在格林斯伯勒另外几家餐馆静坐，然后静坐发展到其他的城市。从静坐开始的两星期内，国内、国际的媒体都对其重大意义予以报道。“抗议刚开始时，人们只将其当做学生们一时流行的新花招。”《纽约时报》报道，“然而随着运动从北卡罗来纳到弗吉尼亚、到佛罗里达、到南卡罗来纳、到田纳西州的进行，有 15 个城市参与了运动，人们对此的看法也改变了。”

“静坐抗议使现存的民权组织大为惊讶。”玛丽·金，一个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白人志愿者这么说。这种形式不仅使马丁·路德·金新成立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大为吃惊，也使一些像 CORE 那样的老牌组织感到震惊。但是他们吸引了新闻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竭力制造一些类似的精彩新闻。

1959 年，在树木茂盛的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有两万名学生。当时还看不出有什么民权运动和激进政治的苗头。但是到了 1960 年 2 月，因为受格林斯伯勒静坐抗议的启发，该大学一个名为罗伯特·艾伦·哈伯的大学生宣告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叫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他首先吸收了两个出身于传统左派的人物：沙伦·杰弗里，大二生，其母是联合汽车工人联盟的重要人物。另一个是来自南布朗克斯的鲍勃·罗斯，其祖父母曾跟俄国革命党交往，他本人喜欢爵士乐和“垮掉的一代”的诗歌。他们也吸引了《密歇根日报》勤奋的编辑汤姆·海登的注意。海登来自于离安娜堡不远的一个小城市，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日报的工作中。《密歇根日报》很有专业水准，被看做是美国大学最好的报纸之一。但海登对首创于密歇根大学的另一个组织更感兴趣，这个组织为建立一个和平学生社团而四处游说。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希望在全国建立一个学生领袖网络，此时正是机会。格林斯伯勒的二月静坐激励了学生，他们也渴望做些类似的事情。海登在后来写道：“在几千个南方学生被捕和遭到殴打的同时，我对他们的勇气



SNCC
STUDENT NON 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 1968 年的海报（尚博格黑人文化研究中心图书馆）

和信念越来越认同和尊敬。”哈伯、杰弗里和罗斯最初是在安娜堡声援格林斯伯勒的静坐，海登对此进行了报道并写了充满同情的评论。到了春天，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邀请南方的黑人民权运动人士到安娜堡来和北方的白人学生会面。海登对此进行了报道，虽然他此刻已经是日报的主编，这是他勤奋工作多年才实现的志向。

20 岁的海登在加利福尼亚度过了一个改变他生活的夏天。他当时去伯

克利想找一个地方住，结果发现他和一些激进学生住在一起。伯克利校园井然有序，他为日报写了些长文反映“新的学生运动”。他去了利弗莫尔实验室，在那里美国发展了核军械库。他采访了核科学家爱德华·特勒，后者疯狂地跟他解释核战争存在的理由，以及为什么“死了也比当共产主义分子好”。1960年洛杉矶的民主党会议上，海登遇到了当时39岁的罗伯特·肯尼迪。在海登眼里，罗伯特是个很年轻的政治家。海登看到了他的哥哥约翰·肯尼迪被提名，同时被约翰·肯尼迪的演讲深深打动，虽然他的激进的朋友们认为肯尼迪是一个“假冒的自由主义者”。那时，海登不知道自由主义者是不可信的。他也采访了马丁·路德·金，金跟他说：“最终，你的人生总要选择一个立场。”

他给日报撰文报道新左派的兴起，但是密歇根大学校管会却指责他捏造新闻而非如实报道。海登知道新左派确实存在，但他意识到学校的教职工和美国大多数民众完全不知道这事。

海登在就读大学高年级的时候一直渴望去南方参加运动。他送食物给田纳西州的黑人，他们是因为要求登记投票而被赶出家园的一些人。但他还想做得更多。“我迫不及待地想毕业，南方很有吸引力。”他的确毕业了，并且到南方做了一个负责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联络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联络员。但他很快知道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人员充足，根本就不需要他。海登对他在南方艰苦的、甚至是危险的工作感到很孤独。“我不想被一次次地送进监狱遭毒打。”他写道。1961年12月，他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一个监狱中给密歇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同伴们写信，建议开一个会议扩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使它成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那样的重要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美国有800个成员，每人每年交一块钱。为了进一步发展，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需要对自身有进一步的认识。

1962年6月，大约六十个自称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子的年轻人聚集在密歇根的休伦港，这里是孩提时的海登与他父亲钓鱼的地方。海登扮

演起了杰斐逊，他被要求起草一个可以代表“一代人的议程”的文件。几十年后回想起过去，海登对这项计划的豪迈感到惊奇。“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种救世主般的气概，这种对自己的正确性的坚信不疑，这种代言整整一代人的自信都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份现在被称为《休伦港宣言》的文件在很大程度上真的是反映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和感觉。1968年，当老辈人清楚地意识到年轻人的想法与他们很有差距时，这份《休伦港宣言》被作为解读年轻人的文本。1968年的大学生们在文件起草时都还只是高中生，现在该文件被编进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教材。

这不是整个一代人的声明，而是一份明确地写给上层中产阶级白人的宣言，他们知道自己处于优越地位，但同时又对这种不公平感到愤怒。“宣言”开头是这样的：

我们属于这一代，出生于至少是衣食无忧之家，住在大学里，不自在地看着我们继承来的这个世界。

在谈到无论是南方黑人或大学学生都不被允许投票时，“宣言”要求一种人人参与的民主，“社会和人类的目标应该是个体的独立。”“宣言”谴责美国使用武力，并说其结果与其说是用来反对共产主义，倒不如说是用来反对民主的。“宣言”在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小心地穿梭，拒绝支持任何一方，并将新左派定义为一种对自由主义毫无用处的东西。新左派是不可信的，共产主义是极权，资本主义剥夺人们的自由，反共产主义者是以强欺弱者。如果新左派是美国人创造的词汇的话，那么它听起来颇有些像1968年波兰、法国和墨西哥学生的词汇。艾伦·金斯堡，一个总是比别人更有说服力的人这样写道：

共产主义者只带来了肥脸颊、眼镜和撒谎的警察，资本主义者带来

的是凝固汽油弹和装在绿色旅行箱里带给裸体者的钱……

民权运动继续令人眼花缭乱。1961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发明了“自由乘车运动”——名字在推销一种观念的时候总是至关重要。自由乘车运动者不按照黑人和白人的专区乘坐汽车，不按黑白分明的规定使用厕所，这些都引起了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不满。自由乘车运动者几乎成了传奇。该运动的策划者之一詹姆斯·法默说：“我们看准了南方的种族主义者会制造危机，这样联邦政府就得被迫施行联邦法律了。”南方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以暴力回应，而这吸引来的媒体报道将会把民权工作者打造成英雄。一份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报纸这样报道其中的第一次自由乘车运动：

两个坚决的“自由乘车运动者”——被一群白人操纵的暴徒打得遍体鳞伤——在星期六的下午发誓，即使牺牲生命也要重击南方的种族障碍。星期六早上，他们一下车就被这群暴徒打得不省人事，被打的一共有22名反种族隔离主义者。

愤怒的暴徒对混坐的公共汽车的攻击如此凶猛，以至于肯尼迪政府呼吁一段“冷静期”，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则因为自由乘车运动太危险而放弃了这种形式，这反而使这一运动更蓬勃发展，导致许多人被关进密西西比的帕奇曼监狱，在老旧的地牢里面被关了49天。

1963年，在南部11个州大概举行了930次民权示威，导致两万人被捕。年轻的一代为这场大卫挑战歌利亚式的运动激动着。对他们来说，民权运动是一个迷人的景观，它滋养了理想主义，培养了行动主义。男子气概也很有吸引力，因为民权分子常常面对很大危险。种族主义分子越攻击，民权工作者看上去就越有英雄气概。在新闻片里，这些种族主义暴徒只会攻击要求和平的年轻人，还有什么比与这些暴徒抗争更令人肃然起敬的事呢？

接着是1964年，这一年出台了一个最有影响力的策略，那便是“密西西比‘自由之夏’”。当时年纪足够大而得以参与这个行动的人终将会被训练成他们那一代的领导人，这也许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

1964年初，美国还沉浸在年轻总统被刺杀的悲痛中，这位总统曾被赋予了那么多的希望。但随着这一年时间的推移，空气中逐渐有了兴奋的气氛，这体现在玛莎·里夫兹和范德拉斯乐队（Martha Reeves and Vandellas）的新专辑《街头舞蹈》中。1964年是一个有不少新开始的年份。这一年，美国人初次见识了披头士，顶着色拉碗的发型、身着无领套装，这种衣服太中性了，注定不会持久。这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胜过保守主义的年份，体现在约翰逊-戈德华特竞选中。这一年还是《1964民权法案》得到通过的一年，虽然遭到来自亚拉巴马、阿肯色、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等州全体国会议员代表的强烈反对，该法案还是决然通过了，不巧的是，这成为戈德华特击败约翰逊的唯一领域。但该年度最令人兴奋的事情还数“密西西比自由之夏”。

“自由之夏”由出身于哈莱姆、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领袖兼哲学家鲍勃·摩西和后来成为美国国会议员的活动家阿拉德·洛温斯坦发起。当民权运动一度集中在重要、但缺乏视觉戏剧性的南方黑人投票登记工作时，他们意识到，如果要引起媒体的更多关注，他们应该号召北方的白人在夏天到密西西比帮助黑人做投票登记。

如果在近千名志愿者中还有人不相信这个工作的危险性的话，那么在那一年的初夏，詹姆斯·钱尼、安德鲁·古德曼和迈克尔·施沃纳这三个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志愿工作者在密西西比一个偏远的沼泽地的失踪就是明证。这其中，施沃纳是个有经验的民权工作者，但古德曼是来自北方的新人，钱尼则是一个本地的黑人志愿者。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努力得到了FBI的配合，事情真相在夏天慢慢浮出水面。每发现一条新线索，比如找到他们的车子，此事就更加凶多吉少。最后，在8月4日，也就是他们被宣告

失踪后的44天后，因为一个FBI线人的情报，这三个人的尸体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费城南部一个土质水坝下被发现。三个人都是被枪击致死的，其中黑人钱尼是先遭到毒打然后被枪击的。

但是除了一个未成年志愿者在父母的强迫下离开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之外，没有一个人却步。实际上，摩西不得不劝说他们不要再加入该组织了，因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里没有足够的人员可以负责培训所有新加入的志愿者。

那年夏天，在去南方的人中有一个意大利机械师的儿子马里奥·萨维奥，他在纽约皇后区的伯克利大学读哲学。萨维奥生于1942年，身高6英尺2英寸，瘦而温和。他口吃得厉害，以至勉强才能完成他告别高中的演说。他是罗马天主教徒，就像其他天主教徒一样，他有着教徒的道德，但是对教堂多有不满。早些年他还梦想成为一个神父。

1964年，21岁的萨维奥走在伯克利校园电报路和班克洛道之间的一片狭窄地带，这是一块可以从事政治活动的地域。有人递给他一份传单，是关于本地民权组织因反对旧金山的不公平雇佣制而号召示威的。萨维奥日后回忆说：“我说，‘哦，示威，没问题。’这些示威在学校里很有道德威望。它们的吸引力绝对超过足球比赛，我对这点毫不怀疑。”

萨维奥没怎么迟疑便去参加示威了。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女人对他喊，“你为什么不回到俄国？”他想跟她说他是从意大利来的。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捕了，在监狱里，一个叫约翰·金的人不经意间问他，“你要去密西西比吗？”当萨维奥知道密西西比有个“自由之夏”的时候，他想“他应该在那里”。很多志愿者都是这么想的。结果，萨维奥去了。在密西西比他会敲开一个穷苦的黑人佃农的门，很礼貌地，这个小佃农会怯怯地看着他说他不想投票。萨维奥会问，你父亲投过票吗？

没有，先生。

你爷爷投过吗？

没有，先生。

你希望你的孩子有投票权吗？

然后，他们被他说服了，跟着他进了城里，躲避着半数市民投来的仇恨的目光，冒着生命危险去登记投票。“我不知道我从哪儿来的胆量，会说服这些人去投票。”但他一直记得那些被他说服的冒着生命危险去登记投票的人。

这种经历塑造了萨维奥和那一代的北方白人。他们干净而年轻地来到密西西比，他们受到当地工人的欢迎，他们交叉着胳膊，伸出手与他人紧紧相握，形成一条紧密的链条，唱着《我们能渡过难关》，唱到“白人和黑人在一起”这句时，轻轻地摇摆着身子，那个时候他们确实是那样的。他们一整个夏天勇敢而血气方刚地冒着生命危险，被打被关，就像阿尔贝·加缪所著《鼠疫》中的医生，这本书大家都在读。他们在做一些事反对社会的瘟疫。他们在9月离开密西西比时已是有经验的活动家。“自由之夏”在发展校园激进领袖方面所做的事可能甚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所做的所有努力。志愿者们9月回到北方，充满了激情，深受触动，誓言要改变政治状况，并且已在美国历史上最好的一所非暴力反抗学校接受了训练。

萨维奥回到了伯克利大学，作为一个即将就任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之友的主席，他充满了政治热情。但学校令他失望，他发现学校已经废除了学生宣扬政治主张的权利，即使是当初他第一次听说示威的电报路和班克洛夫道之间的那一小片地带也不被允许了。他对此怎能一言不发？要知道他曾经说服密西西比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捍卫他们的权利。他还记得他们安静而有尊严地用柔和的密西西比乡村口音要求“登志”——登记投票。

“我是犹太吗？”萨维奥问自己，仍沉浸在宗教情景中。“难道我回来后要背叛那些我让他们处于危险境地的人们吗？忘了这一切？这是现实，还是只是一个幻想，一个孩子气的游戏？我在密西西比玩孩子气的游戏，现在又

回来干正事了，做我该做的人（尽管我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样的人）？”

吸取了密西西比即使是敲门也要成双成对地敲的经验，伯克利大学言论自由的提倡者们总是成群结队地行动。1964年10月，一个曾经参加过密西西比“自由之夏”活动的民权工作者杰克·温伯格在伯克利大学被捕了。他无视学校的政治禁令，坐在摆满民权书的桌子上。他被押进警车，周围挤满了抗议者。事先没有计划，在民权运动中受过训练的学生们只是坐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围着警车，僵持了32小时。

当萨维奥跳到汽车上演讲时，他首先脱下鞋子，为的是不损坏汽车。他甚至都记不起来他是什么时候决定跳上车的，反正他上去了。他不再结巴，他的流利演说立即使他成为伯克利“自由演说运动”的发言人。

萨维奥的夫人苏珊·戈尔德贝格，当时哲学系的一个研究生，回忆说：“他的魅力来自于他的真诚，”“我平时会看到他在伯克利校园里举着标语牌，但当我听他演说的时候，我惊诧于他的真诚。他有一种不事修辞即可使事情变得简单、易理解的能力，他相信，如果人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们就会去做正确的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他这一观点不敢苟同。他对人有一种的天真的信任。他会与人长谈，相信自己可以说服他们。”

虽然马里奥·萨维奥没有马丁·路德·金的雄辩，也没有汤姆·海登的律师般的精确，但他喜欢语言，并用语言将事情简化。在伯克利他很少结巴，还保留着皇后区的口音。他的演说没有花哨的辞藻，总显得“一切都很清楚”。只有他的眼里闪烁着真正的火焰。从他挥舞的胳膊和手势还能看出他的西西里出身。他的高瘦而前倾的姿势说明了他的谦卑，让人想起甘地的话：政治人物应该是温和的，这样，即使对手被击败了，也不会觉得是一种羞辱。萨维奥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请你考虑。”据说，有一次萨维奥入狱的时候，与一个高大魁伟的人同处一室。萨维奥凭空与他打赌说，如果他一杯水倒在该囚犯的头上，后者不会因此而报复他这个瘦瘦的家伙。对方接受了打赌。萨维奥倒了两杯水，将一杯水倒在了同室的头上，与此同时，将另

一杯水倒在了自己的头上。该囚犯并没有回击他，他赢了。

跳上警车的两个月之后，萨维奥领导了对史鲍尔大礼堂——大学的一座建筑物——的占领，该运动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被捕。在占领该建筑物前，萨维奥做了一次也许是60年代唯一流传下来的学生演说：

总有一天，这部机器的运转会变得如此可憎，让你们心里如此难受，以至于你们不能再参与下去，即便是心照不宣地默许也不行。你们只能把自己的身体垒在齿轮上、车轮上、杠杆上，垒在所有的器械上，迫使它停止运行。你们还要让运行机器和拥有机器的人明白，除非你们自由了，否则就不会让机器运行。

“自由演说运动”的多数领导人都参加了“自由之夏”。他们将鲍勃·迪伦的激动人心的民权之歌《时代在改变》改编成自己的运动之歌。琼·贝茨在一次重要的示威中唱起了这首歌，一夜之间，迪伦的这首歌成了60年代学生运动之歌。

但是，正像60年代的大多数运动一样，“自由演说运动”自称在他们这样高度民主的组织是没有领导的。萨维奥总是否认自己是唯一的领导。正是因为他，而不是因为其他的领导人物，60年代中期进入大学的学生将示威看做是很自然的行动。萨维奥将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从华沙到柏林、巴黎、纽约、芝加哥、墨西哥城，学生们因为马里奥·萨维奥的策略和演说以及“自由演说运动”而激动着。那些名字、静坐、逮捕、头条新闻，他们赢得在校园内示威权利的事实，所有这一切对60年代中期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都是传奇。不幸的是，他们忘记了某位叛逆者的优雅和礼貌：为了避免划坏警车，他踏上车顶时还穿着袜子。

马里奥·萨维奥和汤姆·海登对那个时代的时尚并不感兴趣。1968年当

汤姆·海登在芝加哥大会组织示威的时候，还是一副《密歇根日报》记者的打扮。但如果说，为1968年立下了宣言的是海登，给1968年注入了精神的是萨维奥的话，那么这一年时尚的最佳诠释者就是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三十多岁的男人，阿比·霍夫曼。在他的一生中，也可能在整个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68年那样适合阿比·霍夫曼了。对他来说那一年肯定很特别，好像整个世界都在配合着他做事的方式。他曾说他是同60年代一起出生的，很可能他对这个年代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阿比·霍夫曼是最早意识到生活在媒体时代的万千可能性和重要性的美国人。他是新左派的小丑，不是因为他的滑稽，而是因为他精明地意识到新左派需要小丑，小丑可以宣扬他们的观点，小丑不会被忽视。总之，阿比·霍夫曼不想被忽视。和所有成功的丑角一样，他很滑稽，是一个做秀大师。懂得什么是作秀的人会被逗笑，而不懂的人则在他承诺举起并转动五角大楼时摆好摄像机等着他，而且不明白为什么他没做到却没有感到一丝的尴尬和失望。

霍夫曼自称出生于1960年，其实那年他已经24岁，他实际上出生在1936年，跟黑豹党的博比·西尔同年，当汤姆·海登第一次走了50英里路来到密歇根大学的时候，他还是布兰德斯大学的低年级学生。他比马里奥·萨维奥年长六岁，比1968年的在校大学生大十多岁。霍夫曼觉得自己起步晚了，在1960年以前，他从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那一年他是伯克利大学的研究生，他参加了马龙·白兰度和其他一些名人领导的反对死刑的大型抗议，抗议判处卡里尔·切森死刑，后者因为绑架了两个女人并强迫她们口交而被判处死刑。但是抗议失败，5月2日，加利福尼亚州处死了切森。这次抗议是霍夫曼生平所参加的第一次政治行动。

同一年，霍夫曼结婚，接着有了两个孩子，接下来的几年，他一直很努力地做一个父亲并过着平常的日子，虽然并不成功。1964年，他在电视中看到了“自由之夏”运动，备感失落。第二年，他跟许多白人志愿者一起到

了南方，这是大批白人志愿者去南方的最后一年。接下来的两年，他和少数几个人回到了南部，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工作。霍夫曼不仅错过了“自由之夏”，而且也错过了1964年的民权运动的分水岭——大西洋城的民主党会议，这次会议由约翰逊召开，他是肯尼迪政权的继任者。约翰逊的竞选搭档休伯特·汉弗莱、他的被保护人沃尔特·蒙代尔和其他几个自由派阵营的人担心南方会落入戈德华特手中，所以他们拒绝密西西比自由党的代表入席。他们的这种做法使运动分成两派，基本是以代为界。像马丁·路德·金那样的老民权运动领导人习惯性地认为民主党不是可靠的朋友，需要做工作。但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经不信任白色阵营里的任何人。鲍勃·摩西很气愤。像斯托克利·卡迈克这样的年轻领导人则已经没有了耐心，他们开始谈论黑人力量以及黑人应该走自己的路。

就在民主会议的前几个星期，据说北越的炮艇在东京湾向美国驱逐舰开火。作为报复，约翰逊攻击了北越，并让国会通过了《东京湾决议》，该决议赋予总统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以保护南越的权利。

后来有许多证据显示，包括来自一艘驱逐舰的电报，所谓的北越向美国驱逐舰开火的事可能从来没发生过。1968年参议院对此问题举行了听证会，但没有达成最后的决定。有人怀疑，无论东京湾事件是否发生，都被约翰逊当做了发动战争的借口。汤姆·海登说：“民主党一方面同意东京湾决议，另一方面拒绝在国会里为密西西比自由党设置席位，这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

第二年，斯托克利·卡迈克到了密西西比，准备在那里的某一个县组成一个黑人政党。他选了黑人超过80%的朗兹县。清一色由白人组成的密西西比州民主党用白色公鸡作为符号，于是卡迈克就将他们自己的党称为黑豹，因为黑豹可以吞吃公鸡。一年后，两个加州人休伊·牛顿和博比·西尔谈起要组建自己的加州党，并要借用黑豹这个名字。1964年的会议上不准密西西比自由党入席的做法使民权运动激进化，并全面改变了60年代美

国的历史。

“自由之夏”之后的一年，南方的民权运动不再令人瞩目。黑人力量使得注意力转移到了北方城市。斯托克利·卡迈克尔，鲍勃·摩西和民权运动中的各个派别此时仅就反战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在其他问题上仍然水火不相容。

霍夫曼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1965年春，他在家乡伍斯特开了一家雕刻店，卖南方穷黑人制作的手工艺品，与此同时，他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同伴H.瑞普·布朗，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朱利叶斯·莱斯特和其他人在卖关于黑人力量的书籍和小册子。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佩服霍夫曼不畏险境的勇气。在他身上的不仅仅是勇气，而是一种无可抑制的冲向旋涡的引力。当示威者受到镇压的时候，他走在前头，使尽全身解数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人。但是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华盛顿组织第一次反战示威的时候，霍夫曼甚至连去都没去。他当时最著名的反战言论是，每个人都应该在夏日仅身着泳衣去长岛的琼斯海滩抗议。

1968年，朱利叶斯·莱斯特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留心，白人！黑人力量就要夺走你妈妈》。在书中他写到，正如皮特·西格在歌曲中所写的“黑人和白人在一起”，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同白人并肩作战反抗南方种族主义是很好的一件事，但一旦到了北方，白人——而不是南方人——就成了问题。“面具，”他说，“开始从北方的脸上滑落。”他注意到了黑人力量的媒体效应是具有煽动性的。

对于黑人力量的呼唤比任何其他运动都更有效地催生了黑人意识。“黑人力量”并不是个新词，已经被黑人理查德·赖特，詹姆斯·博格斯和白人查尔斯·西尔伯曼用过。但该词首次引起世界性的注意却是在密西西比梅雷迪思的一次游行中。当时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组织者威利·里克斯将原来的“黑人获得力量！”缩减成了“黑人力量！”（里

克斯不是一个说话拐弯抹角的人)。

一场无聊的游行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新闻事件。每个人都想知道“黑人力量”是什么。如果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说的是黑鬼力量或者是有色人种力量的话，那么白人或许每晚还可以继续睡得安稳一些。但这是“黑人力量”！黑人。瞧瞧这词儿。黑人！白人恍惚看见在短吻鳄遍布的沼泽里，古树遮天，枝干上沥着苔藓，从泥沼深处升起一个黑色怪物，身上淌着淤泥。父亲们让女儿们九点就回家待着，而不是九点半……黑人力量！我的天，黑人开始对白人以牙还牙了。这个国家是歇斯底里的。休伯特·汉弗莱大声疾呼，“……美国容不下任何肤色的种族主义！”他肯定是在撒谎，因为黑人知道，至少有48个州大肆包容种族主义，倒是容不下任何别的东西了。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组织里的白人从来没有超过20%，但是1966年12月，也就是卡迈克尔成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之后的七个月，该组织以微弱票势——19比18，24票弃权——通过了一项禁止白人入籍的措施。正是两年前带了2000个志愿者到南方的鲍勃·摩西发起了这项对白人的驱逐。霍夫曼很气愤，在那个月的《乡村之音》写文章进行反驳。文章是用口语化的第一人称写的——从那以后这种风格就成了纽约出版物效仿的对象。他抨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软肋：问题是，就像60年代的许多运动一样，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组织者们大搞性爱游戏。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紧密工作，经常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凯西·海登说：“拥有一张床就够幸运了，你如果不跟别人分享，你的感觉会很不好。”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一直试图为此保密，只让组织内的人知道，因为成员们不仅有性关系，而且在黑人男子和白人女子之间还有跨种族的性关系，这是最让白人种族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阿比·霍夫曼这样写道：白种女人被吸引进这个组织，被引诱，现在又被赶走：“我对学生非暴力协调

委员会里的其他白人深表同情，尤其是白人女性。我对所有那些被黑皮肤的滑头诱骗走肉体 and 面包的布朗克斯姐感同身受。”

1967年7月，当美国多个城市爆发暴动时，约翰逊委派11个人组成了一个总统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领导，由他们分析、解决“平民暴动”。1968年3月，克纳委员会推出了虽有争议但广受赞扬的分析，分析认为种族主义是主要的问题，还指责新闻媒体对暴力事件的夸大报道，与此同时对内地城市贫困问题的报道不力，“在黑人中，尤其是在黑人青年中很快地滋长了一种情绪，那便是自信和不断增强的种族骄傲，这种情绪正在取代冷漠和对‘制度’的服从。”

这份报告卖得很好，以至到了1968年4月，它成了《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书榜第二名。报告里呼吁增加联邦政府的支出。“必须满足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需求；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如果有必要，要制定新的税收制度。”不幸的是，就在同一天，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威尔伯·米尔斯，作为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决定税收的主要人物，宣布说越来越多的越战支出将强迫增加税收。这就是委员会所谓的艰难选择。纽约市长约翰·林赛，克纳委员会成员之一，与罗伯特·肯尼迪一起认为战争的花费使国家难以实行它的社会责任。

但是报道中最被人津津乐道并难以忘怀的词句是：“我们的国家正向两个社会迈进，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各自存在而不平等。”而这也正是左派气势汹汹的运动中正在发生的事。作为社会的反映，黑人和白人激进分子更加分道扬镳了。

到了1967年，阿比·霍夫曼已经成了特权阶层白人中的激进分子。他用焚烧金钱的方式抗议资本主义和商业主义，并鼓励别人也这么做。烧钱并不能激起南方乡村黑人或北方城市人的共鸣。但是对霍夫曼来说焚烧金钱可以吸引电视媒体的注意，因为此举具有可观性，这点是最重要的。1967年，

当他最终将注意力转移到反战运动的时候，他所关心的是如何上电视。那年的5月，他成立了“花儿别动队”，由一群年轻的反战分子组成，他们的穿着后来成为嬉皮士的制服——长发，印花衣服，喇叭筒的蓝色牛仔裤，包着头巾，戴着珠子——这种衣服看起来是专门为吸引媒体的。霍夫曼挥舞着美国国旗，穿着印有“自由”字样的斗篷。

霍夫曼从民权运动中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使是很有创意的非暴力运动也不会引人注目，除非运动者受到攻击。“花儿别动队”就是招人攻击的。他在防御设施里训练参加运动的人员，将他在运动中所学到的东西教给他们。于是，成员们受到了攻击，年轻女人被打，美国国旗被从手中夺走。这些情形变成了具有震撼力的照片，“花儿别动队”也一时间成了和平运动中的话题。霍夫曼告诉记者说，他们这些可怜兮兮的装束是从“城里的花店”里弄来的，但他们计划“发展自己的装束”。他骄傲地说：“征兵中心正被蒲公英花所环绕。”而那里被征者正在排着队参军。

已经成为纽约东村颇具号召力的嬉皮士之一的霍夫曼此时加入了一个叫做“挖掘者”的队伍，它是由一个来自旧金山的演员团体旧金山哑剧团成立的。他在一篇题为《挖掘主义就是黑人主义》(*Diggery is Niggery*)的文章中解释挖掘者和嬉皮士之间的不同之处时说，挖掘者是一群懂得如何操纵媒体而不是被媒体操纵的嬉皮士，“两者都是为了某种目的的作秀”。该文刊于公开出版物《赢》。

挖掘者一名来自于17世纪的英国自由土地运动，该运动鼓吹取缔金钱和财产，提出毁掉货币，将所有的东西无偿给予的革命性举措。霍夫曼在东村第三街上演了一场“打扫秀”，这条街是曼哈顿最脏的街道之一。警察们面对拿着扫帚和拖把的霍夫曼和与他在一起的挖掘者不知如何是好，其中一个成员甚至走到纽约一个警察的面前为他清理肩章。这个警察笑了，所有的人都笑了，于是“乡村之音”说这场所谓的“打扫秀”是一次“傻瓜行动”。那年晚些时候，霍夫曼又上演了一场“抽烟秀”，人们走到汤普金斯广场抽

大麻，但当时大麻就已风行很久了。

霍夫曼说：“一个现代的革命队伍是冲着电视台去的，而不是冲着工厂去的。”

杰里·鲁宾是霍夫曼的伙伴兼竞争者，他出生于1938年辛辛那提的一个蓝领家庭。有一个说法是，鲁宾和霍夫曼在1968年1月的一次嗑药后神智不清地在地上打滚，于是有了异皮士运动。实际情形却与之相反。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内部人背信弃义，把丢人现眼的真相泄露给媒体。这是一个早有计划的运动。事实是，鲁宾和霍夫曼对开创此运动早有清醒的思考。霍夫曼在他“自由”的阶段，想将这一组织称为“自由人”。实际上，他出版于1968年的第一本书便是以“自由”为笔名的。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自由人”输给了异皮士。直到那年的晚些时候他们才对外说这名字是代表青年国际党的。

没有人知道到底该在多大程度上把霍夫曼当真，这也是他的拿手伎俩。有件事很能说明这个60年代难以捉摸的小丑的本色。1967年，霍夫曼第二次结婚，他们6月8日的“结婚运动”也被登在《乡村之音》上，文章说婚礼伴随着“鲜花、朋友、食物、玩乐、服装和经过化妆的脸”。这对新人在主的名义下结合——他们穿着白色的婚礼服，头上戴着花环。《周易》，中国的一本3000年前预测未来的书，在当时作为神秘主义著作很流行，这本书在他们的婚礼上被诵读。新郎显然是吸了大麻而不由自主地咯咯笑。《时代》杂志在1967年7月关于雅皮士的这一期上报道了这次婚礼，但并没有提到这对“戴花夫妇”的名字。阿比·霍夫曼直到1968年才出名。婚礼后，这对夫妇悄悄地到了显然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一个教堂——在曼哈顿繁华的上东区的埃马努埃尔教堂，在那里，拉比内森丹·A.培利曼悄悄地为他们举行了一次传统的犹太改良婚礼。

犹太人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占的比例很大，无论在波兰、美国和法

国都是如此。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最活跃的两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其成员有一大半都是犹太人。当汤姆·海登刚到密歇根大学的时候，他注意到政治积极分子都是来自左翼家庭的犹太学生。三分之二的“白人自由乘车者”是犹太人。伯克利的大多数“自由演说运动”的领导也都是犹太人。著名的非犹太人马里奥·萨维奥说：

我不是犹太人，但是我看到了那些令人惊讶不已的照片。成堆成堆的尸体，山一般的尸体。这些照片给我的意识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它给我的冲击可能别人通过别的途径也能感受到。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一切都需要质疑。我们需要真相，因为这就好像打开了父亲的抽屉，看到的却是孩子被成人玩弄的照片。这种黑暗、令人不舒服的秘密就好像是人们在近期看到的尸体被焚烧，成堆的人被叠起……这些照片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我知道它们对我的影响不是同等的强烈，但却是一种希望它“永远不再”的感觉，犹太人的感觉一定是一样的，但非犹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

“二战”期间和之后出生的一代人是在被恐惧改变了的世界中成长的，这使他们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世界。纳粹大屠杀给战后这一代人的教训是，在罪恶面前每个人都有责任声讨它；在无情的历史面前，任何沉默的借口就好像因战争而受审，还求情说他们是在按命令行事的德国人一样的可怜和活该受谴责。这一代人在孩提时代就知晓奥斯威辛、贝尔-贝尔森、广岛和长崎，知道只要大人们决定战争就意味着毁灭地球上的生命。

当老一辈以核弹轰炸日本缩短了战争为由为使用核弹辩护时，新一代却用截然不同的观点看待它，因为美国还在进行地面测试，他们也在电视上看到了核弹爆炸的蘑菇云。美国和欧洲，东方和西方，都知道美国是唯一用过核弹的国家，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制造更大更好的核弹。美国也一直在说要

再次使用核弹——在韩国、古巴和越南。出生于 40 年代的两个超级集团的孩子从小就进行面对核弹攻击的躲藏练习。萨维奥回忆在学校里被命令躲藏到课桌下时说：“我最终拿了物理学学位，但即使那时我还在问自己：‘这真的有效果吗？’”

在冷战中成长的孩子大部分都受到了同样的影响。他们害怕两个集团，这就是为什么欧洲、拉美、非洲和亚洲的年轻人迅速而坚决地谴责美国越战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他们不是在支持共产主义，只是对两个集团各自施加影响力不满。美国青年从罗森堡夫妇的死刑中，从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毁人名誉的听证会中，学会了不去信任美国政府。

那时候的青年们都看到了世界被两个势均力敌的力量挤压着。一些美国青年抗拒共产主义。《休伦港宣言》宣称要反对共产主义：“苏联，作为一种制度，其基础是对敌对势力的全面压迫、牺牲无数生命以换取幻想的未来和无数的大大小小的对人类尊严的否认，而且否认得名正言顺。”但是该宣言又说，在美国的反共产主义力量其危害性远远超过其有益性。该宣言警告说：“一种非理性的反共产主义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

这首先体现于 50 年代由詹姆斯·迪安、马龙·白兰度和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所刻画的电影角色上，以及“垮掉的一代”金斯堡和杰克·凯鲁亚克等的作品中。但是这种情绪到了 60 年代又有了滋长。年轻人相信约翰·肯尼迪，主要是因为他也相对年轻，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总统，他取代了艾森豪威尔，那时艾森豪威尔已经是美国史上最老的总统了。肯尼迪在 1961 年就任，这对白宫来说是年龄跨度最大的一次总统交接，就任总统和离职总统的年龄相差几乎三十岁。但即使在肯尼迪治下，年轻的美国人也经历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古巴导弹危机，这让年轻人明白了拥有权力的人总是草菅人命，即使他们年轻而有幽默感。

大多数在 60 年代中期进入大学的学生对任何权力都持厌恶和不信任的态度。政治圈中的有权之人都不被信任，这就是为什么不存在绝对的领导

人。一旦萨维奥或海登宣称自己是领导，他们就会失去所有的公信力。

这一代人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是与电视一起成长的第一代，他们不需要去学习如何使用电视，就像成长于90年代的孩子与电脑一起长大一样，这些东西是自然而然的，他们对这些东西有一种本能，这是老一代人所无法比拟的。1960年，在艾森豪威尔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专栏作家罗伯特·斯皮瓦克问总统，他觉得在白宫执政的八年里媒体对他是否公平。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哦，我不觉得一个记者可以给一个总统太大的影响。你说是吗？”这样的一种看法在白宫不会再出现了。出生于1917年的肯尼迪据说对电视很有理解力，但事实上比他小八岁的弟弟罗伯特才是他总统电视秀的总负责人。

1968年，沃尔特·克朗凯特得出了一个令他担心的结论：电视不仅在报道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在塑造事件方面也一样重要。世界上的游行示威越来越多，而且好像都是冲着电视来的。街头抗议就是很好的电视，它们的规模甚至不需要太大，只需要有足够的人填满镜头就行。

“你不能说这是他们走上街头的唯一原因，在有电视之前就有游行了，但能上电视却是他们示威的一个额外诱惑。”克朗凯特在几十年后回忆道，“尤其是当他们看到电视在不同的社会是同样的成功，他们更加觉得这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于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开始流行全球了。”

这一代人，对权力的不信任，对电视的理解，在最好的政治活动学校——美国民权运动中成长，是扰乱社会的绝佳的一代。他们又面对着一场他们不愿意去打并且认为不应该打的战争。这一代的年轻人，也就是1968年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是征兵的对象。无论是海登们、萨维奥们还是阿比·霍夫曼们，当朝鲜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们还小，当越战来的时候他们又已经老了，所以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征兵制度。60年代的年轻人，1968年的人们，内心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

英雄们

让我们决定不要效仿欧洲，让我们朝着一个新的方向整合我们的力量和头脑，让我们创造出欧洲人未曾创造出来的“完整的人”。

——弗朗茨·法农《受诅咒的大地》，1961

1968年似乎应该是约翰逊大出风头的一年。当寒冬过去，春天来临的时候，每一个梦想着入主白宫的人都在算计着如何击败现任总统，但是在每一次虚拟的竞赛中，约翰逊都获胜。但即使那些不参加总统竞选的人，也在进行反对约翰逊的活动。马丁·路德·金和他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宣布了一项计划，要让成千上万的穷人、白人和黑人在春天的时候到华盛顿游行，他们要在电视上公开展示曾经被隐藏着的贫穷。该运动的第二号人物拉尔夫·阿伯内西牧师说：“我们要到那里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谈，如果他对此不予理会，那么我们就要推翻他，找一个能说得上话的总统。”

但是1968年3月12日以后的日子却不再是约翰逊的日子了。那天约翰逊赢得了初选，这是一次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并不艰难的选举，期间唯一的对手只有参议员尤金·麦卡锡，而这个麦卡锡曾在一个月前被《生活》杂志称为“费解的人”，是一个不可能赢得选举的人。结果令人吃惊，在新罕布什尔的那个雪天，总统只是以微弱的230张选票的优势赢了这个“费解的人”。

这一消息在世界上传开后，所有的报道都好像是这个不知名的参议员已经当选了总统，或者至少是他击败了约翰逊。当华沙学生上街与警察抗争、捷克人进一步脱离苏联控制的时候，苏共党报《真理报》说，首场的选举结果表明越战“已经成为1968年总统选举中一个主要和决定性的因素”。在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关闭了，天主教报纸《现在》(Ya)预言11月的选举将“掀翻约翰逊”。在罗马，学生们关闭了大学，左翼媒体宣称反战运动正在取得胜利。

纽约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当时没有被列入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的候选



马丁·路德·金 最后的运动, 1968
(尚博格黑人文化研究中心)

人之列，他发起了令人失望的增补候选人运动，当中他仅获得了10%的选票。首场选举之后他决定退选，令共和党阵营陷入了一场许多人都认为不可能的境地：又一次提名尼克松。尼克松没有时间幸灾乐祸，因为罗伯特·肯尼迪也宣布参选，这使尼克松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似乎又面临着几乎曾经断送他前程的辩论——又一次的尼克松—肯尼迪辩论。但是首先肯尼迪必须让约翰逊离开总统宝座。3月31日一个突如其来的令人不快的消息：约翰逊总统在电视上宣布说，“我将不会寻求、而且我也不接受我党提名我为总统的决定。”

突然之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退出了竞选，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美国正在路上，我们只是静静地站着，”阿比·霍夫曼说，“美国早已是赤裸了，我们又怎能再将它的内裤扒下？我们还能破坏什么？美国几乎要完蛋了。”

历史学家们此后一直对约翰逊的理由有争议。麦卡锡的支持者们和反战分子宣称胜利——至少他们迫使总统认为自己是赢不了的。接下来的几年，约翰逊的鹰派内阁们告诫他，扩大战争的规模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并且在军事上也是赢不了的。约翰逊在离职的同时，确实宣布了有限地中止轰炸，并有意寻求与北越和平谈判，但总统的做法和众所周知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做法不一样。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可能还会竞选连任。可能是初选那天的暴风雪把约翰逊过分自信的支持者们封在了家里，而他初选的微弱小胜只是一个侥幸。即使新罕布什尔之选确实意味着前面的困难，约翰逊也不是在政治竞争中轻易退却的人。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结束后，伦敦的《泰晤士报》就预测说，其结果会“激怒”约翰逊，并“唤醒他的政客本性”。也有人说他夫人不希望他参加竞选。《纽约时报》猜测说，主要原因是战争进行得很不顺利。从3月8—14日，世界经历了由美国的越战而引起的另一场全球性的崩溃。美国每年都要将300亿美元投入战争中，财政赤字高达36亿；与这个庞大的数字相比，像控制出境旅行这种应对措施只被当做是毫无意义

的权宜之计。美国动用黄金储备来支付越战，到这时黄金储备额只有“二战”后 246 亿美元的一半。美元价值是与黄金挂钩的，面对这些数字，投机者们认为美元对黄金每盎司 35 元的固定比价不可能维持下去。理论上，美国没有足够的储备以 35 元的价格卖给所有买家，这将促使黄金价格上涨，于是拥有黄金的人会获得巨额利润。在 1967 年 11 月英镑贬值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英镑上面。黄金投机者们疯狂地大量买进，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媒体称之为“史上最大的黄金热”。伦敦金市上的黄金流动量超过 200 吨，价值 2.2 亿，创下了每日成交量的记录。大量的黄金流入瑞士，以至于其中的一家银行不得不加固金库以承受额外的重量。世界上的经济学家们预测将面临灾难。“我们正处在世界性危机的初期阶段”，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维齐说。

当世人愤怒地注视着美国的越战开支所传导出的对全球经济的破坏的时候，战争本身变得更加糟糕。3 月 14 日，美国司令部报告说最近的一个星期有 509 个士兵战死，2766 个士兵受伤，这使得自 1961 年 1 月 1 日起的伤亡人数增加到 193801 人，其中有 19670 人战死。虽然没有三年朝鲜战争总死亡人数 33000 来得多，但这是越战中头一次伤亡人数超过朝鲜战争。

3 月 16 日，第 23 支陆战队，所谓的“美国支队”，在越南中部靠近肮脏而褐色的南中国海的一个叫做山美（Son My）的村子作战，杀死了近五百个手无寸铁的平民，多数死者来自一个叫做美莱的小村庄，但整个地区都遭到了杀戮，老人、妇女、儿童甚至婴儿都大量地被屠杀，虽然也有拒绝参与屠杀的部队。一个士兵用 45 毫米口径的手枪对着他面前的一个婴儿射击，因连射三次才击中而被同伴耻笑。妇女们被用来福枪柄殴打，有些被强奸，有些被迫口交。美国人杀死家禽和牲口并将它们扔进井里以污染水源。他们轰炸房子下面村民用以躲避炸弹的掩体，被迫逃跑的村民就被枪击。房子被烧。一个在第 11 支队的叫做汤姆·格伦的士兵给支队总部写信报告这些罪行，并等待回应。

无论是什么原因使约翰逊退出总统竞选，它都制造了一种奇怪的政治现实。民主党有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这个和平的候选人几乎没有清楚地表述过和平计划之外的任何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纽约州的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根据2月份的《财富》杂志的说法，他是30年代以来最不受商业领导人喜欢的候选人。1968年的年轻人是一群远离传统政治的人，突然之间冒出了两个他们所佩服的人来竞争执政党的提名。事实是，同样来自于传统政治阵营的这两个候选人成功地赢得了年轻人对他们的信任和尊敬，而这些年轻人又是一些对所谓的“民主”和“自由”标签不屑一顾的人。谁也没把握他们能长久地独领风骚。当局将推选自己的候选人，毫无疑问将是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但目前政局正处于很兴奋的阶段。一个有关麦卡锡的广告上是他被一群年轻人围着，标题是“我们的孩子已经回家了”：

突然之间选民们有希望了。

突然之间他们回到了美国生活的主流。这是一个不同的国家。

突然之间孩子们投入了政治，用他们所有出众的才华和能力。这是一个新的选举。

第二年亨利·基辛格成了尼克松的安全顾问，他接受杂志《瞧》的采访，展示了他在完全错误的时候仍能说得头头是道的非凡才能：

我能够理解年轻一代的苦闷，他们缺少典范，也没有英雄，在这世界上看不到远大的理想。但是出于道德原因而拒服兵役是对社会造成破坏。个人的需求总是和社会集体相矛盾。出于道德原因而拒服兵役应该只针对最大的道德问题，而越南并不在这个范畴之内。

很明显，基辛格并不理解“这一代年轻人的苦闷”。首先，这些年轻人

中有许多英雄，虽然基辛格及其所崇拜的对象并不在这些年轻人所崇拜的名单之内。最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所崇拜的对象并不包括政治家、将军或者国家领导人。世界上所有的年轻人都有共同的崇拜对象，而令人激动的是，他们发现具有相同想法的人居然遍布世界。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国际看法。也许是因为卫星通讯和电视的发明创造了一个全球化的一代，但接下来的几代人却没有那么国际化了。

对美国人来说另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是，有这么多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被人崇拜，这很可能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活动范围是从大学开始的。对60年代的年轻人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加缪1960年死于车祸，时年47岁，他的大好前程从此葬送。他发表于1942年的作品《西西弗斯的神话》认为人类状况根本上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他经常被与存在主义运动相联系，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他不是个介入者，这是他比存在主义和共产主义者让-保罗·萨特更受尊重的原因之一，尽管萨特见证了整个60年代甚至参与了60年代的学生运动。加缪编了一本地下报纸《战斗报》(Le Combat)以抵抗纳粹对法国的占领，经常写文章从道德的角度阐述行动的必要性。1948年，他的小说《鼠疫》出版，该书描写一个医生发现自己的社区里流行一种疾病，他冒着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危险将它消灭。60年代，全世界的学生们都在读《鼠疫》，并将它解释成是对行动主义的号召。马里奥·萨维奥1964年的一段演讲：“总有一天，这个机器的运转会变得如此可憎……你不得不用你的身体去抵挡齿轮……使它停止运行。”这话听起来颇似《鼠疫》中的话：“有好多次我唯一的感受就是要疯狂地反抗。”美国的民权运动者读加缪，他的书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广为流传。汤姆·海登撰文说加缪对他离开新闻业而投身学生运动这一决定起了最大的影响。阿比·霍夫曼用加缪在《笔记本》中的话部分地解释异皮士运动：“被神话化的运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运动。”

1968年还有另一个知识分子被广泛引用，那便是马克思—黑格尔修正主义革命者赫伯特·马尔库塞，他最具号召力的观点被他称为“伟大的拒绝”，即在某种时刻必须说“不，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个思想在萨维奥《可憎的机器》的演讲中也有体现。为逃避纳粹，马尔库塞后来成为美国公民，到布兰代斯学院任职，阿比·霍夫曼正好是那里的学生。霍夫曼深受他的影响，尤其是他的书《爱欲与文明》。这本书讲了无负罪感的性爱，并警告读者这世界上存在着“虚假的父辈、教师和偶像”。60年代晚期被谈论得最多的一本书是马尔库塞出版于1964年的《单向度的人》。他谴责技术社会是浅薄的、墨守成规的社会，并把50年代詹姆斯·迪安式的反抗和60年代的学生革命都融入了分类严谨的德国哲学体系。《纽约时报》称马尔库塞为“尚健在的最重要的哲学家”。

1968年，70岁的马尔库塞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书，人们看到他十分溺爱他那铁锈色的猫，也喜欢动物园里的河马，简直就是一个白发老者的可亲的形象，而当时他的影响已经遍布全球。那年3月迫使罗马大学关门的学生们举着写有三个M的旗帜，分别代表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

当更保守的思想家们认为技术可以创造更多的休闲时间的时候，马尔库塞却警告说技术会使人们陷入缺乏创新思维的生活。他认为虽然技术看起来似乎有利于异议分子，但实际上它却起到了削弱抗议的声音的作用。人们被麻醉了，进入一种自以为是的满足状态中，误把这种状态当做幸福。商品和服务使人类显得无用和无法产生真正的思想。媒体是越来越多了，但支持的观点却越来越少。在今天的社会，人们有多达80个电视台可以选择，但却发现其实还不如四个电视台的时候有更多的可选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开始认同马尔库塞对技术年代的看法，在这个年代人们虽有更多的选择，但这些选择却缺乏至关重要的不同性。在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当技术赋予人们以更高效率的时候，为什么人们反而会花更多的工作时间，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工作是盲目的而不是有趣的、富于启发性的？作为第一个对苏联

制度丧失信心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认为西方照样是“不自由的”，而唯一通向真正自由的途径也许就是革命。

马尔库塞，一个年老的教授，似乎对成为激进学生的精神导师产生了兴趣。他经常讨论他们的运动。他就“花的力量”警告阿比·霍夫曼，除了培育花儿的人们力量之外，“花儿没有任何力量”。对此霍夫曼没有什么回应，这对他来说是很罕见的。但是正像连马尔库塞自己也坦然承认的那样，许多谈论他的思想的青年反叛者其实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书。他的著作是用德国的辩证法传统写的，虽然他从未采用更易懂的文风写作，仍然被广为接受。一个墨西哥的学生领袖刘易斯·贡扎勒斯·阿尔巴描述他最终坐下来阅读马尔库塞的书，是因为总统迪亚斯·奥尔达斯谴责运动是受了这个哲学家的影响。

我打开《单向度的人》，翻到第五页就看不下去了。《爱欲与文明》无聊透顶。现在我不得不读马尔库塞的另一本书，全是因为迪亚斯·奥尔达斯恰巧提到过这些“搞破坏性的哲学家”。

一个出生在马提尼克岛的叫做弗朗茨·法农的精神病学家自1961年出版了一本叫做《全世界受苦的人》(*Les damnés de la terre*)的书之后就名声大振。该书被译成25种文字，在美国被译成《受诅咒的大地》，美国大学的学生都在读它。法农于1953年在阿尔及利亚完成了他的法国医学学位，同时他加入了阿尔及利亚民族阵线，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中成为一名领袖，这对开始于50年代晚期以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为己任的法国青年运动来说无疑是个激励。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就像古巴，开始被作为一个反抗世界现有秩序的符号。《受诅咒的大地》虽然不是一篇反对殖民主义的长篇宣言，它不仅揭示了殖民主义的心理，同时也探讨了推翻殖民主义的心理，以及建设一个后殖民主义的社会所需的“新人类”。

通过解释以内部斗争结束殖民主义的复杂性,《受诅咒的大地》对美国的民权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该书帮助人们将受压迫的、试图反抗白人统治的美国黑人与企图逃离欧洲人统治的非洲穆斯林相联系。这是黑人穆斯林运动的主题,尤其是当该组织在马尔科姆·X (Malcolm X) 手下的时候更是如此。马尔科姆·X 跟法农一样,出生在1925年,于1965年被杀。他似乎是被内部人杀害,虽然一直没有证据。黑人穆斯林拳击手穆罕默德·阿里因为抵抗白人权威而常被看做是新兴贫困国家的旗手。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称阿里为“拳击场上的黑人卡斯特罗”。

甚至连马丁·路德·金都将民权运动与不发达国家的斗争相联系。1955年当他讲到蒙哥马利的抵制运动时说:“这是世界运动的一部分。放眼望去就会看到,这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被压迫者都在反抗压迫者,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特征。”

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因为自己的文学才能而成了60年代的偶像。他在18岁时因吸食大麻而被捕入狱,后来因强奸而再次入狱。1966年刑满释放后他进入了反主流文化的杂志《城墙》——1966年该杂志的封面因登载了焚烧征兵卡而被控有罪,从此名声大噪。同事们鼓励克利弗将在监狱中写的文章结集出版,他在这些文章中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同时也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创造了他的世界。克利弗一直没有名气,直到1968年出版了新书《冰上的灵魂》,他因此而被包括《纽约时报》书评在内的评论家赞扬为傲气而又恰如其分。他的时机正合适:在1968年,美国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错是美国国内的头号话题。6月份的盖洛普调查显示:有3:2的白人认美国并没有什么“毛病”,但8:7的黑人却有不同的看法。《冰上的灵魂》出版时正好是谢纳关于种族动乱的报告出台之时,正如《纽约时报》指出的,该报告证实了此书观点。“照照镜子吧,”克利弗写道,“原因是你们,眷顾昨天先生和昨天女士。你们,还有你们的谎言。”

在他的书出版之前不久,克利弗在加利福尼亚做一个重要的黑白联盟的

中间人。那里的新左派组成了一个政党——和平与自由之党——征集了10万人签名，要求该政党的候选人参与加州的选举。通过克利弗，该政党可以与黑豹组成联盟，前提是同意黑豹所提出的黑人免于服兵役、释放监狱里的所有黑人以及必须由黑人审判黑人的主张。克利弗被提名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伙伴是杰利·鲁宾。克利弗的新婚妻子凯瑟琳，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将成为国会候选人，就像黑豹的博比·西尔一样。克利弗将选前的一次竞选活动叫做“前勃起日”，号召“性力量”。他还号召和“机关枪凯利”联合，意思是，与任何持有枪支并且愿意使用它的人联盟。10月份，他在斯坦福大学做演讲时人满为患，掌声如雷，他评论加州州长罗德·里根，“罗德·里根是个流氓，女里女气的懦夫。我要与他决斗，直到我们当中一个人死掉，或者直到他喊我一声埃尔德里奇叔叔。我让他在这些武器中任选一样——一支枪，一把刀，一个棒球拍，或者棉花糖。”

1968年对埃尔德里奇·克利弗来说是最好的一年，第二年他因参与黑豹在奥克兰的枪战而被控告，随即逃到古巴，然后是阿尔及利亚。当他最后在1975年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已没有什么崇拜者了。

说实话，在私底下，大多数白人左派都觉得黑豹有些可怕，因为很多白人新左派出生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民权运动中的大多数黑人，像鲍勃·摩西和马丁·路德·金都接受过很好的教育，而黑豹成员大多来自治安紊乱的社区，还经常有人狱记录。身着黑衣，头戴黑贝雷帽，手持武器拍照，他们看起来的确可怕。他们散布暴力，鼓励黑人拿起武器进行革命。没有什么人同情与景仰他们，除了两件事。1968年，当局明显在准备用武器对付没有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在某些地方尤甚，比如在理查德·戴利治下的芝加哥和罗纳德·里根治下的加利福尼亚。4月，戴利宣布他已经命令警察“射死”任何一个纵火犯或者任何携有瓶装汽油弹的人，“射伤”任何一个掠夺者，即允许对平民暴动开火。1967年里根刚当上州长，就在削减医疗和教育财政预算的同时推出了残酷镇压示威的政策。1967年10月16日奥克

兰警察残酷镇压反战示威，导致“流血星期二”，但里根随即表扬奥克兰警局，说他们“具备出众的能力和专业技术”。年轻的、出身优越的白人青年开始遭受像黑人一直以来遭受的警察的虐待。

1968年1月，700个反战分子包围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旧金山的演说现场，阻断了入口，警察对此予以镇压。事后，一个被关进监狱的伯克利的学生说，警察们“想杀死我们，如果他们可以不被追究责任的话，我们就真的被射死了。我现在明白了，他们是想干掉休伊，除非休伊知道要保护自己。”

他所说的休伊是休伊·牛顿，1966年在加州创立黑豹，1968年成为伯克利—奥克兰地区和平与自由党在美国众议院的候选人，与此同时，他因为涉嫌在1966年的枪战中各打死和打伤一名警察而被关进监狱等待判决。1968年夏季的第一次审判被宣布无效，接下来两次也一样无效。几乎对所有黑豹重要人物的判决结果都是无效、无罪或者撤销判决、再次上诉，这更引起人们猜疑这些人是否在被警察陷害。审判过程中，警察暴行的可靠证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包括在一次案件中，警察在两个嫌犯的床上谋杀了他们。黑豹被人们看成是暴力的受害者，勇敢与警察抗争的烈士。

这是黑人社群内讧不断的时期，因为早前的黑人（Negro）想要弄清新的黑人到底是怎么回事。1968年，很多著名的黑人文化人频繁地受到攻击。在《冰上的灵魂》这本书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猛烈抨击詹姆斯·鲍德温，后者可以说是60年代前半期最受人尊敬的黑人作家。在称赞这位黑人作家技艺超群、令他激动不已之后，克利弗说鲍德温“对黑人充满了严苛、痛苦和满腔的仇恨，尤其是对他自己。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对白人充满了最无耻、疯狂、谄媚之爱的美国黑人作家”。克利弗抨击黑人仇恨黑人现象，在他的一本小书里他不仅谴责了鲍德温，而且还谴责了弗洛耶·帕特森，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乔·路易斯，哈里·贝拉方特，利纳·霍恩和马丁·路德·金。根据克利弗的说法，爵士乐明星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是“汤姆叔叔”，他用他

的大眼睛和大牙齿，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口味极尽逢迎之能事。

基本上，克利弗将成功的黑人都看做是叛徒。被谋杀的马尔科姆·X，被剥夺了拳手资格的穆罕默德·阿里，被迫逃亡的保罗·罗伯逊——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黑人英雄，而马丁·路德·金就应该因获得诺贝尔奖而被讥讽。克利弗写道：“马丁·路德·金所获得的诺贝尔奖以及他由此而上升的国际名声，证明了只有做权力的傀儡和奴仆的黑人才能获得国内或国际名声这一历史事实。”一旦此论被公认，那么扩而大之的问题便是：如果一个黑人获得了认可，那么是否就说明他或她是走狗？

林肯·西奥多·门罗·安德鲁·佩里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斯德宾·费希特。1968年，在他76岁时，CBS电视台做了个特别节目，《黑人的历史——失落、被盗与迷失》，由黑人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解说，节目将斯德宾·费希特刻画成一个典型的早期种族论者。对此，斯德宾·费希特予以猛烈回击。他说：“不是马丁·路德·金在解放现代黑人，而是我，斯德宾·费希特在做这件事。”并说，“我是在南方第一个住宾馆的黑人，是第一个在东西海岸之间乘飞机飞行的黑人，我为黑人洗去了强奸犯的形象，我使黑人有工作，让他们被认为值得相处。”然后他抨击一些新上映的电影，比如《猜猜谁来赴晚餐》，影片中斯宾塞·特雷西和凯瑟琳·赫本的女儿将他的未婚夫带到家里共进晚餐，其未婚夫由悉尼·波伊蒂尔出演，他是一个英俊、口才出众、前途无量的青年医生。作为一个白人父亲，特雷西尽可能地不表达出种族主义思想，但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这个问题。影片说明了跨种族婚姻是可能的，只要其中的黑人是美国有影响力的公民。斯德宾·费希特说，影片“无助于跨种族婚姻，反而阻碍了这种婚姻的实现”。他说，影片中的波伊蒂尔自始至终没有碰他的白人未婚妻一下。喜剧演员说，波伊蒂尔和其他的当代黑人影星“只是工具。就好像在银行里，你摆设了一个黑人职员，但仅仅是一个而已，再也没有第二个了”。

新的黑人英雄层出不穷，而老的却日益凋谢。到了1968年，穆罕默德

德·阿里是少数几个左派的黑人英雄常青树。当他在1967年因拒绝征兵而被取消拳击资格时，受到了黑人青年的尊崇。在《伟大的白色希望》里，詹姆斯·厄尔·琼斯饰演了一个黑人英雄新星杰克·约翰逊，他是第一个黑人重量级冠军，用1968年的术语来说是一个黑人斗士，而不是一个旧式的黑人。他被逐出拳坛的经历看起来与穆罕默德·阿里的经历有些类似。

在这种黑人英雄的艰难时期，马丁·路德·金经常受到批评就不足为怪了。许多民权运动者尤其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开玩笑地将他叫做“主 (de Lawd)”。从1966年开始，金在演讲时就经常被该组织的成员喝倒彩，他们大叫“黑人力量”来干扰他的声音。有一次金回应说：“法老想让奴隶听话的时候，就让他们互相争斗。”

他经常被抨击过多引起媒体对他的注意。这也许是事实。他天生就善于操纵媒体，这也是他成为领袖的原因。他有时会思索，如果不参与民权运动的话，他可以过上什么样的好日子。他出身优越，其父是亚特兰大的一个牧师，他力争终结贫困与歧视，但是他并不是生在这样的环境。直到他六年级时，他和原先的一个白人朋友因为各自转到其他学校停止交往，他才意识到什么是种族歧视。

作为波士顿大学的博士生，他的保养与穿着给女同学留下了很深印象，虽然只是一个研究生，但他总是穿戴得很有品位。他未来的妻子科雷塔·斯科特回忆说：“他很有一套风格。”她用“做学问的摇摆舞者”来形容这种风格。若不说话，他是一个小个、长相一般的人。他从一开始就以其超人的演说才能赢得了领导人的地位，而且在媒体面前他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老成许多。当他成为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公交车抵抗运动的领袖时，他只有26岁，而且新来乍到。

他经常谈到他的人生并认为他已别无选择。“当我参与了斗争，人们从斗争中获得了灵感时，我意识到选择就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人们希望你做他们的领袖。”

虽然出生于1929年，比60年代的领袖如汤姆·海登等年长约十岁，金的想法和60年代的运动分子一样——梦想着比南方和种族隔离等更大的事。他觉得自己是迈向自由的国际运动的一分子。

J.埃德加·胡佛领导下的FBI对金进行紧密跟踪。胡佛被克利弗叫做“美国最正宗的警察”。FBI监视他，给他拍照，在他身边安插线人，记录他的谈话。胡佛名义上在寻找金与共产党的联系，并且说服罗伯特·肯尼迪——他一生中大部分的重大失策都是冷战中犯下的——当前危机四伏，进行窃听是很有必要的。金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失败，对马克思主义也没什么崇敬之心，他对这些东西很谨慎，从不多谈。至于与共产党的联系，所有证据只显示他可能认识一两个早期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

FBI能找出来的关于金的最确凿的证据只是，马丁·路德·金牧师与许多女人有染。跟他过从密切的人曾警告他说，万一丑事泄露，运动也许会遭殃。金曾经说：“做爱有助于减压。”因为组织内大多数人都跟他一样，所以他很少受到指责。“每个人都出去找乐。”政治激进分子迈克尔·哈林顿说。但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是去追女人，反倒是女人在到处追他。

FBI将照片和其他的证据给记者看，希望他们报道这些事，但没人愿意报道。在60年代，基于尊严和道德，许多记者都不屑报道这种事情。1965年，FBI更进一步地将金的性爱录音带寄给金的妻子和他本人，并且附话说，唯一的解决途径是请金自裁。

但所有这些都无补于意识到他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人再愿意相信非暴力运动这件事更让金悲伤的了。他在1967年说：“我还会竭尽所能地宣传非暴力，但恐怕也只是对牛弹琴了。”1968年，他已经极度抑郁，经常谈到死亡。并且因为强迫性进食而发胖。诺贝尔和平奖也没有使他开心。他跟拉尔夫·阿伯内西说：“也许我们必须承认暴力时代已来到，也许我们只有放弃非暴力、让暴力取而代之。这个国家不会听我们的。也许它会听听暴力的声音。”。

他说他生活在一个“有病的国家”，他的演说开始病态地专注于死亡。他把自己比做摩西，带领人民走出奴役却死在约旦的山顶上，眺望着那块上帝应允之地。

春天，他会定期地花时间在孟菲斯支持垃圾工人的罢工活动。这些专门分配给黑人的工作所给的报酬刚够最低工资，没有假期，也没有养老金——这就是黑人在美国的繁荣中没有一席之地的见证。3月28日的一次游行示威对金来说是个灾难，示威者变得暴力起来，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摧毁了临



1968年4月7日，因马丁·路德·金被刺而引发暴乱之后的华盛顿DC。

(波特·格林 摄 / 玛格南图片社)

街的店面。4月3日，金回到了孟菲斯，再一次发动示威，却遭到媒体的冷嘲热讽。4月4日晚上，他在旅馆里休息，准备下个星期在亚特兰大他的教堂的一次布道，在他之前，他父亲是这个教堂的牧师。布道的主题为“美国可能走向地狱”，结果他右脸中弹，几分钟后死亡。

正如金所预言的，暴力一触即发。当金被一个叫做詹姆斯·厄尔·雷的白人逃犯枪杀的消息传开后，美国120个城市爆发了黑人暴乱，其中40个城市的情形更为严重。国家防卫队进驻许多被烧杀劫掠的城市。就是这时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颁布了其声名狼藉的“射杀”令。黑人社区的几百万财产被摧毁，黑人被杀——仅华盛顿特区就有12个黑人死于非命。金，不再是一个有“汤姆叔叔”之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最终成为了一个黑人烈士，在他不到40岁的年龄，被一个白人枪杀了。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说：“他们既已要了金的生命，狗屎的非暴力的言论也就到此结束了。”

一个波兰人的绝对命令

格罗斯：哦，上帝！你难道没把自己弄病吗？

巴勒斯：我们没有让自己折磨得生病吗，P先生？

（皮勒摇摇头）

我们当然没病。当人类危如累卵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能使我们生病。

——哈维尔《备忘录》，1968年在美国第一次上演

3月8日，几百个华沙大学的学生高喊着“无自由，不学习！”的口号行进到院长办公室，要求见他，然后出了校门。这次游行人数并不多，一个大教室就可以装下，对1968年的美国校园来说是一次微不足道的事件，在那里有成千上万个人在游行，占领校区，令学校被迫关门，但这在波兰还是头一次。民兵们被训练成对付任何有“反革命”倾向的人和事，约五百个民兵，身着便衣，戴着红白相间的波兰国旗的臂章。他们声称要与学生们交谈，但不久他们就追赶学生并以棍棒相加，在场的两百个警察则帮忙逮捕想要逃跑的学生。

学生们被这种暴行和闯进校园这种前所未有的违反传统的做法震惊了。几年来，异议分子在庫龙和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的领导下，都定期地举行示威活动，但也仅吸引了为数不多的人参与，政府这次的残暴无情激起了真

正的运动。第二天，两万名学生到华沙市中心游行。他们又一次遭到便衣警察的殴打。库龙、莫泽莱夫斯基和他们年轻的追随者亚当·米赫尼克等均被逮捕。

这次前所未有的运动是由年轻的波兰共产党人、这个国家精英们的子女发起的，其中三位是部长的子女。许多人的父母是共产党内的重要成员。直到那时，有理想的年轻的波兰人尽管与他们的父母的想法并不一致，但还是加入了共产党，试图改变它，使它得到发展。但这件事让他们转变了看法，这是一个随时准备以武力对抗任何改变的制度。

“二战”前的波兰共产党人对战后这一代人有一种冷嘲热讽的看法：他们成长于安逸的环境，直到1968年才有了点长进。康斯坦蒂·格贝特当时只有15岁，也加入了1968年的示威运动。他的父亲曾在美国组建共产党，战后回到了波兰建设共产主义国家，他是一个外交官，是个强硬的、老派的共产党人，懂得游行示威，也曾经被捕过。年轻的康斯坦蒂觉得父亲应该为儿子而骄傲，因为他像一个好的共产党员那样在街上游行了，但他的父亲却不这么看。“我父亲认为我参与政治是歇斯底里，这使我很失望。我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所以我要社会主义、自由、独立。我觉得这是伟大的。我参与了。我们为此对抗警察。那天我回家晚了三小时。‘爸爸，我们跟警察打起来了，为了独立！’我以为他会打开一瓶伏特加一起乐一乐的，没想到他们却把我锁在家里关了三天。当然，如果这些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我也会这么做。15岁不是一个上街游行的年龄。但我有多伤心啊，我还以为我会成为那些男孩的一员，就像我爸爸那样。”

年轻的波兰人很快就明白上街游行是危险的，但他们并没有被吓住，反而又走上了街头。第二天，学生们上街抗议逮捕学生、闯入学校以及不准上演《先人祭》。工艺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欢呼捷克斯洛伐克的胜利，谴责内政部长莫恰尔和他的“盖世太保”，他们向警察扔石头，警察则回以催泪弹。交警们将该地方围起，用卡车将便衣们送进示威区，这些便衣们跳下车，又

对着学生开打。其他聚集在华沙大学附近一个教堂前面的一小组学生也遭到殴打，他们聚集的地方是埋葬着作曲家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心脏的地方。

3月11日，几千个学生走进华沙市中心波兰共产党的总部，一幢灰色的、被严密把守的、正门有艺术装饰的大楼。在那里，共产党的官员们从六楼的露台往下看，警察又一次对着学生挥舞警棍，将他们打倒在地，鲜血直流，然后拖走。一些学生反抗，对警察投掷碎石头。打斗持续了两小时，这几千个波兰学生与柏林、罗马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学生抗议越战的场面比起来可谓微不足道，但对苏联集团内的国家来说却是一件令人吃惊的大事，世界各地均以头版报道此事。

在大学门外，卡车载着被人们喊为“盖世太保”的便衣。在1968年的游行示威中，从华沙到柏林、巴黎、芝加哥、墨西哥城，几乎没有不将警察比做纳粹的“盖世太保”的。在华沙，被学生呼做“盖世太保”的往往是来自工人阶层的民兵。这些人被告知这些闹事的学生出身优越，住着好房子，有机会去巴黎享受。所有这些都大体上都是真实的。虽然有大量的媒体报道说工人拒绝去对抗学生示威，但是挑拨工人对抗学生却是政府的一项成功策略。3月11日那一天，学生和民兵已经在华沙街上对峙了近八小时。政府早早地关闭了工厂，让工人们上街对付游行，将学生们诬蔑为“第五纵队”。

同一天，学生们在格但斯克、克拉科、波兹南、弗罗茨瓦夫和罗兹等地同时举行了游行示威，而且均遭到了警察的殴打，警察也使用了水枪和催泪弹。学生学了美国民权运动的一些技巧。他们联合抵制加上静坐，起初有许多学生还不明白他们在静坐时真的得坐下来。

政府分析在华沙和中产阶级聚集的克拉科这两个地方发生示威是有原因的，因为那里集中了大量的学生精英。但是在格但斯克和罗兹这两个有着强大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基础的城市也发生示威，就很难解释了。在格但斯克，学生们要求工人加入他们的队伍，众所周知，在美国，反战示威者也要求人们一起参加，但格但斯克的学生之与工人就像华盛顿的学生之与国家卫队一

样的不幸运，没什么人听他们的。在波兹南，学生们大声喊：“波兹南工人万岁！”但工人们也依然没有参加那里的示威。

库龙回忆道：“示威之前，我们这些学生想与工人一起行动，但羞涩而胆怯。没人料到会有这种冲突。当示威来临时，政府说学生们都是一些被宠坏的、出生优越的犹太人，是精英们的后代。”

“1968年，学生们有一个座右铭：‘没有自由就没有面包。’”叶乌盖尼纽斯·斯莫勒回忆道。斯莫勒的父亲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员。“工人们觉得这很可笑——没有面包才没有自由呢。面包总是第一位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挨过饿，工人和学生彼此无法理解。”接下来的几年里政府之所以能容忍抗议活动，是因为掀不起什么大波澜，不是工人们不支持学生和知识界，就是学生不支持工人。

示威者扛着标语、喊着口号，谴责波兰国家控制下的媒体，媒体将学生们的运动说成是流氓闹事，并拒绝对此予以评论报道。“说谎的媒体”成为学生们最大的不满。2月份的一次作家会议首次理性地讨论审查制度和不准上演《先人祭》事件，一个月后这次会议在《人民论坛报》上得到了报道，那时已是3月底了，抗议、静坐和街头战争已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但世界各地却在广泛地报道波兰的暴力事件。在维也纳，扬·诺瓦克只需浏览《世界报》、《纽约时报》以及一些其他报纸，就能找到可以用波兰语报道的新闻事件。

在罗兹，乔安娜·塞泽斯娜是一个17岁的大一学生，她来自中下层阶级，是个书虫。她从19世纪的法国小说中知道了资本主义的邪恶。她很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我可以在学校里畅所欲言。”3月份，一个从罗兹去华沙大学的学生回来说华沙的学生正在抗议审查制度，抗议政府不允许他们上演一出戏，他们因此而遭到了警察的殴打。

“或许我生活在书本的世界里，但我感到非常震惊。”塞泽斯娜说。“以

前除了电影版之外，我从不看报，现在我开始看报，发现事情是那么的不一样。报纸上在谈论流氓、冒险、有钱人的后代、犹太复国运动者。这是不可接受的。很清楚，我应该参加运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元素——一种令人兴奋的元素。”

她签了请愿书，上街抗议逮捕学生，并要求媒体说真话。她的母亲亚德维加是一个店员，一直梦想着成为一个社会工作者，因担心女儿出事，所以坚持要一起走以便保护她。出于自卫考虑，亚德维加手里拿着雨伞。当他们碰到一群工人的时候，游行队伍的人数大约已有一千人了。有人认出了亚德维加。

“你在这里干吗！”一个工人质问她。

亚德维加手里拿着雨伞做好了准备，回答说：“你在这里干吗！”

学生们宣布静坐三天，政府切断了学校的电话以防校园两个营地之间互相沟通。乔安娜阵营中有传言说有一些学生已放弃了行动。但是亚德维加刚给校园另一边乔安娜的男朋友送完三明治回来，她告诉女儿的伙伴们说，其他人并没有放弃，还在抗议。24小时后，当学生们准备放弃静坐的时候，乔安娜做了她一生中第一次演讲，她坚持要将示威进行到底，并提议要绝食抗议。

“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我同时也是一个孩子。”乔安娜说。“我希望我的父母加入我们的运动。我知道如果我绝食抗议，我的母亲会起来攻击共产党总部的。”有地下异议分子听到了她的演讲，并邀请她与大家一起干，于是乔安娜在她17岁的年龄成了一个不同政见者，以后她将与库龙、莫泽莱夫斯基和米赫尼克一起工作。

波兰执政党说学生运动是受斯大林主义者操控的，他们不愿承认这是一个自发的运动。根据《人民论坛报》的报道，“3月8日的事件是一次有准备的事件，之前有许多小规模的运动作铺垫，让领导和参与者为大型运动做

好了准备。”他们点出的领导是莫泽莱夫斯基和米赫尼克。但当他们和其他领导被关进监狱的时候，示威游行却在波兰每天照常进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人来协调运动。“当我听说的时候，我彻底震惊了。”库龙说，他当时还在监狱。“我们与弗罗茨瓦夫没什么联系，但所有的大学都在做这件事。”有些人被选出来组织3月8日的示威，但他们都被逮捕了。之后被选出的领导人也大都被逮捕。

接下来是持续两个星期的示威。许多示威者扛着“与华沙学生一起战斗”的标语，他们焚烧不报道运动的官方报纸。

政府或许对此猝不及防，但没有人比学生对此事更惊奇的。欧根纽什·斯莫拉尔说，他们几年来都是在小圈子里讨论，“这些话题的普遍性让我们备感意外，华沙大学里有那么多人揭竿而起让我们大为吃惊，而更让人惊讶不已的是国内每一个主要的大学都在响应。”

看起来，许多波兰年轻人无须讨论也都对社会有所质疑。斯莫拉尔说：“似乎有这样一种气氛：共产主义不能给他们带来所要的自由。”这种想法是波兰当局在不经意间传递给学生的。斯莫拉尔的妻子尼娜当时是一个研究生，她说：“一个意外是反犹太主义，接踵而来的意外是暴力。”

随着遍及全国的抗议，始于1967年的反犹太复国者运动在1968年掀起了高潮。对许多波兰共产党人来说，尤其是像斯莫拉尔这样的犹太人来说，这简直与共产党的理念是相反的。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禁止反对犹太人。亚当·米赫尼克说：“我之前从没有读到过反犹的文章，这是法西斯主义，是不被允许的，在这之前反犹运动只是一个抽象的术语。我想在波兰，在大屠杀之后，反犹运动是不可能的。”库龙说，“战前我见过反犹的共产党，但从未见过反犹的国家政策。”但是对一个极力想解释遍及全国的抗议运动的政府来说，将它归之为犹太复国运动者的阴谋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3月9日，米赫尼克被逮捕。审讯者问他，“米赫尼克先生，如果你被释放，是否会移民到以色列？”

“除非你移民到俄国。”米赫尼克回答。但他们给他施加压力，说只有他同意去以色列才能释放他。波兰想最终摆脱犹太人。正如在之前几年的“六日战争”所做的那样，哥穆尔卡宣布说，政府会为任何想去以色列的犹太人提供移民护照。

3月15日，一篇解释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出现在《人民论坛报》上。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美国的犹太人将几百万美元送到以色列。这些钱使以色列能发展经济和武器，来对付阿拉伯国家（最近的一次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第三次战争），同时也用于维持占领阿拉伯领土的费用……犹太复国主义者呼吁对受帝国主义支持的扩张政策实行经济援助，这些政策尤其受到美国和西德的支持。有了以色列的帮助，帝国主义就能取缔进步的阿拉伯政府，加强对阿拉伯石油的控制，并将中东变为对付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跳板。为了使以色列统治者的侵略政策冠冕堂皇，也为了迎合帝国主义，犹太复国运动者动用宣传，意在让世界相信以色列是在为自己的存在而奋斗，也让世界知道以色列目前正受到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因为这些国家想将“以色列人赶进大海”……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个词却演变成了“学生组织者”的代码。政府坚持声称这个问题是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引起的，是斯大林主义者的一个阴谋。这些人是一些过分宽容的父母和一些信奉斯大林主义的教授们，这些人恰好也是犹太人，是他们纵容出了一群像库龙、莫泽莱夫斯基和米赫尼克那样的阴险之徒。3月26日的《人民论坛报》抨击这些教授们，专门点明了哲学、经济和法学院——都是一些涉及意识形态的学院。“每当这些部门与国法和校规有冲突时，这些学者就利用他们的权威和他们在科学、学术界的地位，有系统地捍卫修正主义党派。”在斯大林主义教育的误导下，这些教

授宠出了这批危险的顽固分子：

面对有可能受到的制裁，学生们每一次都向他们的教授寻求保护。教授们则在许多会议中为学生辩护，说“年轻人必须有自己的尝试”。尽管他们说得语焉不详，教授们的用意其实是在鼓励学生的政治行为。有些教授甚至在法庭上替他们辩护。W.布鲁斯作为K.莫泽莱夫斯基的辩护方证人出席时，称他是“一个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旨在唤醒年轻人的政治参与热情的、诚实的、有理想的人。”这个清楚的表述对同道中人来说无疑是个再好不过的激励。

W.布鲁斯是大学里在3月初被革职的许多有犹太背景的教授之一。现在政府开始解雇更多的教授和导师，大多数人都有犹太血统。从3月12日开始，政府着手列出运动中犹太籍学生领导。三个有犹太背景政府高官被革职，并通知他们其子女是学生运动领袖。紧跟着就是清算，多是针对犹太人的。有犹太背景的诗入、哲学家、大学教授都被指为是同谋，许多人遭到解雇。3月18日，前政治局委员罗曼·赞布罗夫斯基被发现是学运的策划者，因此被开除出党。其实，赞布罗夫斯基与学运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但他是犹太人，并且是莫恰尔的政治对手。他的儿子安东尼尽管与学运毫无关系也被指控为学运领袖。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被解雇、越来越多的学生被殴打以致逮捕，学生们开始明白，政府已经站定了立场，它是不理会学生们内心的不满的。

另一件刺激自发性学运发展的事情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学生扛着标语说，“波兰等待着自已的杜布切克！”有史学家认为当这些标语出现在华沙的那一刻，杜布切克就注定要完了。自杜布切克于1月份掌权后，莫斯科就寝食不安，担心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将酿成席卷中欧的运动。

波兰人崇拜自己的民族英雄形象，这是外人鲜有人知的。他们引以为豪的是波兰人的反叛精神。根据波兰版的历史，捷克人允许了德国的占领，而波兰人却起来反抗了。捷克在1948年接受了共产主义，而波兰却抵制。1956年，波兰人造反以支持布达佩斯的反抗运动，但捷克人却一声不响地继续效忠莫斯科。波兰人还记得他们运送一批食物给正在造反的匈牙利人，但运货的卡车在经过捷克关口时却被扣留了。中欧国家形象分为复杂的三六九等，波兰人说，1956年“匈牙利人像波兰人，波兰人像捷克人，捷克人却像头猪”。

捷克人曾因为诺沃提尼治下实行过时的斯大林主义而遭到波兰人的耻笑。但现在捷克却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的典范和先锋。“捷克人居然赶在我们前面了，这很让人意外。他们本应该是机会主义者和懦夫，”欧根纽什·斯莫拉尔说。

不管是政府还是学生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个无组织的运动。缺少了领袖的学运分子不知所措。“我们没有任何准备，无论是对政府的血腥镇压还是对民众的热烈反应，我们都没有准备。”欧根纽什·斯莫拉尔说。

3月22日，西方报纸都在报道学生在克拉科、华沙和其他波兰城市的静坐，波兰报纸则在大写犹太复国主义、流氓闹事、斯大林主义和滋事者，这个时候苏联人第一次知道了波兰境内的状况。同一天，苏联新闻社塔斯社报道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诺沃提尼在第二任上被免职的情况，而苏联共产党报《真理报》和政府报纸《消息报》则不惜文字长篇报道了在波兰的“反苏维埃煽动者”。

也是在3月22日，异皮士们——阿比·霍夫曼，杰利·鲁宾和保罗·克拉斯纳——参加了一个在伊利诺伊州湖滨别墅的会议——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新左派聚会，新左派是1968年的青年运动。会议是由国家终战动员委员会召集的，也就是“结束越战的国家动员委员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

汤姆·海登和伦尼·戴维斯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议题是如何抵抗8月份即将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会议。约翰逊提出用送葬仪式来堵塞城市交通，也有人提出武力攻击会议。阿比·霍夫曼——一个反叛者、小丑和媒体才子——一如既往地勇敢。他吸着大麻参加完了整个会议，不断地抛出新点子。其中一个停止支付如厕费，另一个是赞成国家终战动员委员会对波兰的抗议学生予以支持，但两者都没有被采用。

3月24日，当静坐蔓延到波兰的每一所大学、越来越多的“犹太复国阴谋者”被解雇的时候，波兰天主教的主教发表了一封信，说学生运动是“为了真理和自由而战，这是人类的本性……”主教继续说，“用武力镇压就意味着侮辱人类尊严”。这封信预示着一个新联盟的开始。天主教和左派知识分子站在同一阵线在波兰是史无前例的。根据米赫尼克的说法，这封信引起了思想观念上的根本改变。“传统上，波兰的左派是反教会的。”米赫尼克说。“我也是这样，直到1968年，当教会声明支持学运时，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想，也许教会并不是敌人，也许他们可以成为对话的伙伴。”

3月28日，华沙有3000名学生示威，要求停止审查制度，建立自由贸易联盟，成立独立于共产党的一个青年组织。这是最后一次示威。八个大学的院、系被关闭，华沙大学的7000名学生中的1000名无课可上，并被告知他们需要重新申请入学。另有34名学生被开除。“我们不能再容忍大型集会，不会、也不能再宽容麻烦传播者和心怀歹意者。”《人民论坛报》宣布说。

随着1000名学生被捕入狱，学运被镇压了。政府继续寻找犹太复国运动的头目，并将他们革职。

随着最好的教师和学生逃离以躲避反犹运动，以及党的御用文人的滥竽充数，大学无可挽回地遭到破坏。一个波兰人只要愿意到以色列并出示犹太血统的证明就可以离开。有一个人被截留下来，因为除了一纸政府将他定为

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指控外，他没有其他能证明犹太人身份的证据。几乎所有犹太人都离境了，只有一千人留下来。

但是欧根纽什和尼娜·斯莫拉尔却留下来了。“1968年3月以后人们对这个制度就不抱希望了。”欧根纽什说。“以前人们入党是想改变它，要改变，就要先进入党的内部。1968年3月后入党的多是一些玩世不恭者，他们只是捞张党证以求个人发展。”

米赫尼克是另一个留下来的犹太人，但他是在监狱。当他后来被问起面对被关进监狱、大学遭到破坏、知识界被压制的情形是否后悔时，这个小个子但有力的男人毫不犹豫地抬起下巴坚决地说：“我从不后悔。在1935年的审讯中我的父母保持了沉默，这对我来说是个教训。你必须自始至终地反抗独裁，这就是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

斯莫拉尔说：“1968年那一代是在战火中出生的一代。他们在实践中学到了东西并且在日后所有的运动中都很积极。”他们学会了联合教会和工人，或者正如一位作者不经意间在《人民论坛报》上预言的那样：“大学中所发生的这些事件表明学生们除了普遍比较天真轻信之外，有些学生确实是很有潜力的。他们投入到意识形态斗争中，希望改变这个国家，使之更好。我们拭目以待这些学生成就斐然的那一天的到来。”

乔安娜第一次入狱时只有19岁。她背诵《飘》和高尔斯华绥的小说让狱友开心。1981年，当运动再起，工人和教会都加入了，情况之严重导致政府宣布实施戒严令以遏制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乔安娜的母亲亚德维加是被拘留者中年龄最大的。乔安娜说，“我对母亲起到了不好的影响。”

诗、政治和艰难的第二段

我写好了纠缠不休的第一段，
第二段也一样。此时我深陷繁杂之中，
无法再写第三段了。

——尤金·麦卡锡，《一个老政治家的悼词》，1968

1968年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把诗歌当回事的一年，这一年纽约的电话服务提供“播送一首诗”服务。那一年，政府有个试行计划，将诗人送到全国各地的公共中学，让他们给学生们朗读诗歌并一起讨论。学生的反应非常热烈。在底特律，诗人唐纳德·霍尔被阿梅莉亚·埃尔哈特中学热情的学生围在走廊中脱不了身，学生们高喊，“来一首诗！”他应邀高声朗诵了一首，但人群这时已多出了一倍，他只能再读一遍。

罗伯特·洛厄尔，1917年出生于波士顿名门，那一年也是约翰·肯尼迪出生的一年。罗伯特·洛厄尔看起来就像是专为60年代而生的诗人。正如出身背景相同的国家终战动员委员会的大卫·德林杰，洛厄尔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不是“二战”的战场上，而是在狱中服刑。他经常出现在60年代的反战集会上。到了1968年，他是美国最活跃的诗人，因为他与尤金·麦卡锡在同一个阵营。

出生于 1926 年的艾伦·金斯堡与 1968 年的学生相比在年龄上更接近于洛厄尔，但是即使在他 40 多岁的时候，金斯堡的个人精神和文学风格在 60 年代仍极具代表性，尽管当时他已是一个秃顶且有着一个大肚子的男人，胡子一大把，一头乱乱的黑色卷发。他应该是 50 年代的人物，是“二战”后垮掉一代的中心人物。但到了 1968 年，他那一代的人很多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他的老朋友杰克·凯鲁亚克沉溺于酒中，不支持反战运动，并谴责老朋友金斯堡不爱国。尼尔·卡萨迪在 1968 年初死于墨西哥，当时他正沿着铁路进行 15 英里路的远足，他说他要用数铁路轨道来度过时间。但是在途中他接受了一个婚礼邀请，在那里他花了几小时时间喝酒并吃速可眠。第二天 he 被发现倒在铁轨边上，显然已经淋了一夜的雨。经过了过度曝晒，他不久就死了，他的名字也退出了那使他和他的伙伴出名的自由和反传统的风格。据说，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六万四千九百二十八。”

尽管许多朋友都死于酒和药物，金斯堡对某些药物仍然劲头不减，尤其是大麻、裸头草碱和迷幻剂。实际上，虽然他坚决反对越战以及美国的军事和工业战争机器，但三个话题是他在许多场合都要谈到的。一是公平对待同性恋。他在诗里总是非常坦率，甚至是用图解来说明他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他是一个同性恋的维权人士，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词。他还经常宣扬服用毒品的好处，主张不应该迫害毒品服用者。他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1968 年，当东方宗教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想起金斯堡已经是一个多年的虔诚的佛教徒。1968 年，印度教也是一种时尚，尤其是当时的新词“宗师 (guru)”。在 1968 年，这个词因为太生僻，媒体常常还随附音标：goo-roo。

玛赫西·约吉称自己为 Maharishi，意为“大圣人”，他声称发现了一种不必禁食和不停地祈祷即可立刻进入冥想状态的做法，而且保证可以进入 samadhi 状态——一种超验的出神状态。玛赫西·约吉在 1968 年到美国之前，已使几千个欧洲人皈依“超验冥想”，1968 年，他将印度服装和印度音乐的

时尚潮流带到美国，许多名人，包括甲壳虫乐队和沙滩男孩都跟着他。但是当甲壳虫乐队到印度跟他学了三个月之后，成员中的林戈·斯塔尔，据说是乐队中最不喜欢沉思的一个，在10天后与他的太太莫林一起回到了伦敦郊区的别墅，据说是对“大圣人”的食宿不满。“我太太不喜欢那里的食物，我们不喜欢吃辣的东西。”林戈解释说。

“大圣人”对诗人和佛教崇信者金斯堡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前者反对吸食LSD并要求年轻人入伍服兵役。金斯堡继续诵经、反战、使用迷幻药。

60年代，金斯堡成为一个最受人尊敬的诗人，他被邀请到世界各地演讲，尽管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苏联、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他都发现要使他的言论合法化确实有些困难。

他在纽约东村邻居的眼里是一个说话温软的绅士，而且是个好心的人。从他出版第一本诗集起，他热情的自由诗体就既备受争议，又被公认为风采卓绝。他有时和他的同为诗人的父亲路易斯一起念诗给大家听。路易斯是新泽西州的一个学校教员，喜欢在评论中用很多双关语，也喜欢写一些结构有致的抒情诗，多为押韵骈文。父子间的关系既有爱又有尊重，虽然路易斯觉得儿子应该少写些自由体的诗，也希望他不要在诗里写些乌七八糟的令人尴尬的词，不要公开谈及他的同性恋倾向。但这是艾伦的行事之道。他在公开场合大讲他的同性恋，他爱上了谁，他在追求谁，如何追等等。有一次他甚至写到了他父亲的婚外情，路易斯让他儿子删掉了这几行诗。他们一起念诗，这在“有代沟的年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表演——路易斯穿着斜纹软呢，艾伦戴着珠子。

1966年，父子俩聚在金斯堡的家乡、新泽西州的佩特森。在那里路易斯给自己在当地的诗迷读诗，而比他更有名气的儿子则读一些政治诗，也读了他关于佩特森的诗。他们讲起了父子俩在前一天参观帕赛克瀑布的情况，路易斯将此描述成是父子共同享有的一次亲密的旅行。而艾伦这个一向喜欢爆料的人则说他在瀑布那里吸了大麻，因此给旅行增添了快乐。第二天，佩

特森市长弗兰克·X·格利佛说他收到了好几通电话举报吸毒事件，于是签发了逮捕证前来逮捕年轻的金斯堡。警察拘捕了一个蓄胡子戴眼镜的年轻人，误以为他是金斯堡，而此时真正的金斯堡却已经安全地回到了东村。

1968年，当父子俩一起出现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时候，蓄胡子、抽大烟的嬉皮士形象已更为普遍，但父子俩出现在同一个场合还是少见。路易斯以双关语开场，艾伦则以演奏一首曼特罗开始，《纽约时报》评论说他的这首诗是他所有的诗中最长的。晚会以父子两人争论勒鲁瓦·琼斯最近被宣判非法拥有武器而结束，儿子认为这个黑人剧作家显然是被陷害了，父亲却不这么认为。听众们也分成两派，分别为父子俩喝彩。

勒鲁瓦也是很受1968年那一代人欢迎的一个诗人，他最著名的诗句是“起来对墙站着，混账，这是持枪抢劫！”这句诗出来后，1967年纽约东村的一个“亲密团体”就把自己叫做“混账”。这个“亲密团体”做了多次深入的学术辩论，以此为基础来开展吸引媒体注意的街头行为，而此街头行为也是阿比·霍夫曼所擅长的。在纽约城的环卫大罢工中，这些“混账”们将人行道边臭气熏天的如山的垃圾用地铁运到新开放的林肯中心。

1968年最受欢迎的诗人是罗德·麦丘恩，他妙语如珠，并常以一种沙哑的嗓音读出来，让人怀疑他若不是激动，就是得了支气管炎。他是好莱坞的歌词作者，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常常穿着V字领的运动衫。他不完全属于“垮掉的一代”，但到1968年为止，他的那些大肆渲染愁绪的诗集却已狂销了25万册，其中两本书《史丹扬街和别的哀愁》和《倾听那温情》卖得比《纽约时报》上的任何小说都好，虽然因为是诗集的缘故，它们并没有被列在时报的畅想书榜上。在1968年的一次采访中，他以其特有的自我解剖式的诚恳说：“我不是一个诗人。我只是把文字串起来。”当他因肺炎而病倒时，几百个他的诗迷给他送上了动物标本，很多人都受不了他和他的诗迷的这些举动。

如果一个歌曲作者也可以称做一个诗人的话，那么在1968年有更多的人比麦丘恩更有资格被称为诗人。鲍勃·迪伦选择“迪伦”做艺名就是在表明他的立场。他写的歌词辞藻丰富，这与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有着依稀联系。“大门”乐团的名字取自威廉·布莱克的一句诗：“感知之门”。《生活》杂志把“大门”乐团的主唱吉姆·莫里森称为“一个很好的演员和诗人”，他本质上是“夸张地穿着黑色皮裤的诗人”，虽然有的时候，若没有了莫里森的尖叫作为注释，他的诗词会言不达意。保罗·西蒙和阿特·加丰克尔的诗充满了比喻和想象，对许多歌迷来说他们就是诗人。但是这个二人组中的词作者保罗·西蒙自己却不这么看。“我写过诗，但这与我的歌曲没有关系……流行歌曲的歌词是如此平庸，所以你只要稍有一些才气，他们就叫你为诗人了。如果你否认自己是个诗人，人们就会觉得你是低调。但称你为诗人的人却从来 unread 诗，好像鲍勃·迪伦写的东西就是诗一样。比如说，他们从来 unread 华莱士·史蒂文斯。那才是诗啊。”

另一方面，金斯堡无疑是个诗人，埃兹拉·庞德的诗人地位更无人质疑。庞德，这位造就了20世纪诗歌的八旬老人如今正在意大利度过他的余生。尽管他是法西斯主义，反对过犹太人，但他和他的保守的政治被保护人T.S.艾略特仍旧在1968年那一代的文化名录上名留青史。即使不是专门研究诗歌的人，也很清楚这其中的脉络：如果没有庞德，就没有艾略特，同样就没有狄兰·托马斯，劳伦斯·费林蒂和艾伦·金斯堡；或者他们就不是现在的他们了。

金斯堡对庞德怀有感激之情，所以这个犹太诗人——或者按他自己的说法，犹太裔的佛教徒诗人——想拜访庞德。1967年他在威尼斯实现了愿望，但是他没有诵读自己的作品，相反，他在那天晚饭后用报纸卷着大麻，然后一言不发地吸着。之后他为这个年老的诗人播放音乐——披头士的《黄色潜水艇》和《埃莉诺·莱比》、鲍勃·迪伦的《悲伤的苏格兰女人》、《甜甜的玛丽》和《伊甸园之门》以及《阳光超人》。庞德面带微笑静静地听着，好像

特别欣赏其中的某些句子，用他的镶着象牙手柄的拐杖和着音乐，但没说一句话。金斯堡后来听这位老诗人的常年伴侣奥尔加·拉奇说，如果他不喜欢这些音乐，他当即就会离开的。

谁是诗人、谁不是诗人，一时间成了一个问题。

政治与诗的品位有很大关系。俄国诗人，尤其是那些在政治上直言不讳的人在西方的大学里往往拥有很多崇拜者。叶甫图申科在1968年轰动一时，那时候他在国内是个政治上很有争议的人物，但在国外却是诗歌艺术界的红人。出生于1933年的他属于俄国一个新的抒情诗流派。评论者们普遍认为该派别中的另一个同样出生于1933年的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是更好的诗人，他是鲍里斯·巴斯特纳克的门徒。但叶甫图申科却是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上最著名的俄国诗人。1962年，他出版了四首批评苏联的诗，包括叙说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娘子谷》，这一事件苏联想掩盖却未能成功。

金斯堡在被从古巴驱逐后又被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在这之间，他在1965年到了俄国，并见到了著名的俄国同人叶甫图申科，后者告诉他说已风闻关于他的很多丑闻，但他都不相信。金斯堡跟叶甫图申科说，这些传言很可能是真实的，因为他是个同性恋，这是个事实，而这些传言来自于他自己对这些经历的公开讲述。

叶甫图申科听闻后显然很不舒服，他说：“我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金斯堡很快就将话题转到了另一个他所喜欢的话题——吸毒。叶甫图申科说：“这些事情——同性恋和吸毒——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觉得它们应该是青少年的最爱。在俄国，它们一点也不重要。”

1962年，当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完成《战争安魂曲》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并不是越战，他是用此曲纪念考文垂大教堂的重新开放，该教堂在“二战”中曾被轰炸。歌词来自于威尔弗雷德·欧文关于“一战”的诗。但是到了1968年，他的这首《战争安魂曲》就被看成是“反战”的作

品了，而任何反战的东西都是会引来跟风的。就这样，威尔弗雷德·欧文的几乎被遗忘了的诗又被人们忆起，不仅仅是因为诗歌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也因为它们反映了欧文悲惨的生活。欧文在“一战”中是个连长，在宣泄他对战争的憎恨中他发现了自己的作诗天赋。他几乎马上就可以是一个耀眼的诗人了，但却不幸战死于战争结束前的一个星期，时年 25 岁，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死后出版的。1968 年不仅欧文的诗再度风行，另一个死于“一战”的年轻诗人鲁佩特·布鲁特也得到追捧。对 1968 年的文坛来说，战争中的诗人牺牲者似乎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背景，就连死于“一战”结束前一天的法国作家阿波利奈尔也在 1968 年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他在“一战”中头部被榴霰弹击中，几个月后去世，距战争结束仅一天。阿波利奈尔在艺术界的知名是因为作为评论家的他捧红了毕加索，布拉克，德兰，他自己的情妇玛丽·洛朗森和其他许多人——他是超现实一词的发明人。阿波利奈尔自己也是个诗人。1968 年，当一本新版的英文书《被刺杀的诗人》出版的时候，理查德·弗里德曼在《生活》杂志上为该书写评论说：“阿波利奈尔已去世半个世纪，但他在校园里的影响从未如此深远。”

文学界反对战争——无论是什么战争——的作家似乎在增多。赫尔曼·黑塞是一个德国的和平主义者，在“一战”中为躲避军役而移居到瑞士，现在他受到瑞士年轻人的热烈欢迎，此前他从未享有如此盛誉。虽然死于 1962 年，但他的小说中对现代社会的异化的看法是马尔库塞式的，又充满了亚洲神秘主义气息，很适合 60 年代末年轻人的口味。若他泉下有知，他肯定会惊讶：1967 年 10 月一个电子摇滚乐团居然以他的小说《荒原狼》(Steppenwolf) 来命名。该乐团在 1968 年以一首《天生疯狂》(Born to Be Wild) 而出名。据该乐团的主唱、吉他手和打击乐手约翰·凯的说法，乐团的哲学跟黑塞小说中的主人公很相似，“他拒绝中产阶级的标准，”凯解释说，“但同时他又希望在中产阶级理念中找到幸福，至少不与之冲突。我们也一样。”

1968年好像每个人都想做诗人。美国议员、总统候选人尤金·麦卡锡在4月12日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两首处女作，并声称自己是在一年前开始写诗的。因为媒体没有人相信一个政治人物会无缘无故地在大选之年写诗，所以《生活》杂志的专栏作家亚历山大指出，“最近麦卡锡惊奇地发现，喜欢他的政治的人也会喜欢诗。当人们听说麦卡锡与罗伯特·洛厄尔一起旅行的时候，一个个都趋之若鹜。”

麦卡锡也开始攀上了诗歌，这说明他对他的支持者具备一定理解力。人们很少看见他刻意讨好，所以这是件新鲜事。很多时候，传统的政治家和记者并不理解他。麦卡锡会在未打招呼的情况下不参加有关演讲和活动。有一次电视台主持戴维·弗罗斯特问他希望怎么写他的讣告的时候，麦卡锡直截了当地说：“他死了。”他在不喜欢传统政治的青年学生中有巨大的吸引力，在罗伯特·肯尼迪参加竞选之前，他是唯一断言要结束战争的参选人。在他的竞选早期，像阿拉德·洛温斯坦这样的反战左派人士在策划他的候选时，对他的模糊而缺乏热情的个人风格很烦恼，他们担心是否选错了人。有人甚至认为应最后求一次鲍比·肯尼迪，他是洛温斯坦的首选。但是麦卡锡的风格对青年人很有吸引力，他们不喜欢传统意义上的领袖，而麦卡锡看起来不像是个领袖。他们谈起他，好像他先是个诗人、后来才成为议员似的，虽然真实的情况是他在参选的中途才努力使自己成为诗人，这一并不浪漫的事实若曝光的话也许会令人吃惊。

《生活》杂志的亚历山大称麦卡锡为“谜语”，因为，“人们对他的第一反应是惊奇，如果要说是钦佩的话，那也只是后来的事了。”可能他吸引青年学生的原因之一是他看着更像一个教授而不是一个候选人。但被问起如何看待洛杉矶瓦茨市的黑人暴动时，他竟然将之与1381年的农民起义相提并论，这让所有的人都感到迷惑不解。

诺曼·梅勒在评论麦卡锡在最后几小时的选战中的错误时，也许说出了他吸引1968年青年反战分子的原因：



THE WINDS

MCCARTHY



'68 OF CHANGE

Authorized and paid for by McCarthy for President Ted Finnan, Treas., 119 E. Millin St., Madison, Wis.

海报文字：“选麦卡锡为总统”1968年的竞选海报
(芝加哥历史学会)

他以他向有的冷静、即席的风格说话，而现在看起来却那么缺少重点和力量，缺少中心议题，就好像人们的首要目标并不是竞选总统，而是为了避免将个人意愿强加于人（似乎魔鬼目前最想做的是诱使你成为自己意志的工具）。他在这几个月的所有的演讲中都坚持自我本色，不迎合，要自然地演讲，即使外在因素表明，在这种场合演讲时显示一

下掷地有声的气度最为奏效，他也不肯见风使舵。麦卡锡用圣人的逻辑行事，不过这并不说明他把自己看成是圣人（虽然有时他肯定是这么认为的！），但他的心理和这一逻辑是一样的：是上帝在裁断事件的重要性，而不是人，所以如果舌头是用来表达的话，那么上帝会教你的舌头说话的。

这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所以不难理解麦卡锡为什么会在选战的中途发表他的诗了，但是诗的内容乏善可陈。为什么这个竞选美国总统的人会陷在第二段中，而写不出第三段？有人问他为什么写不出第三段，他回答说“我不想写了”，他的这个回答被很多拥护他的人，以及记者、政治圈内的人解读为他不想做总统了，而人们也一直对他是否真的想做总统有所怀疑。但是麦卡锡却若有所思地说：“你知道写诗的规则：第一段陈述问题，第二段处理问题，第三段解决问题。我是属于第二段的人，这里有我熟悉的东西，我就生活在纠缠和复杂之中。”

麦卡锡又列举了从拿破仑到 FDR 的每一个人，最后讲到了他的竞争对手罗伯特·肯尼迪。“博比是第一段中的人，他说这里有个问题，那里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他从来没有真的处理过第二段，但我想他可能正在开始写第三段。博比的悲剧在于，为了击败我，他要毁掉他的哥哥。今天我占了杰克大部分的位置。这有些像希腊悲剧，不是吗？”

不论吉恩·麦卡锡和已故的约翰·肯尼迪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除了麦卡锡本人没其他人看得出来。另一方面，很多人都希望鲍比·肯尼迪能像他哥哥一样，但也有一些人欣赏他与哥哥杰克没有任何一点相似，除了一口科德角的美国腔和家族遗传的眼圈相似之外。罗伯特出生于 1925 年，比杰克小八岁，他不完全是“二战”那一代的人，因为当时他还太小，没有被征，虽然他的青少年时代沉浸在对那个时代的思考和经历中，包括经历比他年长

10岁的哥哥战死在沙场。到了1950年他已经25岁，所以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不属于50年代。他实际上是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代的人，但因为家庭的原因他更接近于老一代。50年代他加入了冷战，甚至给声名狼藉的反共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当律师。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长，肯尼迪过后称这段关系是个错误。他说虽然被误导了，但他确是认真地考虑过共产主义的渗透问题，但更好的解释也许应是当初是他的父亲帮他找到了这份工作。

罗伯特·肯尼迪努力赶上他的父亲和哥哥。因为错过了“二战”，他一直崇拜上战场的勇武之士。1960年，在乔治城的一次聚会上，有人问他如果可以重来，他想做什么，“伞兵。”他说。他缺乏他哥哥的随意和魅力，但却知道如何用电视为他有魅力的总统哥哥造势。他给白宫雇来了第一个媒体顾问，让约翰·肯尼迪成了第一个上电视的总统。约翰对电视一窍不通，但是一个自然、随意、轻松、诙谐的人，笑起来也很帅。他的小弟弟博比深谙操纵电视媒体之道，但他的外表看起来却笨拙而紧张兮兮，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约翰取笑博比的认真个性，叫他“黑色博比”。现在不难理解，因为博比冷静的紧张，他看起来永远像一个奔赴厄运的人。“你的神经中潜藏着厄运。”罗伯特·洛厄尔这样写他。

他纤细，不像他的兄弟们那样体格健壮；他笃信宗教，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这点和他的兄弟们又不一样。同时他也是一个好丈夫。他喜欢孩子。别的政治家最多只是跟孩子们笑笑，或者摆个指导儿童的姿势，但鲍比看起来总像是想跑到一边与孩子们一起玩耍。小孩子们感觉得到这点，所以与他在一起很快乐、无拘无束。

这样的一个人——崇拜战争、希望自己是伞兵、支持冷战、因为担心马丁·路德·金与共产主义有染而批准对他进行窃听——怎么会成为60年代那一代人和新左派的英雄？汤姆·海登甚至一度考虑，如果鲍比被提名的话，他也许会取消在芝加哥的示威。

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42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许多。八

年前，汤姆·海登在洛杉矶的民主党会议上毛遂自荐地向罗伯特·肯尼迪介绍自己，当时后者给前者留下的印象是他的外表如此年轻，这可能就是人们一直用他孩童时的昵称“博比”称呼他的原因。在为艰难的竞选运动奔波一天之后，鲍比总会在夜里坐下来吃一大碗冰淇淋，看上去就像一个12岁的孩子。

肯尼迪倾心于自省，从中发现自我。他经常读书，一度，他迷上了汉弥尔顿的《希腊之路》，这本书引领他去读希腊人的作品，尤其是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又有一段时间，他整天读爱默生。他也读加缪。他的新闻秘书弗兰克·曼凯维奇抱怨说他几乎没有时间跟当地的政治家在一起，却一连花上几个钟头与文学家比如罗伯特·洛厄尔攀谈，他对后者非常熟悉。

虽然忙于竞选，他还是抑制不住地会见诗人艾伦·金斯堡。当这个头发散乱的诗人说起《毒品法》是迫害时，罗伯特·肯尼迪洗耳恭听。诗人问议员有没有吸过大麻，他说没有。他们谈政治，谈在“花儿力量”和“黑人力量”之间结盟的可能性——也就是嬉皮士和黑人斗士之间结盟的可能性。当瘦瘦的议员和矮壮、结实、蓄着胡子的诗人一起走向议员的办公室的时候，诗人拿出小风琴，吹了几分钟曼特罗。肯尼迪静静地等着他吹完，然后问：“接下去干什么？”

金斯堡解释说，他刚刚吹了一段献给印度教的守护神毗瑟拏的圣歌，所以也就等于给我们这个星球的守护神献了一段圣歌。

“你应该唱给街上的那些人听。”肯尼迪指着白宫的方向说。

尽管肯尼迪与马丁·路德·金之间不那么心有灵犀，但这两个人看起来似乎总在尽力与对方对话。肯尼迪与加州的农场工人领袖西泽·查维斯一见如故。查维斯举着标语“罢工万岁！”，在全国成功地举行了名为“我们的事业万岁”的运动，抵制加州的葡萄和其他产品，使农民的日子好过些。1968年，大多数自重的大学生都不会去吃葡萄，因为唯恐吃到了被查维斯抵制的葡萄。他组织起了17000个雇农，使他们的工资从每小时1.10美元

提高到了最低 1.75 美元。查维斯是年轻人的偶像，肯尼迪和查维斯，一个是豪门之后，一个是外来移民的发言人，这两个人在一起是那么奇怪，可又是那么自然，虽然人尽皆知的是，在一次集会结束时，博比用西班牙语高呼：“罢工万岁！”“事业万岁！”然后，和他的热情相比，他的西班牙语不够用了：“大家万岁（viva all of you）。”

鲍比甚至与媒体也发展了一种和善而幽默的关系。他标准的竞选演讲通常以萧伯纳的话作为结束语，之后，他会发现记者们会用这句话作为提示语走向记者车。于是，之后的某天，他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一次演讲：“萧伯纳曾经说——赶快到车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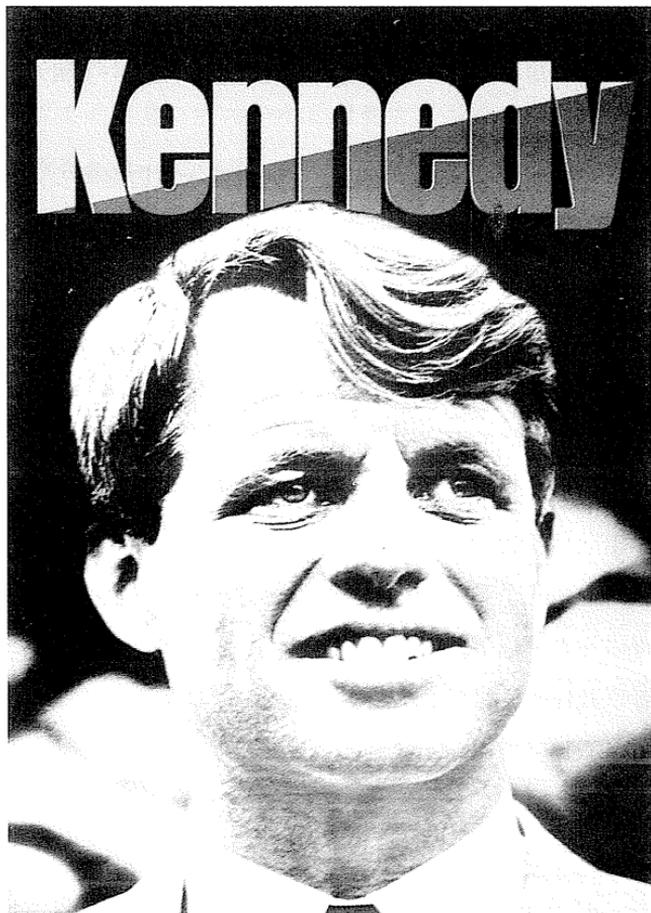
自哥哥辞世后，罗伯特·肯尼迪显然有了很大进步，他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他感兴趣的事，而不仅仅是家族的事，并且很愿意去做这些事，即使这意味着与仍受着怀念的哥哥的班子里的盟友们作对，而这些盟友是在那个热血沸腾、令人怀念的年代结下的。转而反对战争对他本人来说并不容易。1965 年，他的儿子出生，他以麦克斯威尔·泰勒将军之名作为其子的名字。1967 年他的另一个儿子出世，取名自埃夫里尔·哈里曼和道格拉斯·狄龙——这三个人都是战争的主要支持者。

即使他不是一个好的演说者，他也出语不俗。与今天的政治家们不同，他所讲的并不是人们想听的，而是他觉得人们应该知道的。他在强调个人责任时的遣词和那种宗教热忱与马丁·路德·金颇为相似。在采取强烈的反战态度的同时，他也批评那些逃兵役的学生。他到校园里跟学生们演讲，学生们欢呼着欢迎他，他则教育他们，如果拒服兵役，他们是在把责任推给没有特权的人。但他也说，那些不同意政府在越战中的做法的人有权利说出他们的感觉，因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战争是以“你们的名义”进行的。

麦卡锡也做了些类似的事，他要求他的年轻的支持者们努力工作，希望他们为了选战把自己弄得体面点。他的支持者们剪短了头发，放长了衣服边，刮了脸，“为了吉恩而整洁起来”。但是肯尼迪进一步阐述什么是错的、什么

是应该做的。他批评国家过分沉迷于经济增长，海登引述了一段与《休伦港宣言》十分相似的演讲：

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商品累积，既不能达到国家目的，也不能满足个人需求。我们不能用道琼斯指数来衡量国家精神，也不能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国家成就，因为国民生产总值包括空气污染，包括在公路上处理流血冲突的救护车，包括以特殊的门锁关押打破监狱的人们。国



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海报
(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
和博物馆)

民生产总值里面包括对红杉树的破坏和苏必利尔湖的枯竭，它的增长是与凝固汽油弹、导弹和核弹头成正比的……国民生产总值里面还包为了把产品卖给孩子而美化暴力的电视节目。

如果国民生产总值涵盖以上这些话，那么肯定还有它无法含括的内容。它不包括家庭的健康、教育质量和玩耍的快乐。它也不理会我们工厂的整洁和街道的安全。它也不包括诗歌的美、婚姻的力量、公共辩论的才智和政府公务员的廉洁……国民生产总值既不能衡量我们的聪明与勇气，不能衡量我们的智慧与知识，也不能衡量对人的同情和对国家的热爱，简而言之，它可以衡量一切，除了生命的意义，它可以告诉我美国的一切——除了我们是否以作为一个美国人而自豪。

一个能讲出这种革命性言论的人能入主白宫吗？是的，有可能，因为毕竟他属于肯尼迪家族。许多麦卡锡的支持者认为最乐观的前景是这场竞选也许可以结束战争，但私下并不认为他们所支持的麦卡锡能当上总统。但是罗伯特·肯尼迪却真的有机会成为总统，史学家们一直在探讨他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总统，但他是一个贴近年轻人、受他们信赖的人，即使在一个因为金的遇刺而充满憎恨的年代，他仍然是一个英雄。

肯尼迪精力充沛地投入竞选，他很可能追上并超过麦卡锡，他甚至还可以击败休伯特·汉弗莱，一个会继承约翰逊的衣钵而参与竞选的副总统。就算是与另一个对手尼克松较量，民意测验专家们都觉得肯尼迪能赢。如果他可以在春季追上麦卡锡，他就可能势不可当。那个时候，肯尼迪和他的支持者以及他的反对者的头脑中所想的就是他可能的确是不可阻挡的——除非有人用子弹阻挡他。

新国土上的儿女们

作为一个从来不识得立国之道的国家的国民，并且在其精神传统之下工作，是什么滋味？为了成其为国家，它以铤而走险、妄自尊大的做法使整个世界备受折磨！作为一个德国作者，那滋味是怎样的？在用我们的语言所写的每一句话背后，都站着一个破碎的、精神被摧毁的民族……一个永远无法抬起头的民族。

——托马斯·曼，《德国的悲剧》，1946

其他国家的人民将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出生在 40 年代晚期的德国人的感觉，集中营关闭了，罪恶感消除了，尸体不见了。1998 年的德国民选总理，出生于 1944 年、活跃在 21 世纪舞台上的格哈德·施罗德，就是他们那一代的缩影。他从未见过父亲，因为后者在战争中死了。他父亲是谁、是如何死的，一直是个谜。当施罗德做总理的时候，找到了他父亲一张褪了色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是一个德国士兵，除此之外他对他别无所知。未知的事实也许是可怕的。

“二战”后不止有两个德国，事实上是四个——美、英、法、俄四区。四个区域所采取的政策就是美国的所谓“去纳粹化”，纳粹官员从高到低都被清除，各级纳粹战犯都受到战争审判。

1947年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开始重建欧洲经济。俄国拒绝参与其中，所以就有了两个德国和两个欧洲，于是开始了冷战。1949年，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德国——西德，首都在波恩，一个尽可能远离东方的城市。苏联也以建立东德作为回应，首都在旧都柏林。1950年7月，当冷战演变成了在朝鲜的枪战的时候，西德的去纳粹化悄悄隐退，毕竟那里的纳粹一直都是可靠的反共产主义者。但在东德，依然进行着对纳粹的清算。

一直以来就存在着北德和南德，北德是新教徒，南德是天主教徒，他们的食物和口音都不一样，但从来没有所谓的东德和西德。新的858英里长的东西德分界线既没有文化的理由也没有历史的逻辑。西德人被告知他们是自由的，东德人正在受共产主义的压迫。而东德人却被告知他们是新的实验国家的一部分，他们要从噩梦般的过去脱离，建设一个全新的德国。东德人还被告知，西德是个不愿抛弃过去的纳粹国家。

事实上，1950年的西德，在美国及其盟国的同意下，宣布了赦免下层纳粹的计划。85%的东德法官、检察官、律师因为其过往的纳粹经历被取消了资格，但大多数人在西德因为符合赦免的条件，所以又恢复了职业。东德的学校、铁路和邮局都肃清了纳粹，这些人都在西德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

对许多东、西德的人来说，格洛布克事件让他们看清了西德的情形。1953年，康拉德·阿登纳总理选择了汉斯·格洛布克做国务卿。格洛布克是一个颇有些名气的纳粹。他写文章支持纽伦堡法案，剥夺在德国的犹太人的权利。他提议强迫犹太人要么只取名“萨拉”，要么取名叫“以色列”，以便于识别。东德人抗议格洛布克留在西德政府。但是阿登纳坚持说格洛布克没有做错什么，于是他一直为西德政府效劳，直到1963年退休到瑞士。

1968年，揭露纳粹的活动还在进行。

埃达·戈林在法庭上抗辩，试图保留一幅16世纪的卢卡斯·克拉纳赫的画：《圣母玛利亚和孩子》。这幅画是在她的受洗仪式上由她已去世的父亲赫尔曼·戈林给她的。戈林是盖世太保的创立者，也是去纳粹化运动——纽

伦堡审判中的主要被告，这幅画是他从科隆偷来的。他在行刑之前几小时自杀。科隆城一直想追回这幅画。虽然埃达·戈林在1968年1月又一次败诉，她的律师们还想再发起至少两次上诉。

就在这个时候，73岁的西德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曾经帮助建立过集中营的证据浮出水面，准确地说，是再度浮出水面。东德人在两年前就已经对他进行指控，但指控文件均被认为是错误的。现在，《斯特恩》(Stern)，西德的一份杂志聘请了一位美国手迹专家来帮助辨认，据该专家称，吕布克现在作为国家元首的签名和当年在集中营计划中的签名出自同一只手。

1968年，审问一个高级官员在战时的所作所为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不同的是，这回是在电视上。《巴黎竞赛》这样写道：“当你在72岁的年龄、在政治生涯的顶峰，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在2000万人的面前在电视上成为被告，那是最糟的事了。”

2月份，两个学生被波恩大学开除，因为他们擅自闯入校长办公室，并在优生名单上将吕布克标为“集中营的创建者”。他们被开除后，波恩大学200个教授中有20个联名上书要求吕布克公开面对这件事。于是德国总统会见了总理——政府的首脑，在德国体制中更有权力的人物。总理库尔特·乔治·基辛格跟他讨论了几种选择，排除了退休或者辞职。几天后，总统上电视否认指控，但却接着说：“很自然地，经过了将近四分之一一个世纪，我已记不清我所签的每一份文件了。”他过了10个月才被迫辞职。

总理基辛格曾经为第三帝国政府效劳，在1968年也遇到了问题。他被传为证人，为审判战犯弗里茨·格布哈特·冯·哈恩作证，后者被控是1942和1943年屠杀30000名希腊和保加利亚犹太人的共犯。几乎从审讯一开始，在总理就位证人席那一刻，就好像他自己在受审一样。辩方律师让他解释，当他在外交部的时候，为什么驱逐和杀害犹太人的消息都未经过他的电台监控部门，但首先他要解释他为什么在外交部效力。他说“那是巧合”，但他承认了他曾经是个纳粹党员。他说他入党是在1933年，“但不是出于信仰

或者机会主义”。他说，在战争中大部分时候，他都以为犹太人是被驱赶到“军需工厂或类似的这些地方了”。然后他又被问及电台部门是否报道过被驱逐的犹太人的命运的消息？“什么消息？”这是基辛格的回答，他否认知道有关屠杀犹太人的任何事情。

基辛格政府在两年前执政，当时是在一种多党派联盟的情况下执政的，以图政治稳定。此举本来应该是合理而成功的，但就在那时，学生运动正如火如荼。新一代年轻人对去纳粹化运动就此收尾和让西德重新军事化既愤怒又感到忧心忡忡。因为联合政府推迟大学生入伍的政策，大学变得人满为患，到了1967年，尽管大学录取率有所提高，但也只有8%的人口上大学，还只是一小撮精英而已。学生们不想太过精英化，要求政府扩大招生范围。

1968年3月，西德贸工会抱怨说德国的大学毕业生已越来越多，以至高于相应的就业率。3月2日，法庭释放了罗伯特·缪克，理由是71岁的他因为身体不好已不适合再蹲监狱。缪克在三年前因为谋杀3000人和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副司令而被判有罪。

1968年，德国学生领袖估计他们有6000个好战的学生。而且他们还能够就不同的议题再动员几千个学生。越战、希腊的非法军事独裁和伊朗国王对伊朗的压迫是最主要的三个外国议题，但德国的事务偶尔也会引发更多人的抗议。弗里茨·托伊费尔的第一公社和恰巧也叫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在当时都组织得很不错，经历也很丰富。

学生运动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德国是一个压迫型的社会。这里面有一个没有明说的词：“仍然”，德国仍然是一个压迫型的社会——意思是德国没有从第三帝国状态中走出来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纳粹分子在政府中的存在只是这个问题的很基础的一部分。许多学生怀疑父母亲曾经做过或者支持过一些可怕的事情，这使家长和学生之间所产生的代沟远甚于格雷森·柯克在哥伦比亚所看到的。

许多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师发现德国战后的一代有一个特殊的问题，那便是对过去感到恐惧，或者根本就没有过去。萨米·施派尔，一个出生在以色列、在法兰克福开设个人诊所的心理分析家这样写道：“自奥斯威辛之后讲故事的传统便不复存在了，几乎已没有父母或者祖父母会将孩子抱在膝上讲过去的事情。孩子们需要童话故事，但他们也需要父母亲给他们讲述过去的事，以使他们有些历史感。”

在诸多表象中，有一个就是学术自由和对大学的控制。这是个热门话题，但它并非冲突的本质，这点可以从学生运动最先产生的、发展最快和最迅猛的地方看出来。柏林自由大学，正如其名，是在德国最自由的大学。它在战后的1948年建立，所以没有陷入旧德国司空见惯的官僚习气。根据宪章，民主选举出来的学生会将按照国会程序投票决定学校事务。最初的学生会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政治上激进的东德人，他们离开东德的大学体系是因为拒绝那里的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他们一直是自由大学的核心，乃至大学建立13年后，也就是1961年，当东德人开始在两德之间竖立一道墙的时候，这些西德的自由大学的学生们就试图冲击这道墙。墙建好后，东德的学生就无法再入自由大学了，于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从事政治的西德学生的学校。带着比美国的学生更强烈的情绪，西柏林的学生——冷战的最终产物，既拒绝资本主义也拒绝共产主义。

柏林，因为是冷战中心，所以成了所有抗议的中心。东德人溜到西柏林，西德人溜到东德。这第二种迁徙现象很少被谈及，西德对此也没有统计。1968年，东德人说每年有两万西德人到东德，并认为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政治原因，但这个神话在1968年3月被打破了，因为那时沃尔夫冈·基林到了东德。基林是德国著名演员，在美国也很有名，因为他在1966年出演了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执导、保罗·纽曼主演的电影《冲破铁幕》中的东德坏蛋。基林曾在俄国为第三帝国打仗。在瓦茨种族暴动的时候基林正在洛杉矶拍电影《冲破铁幕》，他说美国使他心寒，他说他离开西德的原因就

是因为西德支持美国。美国在他眼里是“今日人类在世界上最危险的敌人”，罪证是“它对黑人和越南人民犯下的罪行”。

1966年12月，自由大学的学生们在街上首次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在那个时候，美国的越战已经成为学生们发动运动的主要原因。用美国的示威技巧去抗议美国的政策，自由大学学生的该次运动很快就成了欧洲最著名的学生运动。但是学生们也反对西德的物质主义，他们要寻找更好的途径达到东德的愿望——彻底地与过去决裂。追求这个目标的同时，他们也开始抗议有轨电车的车资和学生的生活条件。

1967年6月2日，学生们聚集在一起，抗议市长威利·勃兰特宴请伊朗国王。一伺客人们安全地进入歌剧院欣赏莫扎特的《魔笛》，警察就开始疯狂攻击聚集在门外的自由大学的学生。学生们四散逃遁，但有12个人因伤势严重而不得不送往医院，还有一个逃跑的学生本诺·奥内佐格被当场打死。奥内佐格并不是一个好战分子，他参加示威还没多久。开枪的警察很快就被判无罪，但组织示威的第一公社的学生领导弗里茨·托伊费尔却在冗长的审判后被判有可能长达五年徒刑，罪名是“煽动闹事”。因此，愤怒的学生运动遍及全国，要求建立一个新的议会机构反对德国的立法机构。

1968年1月23日，一个汉堡的右翼牧师赫尔穆特·蒂利克发现他的教堂挤满了准备破坏他布道的学生。他打电话叫西德的军人来驱赶正在散发传单的学生，传单是一篇被改过的主祷文：

我们在西方的首都，愿你的投资被分期偿还。

愿你的利润降临，

愿你的利率涨在华尔街，如同涨在欧洲。

我们日进的营业额，今日赐给我们。

放我们的贷，如同我们放了人的贷。

不叫我们遇见破产，救我们脱离行会。

因为半个世界，权柄，财富，全是你的，
在过去两百年里。
阿门。

到了1968年，神学学生也起来抗议，他们对在听布道的时候不允许就西德政府和美国越战的不道德提问或对话表示不满。教堂实质上成了提升人们政治和道德觉悟的讨论会。最著名的一个神学学生造反者是来自东德的一个学生难民鲁迪·杜奇克，有时人们叫他“红鲁迪”。

德国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大学里是个很出色的团体。2月17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邀请世界上的反越战学生运动分子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会议的恰当时机和有条不紊相得益彰。这次的国际越南会议是1968年第一次大型的学生运动国际会议，而且时间是在新年攻势的高潮阶段，正是世界各国电视台热播越战的时候。在多数国家，反战不仅是最受欢迎的一件事，而且它也是各路运动唯一的共同话题。在多数时候，反战运动也是组织得最好的运动。一个伊朗“革命者”也与会了，还有美国和加拿大的士兵，这其中还有两个黑人越战老兵，他们握拳敬礼并手挽手高喊：“该死，不，我不会去参战！”——太迟了，因为他们已经去了。虽然有这些人参加，这基本上是一个由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学生组成的欧洲集会。他们在自由大学一个巨大的厅内连续12个小时地演说、讨论，另有几千名学生因为容纳不下而去了另两个大厅里。主厅里是一面巨大的北越国家解放阵线旗帜，另有一面横幅，上面是切·格瓦拉不容辩驳的名言：“革命者的责任就是发动革命。”演说者林林总总，包括杜奇克、其他全国性运动的领袖、剧作家彼得·魏斯，他的作品《马拉/萨德》正被世界各地的学生引用。

德国人的做法使许多外国激进分子眼花缭乱。其中的一个演讲者，27



1968年德国街头的反越战海报
(雷纳德·弗里德摄/玛格南图片社)

岁的阿兰·克里维纳，一个日后成为巴黎春季造反运动的领袖之一的托洛茨基分子说，“1968年学生的许多策略是这一年早些时候在柏林和布鲁塞尔的反越战示威中学来的。反越战示威在整个欧洲都组织得有条不紊。杜奇克和德国人是示威策略的创造者。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早已如同执行军事

任务一般地准备好了横幅、标语、安保和一切，这对我和其他法国人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

德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将学生事物融进大型示威中的这种做法，给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特，一个法裔德籍学生领袖，留下很深印象。法国学生邀请了1968年德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主席卡尔·D. 伍尔夫到法国来跟学生对话。

出生于1940年的鲁迪·杜奇克是德国最老的学生领袖。塔里克·阿里——一个叫做“越南团结运动”的英国组织的领袖，也是1968年一份短命的伦敦地下刊物《黑侏儒》的创办者之一——这样描述鲁迪：“一个中等个子、脸部棱角分明的男人，笑容温和，并且总是用眼睛笑。”甩着一头长长的黑发，留着一茬儿好像似乎永远不变的胡须，鲁迪据说是一个令人倾倒的演说家。但这种技巧在德国青年面前却显得那么笨拙和尴尬，好像德国人对这种有魅力的雄辩术都存有戒心，所以只是给以礼貌性的鼓掌。鉴于此，其他学生领袖建议杜奇克要使其演说风格更温和些。

他在大会的演说将越南人民的斗争和欧洲人推翻等级制度相提并论。然后他以自己惯有的做法，将这种一点点改变欧洲社会的战斗与毛泽东在1934—1935年间著名的长征相比，其时，毛泽东在重围之下带领九万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横跨中国境内的长征，所到之处，一点一滴慢慢积攒群众的支持。当然，杜奇克没有提到毛泽东的追随者有一半死在了路上。

演讲持续了几个小时后，然后是埃里希·弗里德上台了。他是一个大家所熟悉的诗人，一个早已变得稀有的品种——德国犹太人。埃里希·弗里德于1921年出生于奥地利，自父亲被纳粹杀害之后，他逃离了纳粹势力。虽然不是同一代人，但弗里德与德国许多学生领袖都相处得很好，尤其是杜奇克。他深受德国新左派的喜爱，因为他是一个敢于直言的反犹太复国运动者和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德国的新左派与欧美的许多同人一样，将年轻的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看做是又一个浪漫的国家主义运动。但是支

持一个杀害犹太人，包括欧洲的犹太人的组织，对这些年轻的德国人来说多少有些不舒服，所以有一个真正的犹太幸存者与他们在一起，对他们来说是个鼓舞。从一开始的支持以色列变成支持巴勒斯坦起源于“六日战争”和阿拉法特的出现，但也是因为人们对非暴力已渐渐失去了兴趣。巴勒斯坦人热衷于暴力也就意味着他们就是一群游击队员——就像切那样。

“和平运动”和“反战运动”这种词汇来自于美国，但即使在美国，这些词在一些极左派圈子里也渐渐变得过气了。欧洲的激进分子更愿意看到北越的胜利而不是战争的结束。春节攻势对他们来说不是一次生命丧失的悲剧，而是一次被压迫人民的胜利。英国的激进分子塔里克·阿里用在柏林、罗马和巴黎都听得到的语言来评介春节攻势：“世界迸发出喜悦与力量的浪潮，几百万人突然兴奋地发现，压迫者不是强大的。”

我们都背负着自己的历史。美国的运动积极分子想结束侵略，欧洲的激进分子则希望殖民主义遭到挫败——他们希望美国被击垮，正如欧洲殖民力量被粉碎那样。这在法国人那里表现得更加明显，他们认为美国海军在溪山的失败将会同法国在奠边府的失败一样令人感到耻辱。法国报纸连篇累牍地问：“溪山会是另一次奠边府吗？”毫不掩饰地希望此战役以失败收场。欧洲的左派有一些自我憎恶的情绪，尤其是德国人，所有的罪孽都可以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中找到对应物。对法国和英国的左派来说，美国人就是殖民主义者；于德国人来说，美国人就是纳粹。彼得·魏斯 1968 年的《话说越南》就认为美国人在越南犯下了纳粹般的罪行。

第二天早晨，估计有八千到两万人涌到柏林库达姆大街，这是一条宽敞的林荫道，两边是时尚的商店。东西柏林隔绝之后，市场需求被大大简化，柏林库达姆大街就是展示高档时尚趋势的场所。令人惊奇的是，学生队伍中有几百个穿越了东德的西德人，就在前一晚，他们还在柏林的同志们的家里。《纽约时报》估计这次集会“超过一万人”，称它是一次“该城市有史以

来最大的反美集会”。在阴冷、潮湿、灰色的街道上，学生们手持来自多个国家的领袖肖像，各种文化被奇怪地掺杂在一起——切·格瓦拉、胡志明、罗莎·卢森堡——一位来自波兰的犹太左派，1919年在德国被杀。他们喊着在美国反战游行中同样可以听到的口号：“胡，胡，胡志明！民族自由阵线就要赢！”他们走到歌剧院，本诺·奥内佐格曾被枪决的地方，然后又到柏林墙发表更多的演说。杜奇克对着群情激奋的人群说：“告诉美国人，他们被赶出去的日子即将来临，除非他们抛弃帝国主义。”但是鲁迪，一个欧洲最重要的学生革命者，尽管一直是明确反美的，却娶了一个来自芝加哥的美国神学生。

警察骑在马上，他们主要是被派来保护美国的军事设施和使馆。但是示威者们无意于这些地方。他们爬到两个有30层楼高的起重机上，系上巨大的越共的红旗。当建筑工人将旗子扯下并焚烧的时候，示威者一片嘘声。同一个西柏林，因为商联的作用，也组织起同等规模的反示威，并高喊，“柏林支持美国”和“将杜奇克赶出西柏林”。

从柏林的2月越战示威返回后的其他国家的学生非常兴奋。英国学生在3月17日组织了自己的示威，这是在塔里克·阿里和VSC领导下的第二次示威。第一次是小规模、没有暴力的，就像以往伦敦的多数示威一样。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几千个学生涌向牛津路，红旗汇流成河，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民族自由阵线就要赢！”一个德国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小分队希望VSC占领美国使馆，但塔里克·阿里对此并不首肯。当人群走到格罗夫纳广场的时候，令VSC组织者感到意外的是，学生们冲过了警戒线开始往使馆方向跑。骑在马上挥舞着警棍的伦敦警察罕见地对学生施以血腥镇压。滚石乐团的米克·贾格尔也参与了示威，之后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街战男人》里。

除了越南这个重要问题和北爱尔兰气候恶化事件之外，当年在英国最大的事情是种族主义。在国会议员伊诺克·鲍威尔的领导下，这个国家经历



格罗夫纳广场的反越战示威。伦敦，1968年7月7日
(戴维·赫恩摄/玛格南图片社)

了种族紧张，导火线是由执政党劳动党提交的《联邦移民法案》引起的，此事与美国民权运动中的白人反击事件颇为类似。帝国正在去殖民化，工人们被教唆说，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黑人和棕色人种将夺走他们的工作。“维持英国的白色。”这是鲍威尔的口号，也是许多工人组织的口号。有一个笑话，当一个肯尼亚外交官进入国会下议院的时候受到激烈的质问，并被高声要求回到他东非的“牙买加”去。

德国似乎是一个随时容易引起大爆发的地方。4月3日，崇尚暴力的左

派焚烧了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商场，这一举动若是发生在70年代肯定会更引人注目。4月11日，鲁迪·杜奇克在西柏林的一个药店门口为他襁褓中的儿子何西阿·切买药，这个名字是由先知和革命者的名字组成的。突然，慕尼黑一个23岁的失业房屋油漆工人约瑟夫·巴赫曼走向他，用手枪朝他开了三枪。一枪击中杜奇克的胸部，一枪击中脸部，还有一枪正好在他的头部。这是自第三帝国崩溃以后的第一次政治谋杀。警察在枪战之后将巴赫曼制伏，巴赫曼解释说，“我听说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了，因为我恨共产主义，所以我觉得一定要除掉杜奇克。”巴赫曼在他的家里藏了希特勒的照片，与同为慕尼黑油漆工的希特勒很有认同感，他还是右派报纸《图片报》的忠实读者。这份报纸属于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德国最有实力的报业大亨，他的报纸都无条件地支持美国政策，鼓励袭击左派分子并对这种行为大加赞赏。其中的一则头条写道：别把所有的脏活都交给警察！

德国右派的主要报纸《图片报》发行于1952年，每日发行量四百万份，是欧洲大陆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施普林格的14个出版物，包括五份日报，总发行量在五千万份。这些报纸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宣扬种族主义，许多人感到这些报纸是在唤醒一头野兽，而德国正试图让这头野兽沉睡。施普林格总是说，他讲出了普通德国人的想法，而这正是令许多人害怕的情况。施普林格并不否认报纸有时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你该看看我早上读报时被自己报纸上所登载的东西吓得从床上掉下来的样子。”施普林格曾经这么说。

被激怒的不仅仅是学生。早在杜奇克被刺杀之前，就有200个作家要求他们的出版商联合抵制施普林格的报纸。但是当巴赫曼声称是施普林格的报纸引发了他的行为之后，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至于施普林格本人就更加复杂了。作为老板，他对待他的工人很好，所以尽管他有右翼背景，还是得到了工会的支持。虽然他的报纸充满了纳粹气息，施普林格却是一个坚定的支持犹太事业的人，为此他还慷慨解囊。他为德国对以色列的补偿而不辞辛

劳，他的报纸也是强烈支持以色列的。但是，1968年，德国左派们最清楚的是，施普林格的报纸对他们宣战，要求用法律制裁游行示威者，对他们实行残酷镇压，这些人在他眼里是“恐怖分子”。他支持警察对学生暴力相向。

公众的反应非常之快：因杜奇克被刺所引起的愤怒立即转向施普林格，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反对左派，也因为人们根深蒂固的欧洲不可以由传媒大亨来控制的观念。施普林格是默多克和贝鲁斯科尼的先驱者，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媒体帝国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它缺乏广播股份，问题是——这个人，一个被英国人从德国的废墟中挑出来派去经营广播电台的人，是如何变成了欧洲最强有力的舆论制造者的？

杜奇克被杀之后仅几个小时，一群愤怒的青年人就冲到了19层高的钢铁与玻璃混合的位于柏林克罗兹堡区域的办公楼。施普林格选择这个地方，因为此地正与柏林墙傲然相对。他在大楼的一个霓虹牌上写着：“柏林仍是自由的。”警察用水枪来驱赶向大楼扔石头和火把的学生。第二天，几列学生纵队，挽着胳膊，走向西柏林施普林格大楼。当他们到达后发现，那里早已安装了铁丝网，并有防暴警察严阵以待。学生们高喊杜奇克的名字和“施普林格是凶手！施普林格是纳粹！”，警察开启水枪并逮捕学生。在市政厅，学生们高喊“法西斯！”“纳粹！”，他们还冲到美国电台，砸坏那里的窗子。慕尼黑的示威者做得更绝，在被警察赶出来之前，他们实际上已经冲进了那里的施普林格大楼。之后，学生们焚烧了报纸输送带。在汉堡、埃斯林根、汉诺威和埃森也有几千个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情况基本上是学生们联合起来和警察的水枪抗争，结果是高压水枪赢了。但学生们至少破坏了施普林格的报纸输送管道。在法兰克福，他们也破坏了西德最著名的商业报《法兰克福汇报》，因为该报也在施普林格的工厂里印刷。在纽约、伦敦和巴黎的施普林格大楼前面也有人示威。在伦敦，塔里克·阿里带领一队人从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马丁·路德·金纪念碑出发，试图占领施普林格办公室。在巴黎，根据阿兰·克里维纳的回忆：“鲁迪被枪杀引发了巴黎第一次自发的暴力示

威，当时警察都没做好防暴准备，没有钢盔，也没有盾甲，拉丁区的学生们突然将桌椅扔向警察。”

鲁迪被枪杀后，德国引发了连续五天的街战，时间恰好在复活节。混战中死了两个人：一个是美联社的摄影师，另一个是学生，这两人都是被学生扔的物体砸死的。另有几百个学生受伤，好几百人被捕。这是自从希特勒上台之前至今最严重的街头暴动。因为对德国政局动荡的恶果记忆犹新，所以大多数德国人都不赞成街道暴力。根据1968年德国杂志《明镜》周刊的调查，92%的柏林公民反对“学生使用暴力抗议”。同时，学生们也没有争取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在出身工人家庭、不满三十岁的柏林人中，78%的人都反对学生暴力，甚至也有学生直言反对暴力的。

杜奇克活下来了，甚至还给刺杀他的巴赫曼写了封信，解释社会主义，但后者在牢里上吊自杀了。

彼得·勃兰特是柏林230个被捕学生中的一个，他是威利·勃兰特的儿子，后者是柏林前市长，外交部长，德国副总理。威利·勃兰特一直是个好人，是个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并且没有不可告人的过去。但是彼得对进入政府部门之后的父亲很失望，因为他失去了对社会主义的热忱。彼得是个社会民主党人，相当于别的国家的自由党。“我从没有说过我父亲不应该为政府效劳，这不是事实。”彼得说，“但我认为他改变了，这令我很遗憾。他不再是以前的他了，他不再是那个在内战中抗击西班牙人的社会主义者了。我们从此意见不合。”当他父亲觉得他花太多的时间在政治上，而没有将足够的时间花在学习上时，他说：“当我觉得事情需要改变时，我认为我有责任去用行动改变它。”

彼得的一个老师曾对彼得当副总理的父亲说：“再过六个月，你儿子就要变成共产主义者了。”

勃兰特耸耸肩说：“任何一个在20岁的年龄不信共产主义的人就不会是一个好的社会民主党人。”

一场时尚先锋派革命的瓦格纳式弦外之音

我从小就耳濡目染埃尔罗·弗林主演的《罗宾汉》电影以及其他许多反抗社会不公并领导人民战胜暴政的英雄人物。在古巴所发生的事情就如同好莱坞的经典场面。

——勒鲁瓦·琼斯，《勒鲁瓦·琼斯自传》，1984年

1968年2月，20名美国青年学生取道墨西哥城来到哈瓦那。此次行程系由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所组织。在这群人中，有一位来自新泽西州名叫马克·拉德的20岁哥伦比亚大学大三学生。他通过在上曼哈顿地区一家学生经常光顾的“西区酒吧”贩卖大麻才筹措到此次古巴之行的经费。

在和越南驻古巴外交官员会面之后，这群学生深深折服于他们极其彬彬有礼的风度举止。越南大使表示，他知道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尽管学生们对大使的善意言辞感到十分欣慰，但拉德仍然不失时机地指出，虽然他希望大使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的美国人确实支持这场战争。

越南大使对这位认真的白肤金发的青年学生笑了笑。“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表示，“我们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我们也可以抵抗更长时间。最后，美国人民将会对战争感到厌烦，他们会反对战争。到那个时候，

战争就会结束。”

拉德意识到，这位大使的话是正确的。有一位外交官声称，他在南越战斗了七年时间。白天藏身于地道中，夜晚就出来攻击美军。那年冬天，古巴到处都可以听到从越南传来的消息。在哈瓦那的主要街道拉姆帕大街上有一块巨大的霓虹灯告示牌，上面实时显示着被击落的美军飞机数量。当学生们来到乡间时，他们发现古巴人都聚拢在半导体收音机前收听“新年攻势”的消息。有人给了拉德一枚据说是用一架击落的美军战机残片所制成的戒指。

学生们遇到了许多和他们年纪相仿的古巴人，包括以琼·贝兹的风格演唱民谣的希尔维奥·罗德里格斯。他们在绿树成荫的热带公园里消磨时光，品尝著名的柯贝利亚冰淇淋店里的冰淇淋。拉德后来回忆道，“我们在柯贝利亚店里厮混，吃着番茄冰淇淋，出入人群拥挤的聚会，那里所播放的非洲—古巴风格的音乐我还从未听过，也听不太懂。我在古巴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一切：工厂、农场以及单位机构都属国家所有，已被社会主义化。我想看到一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但我却并没看到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比如国家不能由一党专政，必须实行选举。”

蓄着络腮胡、身穿迷彩服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在1959年轰动一时，令人颇感惊奇且有些许特立独行特质的人物，现在已然成了1968年时的新左派英雄。

当卡斯特罗1955年访问美国寻求资金援助推翻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巴蒂斯塔三年前夺取政权并禁止所有党派活动）的独裁统治时，他既没有蓄胡须，也不是一位革命者。巴蒂斯塔贪污腐化，不得人心，但卡斯特罗——有鉴于其所取得的法学学位，他在美国被人称做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通情达理、态度诚恳、外形轮廓分明，而且来自中产阶级的他也让人颇为放心。

1956年12月，卡斯特罗和82名武装人员乘一艘快艇在奥连特省登陆。

古巴政府的报告称，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几乎所有叛军都已毙命。这一说法有点夸大。起义军的确几乎全军覆没，但尚有 12 名幸存者得以逃脱并躲进马埃斯特腊山区。卡斯特罗博士就在其中。或许人们都不会知道，直到一名退休的《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L·马修斯采写了那篇 20 世纪最为知名且极具争议性的独家新闻后，人们才发现卡斯特罗博士原来尚在人世。藏身于崇山峻岭之间的卡斯特罗，满脸络腮胡且十分健谈。和他一道的还有 18 名蓄着各色胡须的起义军，其中一位还是美国前棒球运动员。

《纽约时报》在 1957 年 2 月 24 日、25 日和 26 日刊登了马修斯的系列采访报道。反对卡斯特罗的人经常攻击指责，称这篇报道将卡斯特罗描绘成了和“二战”时期的游击队员一样富有同情心的自由战士。当然，美国人很容易就忘记了许多“二战”时期的游击战士也同样是共产党人。在对马修斯这篇系列报道的攻击之中，给人印象最深者当属 1960 年时在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上发表的卡通漫画。漫画中的卡斯特罗形象贪婪，他盘腿坐在一座标着“古巴警察政权”的岛屿上。漫画的说明写道：“我从《纽约时报》那里取得了我的地位。”

但在那个时候，刊登对卡斯特罗好评报道的媒体远不止《纽约时报》一家。一位名叫安德鲁斯·圣乔治的狂热反共的匈牙利流亡者在《展望》周刊 (*Look*) 上撰文称赞古巴反叛者；朱尔斯·杜波依斯在惯于政治迫害的右翼报纸《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 上给予同情性的报道；受极端保守的《读者文摘》派遣，摄影记者迪基·夏佩尔与卡斯特罗在一起待了三周时间；另一份有右翼倾向的出版物《时代》周刊在这些古巴反叛者奋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两年中发表了 32 篇相关文章，其中大部分都是积极正面的报道。1956 年 12 月，《时代》周刊将菲德尔称做“卡斯特罗律师”，并表示他是一位“出身良好、家道殷实且勇敢无畏的 29 岁青年”。

美国记者们总是强调卡斯特罗的中产阶级性格、出身以及教育，并经常不忘提及他纯正的西班牙血统。古巴的反叛行动并非危险的“黑人起义”，

这一点虽然从未有人指明，但人们却对此毫不怀疑。对美国的新闻媒体来说，卡斯特罗的事迹可谓是善行义举，一则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多彩多姿且振奋人心的传奇故事。然而他在电视这个大舞台上的表现却开始变得更具重要意义。穿上迷彩服时，卡斯特罗看起来显得英姿勃发。而他那不太熟练的英文则让其展示出在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的那种打动人心的脆弱和较为犹豫不定的一面。讲英文就是让卡斯特罗感到不自在。在马修斯的专访发表三个月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支新闻采访组深入到古巴奥连特省灌木丛生的热带深山老林中，在那里拍摄了一部在5月份时播出的黄金时段新闻专题片：《马埃斯特腊山区的起义者：古巴丛林斗士的故事》。

对墨西哥革命来说，电视时代显然来得太迟。它已错过了以精湛骑术知名、魅力无比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以及潘乔·比利亚手下那些狂放不羁的北部骑兵匪帮的传奇故事，尽管好莱坞曾在50年代时让浪漫的叛逆明星们演出他们的故事，如马龙·白兰度扮演萨帕塔。然而现在，通过电视对革命进行现场直播，人们可以目睹身材魁梧、面容粗犷的非德尔·卡斯特罗博士以及其英俊迷人的阿根廷伙伴切·格瓦拉。这群胡子拉碴的叛逆分子，嘴里叼着雪茄，身穿绿色迷彩服，所扛的巨型枪支更像是为了突出照片效果而非军事用途——但这些武器却让人联想起墨西哥革命。这正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拉美革命的形象。在下山攻击邪恶的独裁政权以及其报酬低廉且士气低迷的追随党羽之余，卡斯特罗可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罗伯特·泰伯一起蹲在迈阿密以南的丛林中，通过麦克风发表讲话。这些报道不如1968年越南战争的现场感那般生动，但它们能立刻被感觉到，而其非暴力性也正是吸引力所在。

学生们设法前往古巴为卡斯特罗而战，但古巴的起义者们并不鼓励他们这么做。法国人雷吉斯·德布雷只是在后来才成功地和切·格瓦拉一起并肩在拉美大陆战斗。卡斯特罗取得革命胜利那年才20岁的贝尔纳·库什内一度试图加入卡斯特罗的队伍，但却被婉拒。返回法国后，他进入医学院学习

并创建了“医生无国界”组织，以此医学工作作为其实践“第三世界主义”理想的途径。《纽约时报》报道称，和卡斯特罗一道作战的有25名美国人，或许人数还更多，尽管我们只是偶尔得知他们的名字。在关塔那摩基地服役的三名美军海员的儿子加入了古巴游击队组织。不知为何，起义军在通讯中却不时以“美国鬼子”来称呼他们。1957年3月，一位名叫汉克·迪·苏维洛的伯克利大学学生写信给赫伯特·马修斯，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春季学年结束后和一群朋友乘坐两辆吉普车到奥连特省以助卡斯特罗一臂之力。出于一片好心，直到春季学年结束，马修斯都未过多提及卡斯特罗坚持革命斗争的事。但他不赞成他们这么做。于是汉克·迪·苏维洛那年便留在了伯克利大学，并成立了学生政党组织“竞选团”，由此开启了伯克利大学校园运动的风潮。

似乎每个人都喜欢卡斯特罗。甚至连艾森豪威尔都曾在1958年时秘密与巴蒂斯塔谈判，试图劝说他下台并由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联合政府取而代之。有关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及其所领导的大胡子革命分子的影像纪录片深深震撼了美国人和世界上许多人。在镜头上，他们丝毫不差于好莱坞所拍摄过的人物。1959年新年之际，卡斯特罗胜利攻占哈瓦那城。人人都想从电视上看到卡斯特罗。埃德·沙利文和杰克·帕尔飞赴古巴拍摄卡斯特的影片。然而，这种电视媒体、新闻记者、左派学生以及执政当局都对卡斯特罗青睐有加的融洽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

一旦掌握权力后，卡斯特罗即开始处决数百名巴蒂斯塔的支持者。忽然之间，执政当局，就是那些在1960年时为查斯曼一案死刑判决辩护的同一帮人，对古巴政府的处决行动震惊不已。阿比·霍夫曼们和马龙·白兰度们这些左派人士，这些坚持在加州监狱前守夜，以此抗议处决查斯曼的活动分子和知名人士，却对死于卡斯特罗之手的受害者们不发一语。但即便在古巴国内，革命的正义性也受到了质疑。1959年3月，44名巴蒂斯塔的空军飞行员以战争罪名义受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拒绝轰炸平民并将炸药倾撒到

荒野之中，因此他们被宣判无罪。但后来一名更为忠心的革命者取代了审理该案的法官，并重新审理这44名飞行员。结果所有的人都被判处入狱。古巴卫生部长埃莱娜·梅德罗斯因此提出辞职并表示：“我和你以及你的朋友不属于同一代人。我们彼此在精神上根本格格不入。我必须辞职。”但卡斯特罗却凭借其个人魅力让她得以留任。

死刑和革命的正当性也在美国引起了话题和非议，但根本的问题却在于革命。走出深山峻岭并且在哈瓦那城里高枕无忧之后，卡斯特罗博士和其白人中产阶级起义者们竟然不剃胡子！在20世纪60年代，多余的毛发就是叛逆的同义词。在马修斯于196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并非调整新的作战部署，不是领导人的重新洗牌，也不仅仅是出局者卷土重来，而是一次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脉相承的社会革命”。

在逐渐认清这一现实之后，满怀对革命的恐惧和疑虑，其他国家的执政当局开始强烈地反对卡斯特罗。许多人仍犹豫不决。但世界各地的一小部分激进分子，那些对革命充满渴望，深信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唯一希望以及创造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社会的唯一道路的人们，不管卡斯特罗有什么过错，他们都对他充满敬意。因为卡斯特罗不仅是夺取了政权而已，他真正地在干一番事业——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在他们心目中，卡斯特罗就是万神殿中的神祇，同胡志明和毛泽东一样并驾齐驱。但胡志明的性格有些古怪和刻板，不像卡斯特罗那么新潮。虽然毛泽东的革命让他们着迷，但他们永远也无法完全理解广阔而复杂的中国。对许多激进的学生以及那些梦想着革命的中产阶级来说，由中产阶级律师转变成革命者的卡斯特罗博士以及其伙伴、由中产阶级医生转变成革命者的切·格瓦拉医生，可谓是他们心目中最最佳的激进分子。

1960年11月，C.赖特·米利斯出版了《听着，美国佬》一书。该书是在60年代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众多左翼作品中的第一本。其他的多数作品，

比如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冰上灵魂》，直到1968年时才面世。C.赖特·米利斯，这位在学术圈颇受尊敬的社会学者，他在60年代初逝世时正值声誉的顶峰时期。自其50年代的著作《权力精英》以来，米利斯的作品便广受读者欢迎。艾森豪威尔在其1960年的告别演说中生造出了“军工产业集团”一词，而《权力精英》一书在此之前即提出了这一概念。米利斯所详细阐述的这种社会权力结构，许多新左派青年都能感觉得到。在米利斯看来，美国的统治阶级是由包括政治人物、公司管理者以及军界领袖在内的一个新型集团所组成，他们极力使世界长期保持冷战状态并以此来维系其权力。在《听着，美国佬》一书中，米利斯打破了所有学术写作的条条框框，结果售出了40万本。该书以第一人称叙述，主角是一位虚构的古巴革命者，他说话语速很快，旁白中交织着大量评论——正如卡斯特罗这个名字在西班牙语中与“缝纫”（costura）一词发音十分相近。古巴人不仅谈论本国的革命，他们也谈到了美国发生革命的必要性。不同于1968年，在1960年的时候还鲜有听到人们谈论在美国发动革命。

尽管古巴让左派们感到振奋不已，但它却让大多数对他赞誉有加的美国人产生了疏离之感。在1959年初，起义军司令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到访美国寻求支持，但此次访问却是灾难性的。这些大胡子不再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游击战士，他们是些不修边幅、粗俗的激进分子。但两个月后，当卡斯特罗于当年4月访问美国时，美国人一度折服于他那似乎难以抵挡的魅力。一家玩具工厂生产了10万顶印有“解放者”（El Libertador）字样以及卡斯特罗“七·二六运动”标志的橄榄绿军帽。每顶军帽都还有一个额带，上面附有一把黑色的胡须。卡斯特罗在纽约受到了特别热情的接待，中央公园为其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纽约市长小罗伯特·F.瓦格纳赠送给他一套象征纽约市的钥匙。然而，如果就对未来的预示性而言，卡斯特罗最成功的行程还当属造访哥伦比亚和其他几所大学。那年春天，美国的民意调查表明，那些反对卡斯特罗的人和那些支持他或者是尚未下定决心的人几乎各占一半。虽然

有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坚定地支持卡斯特罗，但在1959年上半年，他却失去了许多支持者。

一旦被指责为过分偏袒那些大胡子英雄们，美国的新闻媒体便对古巴革命表示出强烈的反对情绪；而一旦他们意识到这场革命已成昨日往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罗伯特·泰伯还曾在深山中见过卡斯特罗，他们便决定成立一个名为“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Fair Play for Cuba Committee）的组织。十分不幸，人们对这个短命的组织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在于，很奇怪的是刺杀约翰·肯尼迪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也曾参与其中。但这一组织还有更加有趣的事情。据许多文章称，泰伯是个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的人。他只是单纯地认为，古巴革命正在掀起一场被新闻媒体所忽略的有趣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受其影响而加入该组织的人包括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德·波伏娃、诺曼·梅勒、詹姆斯·鲍德温、戏剧批评家肯尼思·泰南以及杜鲁门·卡波特。这一团体高调刊登广告对古巴革命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其中除了与法国共产党有关系的一对夫妇之外，这个组织没有什么政治渊源，但他们还是能吸引数以万计的群众参与到签名请愿和示威活动中来。这一组织的出现第一次表明，美国已经产生了一大批拥有左翼倾向的人。他们不属于任何既有的左派政治势力——这些人后来即被称做“新左派”。

在卡斯特罗执政的最初两年里，美国和古巴之间的矛盾分歧不断持续扩大。1959年初，已有迹象表明美国准备发动入侵行动。卡斯特罗发表了其著名的讲话，称如果美国人敢发动进攻，古巴将“消灭20万美国佬”。1959年6月3日，古巴的《土地改革法》对私人拥有土地大小做出限制，并规定土地所有者必须是古巴公民。华尔街的制糖公司股票随即应声下挫，尽管美国政府愤怒地表示抗议，但却徒劳无功。当年10月，乌韦尔特·马托斯少校及其手下的一帮军官因其反共的政治立场而遭到逮捕，而卡斯特罗自己一年前也曾表达过类似的反共立场。这些军官因为其“立场摇摆、背叛祖国以

及反革命行为”受到审判。到1959年11月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决定强行推翻卡斯特罗。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政府开始和在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者进行合作。两个月后，“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开始活动。1960年2月，古巴和苏联签署一个为期五年的协议，以古巴蔗糖换取苏联工业产品。就在几周之后，一艘装载着步枪和手榴弹的法国货轮“科波尔”号在哈瓦那港爆炸，造成75人死亡以及200名古巴码头工人受伤，个中原因至今仍不得而知。卡斯特罗宣布举行一天哀悼，他谴责美国的破坏活动，尽管承认并没有任何证据。在一篇著名的讲话中，卡斯特罗表示，“不管是用战争还是饥饿，你们都不会使我们瓦解”。正在古巴访问的萨特写道，在这篇讲话中，他发现了“所有革命中都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他们被遮盖的一面：即在极度痛苦之中所感受到的来自外部的威胁”。

美国召回了驻古巴大使，国会授权艾森豪威尔削减古巴蔗糖进口配额。艾森豪威尔坚称，他不会以此来惩罚古巴人民，只会在必须调控美国食糖供应时才采取行动。

5月7日，古巴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那年夏天，那些拒绝加工古巴进口的苏联原油的美资炼油厂被国有化。当苏联保证将保护古巴免受外来侵略时，艾森豪威尔大幅削减了古巴蔗糖的进口配额。似乎因为古巴靠近苏联才加剧了美国对其的敌意，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早在古美建交之前的3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即已批准了一项古巴流亡者入侵这一岛国的计划。在整个1960年的夏季总统选战期间，约翰·肯尼迪都在不停地攻击共和党人对古巴“示弱”。

1960年10月13日，古巴将所有大型公司都收归国有。接下来的那周，当肯尼迪指责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已“失去”古巴时，艾森豪威尔决定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卡斯特罗则将古巴国内的最后166家美资企业收归国有以示回应。在1961年1月宣誓就职时，美—古关系似乎已经陷入了无法挽回的边缘。肯尼迪断绝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禁止美国人到访古巴，并

要求“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注册为外国机构，但该委员会对此予以拒绝。然而，肯尼迪却不无得意地表示：“我们可以引以自豪的是，美国并没有使用强力来对付一个弹丸小国。”肯尼迪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个信奉“新边疆”思想的自由派。

但是，肯尼迪采取的行动却是他一直引以自豪不会使用的手段，他授权古巴流亡分子入侵古巴。所谓的“2506旅”在4月17日的行动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灾难。流亡分子们曾说服美国政府相信，古巴人民将起来反抗卡斯特罗并加入他们的队伍。但古巴人并非如此。相反，他们奋起保卫古巴免受外国入侵，其决心坚定令人印象深刻。古巴流亡分子们原本以为如果他们陷入困境，美国军队会介入，但肯尼迪却不愿这么做。三天之内，后来被称做“猪湾入侵”的此次事件就宣告终结。卡斯特罗拯救了古巴。正如迪安·艾奇逊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人们不一定非要造访普华会计事务所(Price Waterhouse)，然后才知道1500名古巴人绝非25万古巴人的对手。”

在“二战”后的历史中，“猪湾事件”堪称是一个极具重要意义的时刻。这是美国在第三世界的首次失败，但这也标志着自“二战”结束以来即已开始出现的一种转变。美国立国的根基乃在于反殖民主义，而且即便直到最近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它始终都在谴责欧洲的殖民主义政策。一直以来，美国都在形成一种自己独有的帝国主义——为了自身利益而残酷地压榨加勒比海、拉美甚至部分亚洲国家却不顾当地人民的困境——但欧洲人却已失去了他们的殖民地，尽管是不得已。美国变成了头号的帝国主义者。

在“猪湾事件”爆发的时候，法国在越南失去了一场殖民战争，同时在阿尔及利亚陷入另一场殖民战争的泥淖。一年前，英国放弃了镇压“茅茅”抵抗运动，并正计划让肯尼亚实现独立。比利时所属殖民地刚果通过血腥的内战而获得独立。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镇压当地的独立运动。这些是欧洲所面临的问题，欧洲的新左派正因反殖民主义问题以及新兴独立国家的斗争而组织起来。“猪湾事件”把美国完全拖入了这场论争当中，它让弗

朗茨·法农等作家都和美国人发生关系，更不用提胡志明，这也因此影响了美国乃至全世界左派青年看待越南的方式。对他们来说，“猪湾事件”让古巴成为反抗殖民主义的象征。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古巴革命的本质，而仅是这一事实本身。它挺身反抗一个庞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并得以生存下来。

美国的自由派和左派因支持肯尼迪当选总统而一度团结起来，而“猪湾入侵”也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分裂。诺曼·梅勒，这位广为人知的肯尼迪拥护者和其编年史作者，在一封公开信中这样写道：“难道你身边没有任何人告诉过你有关古巴的事吗？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你入侵了一个国家，却对它的音乐一窍不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此次入侵事件的众多抗议活动中，很多抗议者是那些在此之前对政治并无特殊兴趣的大学生。很显然，在入主白宫四个月之后，肯尼迪政府并非仅仅是新边疆、和平队（Peace Corps）以及登月竞赛。正如其前任一样，肯尼迪试图以军事武力来巩固冷战偏执思维，他对那些不听话的贫穷小国也毫无宽容之心。像汤姆·海登等为肯尼迪所痴迷的年轻人很快就开始重新审视对肯尼迪的支持。就连和平队也有不同看法。满怀理想者真能通过这个组织来帮助那些新兴独立的国家吗？或者它就是美国政府政策的组成部分而已，具有殖民主义性质而非它所一直标榜的反殖民主义？

“猪湾事件”成为一个标志性时刻，它导致了新一代人对自由派的冷嘲热讽。到1968年时，自由派几乎已经变成背叛的同义词。在示威集会时，歌手菲尔·奥克斯就曾以自己的歌曲“爱我吧，我是个自由派”来逗乐在场的年轻人。这首歌的含义是，自由派们谈起来头头是道，但人们很难相信他们会那么去做。

菲德尔·卡斯特罗堪称一个具有诱惑力的人。他总是有着无穷的魅力能使人着迷、折服和效忠。他总是如此充满自信和踌躇满志，简直可以说是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只要他走进一间房间或即便是一处空旷的空地，所有在

场的人都能感受到，甚至是情不自禁地，一种激动不已的情绪——他们意识到将要发生一些吸引人心的事情。他十分懂得如何应用这种才能，也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他以及其他所有的人都开始将古巴革命视做卡斯特罗自我的一种延伸。古巴同样拥有吸引旅游者的悠久历史，它那优美的风景、丰富的文化以及和其他加勒比海城市都与众不同的宏伟都城。曾在美国大学校园受到热烈欢迎的卡斯特罗知道，古巴在美国仍然拥有一大批年轻的支持者。

鉴于上述原因，说服尽可能多的富有同情心的美国人，向他们亲身展示古巴革命便成为了古巴的政策。古巴政府资助的行程绕过了旅行限制和经济禁运。多数的到访者都清楚，古巴人是想要引诱他们。有些人对此表示抗拒，有些人则不以为意。不管情形如何，结果通常都是一样的。多数人离开



1968 年古巴政府海报
 (尚博格黑人文化研究中心)

时都对古巴革命留下了深刻印象：消除文盲率，在全国修建新学校，构建广泛且有效的卫生保健体系。古巴人甚至还进行了女性主义的实验——加强妇女的作用，反对大男子主义运动，结婚宣誓时男人承诺做清洁家务。这些培养“新人”的社会实验殊为震撼人心。既然这是一场年轻的革命，其所引发的激动和兴奋也具有一种传染性。

许多人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警察人数过多，逮捕行动泛滥，新闻媒体不自由。但他们也看到了许多让他们感到特别大胆、具有试验性和鼓舞人心的东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古巴的敌人，主要是美国政府和古巴流亡分子，之所以反对古巴革命，并非因为那些不好的东西，而是因为那些好的东西。这也让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些重要的转化。

苏珊·桑塔格于1960年时在古巴停留了三个月，她发现这个国家“令人吃惊是因为不存在压迫现象”。虽然意识到缺乏新闻自由，但她却对古巴革命予以肯定，因为它不像其他许多革命那样自相残杀。正在监狱服刑的乌韦尔特·马托斯被处以25年徒刑，60年代中期还有1.5万名“反革命分子”被关押在古巴的监狱之中，其中许多人都是以前的革命者。对于他们来说，这应该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是，因为左派人士认为古巴受到了美国政府残酷镇压越南一样的不公平对待，同时他们对美国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对卡斯特罗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到印象深刻，所以他们倾向于夸大古巴的实际情形。有些人觉得，他们就是在为敌视古巴者的明显谎言和曲解误导做出补偿。

古巴彻底改变了勒鲁瓦·琼斯。生于1934年的琼斯在50年代是一位垮掉派诗人，对种族问题和革命都不关注。事实上，和他在1958年时一起创办诗歌杂志的同人艾伦·金斯堡相比，琼斯根本不关心政治。1960年，他参加了一次由古巴政府所资助的黑人作家访问活动。和许多其他参加这种由卡斯特罗所资助的参观游览活动的作家一样，琼斯十分担心自己会像人们常

说的赫伯特·马修斯那样被“俘虏”过去。“我马上就能确切地感觉到追求已经开始了。”他写道。作为古巴政府的客人，他们在“美洲之家”的带领下轮流参观一处处建设成就，因此也难免会有如此想法。“美洲之家”是古巴政府机构，其成员是一些热心真诚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对拉美艺术和文学都有所了解。该机构由艾德·圣玛丽亚负责，她自革命开始即是卡斯特罗的核心团体成员之一。圣玛丽亚后来因迫害那些不够革命的古巴作家而臭名昭著，她深信不可能存在什么不关心政治的作家，因为不关心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刚开始时，琼斯对此次访问团中的黑人作家的素质深感失望，他是其中最知名度的作家。但在和拉美作家们接触后琼斯受到了触动，他们中有些人指责他没有政治承诺。访问的最后一站恰好是在7月26日。在1953年的那一天，卡斯特罗以一种堂吉珂德式的气概攻打一座兵营。此次行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却由此开启古巴革命的序幕。在和一群庆祝“七·二六”周年的古巴人游览完马埃斯特腊山区后，琼斯返回美国并在一篇名为《自由古巴》的文章中描述了这一场景：

在演讲中的某处，人群打断了近二十分钟。他们声嘶力竭地喊着：“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整个人群，约有六万到七万人，都一起高呼口号。卡斯特罗走下讲台，面带笑容，和身边的助手交谈着。他挥了挥手臂，示意人群安静下来，然后接着演讲。开始时声音轻柔，一字一顿，语调清晰。紧接着他加快语速，几乎以一种音乐的节奏重新安排演说。他以一句冗长得难以置信的句子对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美国南方佬、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逐一予以声讨谴责。人群再次打断了他的讲话：“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卡斯特罗从讲台边探过身子，朝陆军总司令阿尔梅达笑了笑。演讲持续了几乎两个半小时，一次次被

狂热兴奋的人群打断，有一次还被大雨打断了五分钟。当天下起雨时，阿尔梅达披了一件雨衣在卡斯特罗的肩上，卡斯特罗则重新点燃了雪茄。当演讲结束时，人群几近疯狂一般，大声喊叫了差不多45分钟。

在《自由古巴》这篇文章里，琼斯对自己以及垮掉派的波希米亚式生活方式进行了批评，而把古巴革命视做典范。琼斯写道：“我们之中的叛逆者不过是变成了像我这样的人，蓄起了胡须却不愿意参与政治。”新一代的美国黑人，黑人革命者，部分上从《自由古巴》这篇文章里得到了思想启蒙。

古巴之行成为了一种麦加朝圣之旅，变成所有左派分子终其一生都必须至少成行一次的必定旅程。作家们到那里讨论文学，社会活动分子到那里见识革命，年轻人到那里砍伐甘蔗，“尽自己的一份力”。

其中一次不太成功的访问是艾伦·金斯堡，尽管他对自己所见所闻有着不错的印象。他这样记述自己1965年初抵达古巴时的情形：“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 没有瓦格纳式的弦外之音 / 我为之欢欣鼓舞。”和那个时候所有到访古巴的美国客人一样，金斯堡被安排住在拥有50年代最新建筑外表的哈瓦那里维埃拉饭店。一座人行小桥横跨过一个池塘，沿着小桥便可进入这座不算很高的饭店大楼。从饭店远眺，就可以看见哈瓦那港口的风景。沿着弯弯曲曲的马雷贡滨海大道，巨大的海浪拍打着路堤，四散的浪花飞溅到马路上。和之前的许多人一样，金斯堡在他那奢华的饭店房间里不免想到，“被当做贵宾招待是一种变相的洗脑。”在那里的第一晚，他遇到的三名年轻的同性恋诗人告诉他，警察迫害镇压同性恋、颓废派以及留着胡须和长发的人——当然，除非他们是大胡子的“菲德尔主义者”。他们请求金斯堡向古巴政府反映他们的不满。金斯堡真的照做了，结果政府官员们向他保证称，那只是过去的偶然事件而已。金斯堡遭到过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无数秘密警察的迫害，他对此说法仍然表示怀疑。

金斯堡很快就在年轻诗人中拥有了崇拜者，他们会出席他的诗歌朗诵

会，但却被阻止进入会场，直到金斯堡一再坚持。在接受一名古巴记者采访时，金斯堡被问及如果有机会见到卡斯特罗，他会对他说什么。金斯堡举出了三点：他会问卡斯特罗有关警察迫害镇压同性恋的事；然后他会问为什么大麻在古巴是非法的；最后，他会提议与其把那些反对政府的人处死，还不如给他们食用迷幻性菌菇，然后让他们到哈瓦那里维埃拉饭店去做电梯操作工。

“我就是口无遮拦。”金斯堡后来说。“我在古巴那里就像在美国这里一样说个不停，抨击、反对独裁主义政权。但在古巴时，我从根本上对古巴革命充满同情。”

古巴革命很快就对金斯堡的言论感到厌烦了。艾德·圣玛丽亚告诉金斯堡，他可以和高级官员们讨论毒品和同性恋话题，但他们不能让他把这些想法散播到普通大众中去。“我们有工作要做，还消费不起这些破坏我们感官的额外奢侈品。”在谈及解禁毒品时她如是说。和其他访问者一样，金斯堡对古巴进行的建设新社会的实验印象深刻。但古巴人对金斯堡却没有什好感。一天早上8点钟，金斯堡从前晚的通宵聚会回来之时，下达逐客令的敲门声终于响了。一名政府官员带着三名穿制服的警卫通知他收拾行囊并将他送上了一班出境的航班。该航班恰好是飞往捷克斯洛伐克，另一个金斯堡将马上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1968年最初的几个月是古巴的革命高潮期。年初对几名亲苏官员的审判似乎表明它试图与苏联保持距离，尽管这并未持续多长时间。相对苏联而言，卡斯特罗似乎对中国更感兴趣。从新左派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1968年，中国正处在官方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时期。这一运动由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目的是为了将那些他认为可能削弱其权威和革命意识形态的人排挤出去。中国同样有1968年一代，那

些在革命年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中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他们的思想倾向于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是毛主席的保卫者，从学校中解脱出来后成为了先锋的“红卫兵”，这一名称源自1966年5月时清华大学的激进学生。毛泽东的公开目的是打击逐渐侵蚀的资产阶级思想。8月，他发布了16条方针，以期“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使教育、艺术以及文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一致。对全世界的左派理论家来说，文化大革命是试图清除整肃、重新发动并对革命进行净化的一次令人神往的努力。中国人似乎决心不让他们的革命事业沦落到苏联人那样唯利是图和虚假伪善的境地。

但在实践中，文化大革命不仅十分残忍，也是一次灾难。青少年们冲到大人们面前，命令他们脱下鞋子，因为那是由香港制造的。女孩子们强迫妇女们剪掉长发。军队保护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免红卫兵破坏，因为他们想毁灭掉一切在意识形态上不纯洁的东西。学者们因为懂得外语而受到攻击和公开侮辱。鉴于中国人对年长者的极度尊重，这种行为如果发生在西方国家，人们或许还不会感到如此震惊。逐渐地，整个社会在一种几乎普遍性的恐慌中陷入了瘫痪状态。即便在红卫兵中，那些出身于工人、农民、军人、干部或是革命烈士——挑选出来享有特别待遇的“红五类”——家庭的学生以及那些有着资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学生之间也存在着分裂。

相对中国的革命纯洁性问题而言，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更关心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稳定。在1968年时，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国出现了粮食短缺的迹象。西方政府甚至更为关心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核武器项目的影 响。1964年，中国成为一个有核国家。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1966年，中国业已展示出以导弹发射弹头至500英里以外目标的能力。自此以后，相关项目并未显示出更多进展。这或许是五角大楼并未对此感到特别恐慌的原因之一，但其他人则担心五角大楼过于乐观。即使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不稳定局面，物理学家拉尔夫·E.拉普在1968年时仍然警告称，中国人到1973年时将有能力

为人民立新功



1968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海报。画面上，一名红卫兵手拿一本《毛主席语录》。画中文字写道：“为人民立新功：像英雄四排和李文忠同志那样破私立公，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落实到行动上。”

(美国国会图书馆)

打击洛杉矶和西雅图。而且他们似乎正接近于制造出氢弹，事实上他们在1968年底时就爆炸了氢弹。

中国人试图使革命变得纯洁的努力引起了古巴领导人的兴趣。革命的纯洁性成了烈士切·格瓦拉最热衷的话题。格瓦拉强烈反对所有形式的金钱激励，因为他担心这会使革命腐化变质。而卡斯特罗则更为务实，他们之间的分歧，再加上实际的革命已经结束这一事实，致使格瓦拉决定从古巴政府辞职并继续投身另一场革命。

卡斯特罗已宣布1968年为“英勇的游击队年”，这将对切·格瓦拉历时一年的纪念活动。似乎是响应自己的宣传——随处可见的号召人们都效法格瓦拉的标语口号——古巴政府事实上变得更加像格瓦拉。如同新左派一

样，格瓦拉瞧不起也不信任苏联，因为他认为苏联已经放弃了所有的革命原则。1968年伊始，卡斯特罗即采取了一种反苏的姿态。他表示，希望扩大出口以期在两年内能够不再依靠苏联。于是，他在3月14日宣布展开“革命攻势”行动。此次新的进攻行动取缔了残存的私人商业活动，关闭了5.5万多个小型私人产业，包括水果摊、洗衣店、修车厂、夜总会以及餐馆。哈瓦那许多有名的餐厅因此关闭。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对卡斯特罗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长——卡斯特罗宣布，单在哈瓦那市就将关闭950家酒吧。他表示，这些在酒吧工作的人每天可以赚50元，而其他那些砍伐甘蔗的人挣得远少于此，这是不公平的。正如格瓦拉一样，他直言反对在工作中采取金钱激励。

古巴试图创造为了社会而工作的人。他解释称，私人企业主与他们正努力试图创造的这种“新人”背道而驰。“我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搭建摊贩的货摊？”卡斯特罗问道，人群欢呼雀跃着。“我们在此发动革命不是要争取开展商品贸易的权利！这样的革命发生在1789年——那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年代，是商人的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最终明白，这是一次社会主义者的革命，这是一次共产主义者的革命……在这里，人们流血牺牲反抗暴政，对抗雇佣军，反击强盗匪帮，目的不是为了争取让某些人卖朗姆酒赚取200比索或是卖煎蛋或煎蛋饼赚取50比索的权利……我们要十分清楚和确定地宣布，我们的目标是要消除所有形式的私人商业活动！”人群高声呼喊，掌声雷动以示支持。

在3月16日的一次宣布关闭国家彩票中心的讲话中，卡斯特罗表示，此类机构只会使得“金钱的魔力”变得永久化，而这正是他试图消除的。他寻求的是一种更为纯洁的共产主义，他并表示希望最终能够完全废除货币。1968年是“新人”这一概念大行其道的一年。格瓦拉曾孜孜以求培养出这种新人，那种为了大众福祉而工作、献身革命事业以及没有自私和贪念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新人有时候会被认为是“像格瓦拉这样的人”。卡斯特罗

在1967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即首次提到了新人这一概念，但随着“革命攻势”行动的展开，1968年成为培养新人的一年。

在关于新的“革命攻势”讲话的中间，卡斯特罗提到了另外一种新的现象。“似乎存在着一条为那些劫机者准备的空中航线。”在卡斯特罗发表讲话的那个星期，美国国家航空公司的28次航班从坦帕港飞往迈阿密。飞机在空中飞行五分钟后，两名古巴流亡分子拿出手枪，强迫机组服务员打开驾驶舱门并喊道：“哈瓦那！哈瓦那！”这是最近发生的第七起劫机飞往古巴的事件，也是那个月的第三起。此次的劫机者是此前乘船偷渡出国但后来又思恋岛国故乡的古巴人，但多数劫机者都是被美国执法部门所通缉的美国人。渐渐地，劫机成了那些被追捕的黑人好战分子的逃生出路。古巴很快就会为那些美国黑人劫机者安排整栋的住所并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收留他们，其中有些人至今还在那里。

1968年，古巴政府对这些突然涌入的不速之客予以同其他多数到访客人一样的热情款待。古巴人给机上所有的乘客拍照留影并护送他们通过机场的商店。和其他游客一样，他们被鼓动着购买绝佳的古巴朗姆酒以及无与伦比的雪茄烟。然后他们会享用一顿大餐，通常有对古巴人来说难得一见的烤牛肉等奢侈食物。飞机加满了油，航空公司则为燃油和允许着陆而付费——美国国家航空公司的28次航班需为此支付昂贵的1千美元账单。数小时之后，航班飞返美国。机场海关则通常会以执行禁运令之名将朗姆酒和雪茄烟没收充公。因为这种让人颇感惬意的遭遇，以致在遇到劫机者时不做出反抗成了飞行员、机组成员以及乘客的一项长期以来的策略。甚至连美国联邦航空局也做出上述建议。

在3月份的讲话中，卡斯特罗警告说他或许不会继续其热情待客之道。他表示，尽管他允许被劫持的飞机返回美国，但被偷运到美国的飞机和船只却从未返回过古巴。

古巴政权在美国的敌人变得愈加强硬。在1968年独立参选总统时，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再次对赫伯特·马修斯采访卡斯特罗一事进行横加挞伐。尽管“猪湾入侵”的失败似乎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古巴人民都支持革命而不站在美国这一边，但这并未让那些更为极端的反卡斯特罗流亡分子销声匿迹，这些来自旧独裁政权的古巴人对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并无特别的兴趣。在“猪湾入侵”失败后的那几年里，他们变得更加的暴力。1968年春，一群古巴流亡分子开始攻击那些与古巴保持关系的国家，事实上包括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曼哈顿的法国旅游办事处、纽瓦克的墨西哥领事馆和洛杉矶的墨西哥旅行社、迈阿密的一艘波兰船只以及新奥尔良的一艘英国船只都成为简单自制炸弹的袭击目标。纽约市防暴小组的一名官员表示：“幸运的是，这种特别疯狂的家伙不算太多。没有比试图阻止他们更棘手的事了。”但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因为一时疏忽，比如留下指纹而失手被擒。12月，美国地区法官威廉·O. 梅尔滕斯对九名古巴人进行了判决——包括判处奥兰多·博施，一名儿科医生和五个孩子的父亲10年监禁。他说道：“这些恐怖主义行动愚蠢至极。我看不出以这种方式来对抗共产主义有任何合理性。”

卡斯特的崇拜者爱他之深，正如其敌人恨他之切。对1968年时美国、西欧以及拉美的新左派青年来说，古巴是世界上最为激动人心的国家。卡斯特罗似乎和他们一样对苏联人持保留态度。当苏联和东欧国家因进行私营企业试验而遭遇经济危机之时，严格遵循毛泽东传统的古巴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托德·吉特林写道：“那显然是一种由学生领导革命的模式，不是由共产党领导——事实上，在很多方面与其格格不入。”全世界的青年人都想亲眼目睹古巴，而古巴人则想向他们展示其社会主义的橱窗。这样一种大胆的实验，它距离美国如此之近，所有的失误，哪怕是牛奶短缺以及死刑处决，都是如此难忘。即便被驱逐出境，金斯堡也

仍然印象深刻。来自美国的激烈对抗总是赋予这个盛产甘蔗的岛国一种英雄气概。

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对古巴以及其他第三世界革命的正式立场是所谓的“批评性支持”。当托德·吉特林1968年初参加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次古巴访问行程时，和在他之前到访古巴的勒鲁瓦·琼斯和艾伦·金斯堡一样，他下定决心不被所见的激动场景所诱惑。他写道：“我知道西方人（林肯·斯蒂芬斯、萧伯纳、赫伯·H.G. 韦尔斯、悉尼·韦布和比阿特丽斯·韦布）前往东方朝圣，结果却上当受骗并表示忏悔之意的所有恐怖而可笑的历史；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因此，他准备了一长串有关公民自由、民主以及异议分子权利等方面的问题，以此来使自己抵抗古巴革命的诸多魅惑人心的东西。

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们的此次行程取道墨西哥城以躲避美国禁止访问古巴的旅行限制。在古巴问题上，墨西哥政府与美国存在着公开的分歧，它拒绝和这个历史渊源密切的西班牙语加勒比邻国断绝关系。然而这些取道墨西哥城的美国青年却不知道，墨西哥总统古斯塔沃·迪亚兹·奥尔达斯对古巴革命有着一种妄想狂般的恐惧心理。他仔细地留意飞往哈瓦那航班上的乘客名单并记录下机上的墨西哥人。当机上有美国人时，他会把名单转交给美国情报部门。

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此次古巴之行期间，为期一周的国际文化大会正好同时举行。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报道了此次大会的活动：“很显然，古巴是举办这样一次大会的理想场所。它不仅是一个处在重重包围之中的英雄国度，虽然卡斯特罗自己表示比越南还差很远，而且它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如果单以它是世界上明显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民热爱和信任其政府的国家而论。”在出席此次大会的名人中有小说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和壁画家戴维·西凯罗斯。有传闻称，在认出西凯罗斯是刺杀托洛茨基的主谋者之一后，一名愤怒的托洛茨基分子



1968年1月哈瓦那“国际文化大会”期间的切·格瓦拉照片
(弗莱德·梅约 摄 / 玛格南图片社)

朝他的胫骨踢了一脚。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一行人被安排住在自由哈瓦那酒店，即在古巴革命之前刚刚竣工的前哈瓦那希尔顿酒店。这家一尘不染、现代时尚的酒店可以说是哈瓦那市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真正的高层建筑。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在那里感觉十分惬意，大快朵颐螃蟹，畅饮河虾鸡尾酒和自由古巴鸡尾酒。他们参观工厂——在美国他们很少如此——和培训项目以及一家农场，农场的工人们在去工作的路上放声歌唱。吉特林试图仍然保持怀疑态度，但他表示：“大多数时候，我看到的是力量，一种令人惊叹的献身精神。普通人看起来既被动员起来了，但精神也很放松。”目睹这样一个民族，一场新生的革命赋予他们活力，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给予他们鼓舞，同时他们有着沉静的心态，美妙的音乐，热情感性，智慧以及触手可及的加勒比文化，这是一种绝无仅有的融合。吉特林、汤姆·海登、其他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领导人以及大卫·德林杰等人在那里探讨古巴革命，间或谈及在即将来临的夏天的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期间该如何行动。

返回美国的吉特林虽对古巴仍然满怀保留态度，但此次的经历却令他印象深刻。他开始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们安排其他的古巴访问行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大学生校园迅速发展起来，到1968年时，该组织已拥有近十万名成员。

马克·拉德是首批参加吉特林所组织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古巴访问团的成员。他们被安排住在里维埃拉饭店，那座靠近海湾的人行桥的不太高的建筑。但因为不愿享用那些奢侈品，他们被安排住进了附近一座废弃公寓的学生宿舍。在这个“英勇的游击队年”里，他们处处都可以看见格瓦拉的画像——在城墙上，在商店里，在家中。有一次乘公交车在乡间旅行，当从一座山谷望下去时，他们看见了格瓦拉的画像，有几英亩大小，用白色的岩石和红色的泥土塑造而成。拉德熟悉格瓦拉的教导：“每个革命者的责任就是发动革命。”他渴望成为一位革命者，一个“像格瓦拉一样的人”。马上他就会回到常青藤校园里。他渴望着回去。

四月里的浑蛋

永远都不要解释你在做什么。这耗费时间不说，而且几乎不会奏效。用你的行动告诉人们，如果他们弄不明白，去他妈的，或许你就该用接下来的行动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阿比·霍夫曼《革命不过儿戏》，1968年

“从马克身上，我感觉到某种狂热的迹象，有他在场使我觉得自己有点无关紧要。”29岁的汤姆·海登这样描述他遇见21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马克·拉德时的情形。

1968年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家伙。”这句熟语出自1968年的好莱坞热门电影《人猿世界》(Planet of the Apes)。在影片中，查尔顿·赫斯顿所饰演的角色对年少叛逆的黑猩猩们不无反讽地提出了上述忠告。在1968年的另一部影片《狂想急先锋》(Wild in the Streets)中，由年轻人掌权的政府将所有35岁以上的人统统拘捕并关押进集中营，同时给他们服食迷幻剂以保持其情绪极度亢奋。这部影片的制作者们都已年过三十，也正是他们坚称，年轻人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二十出头的人从不会流露出此类似是而非的情绪。1968年时，同“黑豹党”的博比·西尔一样，阿比·霍夫曼已年满32岁，其同道杰里·鲁宾正值而立之年，而埃

尔德里奇·克利弗则已33岁。

然而，60年代末期与6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们截然不同。后者甚至更富叛逆精神，不过或许在表达上尚缺乏技巧。在汤姆·海登笔下，拉德是个“挺不错的孩子，来自新泽西郊区，有些不擅言辞。他长着蓝色眼眸和浅黄头发，性格和蔼，平易近人。但很难形容其外形，他显然无暇顾及穿衣打扮之事，也不热衷于徒劳无益的口舌之争。

拉德的风格和做派肯定不同于汤姆·海登或马里奥·萨维奥。后者穿着保守，以能言善辩著称，并且时常参与组织活动中的冗长辩论。海登能以十分清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许相形之下就会发现拉德却是不善言辞。但真正的差别却在于，拉德酷爱阅读并勤于思考，他不像海登那般看重语言的重要性。更为年轻的叛逆者们并不相信什么斯文礼仪。萨维奥，这位或许是60年代最出色的学生演说家，为人熟知的逸事是曾经为避免刮花警车而把鞋子轻轻脱掉后才爬上车顶。但拉德广为人知的举动之一，却是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的住所前脱光鞋子。

6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的学生们经历不尽相同。其中之一即是征兵法令。无论是阿比·霍夫曼、汤姆·海登还是马里奥·萨维奥，他们都不曾受到征兵法令的影响。征兵法令使学生们面临着被卷入战争旋涡的威胁。而这场战争，正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血腥厮杀，命丧黄泉。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残酷而毫无意义的暴戾战争每晚都在电视上播出供人观看。不管这些学生们如何诅咒这场战争，他们却无力加以阻止。如果不满21岁，他们甚至无权投票。然而只要年满18岁，他们却就有可能被征召入伍。

除了上述这些差别之外，可惜的是有一样却未曾改变，那就是大学本身。如果说，近年来美国的大学已被视做是左派思想和运动的庇护所的话，那么这应该归功于60年代后期的毕业生们。在1968年时，大学仍旧是十分封闭保守的机构。曾经狂热支持“二战”并且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冷战的学术界，现在虽然开始有些许迟疑顾忌，但却仍是倾向于支持越南战争。正因

如此，大学校园才将自己视做“陶氏化学公司”招聘管理人员等活动的理想场所，更遑论军方在此招募军官了。但是，大学里也有诸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或是C.赖特·米利斯等知名知识分子，更为典型的则是哈佛大学的亨利·基辛格。“常青藤联盟”高校更是以东北部保守派精英分子聚集的堡垒而著称。哥伦比亚大学延请艾森豪威尔为学校董事会名誉董事。其中的活跃成员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创办人威廉·佩利，年逾七旬的《纽约时报》出版人阿瑟·H.舒兹贝格，其父死后继承其位的阿瑟·O.舒兹贝格，曼哈顿区检察官弗兰克·S.霍根，越战主要军火供货商洛克希德公司负责人威廉·A.M.伯登，1968年时为尼克松效力的共和党筹款人、惠特尼公司的沃尔特·塞耶，电影制片人、林登·约翰逊的幕僚以及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产业受托人劳伦斯·A.魏因。当年晚些时候，学生们即散布文章指称，哥伦比亚大学产业受托人和中央情报局之间不无关联。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常青藤联盟”院校培养出工业界、出版界以及金融界的领袖人物，即所谓的政界后台或战争推手，也就是赖特·米利斯在其书中所称的“权力精英”。

在哥伦比亚大学，系主任设立了“雪利酒时间”。每逢此时，身穿鲜艳运动夹克和灰色羊毛长裤的学生们一边从玻璃高脚杯中啜饮雪利酒，一边讨论校园中所发生之事。大学当局在1968年所力争保留的，正是这样一个日渐消逝的世界。

同早期那批学生相比，新一批学生们所感受到的失望情绪并没有太大差别。汤姆·海登同样对密歇根大学深感失望，因为他发现自己竟与工商业界沦为同道。对同一件事，新生们的感受或许更为深刻。马克·拉德这样形容哥伦比亚大学：“入学之初，我满怀希望，以为自己迈进了高山之巅的常青塔——在那里，潜心学术的学者们在一个亟须救助的世界里探寻真理。与之相反，我所发现的却是一个庞大的公司集团，它从不动产、政府研究项目合同以及学费中牟利；教师们则只关心自己狭窄研究领域内的进展；更严重的是，它无可救药地陷入了社会上种族主义和穷兵黩武情绪的泥淖之中。”那

些声名显赫的高等学府，它们试图以其强势地位挑选出最聪明、最有前途的一代人，但自己本身却最是不堪。

尽管纽约“东村”有许多商业街区，但其仍是颓废派反主流文化的中心所在。居住在东村的有阿比·霍夫曼和艾伦·金斯堡以及埃德·桑德斯。桑德斯组建了一支名为“富格兹”的乐队（富格兹一词则出自诺曼·梅勒在其小说《裸者与死者》中为避讳“fuck”一词而使用的词汇）。霍夫曼经常带着他特制的大麻烟糖出现在东村的聚会上。东村本是东边下段一片荒芜的土地（因垮掉一代的“格林威治村”，即现今的“西村”而闻名），但现在价格异常昂贵。功成名就的鲍勃·迪伦仍住在西村。旧金山的情形也如此类似。弗林盖蒂留在因垮掉一代而异常时髦摩登的北海岸，但嬉皮士们则迁居到相对低廉且偏离市中心的费尔默和海特·阿斯伯瑞区。

东村因嬉皮士的生活做派而声名远播，游览观光车行经此地都会在圣马可坊街——或者像阿比·霍夫曼喜欢称呼的“圣马克思坊街”——的繁忙店铺边停下来，以便让游客们一睹嬉皮士的风采。1968年9月，对此心生反感的东村居民们自发组织起来，乘巴士到皇后区的某个地方，向耕地的农人问长问短，而谁给他们拍照，他们也就照样给谁拍照。

旧金山和纽约是美国1968年嬉皮士文化的两大中心。这一点从摇滚乐制作人比尔·格雷厄姆所建造的两座剧场可见一斑。那就是位于旧金山费尔默区的西费尔默剧场和格雷厄姆于1968年在东村第二大道和第六街之间开设的东费尔默剧场。以前在安德森·易第绪剧场演出的摇滚乐演出就在相邻的东费尔默剧场上演。三年前，管理东费尔默剧场的约翰·莫里斯曾在安德森剧场观看过由梅纳萨·斯库尼科和莫莉·皮肯主演的闭幕演出《犯错的新娘》。莫里斯将其重建后，该剧场演出则以富格兹和乡村音乐以及以灰色反越战讽刺剧《我感觉我快死掉了》而声名大噪的“鱼”乐队等团体为主。于是他们便游说格雷厄姆在街对面开设了东村费尔默剧场。

格雷厄姆不仅是1968年摇滚乐坛决定性人物，他还经常为政治活动举办募款音乐会，其中一场就是声援4月份走上街头罢课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摇滚乐和大学校园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1968年时任大专院校音乐经理人协会执行秘书的范妮·泰勒指出：“现在的大学在美国专业音乐演出市场中的比重已超过70%。”

大学生也占据了唱片销量的很大一部分比例。1967年，美国的唱片销量10年之内翻了两倍，达到前所未有的10亿张。唱片专辑销量也历史上首次超过单曲销量。这一趋势延续至1968年。

提及60年代后期，人们总会想起那些重度放大的音乐，它们充满吸毒者喜欢听的电声颤音、缓慢渐弱音以及其他新花样。其中许多正是甲壳虫领风气之先。回声技术和十二音轨录音带的使用制造出复杂的声音，而且通常只需几个演奏者声音便能十分响亮。田纳西州立大学的研究者让豚鼠在三个月内不时听模拟“迪斯科常客”所喜欢的摇滚音乐，结果发现耳蜗——耳朵中将声波传递到神经信号的那个部分——的细胞有受损迹象。但在1968年时，作为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生们并没有耳朵暴胀的感觉。他们对鲍勃·迪伦在1966年时转向摇滚乐无法轻易释怀，而当其新唱片《约翰·韦斯利·哈丁》出版发行时他们重又欢欣鼓舞。鲍勃·迪伦重新回归了原声木吉他和民歌民谣——但却永远不再是1963年时的纯粹的民谣之声。

1968年，《生活》杂志将新兴的摇滚音乐称做“在即时通讯时代所产生的第一代音乐”。1967年6月，甲壳虫乐队举办了首场通过卫星转播的现场国际音乐会。

《生活》杂志称1968年的摇滚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聚宝盆”。1968年是一个民谣的年代，这些歌曲有着精心创作的歌词和清新明朗的旋律。时年27岁的反战活动分子和艺人琼·贝兹仍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演唱着鲍勃·迪伦、滚石、甲壳虫、具有诗意气质的莱昂纳德·科恩以及同时代的民歌抗议歌手菲尔·奥克斯等人歌曲的民谣版本。古巴人模仿其民谣风格，这

种轻柔抒情的抗议民谣就从那里开始传遍整个西班牙语世界。就连巴斯克人也开始用他们被禁止使用的古老语言演唱贝兹风格的民谣。在60年代初期，西蒙与加丰克尔曾一度因其风格更接近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牧歌而非摇滚乐而饱受争议。随着其新专辑《书挡》(Bookends)于1968年4月发行，他们的受欢迎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专辑中收录有《美利坚》这类以探寻美国精神为主题的歌曲，有歌迷将其视做两人最好的作品。克罗斯比、斯蒂尔斯以及纳什和尼尔·扬等人带以乡村音乐形式演唱民谣歌曲，就像“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CCR)那样，虽然后者所使用的乐器经过了电声仪器的高度放大。1968年时，约尼·米切尔，这位有着金黄色长发和水晶般清澈嗓音的24岁加拿大歌手以其民谣歌曲在美国一举成名。杰里·杰夫·沃克吟唱着街头艺人博詹格的辛酸故事。“谁人”(The Who)乐队的吉他手兼歌曲作者皮特·汤森则抱怨音乐变得太一本正经。既然流行音乐前所未有地将目标听众定位在青年身上，那么它就应该更加具有娱乐性。“在当今的音乐中完全听不到年轻人的声音。”汤森说道。

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凸显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变化。在组建爵士四重奏乐队16年后，戴夫·布鲁贝克解散了乐队并开始创作古典音乐。三名英国音乐家——埃里克·克拉普顿、杰克·布鲁斯以及然热·巴克——偏离了蓝调和爵士乐而转向摇滚音乐，他们自称“奶油”(Cream)乐队。纽约爱乐乐团指挥列奥纳多·伯恩斯坦对该乐队钦佩不已，50岁的他在1968年演出季结束后即放弃了全职指挥工作。伯恩斯坦特别欣赏然热·巴克，称“我的意思是，他们拥有一个能真正把握拍子的鼓手”。

新唱片专辑的封面变得越来越精美，许多都有双层封套，照片以旋转跳跃的造型展示奇装异服和各种姿态。事实上，这种专辑封面是为那些吸食大麻或“服用迷幻药”的年轻人所设计，好让他们花上几乎数小时的时间去仔细琢磨。在毒品的作用下，一切似乎都变成了有着深刻隐藏含义的双关语。一部十分直截了当的电影，比如1967年讲述在价值浅薄的世界中一名对未

来十分迷惘的年轻人故事的《毕业生》，似乎蕴涵着远为深刻的含义。甲壳虫的歌曲就如同丁尼生的诗歌一样被拿来仔细研究。谁是埃莉诺·里格比？由马尔科·费雷里执导、马尔切洛·马斯特罗扬尼主演的意大利影片《带着气球的人》，故事讲述一名幻想破灭的男子，手里带着一束气球。他决定要找出气球破裂的临界点，但结果发现每个气球的破裂点都不相同。电影到此戛然而止。你看明白了吗？这部电影的全部含义是什么？正是坚信任何事情都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含义，1968年的低成本恐怖电影《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才取得了出人预料的成功。该片并不是一部自30年代以来即已反复拍摄过的廉价僵尸恐怖电影，而是对美国社会辛辣有力的讽刺。

在1968年时和一个名为“大哥和控股公司”（Big Brother & the Holding Company）的加州乐队一起声名大噪的歌手贾尼斯·乔普林表示，她并非嬉皮士，因为嬉皮士相信能够努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相反，她称自己为“垮掉的一代”，“垮掉派认为事情不会变得更好，他们会说，‘见鬼去吧，’让我们吸毒狂欢，享受生活。”

然而，为了努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嬉皮士却终日沉溺于吸毒享乐。吸食大麻对1968年时的美国大学生来说可能比今天抽烟更加习以为常。人们曾经一度认为，而且许多人现在依然这样觉得，政府的禁毒执法部门是一种镇压工具，而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将会使毒品合法化。

美国人似乎被分成了两类：那些按照新方式生活的人以及那些极力试图理解这种生活方式的人。《长发》（*Hair*），这部“美国风格的摇滚音乐剧”取得意外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尽管该剧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但它却声称能让观众一窥嬉皮士的生活。这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固有的看法，即嬉皮士们几乎什么事情都不做，而且他们狂热的举动让人难以理解——当然是由于毒品的作用。报纸和杂志通常刊登曝光校园生活的报道。为什么阿比·霍夫曼的集体婚礼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因为新闻媒体以及社会上其他有

关当局试图要了解“年轻一代”。这是当年的“重大年度新闻事件”之一，并且和那场他们拒绝效命的战争相提并论。杂志和报纸定期刊登有关“新生代”的文章。其中的大多数都流露出一种无奈之感，因为记者们搞不清楚这些人到底站在谁那边。对社会当局来说，他们似乎对一切都持反对态度。1968年4月27日，《巴黎竞赛》杂志的一篇社论指出：“他们谴责苏联社会就如同资产阶级社会一样：那里的工业组织和社会纪律，对物质财富和浴室的追求，甚至工作本身。换句话说，他们反对西方社会。”

1968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叫《代沟》的书。该书的作者是一位叔叔和他蓄着长发、吸食大麻的侄子，目的在于相互了解对方。做侄子的介绍叔叔吸食大麻，那位不知就里的叔叔则将其称做“一片茶叶”。但等他吸食之后，他表示，“它让我的意识得到了扩展。千真万确！现在我明白里奇的歌是什么意思了。我听音乐，听到了前所未有的东西。”

罗纳德·里根将嬉皮士定义为“打扮得像人猿泰山，头发长得像女孩，身上臭烘烘像野兽”一样的人。里根的分析毫无理论深度并未让人感到吃惊，但大多数的分析也并不比这好多少。自50年代以来，社会并没有多大进步。在那个时候，整个所谓的“垮掉的一代”——由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所创造的词汇——都被人们贬称为一个名叫梅纳德·克雷布斯的人物。他很少洗澡，而每当有人建议他找份正经工作时，他都会用一种恐怖的声调嘶哑着嗓子喊道，“工作？！”诺曼·波德霍雷茨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上撰写了一篇名为《一无所知的波希米亚派》的关于“垮掉一代”的文章。对物质主义的抗拒和对公司文化的反感被斥为不愿意工作。人们总是用不讲究卫生来指责他们的不同穿着打扮方式，但事实上不管是垮掉派还是嬉皮士都并非特别的肮脏。不错，偶有像马克·拉德会这样以不修边幅而为人所知的，但其他许多人都很干净整洁，甚至过分讲究——不厌其烦地以美发产品打理他们的新式顺滑头发，并且穿上绣花镶边的喇叭裤来扮美。

公众对头发的长短问题有着一种固定的看法，这也是那部1968年百老

汇音乐剧得名的原因。1968年，全美两千个广告牌上都张贴着一张海报，上面是一个头发蓬乱的18岁青年的照片，并配有文字：“美化美国，敬请理发。”纽约“喷气机”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乔·纳马斯留着中长头发，有时候还蓄着胡子，其勇气和坚毅对在60年代末期将橄榄球提升为美国的全国性运动居功至伟。在体育场时，球迷们经常会向他打出上面写有“乔，请理发！”字样的横幅。1968年3月，当罗伯特·肯尼迪正在为是否决定参选总统而反复考虑时，他收到来信称，如果想成为总统，他应该修剪一下头发。这些来函中也有些包含敌意语气。“没有人想要一位嬉皮士做总统。”一封信中写道。事实上，当肯尼迪宣布参选时，他的确去剪了头发。



“Son, why don't you bring some of the New Left home for Cokes and cookies?”

1968年3月号《花花公子》

(经《花花公子》杂志社特别授权重印。版权为《花花公子》所有)

到1968年时，各类商业利益集团都意识到，“代沟”是一个可以出售牟利的概念。美国广播公司推出了新电视剧集《卧底侦缉队》(*The Mod Squad*)，似乎没有意识到“卧底”早已是一个过时的英国英语词汇。该剧集讲述了三名年轻警察的故事——其中一人看起来很像民歌演唱团体“彼得、保罗和玛丽”(Peter, Paul & Mary)中年轻时的玛丽，有一个像仪容整洁的鲍勃·迪伦，还有一个则像长相可爱的“黑豹党”——所有那些挑衅、暴力以及喧嚣的反正统文化突然之间变得全无恶意。美国广播公司的广告称，似乎人们事实上也都这么说：“警察弄不懂现在的年轻一代，年轻一代也不喜欢警察。解决的办法就是——找一些喜欢颓废生活方式且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让他们为警方工作。”美国广播公司的广告进一步解释道：“当今电视节目的主题就是要思考年轻人……随着整整一代年轻成人观众的出现，美国广播公司将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

1968年时，每个人都对代沟有着看法和意见。当年4月12日，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这个词，马上人们就对它耳熟能详。安德烈·马尔罗年轻时以狂热的叛逆者形象著称，但在1968年时他却成为戴高乐右翼政府的成员。马尔罗否认不同世代之间存在代沟，并坚持认为问题不过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正常反抗行为。“相信存在这种矛盾冲突是十分愚蠢的。”他表示。“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的文明，这种机器文明，它能教会人任何事情，但除了如何做人之外。”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在1968年时表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迫切的需要之一”就是消弭他所谓的“胆大敢为的年轻人”和“老练世故”的成年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有人解释称，今天的年轻人不过是处在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过渡期。人们普遍认为，新一代的青年，那些嬉皮士，他们不愿意工作。此外，人们也认为他们根本不必非工作不可。南加州大学研究理事会的一份研究称，到1985年时大多数的美国人将只需工作半年便可维持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

研究也警告称，对于新世代人们所拥有的休闲时间来说，现有的娱乐设施显得严重落后。上述结论是基于个人所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一事实。如果产品和服务的总值按总人口，包括那些无收入来源的人进行分配，那么1985年的数字将是1968年的两倍。60年代的人们普遍都相信，美国的科技将会创造出更多的休闲时间。仅有为数不多的人对此持相反看法，赫伯特·马尔库塞即是其中之一。

1968年1月，深受哥大激进学生尊敬的《纽约时报》年轻记者约翰·基夫纳在阿姆赫斯特撰写了一篇有关大麻和学生的文章。文中透露出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阿姆赫斯特镇销售大量的Zig-Zag手卷烟烟纸，但却没卖出一包香烟。该文让读者初次认识到“消遣性药物”（recreation drugs）这一概念。这些学生服用禁药不是为了遗忘烦劳，而是为了寻欢作乐。“通过对这些学生的采访表明，虽然许多服用禁药者似乎都问题缠身，但许多人并非如此。”文章指出，媒体报道鼓励了这种服用禁药的生活方式。文章并援引富裕的威彻斯特郊区的一位高中校长表示，“毫无疑问，这类事情从今年夏天开始就有所增加。《君子》（*Esquire*）、《展望》和《生活》上刊载有与东村有关的文章，这给孩子们提供了榜样。”

虽然这些文章描述了“大学大麻派对”，但更为典型的聚会情形是：学生们躺在一起吸食大麻，阅读这类文章。他们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以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东村，雨天时消磨时光的流行做法是，吸完大麻产生幻觉后去圣马可剧院。在那里，有时候用一美元就可以看三部影片，其中包括一部讲述大麻危害性的陈年纪录片《疯狂大麻》（*Reefer Madness*）。

在美国，大麻属于一种20世纪的毒品。甚至直到1937年，法律才对其加以禁止。LSD，即迷幻剂，是由一位名叫阿尔伯特·霍夫曼的博士于30年代时在瑞士的一家实验室偶然发现的。当时，沾在他手指上的一小撮化学合成成品让他感到“一种对世界不同的意识感觉”。战后，霍夫曼的实验室在美国出售小剂量的这种化学品。以其非凡的内心反省型音乐而享有盛誉的萨

克斯演奏家约翰·柯川、爵士小号手迪兹·吉莱斯皮以及钢琴家塞隆尼斯·蒙克都尝试过这种新的毒品，不过比起中央情报局来却不算多。这种物质很难发现，因为它无臭、无味也无色。在偷偷给敌人服用迷幻剂后，他就可能泄露机密或是变得思维混乱并屈服投降。秘密向冷饮水箱注入迷幻剂的想法即由此而来。计划拟注入迷幻剂的对象即包括埃及的卡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以及古巴的卡斯特罗，这样他们就会胡言乱语，失去支持者。但如果艾伦·金斯堡以及其他知道卡斯特罗也服用迷幻剂的话，他在年轻人中的受欢迎程度可能会得到极大放大。

特工人员们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结果有一人冲到室外，声称街上的汽车都是“嗜血的怪物”。他们也和军方合作，在对此一无所知的受害者身上进行试验，其中包括囚犯和妓女。这些试验造成了许多人自杀和精神失常，中情局由此确认，想要在迷幻剂药力作用下的人进行有效审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迷幻剂试验得到了理查德·赫尔姆斯的支持，他其后在1967至1973年间担任中情局局长。

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蒂莫西·利里和理查德·艾尔帕通过自己服用或向他人分发来研究迷幻剂。他们在60年代初期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尊重——直到父母们开始抱怨他们年轻有为的哈佛学子竟吹嘘什么“发现了上帝以及宇宙的秘密”。两人于1963年离开哈佛，但仍继续在纽约的米尔布鲁克进行试验。1966年，美国国会法案宣布迷幻剂为违禁物质，利里也因被捕而声名远扬。艾尔帕皈依了印度教并改名为巴巴·朗姆·达斯。1967年，艾伦·金斯堡鼓动每个14岁以上的人都至少尝试一次迷幻剂。汤姆·沃尔夫于1968年出版的畅销书《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对迷幻剂大加赞美并使其流传开来。

这是一种无法预知后果的毒品。有些人觉得是一种愉悦的体验，有些人则会循环产生噩梦般的狂躁和抑郁症状或是被称做“恐怖旅行(bad trip)”的偏执症。那些自诩为负责任的毒品滥用者的学生们坚持，体验这种迷幻之

旅必须在当时未服用毒品但此前尝试过的朋友的监督之下。对包括阿比·霍夫曼在内的很多人来说，那些吸食过迷幻剂的人之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兄弟情谊，那些没有吸食过的则是圈外人。

新闻媒体上开始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1968年1月，数家报纸报道称六名青年大学生因为在迷幻剂的作用下凝视太阳而完全地永久性失明。宾夕法尼亚州社会福利部视障人士服务办公室主任诺曼·M. 约德指出，那些年轻人的视网膜已遭到破坏。这是首起完全失明的病例，但在此前5月的一起病例中，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四名学生据称由于在吸食迷幻剂后凝视太阳而导致丧失阅读视力。但许多有关迷幻剂造成损害的故事被证明是虚构伪造的。美国陆军化工兵团的实验并无法证明迷幻剂会对染色体造成损害这一广泛流传的说法。

迷幻剂对流行音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甲壳虫乐队于1967年发行的《帕伯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专辑（*Sergean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在乐曲、歌词以及唱片封面设计等方面都反映出甲壳虫对毒品的体验经历。有些歌曲就是描写在迷幻剂作用下所体验的那种迷幻感觉。其早期的歌曲《黄色潜水艇》也是描述此种体验，这首歌成为1968年同名电影的蓝本。据说，约翰·列侬首次在潜水艇中的幻想之旅是食用了一颗加入迷幻剂的方糖。对听众来说，帕伯军士与毒品有关，是首批迷幻剂专辑——一个迷幻音乐和迷幻专辑设计时代的来临。或许是由于人们在聆听这张专辑时吸食毒品的缘故，《帕伯军士》据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多年以后，阿比·霍夫曼表示这张专辑表达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他将其称做“贝多芬来到了超级市场”。但在当时，极端保守的“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声称，这张专辑显示出一种娴熟老练的洗脑技巧。这证明甲壳虫乐队和某些国际共产主义阴谋不无关联。英国广播公司禁止播出《生命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因为歌词中有一句“我很想把你的兴趣转移到（毒品或性上）”。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发起运动禁止《朋友们的一臂之

力》(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这首歌,因为这“四绝”唱道,这就是他们如何“获得快感”的方式。

甲壳虫乐队并没有发明“迷幻摇滚”(Acid Rock)——迷幻剂和摇滚音乐的融合,但因为其在乐坛的地位,他们开启了迷幻音乐的潮流闸门。旧金山的乐队团体制作迷幻音乐已有数年,但直到1968年他们之中仅有“杰斐逊飞机”(The Jefferson Airplane)以及“感恩而死”(The Grateful Dead)等几支乐队享有国际知名度,而诸如“每日幻觉”(Daily Flash)以及“天堂般的歇斯底里”(Celestial Hysteria)等许多其他乐队仍只在旧金山地区演出。

最近的校园主题音乐不仅与政治和毒品有关,也和性有关。如同政治示威,摇滚音乐会也通常是性交的前奏。在这一问题上,某些歌手的思想比一般人更为开放。吉姆·莫里森,“门”(The Doors)乐队的这位有着天鹅绒般柔软声音、身穿紧身皮裤的摇滚歌手,即自诩为“情色政治家”。在1969年迈阿密举办的一场演唱会上,莫里森鼓动台下的听众脱下衣服,然后高声说道:“你们想看我的下体,是不是啊?这就是你们来听演唱会的原因,对吧。”声音尖利的民谣歌手贾尼斯·乔普林曾说过:“我的音乐不是想让你捣乱,它是要让你做爱。”

许多有关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文章都或明或暗不同程度地让人觉得,这些年轻人未免有些纵欲过度。性现在被称做“自由的爱”。因为有了避孕药丸,性似乎就再无后顾之忧了。当然也并不是什么麻烦也没有。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二年级时,马克·拉德就因为被一名哥大附属巴纳德学院的女生传染了淋病而接受青霉素治疗。原来该女生是从其已婚的哲学导师那传染此病后再传染给他。事实上,40年代发明的青霉素是促发性解放的第一种药丸。其后,1957年研制出口服避孕药并于1960年获得“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据大学医师发现,口服避孕药很快即取代了其他避孕方法。至1968年时,大学校园里它已经是十分常见的东西了。

“做爱，不要发动战争”这句流行的口号表明，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学生们集会抗议发动战争，成千上万的人一道携手并肩抵抗过棍棒和催泪瓦斯，他们通常在散去后做爱。寻欢作乐的不单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其他一些学生组织经常召开会议，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当随后的事情发生而他们不知如何应对时，就顺其自然。但在会议间歇当中，性事尤为泛滥。正如一名来自底特律的学生告诉《生活》周刊：“我们不仅吃住在一起，我们也一起抗议战争。”

埃德·桑德斯，这位演唱过很多灰色歌曲的“富格兹”乐队歌手把60年代中期称做“做爱的黄金时期”。1970年，桑德斯创作了一部以1968年为背景且毫无故事情节的“雅痞小说”《上帝的碎片》，其主题与之十分相近。在这场运动中，许多人喜结连理，也有不少人劳燕分飞。汤姆·海登和凯茜·海登，马里奥·萨维奥和“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活动分子苏珊·古德伯格以及玛丽·金和一位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员的婚姻就是在这场过眼云烟版的运动中所缔结的众多姻缘中的几例。

对性的态度造成了更深的代沟，就如同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当桑德斯在东村享受他的“黄金时代”以及哥大的鲁迪因青霉素逃过一劫而庆幸不已时，市政委员会委员、民主党人约翰·J. 圣图奇却在1968年成功地迫使城市交通局将电影《毕业生》的海报从地铁车厢摘除。因为海报上，安妮·班克罗夫特和达斯汀·霍夫曼同床共枕。

性道德的改变不仅限于美国。1968年墨西哥学生运动中的年轻女生们“童真导致癌症”的字样震惊了墨西哥社会。1968年巴黎抗议运动肇始于学生们男女生同校同宿的要求。据法国人传说，当戴高乐总统得知南泰尔大学的学生要求男女生同宿时，他满脸疑惑地问身边的随从：“为什么他们就不在咖啡馆见面呢？”

在美国，只有诸如欧柏林学院等为数不多的观念超前的学校有男女混合宿舍。许多大学给予男生比女生更多的自由空间。“常青藤联盟”中单独的

女校，有着完全不同的校规。毋庸置疑，哥大的男生拥有比伯纳德女子学院的女生更多的特权。在大学头两年，她们只允许住在学校的女生宿舍。本来无人问津的男女同校住宿安排，却激起全国性的争议，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然而，当一名《纽约时报》记者决定就大学女生的生活进行报道时——那不过是上千篇有关“新生活”文章中的一篇而已，它却引起了美国社会持续数周的争论。一名要求匿名的大二学生向该记者吹嘘，她是如何瞒骗伯纳德校方，以便能够和她的男友住在校外。

虽然记者并未透露该女生的姓名，但为挽救该校的名声，伯纳德校方却追寻蛛丝马迹，最终找出了那名叫做琳达·勒克莱尔的学生并将其开除。学生们群起抗议校方的处理方式，许多学生抗议称，这只可能发生在女生身上。但奇怪的是，琳达·勒克莱尔的抗争事件——男女生同宿还是不同宿——不仅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位置长达数周，《时代》、《新闻周刊》、《生活》以及其他一些全国性报章杂志均进行了报道。《纽约时报》逐日对该事件进行了追踪——伯纳德校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数百人到场、该女生如何为个人权利进行辩护以及最后当她得知被禁止出入学校自助餐厅但未被开除的最终判定时，她脸上洋溢着的高兴之情。

《纽约时报》的报道也提及许多学生质疑“幸灾乐祸地摇头”的说法。对外界报道而言，这似乎是预示着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重大事件。如同今天我们的大多数人一样，1968年代的学生们似乎很难相信，如此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竟能成为新闻事件。

两天以后，《纽约时报》再次发表了一篇与勒克莱尔父母有关的文章，名为《父亲对伯纳德学院的女儿深感失望》。在新罕布什尔州哈德逊市的保罗·勒克莱尔说道：“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对这件事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个人的行为是一回事，但如果她开始影响到其他许多人，那就是错误的。”

伯纳德学院玛莎·彼得森院长对校务委员会小施惩戒的举动并不满意，她坚持不顾裁决而开除勒克莱尔。于是学生们发动静坐，包围了彼得森的办

公室。伯纳德学院 1800 名学生中有 850 人签署了请愿书，抗议开除的决定。支援或声讨该名大二女生的信件如潮水般涌入院长办公室。从争取民权的象征到美国式家庭衰落的征兆，种种议论不一而足。

玛莎·彼得森说：“我们也很遗憾地发现，公众对发生在大学校园的性事所表现出的好奇是难以满足的。”然而那还绝非简单的捕风捉影。媒体反映出普遍的观感，认为“新一代”有其“新道德”。无论如何，年轻人所做的事情简直可以说反映出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已然面目全非，渐行渐远。埃德·桑德斯满怀自信地写道：“从现在起，40 年后，异皮士和那些曾参与 1967—1968 年和平请愿运动的人，将会得到世人的认可。他们是最近一百五十年来美国文明史中最为重要的文化政治力量。”不管是在惶恐失措的时候，还是在欢愉兴奋的时刻，人们相信人类社会的根本特性正在发生改变。《生活》杂志撰文称：“若干世纪后的性学人类学者在研究避孕药丸、汽车电影院、哈罗德·罗宾斯的作品、双层胸罩以及其他与美国性革命有关的产品时，或许会将琳达·勒克莱尔和其男友皮特·贝尔的案子视做一个时代的道德观改变的开始。”当顺化正遭包围、舰队开进溪山、比夫拉战争 (the Biafran war) 更趋惨烈、中东更趋动荡不安、参议院正在调查引发 1964 年 8 月“越南战争”的“东京湾事件”正当性、鲁迪·杜奇克和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走上柏林街头、捷克和波兰公然反抗苏联的时候，伯纳德学院的一名女生搬到对面街上到其男友宿舍同住的决定却占据了美国报纸头版新闻的位置。

在这场风波之中，似乎从未有人顾虑过琳达·勒克莱尔的男友皮特·贝尔的感受。琳达退学后，他们俩加入了一个社区。贝尔倒是拿到了哥大文凭，后来成为了一名按摩治疗师。伯纳德学院放松了校规管制，规定在校外居住只需征得家长同意即可。但在 1968 年秋，伯纳德学院的女生甚至连这一点也表示反对。

马克·拉德生长于一个富裕之家，他家在新泽西郊区，靠近贫穷的纽瓦克区。马克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希望能明白他父母的所作所为。为什么纳粹上台之初，他们没有进一步努力加以阻止？如果他们尽力的话，肯定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尽管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他，但他读高中时却并不热衷于政治活动。后来，由于父亲开始在房地产市场上取得成功，他和父母便迁往了富人区梅普尔伍德居住。马克的父亲是预备役陆军中校，他将自己有犹太语发音的姓氏进行了英式化以回避军中的反犹主义情绪。

和许多同年人一样，马克·拉德涉足激进政治的入门导师是《呐喊》杂志，一本以民间音乐以及抗议主题歌曲为主的期刊。从这本杂志里，马克接触到了利德贝利、伍迪·格斯里以及皮特·西格等人的音乐。他热爱学习，所读的很多书都是来自他那个对政治敏感的女朋友，学校里的知识分子型人物。她甚至还认识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继子、后来成为拉德大学室友的迈克尔·诺伊曼，其兄汤姆系兴趣团体“东村浑蛋”的成员之一。

拉德从来都不运动。多年以来，他喜欢说性是他的运动——读书以及和女朋友做爱。他的女友随后去了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拉德想进的是芝加哥大学。芝大因废除了体育科目而别出一格。为了能离女朋友近一点，最后他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但正如通常会发生的那样，一旦上了大学，彼此都会另外心有所属。

除了常青藤名校的保守作风之外，哥大对拉德来说不失为适宜之选。在这所产生了“代沟”一词的院校，拉德和学院管理层显得格格不入，但和学生们却是志同道合。和拉德一样，哥大的大部分学生都不擅长运动。据说，哥大保持了连续20年不曾赢得橄榄球赛的记录。中场休息时，乐队演奏出独具风格的旋律，其中一首名为《光圈颂》。学校几乎没什么联谊会。1968年夏，拉德和朋友们在第114街租了一间联谊会活动间，并将其更名为“西格玛—德尔塔—西格玛”（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1965年，当拉德刚上大学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已开始放弃在市

中心动员的失败尝试，他们意识到大学校园才是招募新血的最佳场所。早在拉德上大学一年级时，一天夜晚，一个名叫戴维·吉尔伯特的人敲响了他的房门对他说道：“我们正在开会商议事情，或许你会感兴趣参加。”

事情就是如此。“那是一个聚会。”拉德回忆道。“大家在一起玩乐。寻欢作乐是主要目的。有毒品可以吸，也有女人可以玩。所做的就是这些事了。那个时候，没人会想着去华尔街。”

拉德在哥大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他成为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校园激进分子：经常参与会议和讨论，亲自登门游说和策划抗议示威活动。每次抗议示威之前，总会举行耗时持久的会议。“我喜欢谈论革命——改变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会议上讨论的是重要事项，接下来就会是行动。在那五年的时间里，我参加了不下上千场会议，那和我学校的课程完全不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人见多识广，他们对越南战争、反殖民主义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都所知甚多。”

但对拉德来说，重要的是这些言论通常会转化为实际行动。“对于那些善于读书、思考、辩论并付诸行动的人，我向来都是十分推崇的。那才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拉德最近如是说。因为总是对行动表现得迫不及待，他成为那群激进者中的知名人物。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于是开始将哥大的拉德小组称做“行动派”。从古巴回来后，拉德总爱说切·格瓦拉引用过的何塞·马蒂的一句话：“现在该到生起火炉的时候了，我们看见的只有光。”

那年3月拉德从古巴回来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被革命的激情点燃了”。他在房间的几乎每一寸地方都贴满了格瓦拉的海报和照片——抽烟时的格瓦拉，微笑时的格瓦拉，抽烟时微笑的格瓦拉，沉思时的格瓦拉。在那年早春时候，拉德到牙医诊所看病时，对疼痛满心恐惧的他不由地自问道：“如果是格瓦拉，他会怎么做？”

尽管哥大“行动派”的打扮有时候比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看起

来更为“雅痞”，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十分正经严肃。或许，和大多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样，这群活跃分子一半已步入成年，一半却还是少不更事。在一次会议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投票决定选出一人去当面质问准备到哥大校园演讲的纽约市征兵登记处负责人——臭名昭著的阿克斯特上校。拉德对此想法并不赞同。和征兵登记部门言语交锋显然抬高了其身价，拉德一想到这就无比痛恨。“这帮垃圾”，他心里充满愤恨，决心发动另外一场行动。

那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新近吸收的新血与拉德的“行动派”十分合拍。“东村浑蛋”加入了迅速发展壮大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拉德的计划中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找到一个既能接近阿克斯特上校，又不会被认出来的人。因为在1968年早春之时，拉德和其同道就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人物。机缘巧合，一位自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激进分子的人进入了拉德的视线。在他印象里，他就像一位朋友向他抱怨一个惹人厌烦的不速之客在夸夸其谈，有关革命、暴力和伯克利分校作为当前革命中心的重要性所在。拉德接受了此人的帮助。

阿克斯特上校将在哥大校园的宗教中心伯爵厅发表演讲。“头戴军帽，红光满面，不可一世”。拉德如此形容这位上校。突然间，只听见从大厅后面传来军鼓和横笛奏出的《扬基歌》。当观众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将自己打扮成长发的横笛鼓乐队模样的“东村浑蛋”（他们自称“纽约人”）时，那位不知名的伯克利革命分子冲上台去，不偏不倚地将一个椰子奶油派砸到了阿克斯特上校红光满面的脸上。扔完之后，那人便和拉德沿着百老汇大街逃离现场。令拉德颇为惊奇的是，那人逃跑时也不失舞台戏剧风格，竟还用一条大手帕蒙住脸以作掩饰。拉德思前想后别无良策，便只得将其藏在自己女友宿舍的储藏间里。

哥大校长格雷森·柯克生于1903年，其住所系一座位于“晨边高地”

(Morningside Heights) 社区的常青藤名校豪宅。晨边高地位于曼哈顿北部，哥大校园正坐落于此。柯克出身名门贵族，总将自己视做是历史传统的捍卫者。拉德称他为“统治阶层的自由主义者，一个倾向进步的人，但其本能却总将他推向权力精英一边。他谴责越南战争，并非认为它不道德或是个错误，而仅仅是觉得无法取胜”。那年4月初，坐在晨边高地住所内的柯克对山下处于热火沸腾之中的哈莱姆区感到了明显的害怕。他确实曾试图去安抚那些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仍称做“黑鬼”的人。

从住处的窗户望去，柯克可以看到混乱的人群和熊熊的火光。马丁·路德·金已遭暗杀，哈莱姆区处于燃烧的怒火之中。作为哈莱姆区对面山上这所大学的校长，这正是他所担心害怕的。

马克·拉德同样看到了怒火，但其反应却截然相反。其时，非暴力运动，或者正如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所称的“非暴力的狗屎”，已经过去了。当他站在晨边高地通道上目睹滚滚浓烟之时，拉德期待着一个“黑人力量”年代的重新到来。他当时和一位名叫JJ的朋友在一起。JJ相信世界革命，即通过一场全球范围的声势浩大的运动来使贫困国家推翻帝国列强，同样也包括消除美国社会的白人特权。当革命到来，推翻权力中心之后，每个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将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JJ和拉德都有一头浓浓的金色长发。他们整夜在哈莱姆区到处游逛，目睹人们四处纵火、抢劫、攻击警察并设立路障阻止消防车进入。尽管看似有些不尽常理，但只要不介入其中，作为旁观者还是大可避开这场种族骚乱。“我能看见那些黑人内心的愤怒。”拉德后来回忆道。他和JJ都坚信，他们正在见证一场革命的开始。

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五天后，哥大决定举行悼念仪式。尽管在短暂一生中遭遇过种种监视、侮辱、诽谤和诋毁，马丁·路德·金死后却被当做圣人一样被人歌颂。这些人中，许多也是曾经阻挠过他的事业的人。哥伦比亚大学也是如此。哥大肆无忌惮地向哈莱姆区推进，占据公园和低价房屋从而为富裕的学校当局建造更多设施。1968年的一份关于哈莱姆区的调查表

明，过去七年中，哥大已迫使 7500 户哈莱姆区居民搬离家园，而且该校还正计划再拆迁 1000 户。哥大和纽约市政当局之间的关系早在 1959 年便已暴露无余。那年，哥大拟租用晨边公园两英亩多地皮以建造体育馆。不料协商却遭到几名哈莱姆区负责人的反对。将公用土地租做私人用途在纽约市相关政策是绝无仅有的，而租金每年也仅有 3000 美金。当 1968 年 2 月工程破土动工时，六名哈莱姆区的学生和六名哈莱姆区居民发动静坐示威，试图阻止推土机开动。建造一座新的体育馆却要推倒居民的房屋，而体育馆建成后哈莱姆区居民也无权进入。这引起了人们极大的争议。学生的抗议活动使得哥大最终同意在体育馆靠近哈莱姆区一侧修建一道小门以便当地居民使用。当然那是学生们关心的问题。哈莱姆区的居民根本就不想要什么体育馆。他们要的是房子。哥大当局也试图阻止黑人和波多黎各裔工人之间联合起来。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暗杀，他曾经在那里支持哥大当局试图阻止的联合，也将在那里被歌颂。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学生召开了会议，决定必须以行动来阻止这种卡夫卡式的荒谬时刻。有人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转折点——是时候该介入其中，宣布非暴力的死亡，“黑人力量”时代的到来以及真正革命的开始。但也有人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意味着向白人当局抛弃了马丁·路德·金的形象。“别那么干，”有学生坚持，“他是我们中的一员。”

用汤姆·海登的话说，事实是“马克·拉德这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青年领袖不过是走上舞台，拿过话筒，谴责哥大校方的虚伪行径，指他们一面纪念马丁·路德·金，一面却对哈莱姆区毫无敬意”。拉德却不记得自己是海登和其他人所说的那副冷漠模样。事实上，当他试图站到副校长大卫·杜鲁门面前时，他的双腿在长筒靴内不停地颤抖。他通过话筒说道：“杜鲁门博士和柯克校长正在对金博士的记忆进行道德凌辱。”话筒顿时没了声音。但拉德却并未停下来，继续谴责哥大如何“从哈莱姆区居民那里掠夺土地”，赞扬金博士的非暴力不合作，但却否定了在哥大校园举行类似示威活

动的可能性。

那年春天，是哥伦比亚大学最值得人记忆的，而这只是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的许多运动之所以形成声势，正是因为政府或学校当局采取镇压措施来加以阻止。相反，如果当局听之任之的话——波兰政府没有禁止《先人祭》的演出并镇压抗议群众；德国政府放任主要是抗议美国政府政策而非德国政府政策的示威者——那么，今天人们或许多半都已把它们忘记了。正如同在争取民权运动中一样，在1968年，人们很容易发现，往往由于当政者的蹩脚无能才导致抗议运动此起彼伏。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可以说是因为格雷森·柯克和哥大当局。1968年4月，哥大无故禁止了室内示威活动，这也是为何拉德会带领150名学生进入洛氏图书馆（Low Library），发起反对成立“国防事务分析所”（IDA）的请愿活动。学生们要求校方澄清哥大是否参与了这所军事策略研究机构。哥大拒绝对是否参与其中表示确认或予以否认。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于是声称，不仅哥大是该机构的成员，格雷森·柯克以及其他哥大校董会成员均是其董事会成员。哥大随即采取行动，对包括拉德在内的六名学生给予纪律处分。现在，1968年4月23日示威活动的焦点不仅集中在体育馆事件，所谓的“国防事务分析所六英雄”事件也被纳入其中。似乎是要火上浇油，校方在示威前一天将六人予以留校察看处分。现在，示威活动不只是为反对修建体育馆和成立国防事务分析所，“释放国防事务分析所六英雄”也是活动目的所在。

也在那一天，拉德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以此回应柯克有关青年中虚无主义盛行以及代沟问题的讲话。在其讲话中，柯克声称越南战争“初衷良好但几无所获”。此种言论，显然与反战运动将美国发动越战视做企图压迫臣服一个穷国的不义行为格格不入。

拉德的公开信以“致格雷森叔叔”为题，该信主体部分也与此风格保持

一致。信以“亲爱的格雷森”开头。在信中，拉德重新定义了柯克所谓的代沟。“我将其视做当今的当权者们——阁下，格雷森·柯克先生——与那些遭受你们所统治的这个社会压迫，并且对其深恶痛绝的人们之间真正的矛盾冲突……一言以蔽之，我们认为，毫无意义的学习、认同危机以及对作为整个社会机器组成环节的厌恶都是这个几近病态的社会的结果和反应……”

“我们将接管你们的世界、你们的公司、你们的大学，以创造一个我们和其他人可以作为人而生存的世界。”

拉德誓言反抗柯克对越战和“国防事务分析所”的支持以及对哈莱姆社区的所作所为。但这封信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其结尾：

除此之外，无话可说。对阁下而言，或许这听起来有些无法无天，因为这是一场自由之战的第一枪。我想引用勒鲁瓦·琼斯的话，我肯定你压根儿就不喜欢他：“起来靠墙站着，狗娘养的，这是持枪抢劫”。

您的追求自由的，

马克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托德·吉特林评论道：“有趣的是，留意一下拉德对‘他’所保留的礼貌，尽管从语法上说并无错误，但‘他’指谁却值得商榷。”虽然在稍早前的讲话中，他也将柯克称做“那个狗屎”。但对拉德这样一个通常个性开朗、彬彬有礼的人来说，这种言辞方式是有意对常青藤联盟儒雅风气的对抗。他敏锐地意识到，哥大的行事作风并非如此，而这正是他做事的方式。

4月23日，天气凉爽，一片灰蒙。示威人群预定在位于哥大校园中心的日晷处集合。为准备一篇以马里奥·萨维奥《可恶的机器》演说为主题的演讲稿，拉德前晚一夜无眠。从附近的洛氏图书馆望去，示威者中有一百五十名左右的右翼学生，那些被哥大人称做“帅哥”的短发学生。有一

块标语写着“把拉德送回古巴去”。另一块则更具轰动性——“秩序就是和平”。在日晷处集合的示威者仅有三百名左右。但当学生领袖们开始发表演说时，人群便不断聚集。当轮到拉德开始讲话时，那就是开始向图书馆进发的序曲——这又与室内示威的有关规定相违背——这时发生了两件事。副校长杜鲁门提议召开会议，并关闭了洛氏图书馆。

突然之间，这篇萨维奥式的讲话变得似乎无的放矢。拉德突然意识到，现在不是发表冠冕堂皇的演说的时候。是时候该采取行动了。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学生领袖们从不付诸行动。他们的任务就是组织辩论，然后做出结论。因此，拉德转向示威者，征询他们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的意见。拉德将杜鲁门的建议以及洛氏图书馆已被关闭的情况告知示威者。突然，一名示威者站上日晷，大声喊道，“我们到这里来是谈判的，还是要到洛氏图书馆？”

“到洛氏图书馆！到洛氏图书馆！”人群高喊着口号，向前出发。身为学生领袖，拉德拼命地跑到队伍前面，肩负起其作为队伍领头者的角色。他和其他学生领袖们手拉手，被群情激昂的人群推动着朝洛氏图书馆进发。

“我来了，”拉德说道，“站在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正准备冲进一幢被封锁的建筑内，或许还会迎面撞上一群右翼分子。我并不十分清楚我们在做什么。”拉德十分明白的一点是，如果一旦发生分裂，警察和学校当局就会乘机采取行动，那么他们随即就会获得支持。他知道，在芝加哥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这类手法往往能够得逞。但当他们爬上图书馆楼梯的顶层后，接下来几分钟里具体要怎么做，拉德并不清楚。当他们抵达图书馆时，图书馆确实大门紧闭。

正在拉德四下张望，想找一个立足之地时，他看见了一个垃圾筒。他爬上垃圾筒，准备居高临下地站在那里，告诉人群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但当他爬上去之后，人群却四散而去。原来一名示威者喊道：“我们到体育馆工地去！”站在垃圾筒上，拉德看见示威人群弃之不顾，朝着距校园两个街区之

外的晨边公园涌去。他在人群后大声喊叫着，努力使自己的存在不被忽视。“推倒那该死的围墙！”他跳下垃圾筒，试图重新跑到队伍前面去。

等拉德赶到围墙边时，示威人群已开始尝试着推倒围墙，却未能成功。一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被戴上手铐，警察冲了进来。因为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而且朝公园赶来的警察也越来越多，示威人群于是退回到哥大校园内。校园内的另一群人和他们会合一处。在拉德看来，每个人都在向他出谋划策，建议该如何行动。作为一名学生领袖，他显然并不称职。“马克，你应该采取更激进的行动。”有人告诉他。但也有人对他说道，“马克，你应该平息人们的愤怒情绪。”他感觉自己似乎已被淹没在各种互不相让的想法之中。他站在日晷上，权衡着各种意见，身旁的另一名黑人学生领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显然，他们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做，尽管当时，按拉德的估计，大约有五百名学生正准备着大干一场。

但做什么呢？

其他学生在谈论革命。拉德呢？他所谈论的是国防事务分析所和哥大的体育馆。但该怎么做？最后，他说道：“我们可以从扣留人质开始！”

众人不再说话了。拉德所谓的“人质”并不是指“人”。他想占据一幢建筑物——然后静坐。静坐，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是劳工运动和民权运动长久不衰的策略。”他听见一个声音在喊，“攻占汉密尔顿大厅！”对，他想，就这么办。他高声喊道，“汉密尔顿大厅就在那边。我们走！”人群一边唱着“必须废除国防事务研究所”，一边朝汉密尔顿大厅进发。

在汉密尔顿大厅，留着平头的亨利·科尔曼主任走到拉德面前，而拉德却开始琢磨是不是该扣住一个真正的人质。拉德对示威者称他们应该占据大楼，同时也不能让科尔曼主任离开，除非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具体是什么要求，可以稍后再决定。最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人群呼喊着“该死的，我们不同意！”——这句一般用来指对草案表示反对的惯用语。他们占据了一幢建筑并扣留了一名主任。

从那一刻起，学生领袖们便忙开了。他们在所占据的建筑内张挂起切·格瓦拉、斯托克利·卡迈克尔、马尔科姆·X. 以及或许令人感觉有些时空错位的列宁等人的海报。越来越多的黑人从哈莱姆聚集到汉密尔顿大厅，据说有人还带着枪支。拉德后来承认，当看到那晚人们在大厅地板上席地而睡时，他感到了害怕。“我们仍是中产阶级的孩子，突然我们和一个不同的人群结盟，而这和我们那天早上所发起的学生抗议运动截然不同。”

种族分歧很快就产生了。白人学生主张开放大厅给学生上课，因为不想得罪他们的后盾——大部分的学生。但黑人学生却认为他们的后盾是哈莱姆社区，因此主张封锁大厅。经过讨论协商，双方最终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于是白人学生召开了典型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会议，对越南的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的优势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在内部协商后，黑人学生决定关闭整栋大厦，并要求白人学生离开。“如果你们离开，占据一栋你们自己的建筑，情况会好一些。”

人困马乏且满怀伤感的白人学生们收拾起其后赶来的同情者给他们的毯子和枕头，从汉密尔顿大厅的大门离开了。拉德回忆，当回头看见黑人同学们用粗糙制作的路障将大楼封闭起来时，他眼中满含泪水。这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历史的重现。1968年并非一个“黑人和白人协力并肩”的年代。

有人闯进了大门紧锁的图书馆，示威者如同昏昏欲睡的孩子一般悄悄爬了进去。他们在大楼内到处游荡，从格雷森·柯克那间摆放着中国明朝花瓶和伦布兰特画作的办公室内出出进进。有人抽着雪茄，有人则翻看着文件，想找到些秘密文件，后来声称找到了不动产交易和国防部协议等文件。凌晨时分，拉德找到了一部电话，于是就打电话给他在新泽西的父母。

“我们占据了一栋大楼。”拉德告诉父亲。他父亲已从收音机和电视上得知了拉德的所作所为。

“那么，把它还回去。”他父亲回答道。

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头版文章将此次的学生运动几乎和琳达·勒克莱尔事件同题并论，翔实地报道了当天的混乱事件。与拉德所说的唯一不同之处是，报道认为拉德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根据报道所述，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主席马克·拉德策划领导游行队伍从日晷处到晨边公园，然后又回到日晷处，随即认准时机，号召人群攻占大楼。阅读报纸的公众不知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培养其“领导者”时，注重的是坐而论道而非做出决定。《纽约时报》报道也称，通过引进哈莱姆区的一些活动分子，拉德将“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RE）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卷入其中，使得哥大成为一场全国性抗议运动的一部分。

汤姆·海登从纽瓦克赶来。在纽瓦克市内的运动已经偃旗息鼓后，他搬到了芝加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总部即在此筹建。在努力熬过一段以米饭和大豆度日、每天只花一美元的日子后，他也未能得到他所想要的支持。对哥大发生的事情，他感到大为震惊。

我从未目睹如此之事。学生们最后自己掌握主动权。但他们毕竟还是学生而已。举止彬彬有礼，着装干净整洁，手拿笔记本和课本，耽于聚会讨论，处处怀疑自己的道德准则。最后决心坚守自己的原则，也担心是否会因此断送学业和人生。把校长关在办公室内的想法令他们感到羞愧，相反，他们要求的是和校长进行建设性对话。他们凸显的是那一代大学生的痛苦。

他觉得“他不能做壁上观”。于是他提出施以援手，但按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行事方式，很显然他不可能发挥主导作用。示威群众看似很高兴汤姆·海登能加入队伍之中，即便他保持沉默。他推测，“或许他们会想，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有什么能比将汤姆·海登这个学生运动的老前辈（29岁）纳入其中更适逢其时的呢？”

他们占据大厅的时间越长，加入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当大厅内已容纳不下时，他们转移到了其他的大楼内。也就是那个时候，拉德退出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因为后者拒绝加入示威学生，占据更多大楼。到4月27日（星期五）时，示威学生已占据了五栋大楼。《纽约时报》仍继续以头版篇幅对学生抗议运动予以报道，并认定此次运动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所筹划。

汤姆·海登进入一栋大楼内。阿比·霍夫曼业已抵达。但人们却是群龙无首。众人议论纷纷，争执不休。占据的每栋大楼都成立了“罢课委员会”。在白人学生离开后，汉密尔顿大厅内的黑人学生随即释放了人质，并坚持脱离另外四栋大楼实施自治。每栋大楼都在各自展开辩论。学生们日夜不停地在老式油印机上复制新闻宣传材料。被占据的大楼挂起宣称“解放区”的标语。有人借用西泽·查维斯的“联合农场工人联盟”口号“罢工万岁！”，还有人则借用了旧时工人静坐示威时的口号，“我们绝不走开！”

哥大校园分成了几个派系。有人系上红袖章以示革命之意。还有人系上了绿色袖章，以此表示虽支持抗议行动，但却坚持非暴力原则。对这些学生反叛分子看来，那些运动健将们蓄着短发，身穿哥大运动夹克和领带，简直就是可笑而不合时宜的历史遗物。当他们企图阻止向被占据的大楼内运送补给时，激进的学生们对他们冷嘲热讽道：“哥大校队没一次守得住的。”意在讥讽他们在橄榄球赛中屡尝败绩。

到4月26日星期五时，哥大宣布停止体育馆工程并关闭了校园。校园被关闭的还远不止哥大一所而已。在整个美国乃至全世界，学生们都在星期五那天以罢课来抗议越南战争。引人瞩目的是，美国的高中学生们也广泛参与其中。从4月份起，他们就开始逐渐组织起来。当年底，即成立了自己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以及由约五百所高中组成的地下校报网络。巴黎、布拉格以及东京的各所大学也都积极参与。意大利的大学体系更几近瘫痪。就在那天，威尼斯、都灵、博洛尼亚、罗马和巴里各地的大学校园里都发生了

学生静坐、示威以及冲突事件。矛盾主要集中于学生们对资深教授绝对权威的不满。由于对既有政治势力的失望，他们也依旧拒绝同共产党人或是其他政治党派结盟。在巴黎，因为校方禁止男女生混合宿舍，300名学生冲击包围了位于巴黎南郊的巴黎市立大学内的一所美国学生宿舍。人们注意到，这表明巴黎郊区南泰尔大学激进学生们的鼓动已成功地影响到了巴黎的其他大学。另一方面，因学生抗议示威而被迫关闭38天后，马德里大学宣布将于5月6日复课。

在纽约，这是尤其动荡不安的一天。在一所精英公立学校——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的反对越战和支持越战学生之间爆发的冲突骚乱中，一名女学生受伤后被送进了医院。亨特学院三名学生受伤入院，但因媒体大篇幅报道而引起世界瞩目的当属哥大。在哥大校园内，学校大门和所有尚未被学生们占据的大楼都有警察在把守。在校园附近的第116大街上，长长的绿色卡车载满大批整装待发的警察。即使基夫纳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这场运动群龙无首，拉德不过间或扮演发言人的角色，每栋大楼也由各自指导委员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但占领行动仍被广泛报道是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所组织并由拉德所领导。

哥大校董会抨击谴责称，“少部分人”致使哥大被迫关闭校园。据估计，参与罢课运动的学生有一千人左右，而1968年哥大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有4400人。因此，从数字上而言，说是少数学生并不为错，尽管这个少数其实十分庞大。在哥大校董会至少占有两席的《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这场由静坐和示威引起的骚乱是今年全球校园的先锋流行事件。为表明自己被社会所异化排斥，那就选择置身于远在日本、罗马、开罗和里约热内卢的大学校园中。”对波兰和西班牙而言，这种事情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它们“缺乏和平与民主变革的途径”，《纽约时报》如是说，“但在美国、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来说，其行为并无正当性可言”。

《纽约时报》甚至将WKCR，哥大校园广播电台评为该周热门媒体。通

过全天不间断的现场直播，WKCR 电台以其天时地利之便适时准确地跟踪事态发展。在星期五上午时，哥大校方曾一度禁止该电台继续广播，但在学生们的强大抗议压力下不得不妥协让步。尽管和《纽约时报》的基夫纳等记者们进行过访谈，但拉德和其他学生领袖同哥大校报《每日观察》以及 WKCR 也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拉德经常将重大事件预先通报给校园电台新闻主播罗伯特·西格尔，他就曾让罗伯特前去报道阿克斯特上校的讲话。

在星期天，大约九万名反战示威群众聚集在中央公园的绵羊草原 (Sheep Meadow)。马丁·路德·金的年轻遗孀科雷特·斯科特·金代替其丈夫发言。她朗读了马丁·路德·金的《越南十戒》，谴责抨击美国政府发动的越南战争。当读到最后一戒“不得杀生”时，科雷特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警察逮捕了 160 名示威者，其中 35 人还试图从公园行进到哥大校园以表示对学生们的支持。

纽约区大主教特伦斯·库克则发起了一场反对示威游行运动。刚于三周前在约翰逊总统见证下就任主教一职的库克曾允诺将组织发动六万名越战支持者，但结果却只勉强召集了三千人。

在芝加哥，组织者声称一万两千名反战抗议示威群众和平游行到市区的格兰特公园，但芝加哥警方却以催泪瓦斯和棍棒予以镇压，并称游行不过三千人而已。在旧金山，约一万名示威者游行反战。据组织者称，其中包括几十名身着便服的军人和几百名头戴“老兵呼吁和平”纸帽的老兵。在 3 月 19 日的游行活动中，纽约州锡拉丘兹市一名叫做罗纳德·W. 布拉泽的 16 岁优秀高中生在一所天主教堂附近点燃了身上浸透汽油的衣服以示反战，结果却不幸身亡。他留下遗言称：“如果我献出生命只能使战争提前一天结束，那么我也就死得其所了。”

与此同时，美军以直升机空中机动部队开始对南越的黑晓山谷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行动。仅一天战斗中，就损失了 10 架战机。几乎就在空袭开始的同时，溪山之围得以解除。在一次代号为“天马行动”的战斗中，在第一空

中骑兵师的直升机引导下，三万名美军和南越军队自1月起即被阻击围困在一座高地上的六千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士兵解救出来。跟随此次解救行动的战地记者把环绕溪山附近的座座山丘称做“月球的表面”。在战争史上最密集的空轰炸之下——共计使用了110000吨美式炸弹，这些山头上的泥土坑坑洼洼地布满了道道弹痕。不清楚的是，在溪山围困美军的北越部队的两个师是被空中轰炸击退了，抑或他们根本就无意展开代价惨重的最后决战。不管实际情形如何，相信他们应该是已经退守到了黑晓山谷。在那里，他们可以对付岷港或是顺化发动攻击。除了对黑晓山谷的袭击行动之外，美军还不乐观地以“全面胜利”为代号发起行动，试图彻底清除西贡地区的敌军。在4月底时，溪山阵地已决定要被放弃了。在这里，有200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被围困的11周中阵亡，另有71名美军在解救行动中丧生。

到4月底时，月初约翰逊总统表示放弃竞选下任总统时带来的短暂乐观情绪已然无影无踪。和平谈判和停止空袭进展如何？北越立即宣布它将指派代表开始谈判。美国则宣布，76岁的W.埃夫里尔·哈里曼，一位罗斯福时代的自由派和冷战时期的资深外交官，将率领美国代表团赴日内瓦或巴黎。美国同时也透露，新德里、仰光或万象都是和谈的合适地点。美国不想在南越以及韩国未设大使馆的共产主义国家首都开展谈判。4月8日，北越提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和谈。因为金边没有美国大使馆，美国4月10日拒绝在此举行预备谈判。4月11日，北越提议在华沙举行会谈，美国立即予以拒绝。巧合的是，约翰逊正是在那一天最终签署《民权法案》，希望以此平息美国黑人的情绪。也是那天，2400名预备役人员被征召入伍，在越南战场的美军兵力达到549500——那天，在西贡附近的一场战斗中，美军声称击毙敌军120人，14名美军阵亡。接下来的一周里，美方提出了包括日内瓦、锡兰、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马来西亚和印度在内的10处谈判候选地点。但河内均予以拒绝，并再次提议在华沙举行谈判。

外交手段在晨边高地同样未能奏效。4月29日（星期一），在抗议示威开始大约一周以后，哥大校园仍然关闭着，学生们也依旧占据着大楼。实际上，因为校董会和大多数的教师都对此次抗议活动持反对态度，彼此间也就鲜有交涉。校方的确曾试图和汉密尔顿大厅的抗议学生协商。因为占据大楼的黑人学生和哈莱姆社区不无关系，而哥大并不想激怒哈莱姆区的居民。然而，黑人学生们坚守他们对拉德和白人学生的承诺，拒绝抛开其他学生单独协商谈判。副校长大卫·杜鲁门邀请马克·拉德和其他几名学生领袖到他位于河畔道高尚社区的舒适宅第。叛逆的学生们坐在锃亮的桃木桌旁，用银器茶具喝茶品茗。一切都是标准的哥大传统。可惜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拉德决定脱下自己的靴子。他唯一的理由是脚疼。但《纽约时报》却报道了这起无礼事件，杜鲁门也对该报表示，拉德是一个“混合了能干、粗鲁、冷血等各方面特质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个易于动怒的年轻人”。

会谈并未达成任何共识。拉德对杜鲁门称，学生们已经占领学校，并且要求进入会计室检查学校财务记录。每栋得到“解放”的大楼逐步建立自治委员会。年轻人一起住在大楼内，过着革命生活，等待着围城时刻的到来，憧憬着一种激情澎湃、浪漫的生活状态。有一对情侣决定此时此地在他们占据的大楼内结婚。于是WKCR广播称，费尔韦特堂（Fayerweather Hall）需要一名牧师。哥大的新教牧师威廉·斯塔尔应约前往。《生活》杂志多半会喜欢这种婚礼场面。这对夫妇借来了结婚礼服。新郎理查德·伊根身穿尼赫鲁式的西装外套，脖子上挂着彩色长念珠。新娘安德烈娅·波罗夫则身穿一件别着雏菊的高领毛线衣。约有五百多人聚集在费尔韦特堂，汤姆·海登也在其中。在长长的烛光队伍的引导下，这对新婚夫妇穿过数百名示威人群组成的圆圈，来到威廉·斯塔尔牧师面前。斯塔尔牧师将他们称做“新时代的孩子”。即便是视婚姻制度为畏途的海登也发现自己双眼中噙满泪水。这对夫妻以“费尔韦特夫妇”自称。

对这些学生而言，哥大已经成为了一个革命中心。其他大学甚至高中的

学生和学生领袖们蜂拥而至以示支持。越来越多来自哈莱姆区的居民，或成群结队或只身一人，来到哥大校园举行盛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和 H. 瑞普·布朗来到已被更名为“马尔科姆·X. 大学”的汉密尔顿大厅。来自哈莱姆区的年轻人涌至哥大校园，高呼着“黑人力量！”的口号，这对格雷森·柯克来说简直就是噩梦。

4月30日（星期二）凌晨天还未亮的那段时间，数百名警察开始包围哥大校园。1：30，WKCR 电台提醒学生们，警方将马上发动攻击，他们最好留在宿舍内不要外出。警方称，他们原本计划在1：30开始袭击，但却因其所谓的“战术延误”而数度推迟行动。事后知道，之所以推迟行动，是想等哈莱姆区居民都熟睡之后。2：30，以钢盔、手电筒、棍棒、包皮铅头棍棒以及据目击者称还有指节铜套全副武装的警察们如同开展军事行动般冲进哥大校园。行动中，一千名警察被分成了七个目标小组。“靠墙站着，狗娘养的”，拉德回忆说，“有些哥大学生十分惊讶警察们竟如此口出恶言”。

警察们殴打那些反抗者，他们同样也不放过那些并未反抗者。有些警察开始按部就班地逮捕学生并把他们押到警车上。有些警察则好似发疯般地用棍棒殴打人群。停满的警车足足阻断了阿姆斯特丹大道的两个街区，共有720名学生被捕。当那些占据学校大楼的学生们试图比出“V”字形胜利手势时也遭到殴打。那些系着绿色袖章以清楚表明其和平立场的学生们同样也难以幸免，其中还包括一些教职员工。在报告中，警方抱怨称他们并未被告知有多少教职员工支持学生，或是有多少学生牵涉其中。欢呼支持警方行动的右翼学生们也遭到殴打。报告受伤者共计148名。这是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阶级冲突公开化的时期之一。属于劳动阶层的警察对这些特权青年大学生们心怀不满，因为他们反对由劳动阶层子弟参与的越战。这种矛盾冲突逐渐演变成为阶级分野。大学生们以“大盖帽”一词来嘲笑警察，对方则以赤裸裸的仇恨来回击。曾目睹这场镇压的哥伦比亚人类学教授马文·哈里斯如此写道：

许多学生被从楼梯上拖曳下来。女生们的头发被拽着，胳膊扭曲，猛击脸部。有教职工被踢到腹股沟部，被从人墙外扔掷来的物体击中眼部。一名身患糖尿病的学生陷入昏迷状态。一名教师严重虚脱。警察挥舞手铐作武器攻击，许多学生头部受伤，血流如注。几十人躺在草地上痛苦呻吟而无人理会。

针对警察部门残忍野蛮行径的 120 起投诉，是纽约警界历史上单一事件中被投诉最多的。

公众震惊了。政府部门开始时在公众舆论上占据优势，这主要归功于《纽约时报》的报道。一张照片拍到学生们在柯克的办公室。一位后来成为诗人、名叫戴维·夏皮罗的学生，被人拍到在校长办公室内，戴着太阳眼镜，吸着偷来的雪茄。围绕柯克所说的“我的天，人怎么可以做那样的事情”为议题，《纽约时报》副执行编辑 A. M. 罗森塔尔以头版形式发表了一篇社论性质的报道后，该刊即彻底抛弃了其客观立场。作风老派的柯克所说的“那样的事情”不是指残忍地殴打数百名手无寸铁的群众，而是指粗鲁的破坏行为。罗森塔尔将其归咎于学生们，而《纽约时报》却并未提及，大多目击者，包括一些签署了书面作证的教师在内，却认为警方难责其咎。尽管“新左派”要求其他媒体也进行类似报道，但媒体和公众都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也并不完全责怪学生们。《纽约时报》写道：“许多人归咎于格雷森·柯克校长。正是由于其冷漠态度，更多时候堪称假模假式的管理方式导致对校园中长期以来酝酿着的不满情绪反应迟钝。”哥大教职工召开会议，成立了一个以哈佛教授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最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很奇怪的是，整个事件的所有参与者——学生、学校管理当局、警方——却再次重复着上述一切。学校中有关变革的讨论正如火如荼。最初，哥大校方因单独处罚拉德和其他五名学生而引发此次事件。5 月下旬，校方

决定中止拉德和其他四名学生的学籍。在1968年的时候，中止学籍可非同小可，它意味着学生征兵延缓期的结束，并往往将被征召往越南战场。学生们该如何应对？游行示威。拉德和另外四名学生在示威活动中做什么了？他们占据了汉密尔顿大厅。随后一千多名警察发动攻击。对抗中，包括17名警察在内的68人受伤。

在返回学校后，拉德被校方中止学籍，并以2500美金保释在外。他发誓要将哥大的抗议活动从那年春天持续到夏天。拉德在新泽西州梅普尔伍德郊区的父母收到了潮水般涌来的反犹信件，其中充斥着“该死的犹太佬”之类的字眼。《时代》周刊在访问他们时问及对其子的所作所为有何想法。拉德的父亲表示，他自己的青年时代就是为了赚钱而打拼。“我们很高兴马克还有工夫搞政治这类的活动”。他母亲也不无得意地表示：“我儿子，他可是个革命者。”

8月时，几乎让所有人感到松一口气的是，柯克提出在64岁时退休。接受柯克的退休请求，会不会让反叛的学生们觉得是在向他们屈服。哥大校董会就此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讨论。尽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校长是在学生们的压力下才离职的，但最后他们还是接受了辞呈。

“问题并不在此。”拉德表示。关键不在哈莱姆社区居民受到何种待遇或是越南战争这部机器的发动。问题在于，美国大学的性质需要加以改革。即便是考克斯委员会也对哥大管理当局独断专行的作风表示不满，其中有些规章制度甚至可上溯到18世纪。一旦学生们拥有发言权，他们就可能要求切断大学与公司企业之间的联系，让学术研究远离军工业，也让美国脱离战争的泥淖。汤姆·海登在《堡垒》杂志上撰文：“写在大学校园墙上的目标是，‘创造两个、三个乃至更多的哥伦比亚大学’；那意味着扩大罢课活动，从而使美国要么改弦易辙，要么就派军队占领美国的大学校园。”这个目标看来是现实可行的。

先生，我想您已经堕落了

人既不能说是愚蠢，也不能称做睿智。人只不过是自由还是不自由而已。

——巴黎医学院围墙涂鸦之作，1968年5月，巴黎

在1968年，自由意味着参与。

——巴黎政治科学院一楼梯间涂鸦之作，1968年5月，巴黎

有些法国学生，在看到其他国家的学生已将一切动摇和砸碎之后，也想起而效仿。

——法国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1968年
5月4日如此解释学生事件

当春天来到多雨的巴黎时，当时的法国领导人，那位出生于19世纪、已78岁高龄的将军，在他自己10年前亲自起草的宪法之下，正以近乎绝对的权力统治着法国。他向国民承诺保持社会稳定，并且将其付诸实际行动。

由于对君主制突发奇想，那位年近八旬且近乎拥有国王权威的人，竟至不时邀请巴黎伯爵亨利到爱丽舍宫谈天说地。那位业已失去王位的国王成为

这位掌握实权但并未加冕的总统的座上宾。反对意见极少能见容于戴高乐，他的反应看起来就如同他已经远离政治以及其一直以来对某种永恒地位的追求。1966年，当身居爱丽舍宫节日大厅的戴高乐被问及其健康状况时，他回答道：“我身体很好——不过不用担心，我总有一天会死的。”

1968年3月15日，当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爆发示威运动时，《世界报》记者皮埃尔·维昆松-蓬特撰写了一篇如今已广为人知的社论文章。其中他写道，“法国让人感到厌烦”。几乎就在同时，戴高乐不无得意地宣称：“法国的局势相当令人满意。相反，德国人有不少政治上的难题，比利时人面临着语言问题的困扰，英国人则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他进一步强调，法国人应该对由他带来的这种波澜不惊的和平生活感到心满意足。

尽管戴高乐让全世界都感到怒不可遏，但一份保守派法国报纸《费加罗报》3月初发表的民意调查表明，61%的法国民众对戴高乐的外交政策表示赞同，仅有13%的人表示反对。当然，在法国，对戴高乐本人表示不满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当1968年3月因批评戴高乐总统而在一条有87年历史的法条之下被控上法庭时，备受尊敬的记者弗朗索瓦·方特维雷-阿尔基耶对此深有体会。检控官援引了其新著《重新学习不服从》中的12个段落，称对国家元首构成了“名誉攻击”。根据这部于1881年7月29日通过的法律，凡“在公共场所或著作和文章中以演讲、口号以及威胁”等形式触犯该法律者，将被最高处以入狱三年或罚款100—300000法郎（按1968年汇率折算，相当于20—60000美元）。

该案系自戴高乐担任总统以来该法律第三百次被提起适用。在其中一起案件中，有一名男子因在戴高乐的卧车驶经时高呼“退休”口号而遭罚款500法郎。

如果法国人说他们对戴高乐的外交政策感到满意，那么其他国家则几乎没有人会有同样的看法。戴高乐那具有独特风格的民主主义做派似乎让许多

的国际组织都有一种威胁感。1967年是尤其艰难的一年，或者至少是戴高乐备感困难的一年。他将法国军队从先前以法国为基地的北约组织撤回，并因再次拒绝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而威胁到其生存。在“六日战争”之后发表的著名谈话中，戴高乐将犹太人称做“极权”民族，这使得法国人和美国的犹太人及非犹太人之间产生疏离。他甚至因在对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时在蒙特利尔市政厅的阳台上对魁北克分离主义表示支持而惹恼了加拿大人。

“每个人都清楚，和美国打交道的戴高乐是一个不知感恩的欺世盗名之徒。早在几年前就应该和他摊牌了。”美国达拉斯市的戈登·麦克伦登在其八家电台中如是说。全美各地抵制法国产品的呼声不绝于耳。一份由盖洛普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当美国人被问及最喜欢的国家时，法国的排名几近垫底，仅在埃及、俄国、北越和古巴等国之前。在另一份民意调查中，当英国人被问及谁是20世纪最邪恶的人时，希特勒排名第一，戴高乐则紧随其后，排名在斯大林之前。排名第四的是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素来与人为善的西德外长威利·勃兰特在1968年2月初曾指戴高乐“耽于权力欲望”，随后被迫为其言论致歉。

尽管戴高乐喜欢指责他人，但并非所有的非议与批评都是来自法国以外。下一代的法国人，即约翰·肯尼迪那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正迫不及待地准备好取而代之。这其中包括52岁的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密特朗。那个时候，密特朗仍跟随着时年61岁的具有左翼色彩的政府前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皮埃尔因为1954年将法军从越南撤回而招致右翼势力的攻击。其中也有新面孔。当美国的新左派们在阅读加缪、法农以及德布雷等人的译著时，法国也贡献出一本书。由中间偏左的新闻周刊《快报》发行人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所著的《美国的挑战》(*Le Defi American*)一书成为1967年法国的畅销书。这本书被译成英文后在1968年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塞尔旺-施赖伯对后戴高乐时期的前景以及自己的抱负进行了展望。他曾一度于1962年参与竞选国会议员。不过那次的经历堪称灾难性的。但如

果说政治生涯是从著作开始的话，那这次则是少有的成功。在法国，该书仅在头三个月内就打破了战后所有图书的销售记录。塞尔旺－施赖伯的论点是，在下一个30年，美国将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而欧洲将几至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尽管到1968年7月1日时，欧洲共同体各国将取消关税，但欧洲共同市场的前进步伐不会太快，而且还可能会因缺乏动力而解体。

此书所传达的信息就是，欧洲要么必须变得像美国一样，要么就会被它所吞并。1968年时，欧洲的外交官和企业家经常引用这一观点。在欧洲拥有140亿美元投资的美国公司正在攻城略地。塞尔旺－施赖伯警告说，在下一个30年，所有的人都将生活在一个所谓的“后工业化社会”。他补充道：“我们要记住这个词，因为它将决定我们的未来。”其他具有先见之明的预言还包括：“时间和空间将不再成为沟通交流的障碍”以及“在后工业化时期，薪水高低之间的差距将比今天更为显著”。但他也认同1968年代时广为流传的一个观念，即到本世纪末时美国人将拥有如潮水般的休闲时间。塞尔旺－施赖伯预测到，在30年内“美国将成为一个人均收入达7500美元的后工业化国家。人们将每周工作四天，每天工作七小时。每年工作时间将为39周，休息时间为13周”。

他引述一位白宫专家的预测称：“在1980年前，计算机将变得体积小、功能强大且价格低廉。任何有需求或者想要的人都可以得到计算机，也懂得如何使用。许多情况下，使用者将拥有一台小巧的计算机操作平台，同时与它连接的是以庞大的电子存储器储存各种知识的大型中央计算设备。”

该书是一种警示：“今天的美国和欧洲仍然相差无几——仅有15年的领先优势而已。美国同样属于工业化社会。但到1980年时，美国将会进入另一个世界。如果我们无法迎头赶上，那么美国人将在知识、科学和权力等方面占据垄断地位。”

尽管他所提出的时间表有些快，但塞尔旺－施赖伯却预测了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危险。“如果欧洲和苏联一样在竞争中被迫出局，美国将在未

来的世界中独树一帜。这对欧洲而言将是难以接受的，对美国将是危险的，对世界则是灾难性的……一个拥有垄断性权力的国家势必将帝国主义视做一种义务，并以自身的成功当做其他国家应当效法的证明。”

在塞尔旺－施赖伯看来，法国和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时日不多，并且还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障碍：一位年逾古稀的将军。“戴高乐来自另一个时代，是上一代人。”这位 44 岁的编辑表示。他曾在“二战”时投身于自由法国运动。“在一个呼唤理性的年代，他是非理性的。”甚至连戴高乐将军“二战英雄”这一最受欢迎的标志也正逐渐消失。塞尔旺－施赖伯说，“我不喜欢英雄。崇拜蝙蝠侠的孩子们长大后投票给英雄。我希望在戴高乐之后，欧洲人会对英雄感到厌烦。”

塞尔旺－施赖伯代表了法国的中年一代。他们对垂垂老矣的戴高乐已感到厌烦，但也不信任新生的青年文化。“我希望我的下一代长大后能够成为举足轻重的公民。我不希望他们是二等公民。已经 25 岁仍一事无成，却尽做些蠢事，不是想做嬉皮士，就是跑到玻利维亚加入游击队或者在房间墙上贴上切·格瓦拉的海报。”了无生趣且死气沉沉的法国存在着两种代沟：一种是“二战”一代与其后代之间，一种则是戴高乐将军与多数的法国人之间。

戴高乐十年前创建的第五共和国和即将毁灭无所作为的法国社会的抗议运动，都根源于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在“二战”期间，作为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曾一度是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流亡政府所在地。“二战”甫一结束，阿尔及利亚即开始要求独立。正是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激发了弗朗茨·法农的写作并深刻影响了 60 年代的反帝运动。虽然孟戴斯－弗朗斯曾经使印度支那和突尼斯实现非殖民化，但他却无法拥有足够的政治实力让阿尔及利亚脱离殖民统治。尽管自 1848 年法国占据该地以来，当地即持续不断地发生抵抗运动，但仍有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定居此地。许多人已世代生活于此，并且法国人理所当然地把阿尔及利亚视做本国领土。相继在德国和越南遭受

败绩之后，法国军队就把阿尔及利亚当做其最后的而且是毫无讨价还价余地的立足之地。

在这一点上，法国应当与戴高乐一刀两断。“二战”之后，戴高乐即以将法国从左派手中“拯救”出来为己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戴高乐刻意编织了一个勇敢的法国抵抗纳粹占领的神话。事实上，共产党人才是法国抵抗运动的主体，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大多数的法国人都愿意投票给共产党。戴高乐给出了另外一个选择，并且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坚称，他是避免共产党统治法国的唯一选择。40年代后期，法国人决定不失时机地让戴高乐下台。尽管戴高乐试图以争议性的反对活动挑战社会主义政府，到1955年，他65岁时已正式退出政治舞台，结束其辉煌的政治生涯。

然而在1958年时，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充斥着各种流言飞语。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府面临着被右翼军事政变推翻的现实可能。由拉乌尔·萨朗将军领导的驻阿尔及利亚法军将不会支持一个准备放弃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政府，而且社会主义者也难以让人信任。戴高乐在所有这些阴谋之后介入程度有多深仍然是一个谜。尽管清楚地知道，戴高乐的许多为人熟知的亲信曾参与其事，但他却极力置身事外。作为“二战”时期若干法国抵抗运动团体之一的领导者，戴高乐对于此类国际事务的谋划运作已是炉火纯青。现在，这位退役的将军只是对外表示，如果法国需要他，他随时可以效劳。人们对戴高乐不无怀疑心态，法国议会即公开对其是否出于民主意图表示质疑。“难道你们认为，我会在67岁时准备做一个独裁者？”戴高乐如此回应。

即便当法国政府业已决定下台并将权力转交给戴高乐，但要说服权力强大的下议院——国民议会批准这项决定也很困难。社会主义者、国民议会议长安德烈·勒托奎尔将不会接受戴高乐提出的国会休会和制定新宪法的条件。相反，他要求戴高乐出席国民议会。戴高乐拒绝了这一要求，并答复道：“我不会做其他任何事情，只有让你们和那些伞兵部队决一雌雄。我会回到家中过隐居生活，会因悲伤难过而无法言语。”此后，他回到位于科隆贝双

教堂退休后所生活的寓所。但很显然，只有一个由戴高乐组成的政府才能防止军事政变的企图。国会议员最终同意了戴高乐的条件，包括制定新宪法的权力。

法国之所以选择戴高乐，是希望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而并非改革法国政府。像戴高乐提出的由宪法赋予第五共和国总统那样的绝对权力，极少数的现代君主能够享有，更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如此。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他本人即将出任第五共和国总统。总统有权僭越国会，或者宣布举行全民公投，或者解散国会。总统同样可以设定国会议事日程，决定应该讨论哪一议案以及该议案的何种版本。总统可以否决减税或增加预算的提案。如果预算案在 70 天内无法通过，则总统有权自己颁布。

1958 年 9 月 4 日，站在一个 12 英尺高的巨大 V 字形标志前，戴高乐正式推出其新宪法。V 是罗马数字 5，代表着戴高乐创建的第五共和国，而且它也是“二战”中胜利的象征。戴高乐从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来提及其最爱的神话，即他单枪匹马地从法西斯手中拯救了法国。当然，对新一代的人来说，V 字是和平的象征，它代表着核裁军。戴高乐梦想着制造法国自己的氢弹，他对持反核立场的年轻人一无所知。他也不想去了解那些在巴黎街头举着“法西斯主义”标语抗议反对其新宪的年轻人。警察对青年们采取了镇压措施，后者则以从路障上随手拔下的物体还击，并造成几名警察受伤。

但戴高乐能够如愿以偿入主总统府，其中一个原因在于，面对当时甚至比林登·约翰逊在 1968 年时所面临的还要恶劣的情势，几乎无人愿意接手。法国正陷入痛苦而可恶的殖民战争。与无情而坚决的独立运动之间的斗争所带来的痛苦和暴行，玷污了法国的名声。当时的法国还正在努力从德国占领之中恢复其良好声誉。1968 年时的林登·约翰逊知道，如果他选择结束越南战争，越战的支持者和军方都将接受这一决定。但对戴高乐来说，如果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他将不得不面对可能出现的反叛行动。但不结束战争也会导致同样的后果。

法国逐渐壮大的反战运动足以号召起众多的示威抗议群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遭到警方的残酷对付。反对战争的法国人阶层广泛，包括一些老兵在内。塞尔旺-施赖伯也大胆直言抨击阿尔及利亚战争。在阿尔及利亚服役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名为《在阿尔及利亚的中尉》。因为这本书，他还险些被控上军事法庭。

当戴高乐上台执政时，犹太裔法国青年阿兰·热斯马尔 19 岁。热斯马尔的父亲在对德作战中阵亡，其祖父则被驱赶至集中营。刚出生的第一年，热斯马尔在法国过着东藏西躲的生活。这些经历也影响了他的思想。“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从我祖国的军队身上，我发现了许多纳粹的特征。”他最近表示，“范围要小得多，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事件。但同样有严刑拷打，也有所谓的‘重组营’。在 1945 年的时候，我们就得知这已经过去了。但在 1956 年，我发现它却仍然存在。”

阿尔及利亚战争进一步激化了法国青年的情绪。1960 年，在阿尔及利亚抗议运动高潮期间，左派学生们接管了多年来被右翼学生控制的学生组织。热斯马尔积极参与了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抗议活动。他还是 1961 年 10 月在巴黎举行的阿尔及利亚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当时警察向阿尔及利亚示威者开了火。“我看见他们向阿尔及利亚人开枪射击。”热斯马尔说。随后，塞纳河里发现了死尸，但最终并不清楚到底多少人因此丧命。直到 90 年代，这一事件才得以在法国公开讨论。

1962 年，戴高乐最终成功地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法国也随之进入了其在 20 世纪里鲜有的一段和平与稳定时期。1963 年，当广受大众欢迎的“欧洲一号”电台宣布将于巴黎民族广场举行免费音乐会时，法国人的 60 年代正式开始了。令所有人都感到惊奇的是，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到场。既有播放唱片，也有现场演出，其中大多是美国和英国的乐曲。晚会几乎持续了整晚。法国人习惯于在 7 月 14 日这天举办舞会，那时人们会伴着由手风琴演奏的《巴黎桥下》和《玫瑰人生》等乐曲翩翩起

舞。但举办这样彻夜通宵的露天免费摇滚音乐会却还是十分新鲜的事。

在60年代，法国开始经历蓬勃的经济增长。1963至1969年间，法国实际工资增长达到3.6%。这一增长足以使法国转型为一个消费社会。突然之间，法国人拥有了汽车。家中安装起居室内洗手间，尽管到1968年时仍仅有一半的巴黎家庭拥有。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对“自我吞噬的消费社会”感喟不已。

法国人也购买电视机和电话，可是电话装机服务缓慢，其电视机拥有量也仍落后于欧洲的多数国家。由政府负责提供的电台和电视频道都显得十分乏味，尽管它们均不需插播广告。但法国人开始感受到电视的力量。法国第一个仅能播放黑白节目的电视台在1957年才开播。许许多多法国家庭都在电视上看到了民权运动、美国越战以及反战运动。相反，他们则从未见过法国在印度支那发动的战争。凭借其总统权力之便，戴高乐将这一新兴工具利用得炉火纯青，不仅用它来控制与其相关的报道，还将之用于控制和协调其个人形象。“戴高乐爱上了电视。”塞尔旺-施赖伯说。“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媒体。”印刷媒体的老板们都很恼火，因为戴高乐威胁称将允许电视播放广告。在他们看来，戴高乐的这一策略是试图将胆敢批评他的印刷媒体的广告吸进官方电视台。

1965年，法国举行了首次总统直接选举。按照传统制度，总统系由国会中的多数党任命。此次直接选举是首次通过电视转播，同时也是首次采用民意调查来跟踪记录。为了避免表面上的显失公允，戴高乐同意每名候选人在选战最后两周内可以上电视台做两小时的节目。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让·勒卡吕埃在电视上露面产生了轰动性的效果。除了看过经常在电视上出现的戴高乐之外，大多数的法国人此前还从未真正目睹过其他总统候选人。密特朗和勒卡吕埃在电视上露面让他们与戴高乐拉近了差距。人们也很容易注意到，与戴高乐相比，他们二位是如此年轻和充满活力。尽管戴高乐赢得了选举，但他是被迫在与密特朗进行了第二轮对决后才获得所需的绝对多数。戴

高乐不再是他自己想象中的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君王。

在 60 年代中期，法国物价上涨，政府相信通货膨胀威胁到经济发展。大约一百万的北非移民（大多为基督徒和犹太人）导致人口急剧增长，从而造成物价上涨，失业率也开始上升。

1967 年，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解决经济问题的措施。但对工人阶级而言，这些举措似乎是针对他们的。工资遭到削减，因为新制度招聘农业工人使得费用增加，工人的社会保险负担也因此上升。5 月 1 日那天，天空下着雨。在沉寂了 15 年之后，传统的左派共产党在巴士底广场举行了五一节游行示威活动。工人们举起拳头、高唱《国际歌》的情景再次重现。

由于生活水平的改善，更多的法国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但他们对拥挤不堪的教室并不满意。1966 年，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贫困的学生生活》的文章，其中写道：

在法国，除了教士和警察之外，学生是最为普遍受到轻视的存在……在从前，大学受人尊敬：学生们一直坚信，上大学是一件幸事。但可惜他来的太晚了……现行“教育体制”的目标是要机械化地培养专门人才。现代经济体系需要大规模地培养那些毫无教养和思考能力的学生。

1958 年时，法国大学学生总数为 175000 人。到 1968 年，人数已达 530000，是英国大学生人数的两倍。但因为四分之三的法国学生因功课不及格而退学，法国大学所颁发的毕业证书数量却仅有英国大学的一半。这也是戴高乐起初对学生运动并未在意的原因；他以为参与的学生只不过是害怕面对考试而已。大学的拥挤情形触目惊心，仅巴黎大学就有 160000 名学生。这也就是为何只要学生们一开始示威活动，他们就能够吸引如此大批的游行

者。和大学生一样面临着同样问题的大学预科中的高中学生们也加入到上述游行队伍中。

在大多数的大学中，特别是巴黎第十大学（南泰尔大学），其实际的校园并不是一个适宜生活和学习的场所。同样，法国的大学堪称绝对的独裁，而且甚至比美国的常青藤联盟更甚。当法国与欧洲的未来以及新科学和新技术等话题引发了影响深远的讨论之时——这也说明了《美国的挑战》这类书籍为何流行——学生们却根本没有机会参与讨论上述任何课题。不管是课堂上还是课堂下，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对话。决定由上向下传达而无任何讨论。5月，索邦大学的围墙被人涂鸦上了如下字句：“教授们，你们就如同你们的文化一般老朽。”嘲讽法国文化的历史成为一种新的破坏偶像潮流。

但教师们同样也没有发言权。如今已是一名年轻物理学教授兼全国高等教育教师工会（SNESUP）秘书长的阿兰·热斯马尔最近指出：“年轻的一代人意识到，他们不想像前辈人那样生活。我要谴责解放法国的那一代人，因为他们错过了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机会。他们只是想让一切回复到过去。戴高乐领导了抵抗运动，实现了法国解放，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但对年轻人的事他却一无所知。他是一位伟人，但却是垂垂老矣。”

人们发现，在化学中有些非常稳定的元素如果和其他表面上不活跃的元素放在一起，它们会自然地产生爆炸。隐藏在这个沉闷无聊、局促拥挤和自负自满的社会之下，是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因素——思想激进的年轻人、一位彻底过时的衰老领袖、人满为患的大学、愤怒的工人、让一些人感到心醉神迷也让一些人感到厌烦的突然而至的消费主义、两代人之间明显的差异、而且或许甚至还有无聊本身——当把它们放在一起可能是爆炸性的。

回到1月，当法国仍是无聊的时候，是从性方面开始突破的。在巴黎第十大学（南泰尔大学）那座由混凝土修建的、有着四年历史、奇丑无比的校园里，有11000名学生拥挤在巴黎城的外角。学生们提出了男女混合宿舍的

问题，但政府却对它们充耳不闻。政府青年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到访南泰尔大学时，一名红头发的小个子学生提出向米索夫借打火机点烟。在把烟点燃并吐出烟雾后，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特，这位南泰尔大学大胆坦率且能言善辩的学生问道：“部长先生，我拜读过您关于青年问题的白皮书。在洋洋300页中，您对青年在性方面的问题却只字不提。”

米索夫回答道，他来南泰尔大学是为推广体育项目，而且他也建议学生们应该对此多加利用。出乎意料的是，此言并未让那位红头发的学生善罢甘休。相反，他再次重复了那个关于性的问题。

“长了像你这副尊容的人，难怪会有这些问题：我建议你可以跳到水池中消消火。”

“这就是回答。”科恩-本迪特说道，“简直可以比得上希特勒的青年部长。”

仅此一次交锋，几乎所有的巴黎学生都知道了这位简称做“达尼埃尔”的科恩-本迪特。这次学生与当政者之间的简短的非正式对话也成为了一种模式，并在日后反复重复和不断升级。直到整个法国陷入停滞，达尼埃尔也成了全世界知名的“红色达尼埃尔”。

1945年时，科恩-本迪特出生在初获光复的法国，其父母为藏身于法国而幸免于难的德裔犹太人。在希特勒上台后，其父即从德国逃亡，因为他不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是一名以替左派持不同政见者辩护而知名的律师。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法兰克福重操旧业。作为一个死里逃生的犹太人，重新回到德国是一种奇怪而孤立的经历。达尼埃尔和他做教师的母亲在法国待了一段时间。但由于逃离祖国和放逐海外的经历，他们在法国感到不是特别舒服。每隔几年，他们就得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达尼埃尔从小就认同激进的左派思想。他曾经说过，1953年朱利叶斯·罗森堡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被控为苏联间谍在美国被处死一事，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在德国时，他和弟弟会猜测每一个经过路人的年龄并推测他们在战争期

间的所作所为。当他去一间豪华疗养院探望不久于人世父亲时，他听到商人们以往日德国人表示服从的方式重重地跺脚后跟，这让他感到恐惧不已。

1964年，科恩-本迪特来到美国，那个处死了罗森堡夫妇的恐怖国土。他参加了一场纽约市为在密西西比州遇害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志愿者举行的悼念仪式。遇难者中的安德鲁·古德曼和迈克尔·史维纳都来自纽约市。“现场的气氛令我十分难忘。”科恩-本迪特说，“这两位白人犹太人去过密西西比州。那是多么危险啊。这和我准备要做的事情不大相同。”

1968年3月，当法国仍处在百无聊赖之中时，南泰尔大学开始预热起来。据法国内政部的说法，是一小股极端主义团体正在进行蛊惑煽动，急欲效法柏林、罗马和伯克利的激进学生们。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经常重复这一看法。这一说法也不无道理。小型的托洛茨基团体——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CR）一夜之间影响大增。该组织27岁的领导人阿兰·克里维纳不仅曾和鲁迪·杜奇克在柏林共事过，他还通过其同志托洛茨基组织——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密切关注着美国大学校园的事态发展。

殊为有意思的是，即将发挥最重要影响的团体却最不具意识形态色彩。这就是“三二二运动”，其领导人就是科恩-本迪特。该组织的成立原因并不清楚。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1968年在法国崭露头角的人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他们是对左派和右派的政治组织持有怀疑态度，并试图按照抛弃领导的反独裁主义方式来生活。他们反对冷战，因为冷战总是强调每个人都必须选择一边。他们反对戴高乐，因为戴高乐总是说，“和我站在一起，否则共产主义者就会掌权。”他们赞同《休伦港宣言》中所表明的：通常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冷战给出的选择，而他们想要与之不同的选择。

“法国光复后错过了大好良机，很快冷战就冻结了一切。”热斯马尔说，“你必须选边站。1968年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创造另外一个空间的一次尝试，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要反对1968年运动的原因。”

60年代中期，在南泰尔的巴黎地铁站仍旧可以看到“狂热的南泰尔”的字眼，它暗示南泰尔是一位巴黎贵族的家乡。从那时起，这里就逐渐成为巴黎中产阶级舒适的度假郊区，房子建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两旁。后来工厂搬迁至此，而在座座工厂之间建立起的南泰尔大学几乎毫不起眼，周围是北非移民和葡萄牙移民的简陋房舍。一贫如洗的宿舍房间装着巨大的玻璃窗。同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美窗户一样，从那里向外望去就是贫民窟。相比之下，索邦大学的学生在巴黎这座美丽城市的中心生活和学习，并与中世纪的纪念碑、咖啡馆和餐馆比邻而居。而南泰尔大学的学生却没有咖啡馆，也无处可去。他们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宿舍房间。他们不允许更换家具，不能烹煮食物或是谈论政治，如果不是学生也不许进入。只有在征得父母允许后或已年过21岁，女生才被允许进入男生房间。男生则绝对不允许进女生房间。因此，女生们就经常习惯性地从宿舍门房的柜台下偷偷溜进男生房间。

南泰尔大学理应是最具革新进步精神的学校之一，因为该校鼓励学生们进行试验创新。但实际上，同许多其他大学一样，独断专制的学校体制使得南泰尔大学的改革几无可能性。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在南泰尔大学，这种极高的期望导致诞生了一个彻底失望并满怀愤懑的学生组织。1967年，对学校试图进行改革的失败进一步使学生们感到无可奈何，并促使一些具有政治活动背景的学生创建了一个名为“狂人”（enrages）的组织——这个名字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字面意思就是“愤怒的人”。所谓的“狂人”不过仅有25人而已，但他们却以切·格瓦拉的名义迫使学校停课，并制造出他们能想象出的各种混乱局面。和汤姆·海登一样，他们坚信大学存在的问题不能通过改革学校体制来解决，而只能彻底改变社会。

这一组织并不十分讨人喜欢。这25个恶作剧者如何能在3月份时变成一支1000人的队伍，几周后变成5.5万人，到5月底时竟变成1000万人，并几乎导致整个法国陷入瘫痪状态。这是一个极端狂热的政府所造成的后果的证明。如果从一开始政府就对这些“狂人”不予理会，法国或许就根本不

会有1968年运动。回首往事时，科恩-本迪特不禁摇头。“如果政府没考虑过去镇压这场运动，”他断言，“我们将根本不会上升到为自由而战的程度。会有一些零星的抗议示威活动，仅此而已。”

1968年1月26日，警察冲入南泰尔大学校园，试图强行解散由三十多名“狂人”所组织的集会活动。警方进入校园激怒了学生和教师。正如其他国家的示威者在当年发现的那样，“狂人”们意识到，在这种怒火之下，他们只需发动示威游行就可以了，其余的事就由政府和警察去做。到3月为止，这是他们经常性的举动。由于南泰尔大学院长在学生人数增加后拒绝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这加剧了双方之间的紧张。他拒绝为四名因在巴黎歌剧院附近示威反对越战而被捕的南泰尔大学学生说情，这更进一步激怒了学生们。3月22日，拥有大约500名斗士的“狂人”组织突然从美国同道的策略中获得灵感，他们夺取了禁止入内的八楼教务处，并以言论自由的名义整晚占据在此。“三二二运动”就此诞生了。

4月17日，最具世界知名度的物理学家之一洛朗·施瓦茨代表政府来到南泰尔大学，试图就政府的1967年大学改革方案进行解释。学生们高喊着让他下台，声称他是反革命分子，不许他发言讲话。突然之间，科恩-本迪特，那位和蔼可亲、脸上带着革命宣传画上招牌式灿烂笑容的红头发学生拿过了麦克风。“让他讲话，”他说，“他说完之后，如果我们觉得他已经堕落了，我们就喊，‘洛朗·施瓦茨先生，我们觉得你已经堕落了。’”

这是典型的科恩-本迪特时刻，言语充满魅力而又恰到好处且不失威严。

5月2日，这个使一切事态升级的关键一天纯粹是个闹剧。与哥伦比亚大学一样，巴黎大学做出决定几乎基于同样的错误策略，即试图通过对学生领袖进行纪律惩戒来压制学生运动。科恩-本迪特被要求到巴黎大学总部纪律委员会接受训斥。这激怒了南泰尔大学的学生。他们于是决定以扩音器发动抗议来罢课。但他们手上没有扩音器，束手无策且无可奈何的南泰尔大学校长皮埃尔·格拉潘拒绝让学生们使用学校的扩音器。那些自认为是“直

接行动的革命者”（由德布雷推广的概念）的学生，索性冲进格拉潘的办公室抢过扩音器。瞅住一个自己采取直接行动的机会，格拉潘校长锁住办公室门，把那群学生关在了里面。但他的胜利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学生们打破了窗户，然后带着扩音器逃之夭夭。

巴黎街道上的法律和秩序逐渐让戴高乐变得不安起来，因为解决越南冲突的巴黎和谈即将开始。他特别调遣了防暴特别警察分遣队共和国保安部队（CRS）布防巴黎。应格拉潘校长的请求，教育部关闭了南泰尔大学。这一特别的决定，将学生运动从偏远的郊区转移到了巴黎市中心。

那个时候，巴黎市到处都是准备报道越南和谈的国际新闻媒体。在商定地点和人员以后，越南谈判代表团于5月14日安顿下来开始讨论谈判主厅开几扇门——北越方面坚持开两扇——接着讨论是安排方桌、矩形桌、圆桌还是菱形桌子——不同形状的桌子会影响到座位的安排。然而，双方正在谈判一事使市场，特别是纽约股票交易所显著上涨。

南泰尔大学的那群学生涌进了巴黎，来到索邦大学。科恩-本迪特找到了一个扩音器，这后来也成为他的标志。但索邦大学校长不顾警察局长的劝告，让警方进入索邦大学逮捕学生。警方闯入索邦校园还是没有先例的。而校方对愤怒的学生们的反应也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关闭了校园，这在索邦大学700年建校史上还是首次。包括科恩-本迪特和全法学生联合会负责人雅克·索瓦诺在内的600名学生遭到逮捕。阿兰·热斯马尔号召星期一发动全国教师罢工。就在此时，被惹恼的戴高乐断定此次示威运动是由那些因为考试无法过关而想使学院关闭的二流学生所领导。“追随科恩-本迪特的就是这些人。这些无法无天的学生让其他学生惊吓不已：所谓的‘狂人’只有百分之一，而百分之九十九是等待着政府来保护他们的小绵羊们。”科恩-本迪特、索瓦诺和热斯马尔组成了非正式的领导集体。这三人几乎形影不离。不过他们后来承认，他们当时并没有任何打算，甚至连各自的理念也不一样。“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点。”科恩-本迪特说。“他们两个人之间共同之

处更多一点。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我们的成长经历不一样。我是放任自由主义者；他们则来自社会主义传统。”

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法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对他们持反对立场。“撕下这些冒牌革命者的假面具。”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写道。但最为知名的共产党人让-保罗·萨特却站在学生们一边，在关键的节骨眼上给学生们带来成熟、冷静和权威的声音。法国政府本想逮捕萨特，但据说戴高乐拒绝了这一建议，称“伏尔泰是不能被抓的”。

和其他学生领袖不同，科恩-本迪特并没有太多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许这也是他最受人欢迎的原因。他的诉求属于个人性质。他个子矮壮结实，会出其不意地放声大笑。他的红头发蓬乱地向外凸起，但他自己却怡然自得。他喜欢开玩笑，也不无幽默感。但开口说话时，他那种幽默即具有了尖锐而讽刺的鲜明特色。当情绪激昂时，他的声音也会随之变大。在一种热衷虚华浮饰语言的政治文化中，他显得自然、真诚而热情。

官方在科恩-本迪特的德裔身份上大做文章。德国学生是欧洲最为知名的激进分子。和法国的激进学生一样，科恩-本迪特也和德国学生们有所往来。他参与了他们2月时举行的反越战集会游行，甚至还曾和鲁迪·杜奇克有缘一晤。5月份，当他以“红色达尼埃尔”而广为人知时，这一称谓指的不仅是他的红头发，还与被称做“红色鲁迪”的杜奇克有关。

但科恩-本迪特并不认为自己是鲁迪·杜奇克。“三二二运动”也和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这种目标明确、高度统一的全国性组织毫无相同之处。“三二二运动”没有日常议程或是组织。在1968年时，没有人愿意被称做领袖。但科恩-本迪特却与众不同。“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声称反权威，”他指出，“但实际上杜奇克就是领袖。我是某种类型的领袖。我逐渐慢慢地接受了，因为我在合适的时候和合适的地点发言。”

他与1968年代的其他学生领袖不同。比如马克·拉德就曾说过：“我是领导人，因为我愿意承受压力。”

对科恩-本迪特来说，全世界的学生运动以及学生领袖们之间不无关联，但这种联系不是来自于会面或是思想交流。这些学生领袖们大多数都从未曾谋面。“我们通过电视‘见面’。”他说，“通过在电视上观看彼此的画面。我们是最早的电视一代。我们之间没有关系，但通过在电视上看到彼此的画面所得出的想象，我们拥有了某种联系。”

5月底时，戴高乐开始确信，有一股反对法国的国际阴谋势力。也有传言称有外国资金资助，其中的怀疑对象包括中情局和以色列当局。戴高乐表示，“所有这些运动不可能都在同一时间内、在这么多国家爆发而没有组织。”

但并没有什么预谋，国际性甚至法国内部的预谋都没有。科恩-本迪特谈及5月事件时表示，“一切发生得这么快。我都来不及做什么。事情一发生，就必须做出决定。”“红色达尼埃尔”或巴黎街头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所做的，就是本能地随着事态的发展而做出反应。热斯马尔、科恩-本迪特和克里维纳等这些学生领袖以及普通的参与者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没有任何计划。

此时的事态不由让人想起60年代初期始于诗歌并转向政治领域的“情境主义运动”。他们自称“情境主义者”，认为人们只需创造一个情境，然后退居一旁，那么事情就会发生。这就是情境主义者的梦想成真。

科恩-本迪特承认，“学生运动的激烈程度让我十分吃惊。我感到激动万分。每天都在改变。我们的角色改变了。我，一所小型大学的学生领袖，在三个星期内就变成了世界知名的‘红色达尼埃尔’。”

运动的规模每天都在以完全一样的模式在不断扩大。每一次官方采取惩罚性措施——逮捕学生、关闭学校——这只会增加学生们的要求并使得愤怒的学生越来越多。每次学生发动示威游行，加入的群众就更多。这也引来更多警察，随之激起更大民愤而形成更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没有人知道最终将

向何处去。有些较为传统的激进分子，比如热斯马尔，相信这是一场将从根本上铲除旧有方式从而改变法国或欧洲社会的革命的开端。但笑容灿烂、举止大方的科恩-本迪特却对未来没有任何想法。“每个人都问我，‘这将如何收场？’。”科恩-本迪特回忆说，“我就会告诉他们，‘我不知道’。”

5月6日，星期一，一千名学生出席见证了科恩-本迪特在位于索邦的巴黎大学总部纪律委员会作证的场面。同样地，有一千余人的共和国保安部队分遣队到场。他们头戴黑色作战头盔，眼戴黑色护目镜，身穿特制黑色防水长上衣，手拿巨型盾牌。当他们进行攻击时，在空中挥舞着警棍让他们看起来就像入侵地球的邪恶外星人。

科恩-本迪特和几位友人从共和国保安部队身旁走过，并穿过千余名示威者，其笑容似乎让人群自动让出一条道路。科恩-本迪特向人群挥手并打招呼，永远是一副乐观的激进主义者的模样。

官方再次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禁止了当天的游行示威活动，这自然激起了更多的示威。学生们冲过拉丁区，越过塞纳河，几小时后来到索邦大学，要与共和国保安部队当面对峙。当他们发现共和国保安部队的人数如此之多时，他们绕道至学校后面，取道那条建于中世纪的圣杰克路。突然之间，挥舞着棍棒的共和国保安部队堵住去路。示威者默不做声，向后退去。

在示威者和共和国保安部队之间，是大街上一块空旷的无主空地。那里有二十多个受伤的示威者躺卧在鹅卵石路面上。一时之间，似乎没有人确切知道要做什么。突然，怒火中烧的示威者开始攻击共和国保安部队。他们排成一排，有人挖出地上的鹅卵石，其他人则以人传人的方式将石头递到队伍前面。前面的人冲进浓浓的催泪瓦斯，朝共和国保安部队扔掷石块。然后他们朝后退却，将车辆掀翻来堆置路障。疑神疑鬼的共和国保安部队平素习惯于控制街头局势，他们发动的一次次进攻都被击退了。他们之中的一些坚决而守纪的斗士，或许要等多年之后才能明白这些颇具威吓声势的官方队伍何以会被迫退却。

曾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征兵中逃役的弗朗索瓦·切鲁蒂经营着一家颇受欢迎的售卖左翼思想图书的书店。科恩一本迪特和其他激进学生们经常光顾此处。他表示，“1968年让我彻底感到震撼。我感觉到似乎在进行一场革命，从未见过如此情形。我目睹学生们设置街垒，而他们根本就对革命一无所知。他们还是念高中的孩子，甚至还不懂什么是政治。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什么计划。”

街头巷战导致成千上万的示威人群参加。至当天结束，官方表示有600名示威者和345名警察受伤。接下来的一周里，示威活动越来越多，抗议者打出共产党的红旗和无政府主义的黑旗。已经筑起60座街垒。街道两旁的市民从自家窗户看见那些年轻人勇敢地与警察抗争后，他们来到街垒边给学生们的分发食物、毛毯和其他物品。

堪称警界精英的警察总署署长莫里斯·格里莫开始对其下属失去控制。因为普遍相信其控制警方的能力，格里莫半年前被任命为警察总署署长。他根本就不愿意接受此职。在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四年之后，格里莫感觉自己在职业生涯中已涉足所有想做的警方工作。他属于行政官僚，而并非警察。他看见自己的下属彻底震惊于示威者所表现出的暴力和坚韧力量。“战斗开始后，一直会持续至深夜。”格里莫表示，“战斗异常激烈，不仅是因为示威者的人数众多，还因为暴力的程度令人备感震惊，简直让那些警察们目瞪口呆。”在警方看来，1968年运动直接源自早已持续数年的反越战运动。但这次有所不同。警方不仅感到束手无策，他们的头部还受到砖头大小的鹅卵石袭击。一天天地，他们变得越发暴戾，也越发残忍。《世界报》登载一名示威者对5月12日发生于拉丁区的描述文章称：“警察把我们排成一排靠墙站着，命令我们把手放在头后，然后开始殴打我们。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但他们仍继续残暴地用警棍殴打我们。最后，他们停下手来，让我们站起来。我们许多人身上都满是鲜血。”警察变得越是残暴，加入示威者的人就越多。但是，与十几年前阿尔及利亚人的示威抗议不同，官方决定不向这

些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开火。因此，连夜的激烈战斗却并未有任何人致死，这简直是个奇迹。

和警方一样，科恩-本迪特也讶异于学生们的举动，但他无力控制局面。“暴力反抗存在于法国文化之中。”科恩-本迪特称，“我们试图避免事态升级。我觉得，以暴力为动力正在毁掉这场运动。和通常一样，我们正在暴力中失去想要传达的信息。黑豹组织的运动即是如此。”成熟后的科恩-本迪特在其回忆录中如是说。但当时的他绝非明确主张非暴力。在警方质询时，他承认曾参与印制和散发燃烧瓶制作图纸。但他解释说，那些传单本来是恶作剧而已，但结果却弄假成真了。这是1968年代的幽默。

传达官方立场的法国电视台对暴力事件大肆渲染。外国电视台亦是如此。挥舞警棍的共和国保安部队与投掷石块的年轻人混战一处，没有比这更好的电视题材了。电台与报纸也对暴力事件予以关注。欧洲一号电台特派记者在街头马不停蹄地采访报道，“现在这里发生的事态堪称绝无仅有，就在圣日耳曼中区，示威者三次发起进攻，共和国保安部队三次向后退却，现在——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现场直播，共和国保安部队正在发起进攻！”人们对这种语调已经产生厌烦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那个时代的摄影图片和影像胶片大多都与暴力事件有关。然而，对普通的法国参与者来说，那却根本与暴力无关。暴力事件也不是他们记忆最深的方面。那是一种娱乐消遣方式，法国人有了一种难得一见的激情：高谈阔论。

1968年时的南泰尔大学学生埃莉诺·巴赫塔泽说道，“那时的巴黎棒极了。每个人都在高谈阔论。”如果问任何一个对1968年春天怀有美好回忆的巴黎人，他们都会说：人们热衷于交谈。他们在街垒边交谈，在地铁中交谈；当他们占领奥德翁剧院(Odéon)时，那里变成了法国式夸夸其谈的彻夜狂欢之地。有人站起来，开始讨论革命的本质或者巴枯宁主义的价值以及切·格瓦拉所体现的无政府主义，其他人则会长篇大论地予以反驳。街头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第一次能与教师们和教授们一起交谈。工人们和学生们相

互之间交谈。在法国这个僵化、严谨、19世纪式的社会，每个人都和其他人开始交谈。房屋的围墙上写着“和你的邻居交谈”。阿兰·热斯马尔的妻子拉什蒂·热斯马尔说，“1968年的真正含义在于一种极大的解放感，一种自由感。人们随心所欲地交谈，在街上、大学校园里、剧院内。这绝不仅是投掷石块。那只是一时而已。整个的秩序和权威以及传统体系都被一扫而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许多自由都开始于1968年。”

在那种言论自由的狂热情绪中，许多新的俗语随之产生并被写在或贴在巴黎各地的围墙上和大门上。以下是上千条中的几例：

梦想即现实。

围墙就是双耳，双耳即是围墙。

夸张是创新的开始。

我不喜欢在围墙上书写。

侵略者并非反抗者，而是顺从者。

我们所需要的音乐是狂热而短暂的。

我宣布建立一个永恒的幸福国度。

街垒封锁了街道但却开辟出通路。

政治就在大街上。

索邦大学将成为索邦的斯大林格勒。

俗人的眼泪是上帝的甘露。

不要做机器人，也不要做奴隶。

强奸你的母校。

想象获得力量。

越做爱，越想革命。越革命，越想做爱。

性是美好的，毛主席说过，但不要过度。

我是格鲁乔派马克思主义者。

虽然不多，但也偶尔会有些涉及其他运动的话语，比如“黑人的力量引起白人的注意”以及“华沙学生万岁”。

写在圣西尔学院围墙上的一则宣言或许能表达出那个春天许多人的感受：“我有话要说，但我不知道想说什么。”

对那些有些想法的人来说，在围墙上书写太过于唠叨和啰唆——而且有些人确实在建筑上书写长篇大论的文字——如果能弄到一台油印机的话，他们就只用印一页小册子，然后在示威时散发。油印机，它曾经是激进政治运动的象征，其蜡纸打起字来也不太方便，但却在1968年最后一次风行一时。很快，它就被复印机所取代了。法国学生运动中也创办了几份报纸——一份较大的小报《行动报》，和一份较小的小报《狂人报》。在该报6月10日

影射戴高乐主义者的特刊中，登载了一幅落地马桶的漫画：马桶是当时法国最常使用的那种，它用象征戴高乐主义者的洛林十字架做马桶洞的拉手，并用法国三色旗做厕纸。示威者很快就发现，他们有成堆的报纸可以阅读或浏览。

索邦的美术学院和装饰艺术学院成立了“人民美术工作室”，在五六月间创作了三百五十多幅不同的丝印海报。这些海报以简洁有力的图画和与那些写在围墙上的标语语调一致的简练口号来描述一天的活动。这堪称迄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版画艺术创作高潮期。其中一张，是一只握着棍棒的拳头以及通常用来形容戴高乐统治特点的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还有一张是戴高乐的阴影捂住一位年轻人的嘴，并配上“年轻人，闭嘴”的文字。

警察将招贴画从墙上撕了下来，专门收集海报者也很快把它们从墙上撕下来，而且还有盗版印刷的版本在售卖，这让那些以艺术为业的学生们十分恼火。“革命不是用来出售的。”一位名叫让-克劳德·勒维克的艺术生称。工作室拒绝了两家欧洲知名出版商 70000 美元的出价。那年秋天，纽约现代艺术馆和纽约犹太艺术馆都展出了该工作室的作品。犹太艺术馆的展出以“靠墙站着”为名，系引用广为流传的勒鲁瓦·琼斯的名句。

人们不仅交谈，他们还唱歌。学生们高唱世界共产主义的主题歌《国际歌》，歌唱苏联、共产党，以及许多他们不表示认同的事情。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们来说，这可能有些奇怪。但对法国学生来说，这首创作于 1871 年巴黎公社时期、反抗法国极权主义统治的歌曲，就是一首反极权主义的战斗之歌。右翼们则以演唱法国国歌《马赛曲》来予以还击。这是有史以来创作的两首最为精彩的主题曲，因此在巴黎空旷的大街上，大批人群高唱上述歌曲的场面总是如此激动人心。两组人以不同的歌曲来各自区分自己，这也是理想的电视素材。

科恩-本迪特、索瓦诺和热斯马尔三人受邀与三名官方电视台记者进行辩论。在一段预录的讲话中，乔治·蓬皮杜总理，这位老牌的戴高乐主义者，

拥有老练的政治技巧以及有如美国休伯特·汉弗莱那种“一切马上都可能归我”的急切感。他解释说，观众们将看到三名恐怖的革命者。记者们十分紧张，吓人的革命者却轻松自如，科恩一本迪特则微笑着。

“我们击垮了他们，”科恩一本迪特说，“我开始意识到，我和媒体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我就是媒体的产物。自此以后，他们就跟在我身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媒体的宠儿。”

尽管官方电视台对时事进行了报道，但却进行了大段删减，重要事件都未能获准播出。记者们对节目频遭取消逐渐产生不满情绪，并最终与时代潮流同步。5月16日，电视台记者、摄像以及司机都开展了罢工。

至此出现的形势，是其他一些学生运动只能奢望的。那些学生运动往往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团体的加入。5月13日，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的纪念日，全法主要工会组织都发起大罢工行动。法国陷入瘫痪状态。汽车无油可加，巴黎人都走上空荡的街道相互交谈、争论。那段日子对他们来说是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

在晨边高地，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感到振奋不已。在华沙大学、在罗马、在柏林、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在伯克利，所有的学生都一样如此。法国人做到了——学生和工人携手战斗在一起。

事实上，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虽然有些年轻工人与工会不同，对学生们不无同情，但工会，特别是那些由共产党支持的工会，却并不同情学生们。或许学生们只是引爆了迟来的压抑情绪而已，因为工人们也逐渐对戴高乐的统治心生不满。工人们不想要革命，除了推翻戴高乐政权外，他们对学生们的问题并不关心。他们想要更好的工作环境、更高的工资以及更多的带薪休假时间。

“工人们和学生们从未站在一起过。”科恩一本迪特说，“……他们是两个独立的运动。工人们希望对工厂进行激进改革——工资等等。学生们则想

对生活方式进行激进变革。”

面对席卷全国的危机，戴高乐离法赴罗马尼亚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在巴黎因学生革命而陷入瘫痪之际，戴高乐却离开法国出访罗马尼亚，这看起来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内政部长克里斯蒂安·富歇对戴高乐的决定提出质疑，戴高乐则称，如果取消访问，罗马尼亚人民会难以谅解。富歇不卑不亢地反驳称，如果戴高乐不取消此行，则法国人民不会谅解。翌日清晨，当部长们为其送行时，法国的局势已登上世界多国主要报纸的头版。戴高乐宣称，“此次访问对法国的外交以及世界局势的缓和至关重要。至于国内的学生骚乱，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操心。”

戴高乐习惯于关注他所擅长的事情。学生问题是他根本无法理解的。相反，罗马尼亚不断显示出脱离苏联阵营的倾向。戴高乐一心梦想着在两大超级集团之间领导另一场运动——“一个从大西洋延伸到乌拉尔山的欧洲”，他总习惯这么说。因此，他对罗马尼亚的局势十分感兴趣。即便国家已陷入危机之中，外交事务仍优先于国内事务。在戴高乐出访时，蓬皮杜主持政务。这位总理对自己高超的谈判技巧不无自豪，他炮制出一份协议书，满足了学生们提出的大多数要求。他释放了那些被逮捕的学生，重新开放索邦大学并撤回了警察。这致使学生们又以占据奥德翁剧院的方式重新占领了学院，他们也开始了法国式口若悬河的辩论。但当学生们在进行精彩辩论之时，一千万名工人发动了罢工。食品商店空荡如洗，交通停顿，垃圾堆积如山。

蓬皮杜和戴高乐都很清楚，学生问题不同于工人问题。对他们而言，学生问题是个令其困惑不已的现象，但工人问题则属于他们熟悉的范畴。戴高乐主义者彻底抛弃了其经济政策，提出给工人们增加工资 10%，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减少工作时间以及增加福利。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并未征询政府财政部长及经济政策设计师米歇尔·德布雷的意见。当对外宣布时，德布雷提出了辞职。但罢工者很快拒绝了上述提议。

戴高乐看起来比以前更显苍老，也完全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缩短了访问罗马尼亚的行程返回法国，并不无深意地说，“改革？可以。一塌糊涂？不行。”法语中的“一塌糊涂”一词不太容易翻译，它是指床上杂乱的东西——一团糟。由此，人们创作了一幅美术招贴画，上画着戴高乐的轮廓并配有文字：“一塌糊涂，就是此人。”

法国政府决定将身为德国公民的科恩-本迪特驱逐出境，警界精英格里莫不赞成这一动议，因为他认为科恩-本迪特是学生中的稳定因素。在这场游戏中，官方理应及早认识到，正是自己的刺激挑衅行动让学生运动难以平息。但他们却根本没有看到这一点。

另外一个问题是，一想到要将一个犹太人驱逐回德国就难免激起人们痛苦的回忆。在纳粹占领期间，有 7.6 万名犹太人被法国警察驱逐到德国的死亡集中营。60 年代的法国尚仍未与 40 年代的法国达成和解，仍在附敌叛国的耻辱事实和戴高乐的英勇抵抗神话之间挣扎。1968 年 5 月充满了纳粹的记忆，虽然许多并非事实。共和国保安部队 (CRS) 被称做共和国纳粹党卫军 (CRSS)。在一张美术招贴画上，戴高乐揭开面具，露出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本来面容。另一张上，洛林十字架被扭曲变形成了纳粹万字符。因为驱逐科恩-本迪特事件，学生运动的口号随即变成了“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甚至连穆斯林学生也高喊此口号。在一场抗议驱逐科恩-本迪特的示威游行中，成千上万的人群所举的标语中也出现了这一句话。

纵观戴高乐的漫长政治生涯，在最为困难的时刻，他总是有办法采取正确措施并言辞得当。但这一次他却保持沉默。他回到乡下的老家，完全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在那里，他写道，“如果法国人不清楚自己的利益何在，那这对他们来说就太糟糕了。法国人已厌倦了一个强力的政府。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法国人天生就倾向于党派之争，喜争好辩却懦弱无能。我试图努力帮助他们克服这些……如果我没能成功，其他的我也就无能为力了。事情就是如此。”

5月24日，“伟大的夏尔”最终打破了沉默。他看起来疲惫不堪、备显老态，而且说话闪躲不定。戴高乐提议举行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继续其领导。没有人想要公投，它被视做是这位老谋深算的将军没有法律依据的臆想。当他发表谈话的时候，巴黎又爆发了骚乱事件，并蔓延到法国其他多个大城市。在巴黎，拉丁区的学生们已越过塞纳河，并试图纵火焚烧巴黎证券交易所大楼。



“我们都是犹太人和德国人”。达尼埃尔·科恩一本迪特和他著名的微笑。1968年巴黎学生的丝印海报。（旺斯·波堡画廊）

ATELIER POPULAIRE
11, rue de la Harpe, 75004 Paris

在法国充斥街头暴力的那几周里，颇令人惊讶的是，只有三人在冲突中丧生，其中两人在那个街垒巷战之夜丧命，包括在巴黎的数百名伤者中的一人和在里昂的一名警察总监。其后，一名示威者为逃避警察追赶而跳入塞纳河溺水身亡。

公投看来不可能举行了，且即便举行也无法胜算在握。戴高乐似乎又一次失踪了。尽管不可能，革命者们已感觉到胜利在望。至少，他们将推翻政府。政府或许已经摇摇欲坠了。密特朗和孟戴斯-弗朗斯都已准备好组织临时政府。很快人们就发现，戴高乐已飞赴驻扎在德国的法军司令部。戴高乐为何如此尚不得而知，但许多人担心他可能打算将驻德法军带回国内。当返回法国时，他变成了原来那个戴高乐——趾高气昂，充满自信，就如同他当初将犹太人称做“极权”民族时一样。公投被取消了，国民会议被解散，随之举行新的议会选举。戴高乐表示，法国正处于陷入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的边缘。他是能够再次拯救法国的不二人选。戴高乐主义者在香榭丽舍大街组织了示威游行，以示对戴高乐的支持。公众同意通过重新选举来重组政府，认同戴高乐将再次从灾难中拯救法国。据估计，约有一百万人参与了此次游行示威，以支持戴高乐结束混乱状态的呼吁。游行者高唱法国国歌，间或呼喊着“把科恩-本迪特送回德国达豪”（德国第一个纳粹集中营，建立于1933年3月）。

科恩-本迪特对此也曾有所耳闻。当他被逮捕时，一名警察用手指着他说道：“小朋友，你要付出代价的。太可惜了，你没和你父母一同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现在就不用再费工夫。”

科恩-本迪特的父母并不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但他身为犹太人这一事实却从未被人遗忘，只有在其运动组织内部时，他才觉得那从不曾是个问题。当然，热斯马尔、克里维纳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犹太裔。法国边缘化的左派运动已惯见大规模的犹太人参与其中。一个流行的法国笑话说：如果毛泽东主义者想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话，他们会使用什么语言？答案是：意第

绪语（犹太人的语言）。

官方最后提出一份一揽子方案，满足了工人们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分两步将工人工资增加 35%。工会和工人们满意地接受了该方案。只有少数年轻工人对方案将学生们抛在脑后而略有顾虑。

但那时候，戴高乐的所作所为有些反常和难以理喻：他从监狱中释放了 14 名秘密军事组织 OAS 成员。这一激进组织曾暗杀了许多阿尔及利亚人、法军军官和法国官员，试图以此阻止阿尔及利亚独立。这些人当中，包括拉乌尔·萨朗和安托万·阿尔古这两名法军军官，他们都曾参与 1961 至 1964 年间多起暗杀戴高乐的阴谋。为什么这些人被释放出来？难道是戴高乐在德国时为了得到军方支持而达成的某种协议？始终没有答案。但值此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十周年之际却没有庆祝，戴高乐的举动让法国人想起 1958 年时他为重新上台而与萨朗和阿尔及利亚军官们之间的秘密协定。

然而，为数众多的法国人似乎仍对左派执政抱着更大的怀疑态度。6 月 23 日，戴高乐主义者赢得了 43% 的选票。在一周后的第二轮投票中，他们在国民议会赢得了绝对多数。戴高乐主义者的表现比其最乐观的预计还要出色。左派丧失了其在议会的半数席位，学生和新左派一如既往没有获得代表席位。

由伯克利大学发动的声援法国学生和反对戴高乐的示威游行演变成持续两夜的骚乱，直到警察在伯克利实行全城宵禁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雕塑家阿尔贝的遗孀安妮特·贾科梅蒂终止了当年秋天拟在巴黎橘园美术馆举办的大型阿尔贝作品回顾展。她表示，此举是抗议“警方镇压学生和工人，驱逐外国人和外国艺术家”。其他几位艺术家也致函法国文化部表示取消演出。

阿兰·克里维纳说，“戴高乐是法国有史以来最睿智的政治家。戴高乐熟悉共产党人。他了解斯大林。与其相比，密特朗还显得十分稚嫩。蓬皮杜、吉斯卡尔、密特朗和希拉克——他们都是‘小戴高乐’——这些人都试图效仿戴高乐。1968 年时，戴高乐知道共产党人会同意举行大选，而不是

公投。公投是个小小的策略失误，没有人想举行公投。但一旦他提出大选，一切就成定局。他从未曾了解过学生，但其实这并不重要。他在1945年时拯救了右派势力，在1968年时他同样可以做得到。”

戴高乐已证明，他仍然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他不可能继续享有同样的威望，相反却只会慢慢减弱。他过后承认，“一切都从我手指中溜走。我再也不能掌握我自己的政府。”他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的恶作剧孩子形象被其国内事务极大地弱化了。他梦想着能给从越南战争、魁北克独立到中东等所有问题指明解决之道。这曾经看起来有些过于野心勃勃，但现在似乎已完全不可能了。《世界报》国际版编辑安德烈·方丹写道，这位将军“再也不能给所有人提出建议了”。

戴高乐不无怨恨地采取了报复措施，不仅对曾批评过他的印刷媒体，也不放过罢工的官方电视台。鉴于已逐渐获得来自国会的支持，戴高乐决定允许两家官方电视台中的一家播放广告。10月1日，在晚间新闻播出之前，观众们知道了蒜味奶酪和抗拉伸运动衫，而且还有奶粉的种种奇妙乐趣。起初，每天只允许播放两分钟广告，而且一般在晚间新闻之前，但逐渐地有所扩展。戴高乐也削减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电视新闻时段。

那年夏天早些时候，戴高乐找到了破解下一场左派造反运动的办法。早在1185年就有人发现拉丁区的鹅卵石路基可作为一种有效武器——那时是反抗保皇党人。在1830年以及1848年革命中，鹅卵石又一次次派上了用场。其后，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当人们首次唱响《国际歌》时也是如此。1968年时用力投掷石块的学生们十分熟悉这段历史。在一幅1968年的美术招贴画上，一块铺路石旁写着一行字：“21岁以下者，以此作为你的选票。”但这种情形却不可能再有了。8月时，戴高乐下令将拉丁区的鹅卵石街道铺上柏油沥青。

6月17日，在占领索邦大学长达月余时间后，最后一名学生也离开了。他们接到了纷至沓来的出书合同。就在最后一名学生反叛者离开索邦大学的

那一天，至少签订了35本有关学生运动的出书合同。首先出版的一本有关街头暴力巷战的照片集即很具代表性。科恩-本迪特说得对——当发生暴力事件时，本来想要传达的信息就丧失了。但许多其他的书籍接踵而至，其中包括由科恩-本迪特本人所写的以及有关他的书。在其所著的《左派主义——共产主义老年病的药方》一书中，科恩-本迪特开场即道歉说，“此书在五周之内写就，如此速度难免会有瑕疵，但出版商必须在市场完全被占领之前出书。”以一种科恩-本迪特典型特点的幽默方式，他写道：

在市场体系中，资本家们虽能在短期内通过传播革命思想来赚钱牟利，但他们已为自己的死亡做好准备（当然是指作为资本家，而并非他们个人）。为此，他们相当慷慨地付给我们报酬（科恩-本迪特还未动笔即已获得50000德国马克），即便他们知道这笔钱会被用来制作燃烧瓶。因为他们深信革命是无法避免的。这是用来愚弄他们的读者的。

革命或许是可行的，但1968年的法国并未发生革命。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者应该逐步建立根据地并传播其思想理念。但上述这些并没有在1968年出现。有的，只不过是对于一个令人窒息压抑而死气沉沉的社会所爆发的反抗而已。它所带来的是一次改革，而不是革命。想要革命的只是学生而已。他们并没有将这一革命的理念灌输给工人或是社会大众。这印证了加缪在50年代初期的话，即人们如此地渴望和平，以至他们愿意忍受不公。大学变得些微有点民主；老师和学生们之间可以沟通交谈。社会则脱离19世纪进入20世纪晚期。但对欧洲而言，这一时期充斥着物质主义而少有青年学生们所渴望的精神追求。

科恩-本迪特本以为几周后就可以返回法国，但他被允许再次入境已是10年之后。“这救了我。”科恩-本迪特谈到自己被驱逐时说，“如此之快便暴得大名，人就很难正确认识自己。在德国，我必须重塑自己。”

9月时，在法兰克福书展举行时，法兰克福的一座教堂内演奏着莫扎特四重奏来欢迎塞内加尔总统列奥波德·桑戈尔。教堂外，成千上万呼喊“自由奖漂白了桑戈尔”口号的民众被警方的高压水枪强行冲散。学生们抗议将此和平奖颁给一位对学生进行极端压制的政府领袖。当瓶子和石头漫天飞舞，警方试图控制人群时，一位个子矮小红色头发的人，重塑之后的“红色达尼埃尔”越过了警方的铁丝网路障。在抓捕过程中，他被橡胶警棍殴打了好几下。

当科恩-本迪特在法庭上面对法官之时，他发现巧合的是，波兰学生运动领袖亚采克·库龙和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也预期于同一周内在华沙受审。



“1968年5月：一场旷日持久斗争的开端。”1968年巴黎学生的丝印海报。（旺斯，波堡画廊）

上述情形被巴黎方面密切关注，特别是受到阿兰·克里维纳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持。这一点，他们经常在示威游行中高喊口号：“释放库龙和莫泽莱夫斯基。”在法国，当警察闯入大学校园尚属不可思议之时，托洛茨基主义者经常流传这样一个笑话：谁是世界上受过最好教育的警察？答案：波兰警察，因为他们经常到大学里去。

当科恩-本迪特在法兰克福一间法庭出庭时，其年轻的追随者们挤满了法庭。这时法官问他的名字，科恩-本迪特感觉到时机成熟，也有合适的听众。于是他以清晰而响亮的声音回答道：“库龙和莫泽莱夫斯基”。

“什么？”法官问道。“谁？”他追问，看起来似乎要确定科恩-本迪特是不是个疯子。

“什么？”他那帮年轻的支持者们也小声嘟哝着，“谁？他说什么？”

科恩-本迪特意识到，包括法官在内，法庭内没有人知道谁是库龙和莫泽莱夫斯基。他不得不解释道，他们是波兰的异议分子，告诉他们关于公开信和学生运动以及他们也在本周受审的事情。等所有的事情解释清楚后，最佳时机已经丧失了。正如阿比·霍夫曼指出的，详尽的解释无疑是戏剧最为致命之处。

理想之地

春天总是美好的；当油菜花盛开的时候，真理将获得胜利。

——1968年时捷克学生的口号

当寒冷潮湿的天气逐渐变得越来越长也慢慢变暖，太阳重新出现在阴暗而古老的布拉格城时，这座城市的青年人开始变得充满乐观情绪。在那年春天，这种情绪从几个方面都可以被发现。巴黎人的高谈阔论中并没有结束越战的迹象；比夫拉战争造成生活在饥馑中的儿童；中东和平似乎遥遥无期；波兰、法国和德国的学生运动都已被镇压下去——但在布拉格，却不无乐观，或者至少说是有决心。新的俱乐部开张了，尽管是经过几次示威抗争后才得以开门。俱乐部里的小伙子蓄着长发，姑娘们穿着同巴黎一样的迷你裙、天鹅绒皮靴以及渔网丝袜，自动点唱机则播放着美国音乐。

2月15日那天，成千上万的布拉格人，特别是青年人，走上街头庆祝捷克斯洛伐克曲棍球队在法国格勒诺布尔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上以5比4击败了不可战胜的苏联队——似乎人们就再也离开过街头。他们讨论那场比赛长达数周之久。人们普遍相信，如果诺沃提尼仍在继续掌权的话，捷克斯洛伐克队无论如何是不会允许赢得比赛的。没人能说到底诺沃提尼会如何加以阻止，但一言以蔽之，有诺沃提尼在，一切都将不可能发生；相反，没有了

诺沃提尼，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当从邻国波兰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时，捷克斯洛伐克媒体却以一种直白和公开的方式报道了在那里发生的学生运动，令其观众感到振奋甚至震惊。

新闻媒体——报纸、广播以及电视——几乎仍都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但让读者们、听众们以及观众们备感诧异的是，政府正利用媒体推广民主观念——共产主义民主，需要强调指出这一点。独立且具改革意识的作家协会曾一度被视做异议分子集团，现在则被允许开办自己的刊物——《文学报》，但他们不得不尽力争取足够的纸张配额来满足这本周刊的需要。现在的事情就是如此。高层官员放开一条道路，但下层官僚却仍试图从中作梗。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杜布切克将那些老派的卫道士们逐一肃清之后，这样的事就很少发生了。

礼宾官员在拜见这位新领导人后建议称，杜布切克那简陋的酒店房间不宜再做其官邸。他们给杜布切克看了许多房子，但他却说，“这对我家人的需要以及我的品位而言过于宽敞了。”最后，他接受了在郊外的一套有四个房间的房子。

对于一个受共产党培养并习惯于将含混言语留待进一步解释的人来说，杜布切克的说话却出人意料地直截了当、简单明了。人们发现他的话不仅条理清晰，而且甚至十分悦耳。杜布切克说：“民主不仅是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机会，而且还是如何对待人们所发表的言论，他们是否真正感到共同的责任和共同的决策，是否真正感到他们在参与决策和解决重大问题。”

人们对杜布切克的话深信不疑。会议变成了冗长的辩论。通常是枯燥无味、毫无悬念的农业合作代表大会结果成了一场喧闹事件，农民们确实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他们要求更多的民主集中，要求代表农民利益的陈情者以及与工业相当的收益。3月召开的全国66个地区党组织会议同样直截了当且吵闹喧嚷。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对政府官员提出质问，对他们认为不能接受的答复提出不满和挑战。

和勃列日涅夫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外的许多人都很怀疑，杜布切克是不是比其预想的走得更远，并且正在失去控制。“自由（这瓶酒），”《巴黎竞赛》的文章写道，“在经历过一代人的禁酒时期之后，如果不掺水就喝未免太过浓烈了。杜布切克毕竟是苏联培养的精英人才——一名共产主义者。他有可能被他所解放的力量席卷而去吗？等他想要踩刹车时，会不会已经太迟？”

杜布切克曾在苏联内地生活过，他以为自己对苏联的了解很深，但他只能对勃列日涅夫政府的内部运作机制做出猜测。他从未走近过勃列日涅夫，也从不曾对他感到十分亲切。杜布切克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正是勃列日涅夫总让我想起那种根本不受人欢迎的男人之间相互亲吻的俄罗斯风俗。”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迫不及待地想尽快地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因此想要回头未免有些太迟。但杜布切克知道，他必须清楚地掌控事态发展。他对同僚抱怨，人们所求过于急迫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他不止一次地对中央委员会书记兹德涅克·姆利纳日抱怨说。“要是诺沃提尼在位，他们恐怕是不敢这么做的。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政府不断告诫民众，改革不能走得太快。杜布切克的失误在于，正如他后来承认的那样，他不懂自己的时间有限。他以为通过渐进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的盟友苏联加入进来。杜布切克的每次演讲都十分谨慎，甚至再次重申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的效忠之意，对亲纳粹的西德的蔑视不满以及对东德的赞赏钦佩和友好情谊。如果真是如此，那他对东德示好并未赢得对方善意的回应。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是杜布切克最为激烈的批评者之一。

当诺沃提尼仍是捷克总统时，改革进程很难走得太远，但诺沃提尼及其子涉嫌与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贪污腐败丑闻有关，这导致他在被解除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仅数月之后即终止了第二个总统任期。在最后关头，他试图招徕一些支持者，于是他突然变成了一位“普通人”。人们看见他在一间工人酒吧内和青年人在一起喝啤酒。但诺沃提尼的形象实在太不受人欢迎。3月22

日，他别无选择，只得辞去总统职务。

杜布切克并不能放手任命接替诺沃提尼的人选，因为殊为重要的是，新总统不仅应该是个能和自己共事的人，同时也要令勃列日涅夫感到满意，至少不能惹恼他。不同的团体纷纷致函推荐各式人选。在苏联集团阵营中，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对政府首脑任命进行的公开讨论。学生们属意47岁的切斯特米尔·齐萨日，一位著名的改革派和不无个人魅力的电视名人。在诺沃提尼时期，齐萨日的自由主义观念受到冷遇。他正是那种无法让莫斯科消除担心的人选。

知识界和部分学生也对57岁的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怀有好感，而东德政府对其攻击指责却使其更受欢迎。最后，杜布切克选择了三名最佳人选中支持度最低的72岁的退役将军卢德维克·斯沃博达。斯沃博达是“二战”英雄，他曾与苏军并肩作战。其他竞争者被委以重任，但相对总统一职显得较轻。新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们以抗议示威支持齐萨日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此次示威活动前所未有地持续数小时而未受干扰。午夜时，示威学生们来到共产党中央总部，并高喊要求与杜布切克对话。

这年5月，捷克邻国波兰的学生因为要求言论自由而被警棍殴打倒在地。当得知学生示威游行时，杜布切克正在自己家中。其反应似乎表明，这种事情在共产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是很正常的：他赶到党中央总部和学生们进行对话。他试图对学生们解释其选择的理由，表示其他候选人也是政府其他部门所亟须的。他并向学生们保证，齐萨日会在中央委员会担任重要职务。一名学生质问杜布切克：“那么如何保证过去的日子不会重来？”

杜布切克回答说：“你们自己就是保证。你们，这些年轻人。”

在苏联阵营中可能会有共产主义民主吗？有人不敢如此期望，但学生们对杜布切克深信不疑，他们就是保证者。因此，当斯沃博达就职时，学生们发起了一次持续数小时的静坐示威，为了表示抗议，或者仅仅是以此表明捷

克斯洛伐克的学生也能如此。

当春天带着所有的希望来到布拉格时，并非所有的人都感到快乐。在4月份，平均每天都会有一位政治人物自杀。首先自杀的是捷克最高法院副院长约瑟夫·布热坦斯基，他被发现在布拉格郊外树林中的树上自缢身亡。约瑟夫一直在推动一项大规模的新工程，试图撤销从50年代以来的冤假错案。据信，约瑟夫是害怕自己会在几起无辜者案件中的作用被揭发出来。每天都有此类爆料出现，电视在其中起到了突出作用。受害人接受电视采访。更令人震惊的是，有些犯罪作恶者也接受电视采访，全国的观众都看到他们局促不安地闪烁其词。电视台摄像人员也到全国各地去拍摄普通民众的看法和意见。此举掀起了对过去二十多年政府统治下不公正性的全国性讨论。

在冬天开始的群众集会和公共聚会在春天时开始呈现席卷之势，其中许多也进行了电视转播。人们看见学生和工人们以尖锐甚至充满敌意的问题挑战政府官员。在一个公众对大多数反应迟钝的官僚都知之甚少的国度，那些在镜头前举止得当以及在话筒前侃侃而谈的官员们，比如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现在成为了全国范围的媒体新星。

有人提出质疑，如果杜布切克想要以浅尝辄止的民主取悦大众，那么事态的发展就不应该如此。群众得到的越多，他们想要的也越多。这些诉求也逐渐引起了政治反对派的关注。《文学报》一贯支持这种观念，就如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和哲学家伊万·斯维塔克。斯维塔克曾著文称，根本就没有什么改革，不过是借权力斗争而乘机采取的些许零星举措而已。在斯维塔克看来，整个党的机构都必须彻底根除。“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清算，否则它就会清算我们。”报纸和广播电视媒体都是政治改革的急先锋，它们都意识到，尽管官方审查机构不再进行审查，但其影响仍然存在，而媒体想要的是立法禁止审查。一名电台编辑表示，“只有在党允许时我们才享有新闻自由，这是一种可能被取消的民主。”杜布切克警告他们不要得寸进

尺。尽管他没有这么说，但他肯定知道勃列日涅夫不会容忍放弃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地位。

4月时，杜布切克颁布《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其中提出了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民主模式”。杜布切克政府的官方立场最终得以阐述：宣布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享有平等地位，政府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个人信仰和政治理念不受秘密警察审查，同时还谴责政府过去的滥权行为以及权力垄断。

莫斯科《真理报》发表的文章表明，苏联对此感到不悦。《真理报》写道：“资产阶级因素”正在削弱社会主义。到夏天时，则称捷克电视台正在发起反苏宣传。其中问题之一在于，调查过去罪行的努力结果却总是将线索引向莫斯科。扬·马萨里克之谜即是一例。马萨里克曾任捷克外交部长，是捷克首届总统之子。在1948年共产党政变（“二月事件”）中，马萨里克跳窗而死，也许是失足跌落或被人推出窗外。20年来，这一悬案一直无人过问，但捷克人最终想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4月2日，布拉格的一份学生周报刊登了一篇由伊万·斯维塔克撰写的文章，要求重新调查该案。斯维塔克指有证据显示弗朗兹·施拉姆少校与该案有关。施拉姆曾是捷克安全警察与苏联安全警察之间的联络官员。捷克国内外的媒体均在探讨一个假设，即马萨里克是在斯大林直接授意下被暗杀的。在某些版本中，苏联特工将马萨里克从床上拉下来拖到窗口，然后把他扔了出去。50年代的冤案调查也将矛头指向苏联。但此时的苏联还未准备好检讨斯大林的罪行，因为两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在斯大林时期也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多数共产主义国家，五一节是一个举行漫长阅兵游行、展示昂贵武器以及发表长篇演讲的场合。但在布拉格，仍一直保留着一种古老的迎春仪式。三年前，艾伦·金斯堡在布拉格被加冕为“五月之王”，但旋即被驱逐出境。今年的五一节，人们潮水般地涌向街头，在穿过官方检阅台时举起标

语和旗帜。有人举着美国国旗，有人举着以色列国旗。如果说去年还是禁止此举的话，那么今年则成为时尚流行。那些标语包括：

少些纪念碑，多些思想。

做爱，不要打仗。

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民主。

让以色列生存。

我愿意生育以增加我们的人口，但我居无定所。

端坐在检阅台的官方嘉宾们开始变得有些不自在了。在看到一幅标语称保加利亚拥有主权的马其顿属于南斯拉夫时，保加利亚大使愤怒地拂袖而去。人群围住了杜布切克。成百上千的人想要和这位个子高大、满脸笑容的领导人握手。警察们赶紧冲上来为杜布切克解围，这让人们想起一年前警方也曾介入。一名布拉格的党干部走到麦克风前向大家表示道歉，并解释说人群太多让总书记无法脱身。警方未使用暴力，人们也似乎对此予以理解。但其他苏联阵营国家的代表却被此情此景惊呆了。那晚，示威人群行进到波兰大使馆，以抗议波兰政府对待学生的方式以及从波兰驱逐犹太人的反犹太复国运动。两天后，抗议波兰的示威者越来越多。这时，杜布切克却突然飞赴莫斯科。

由于没有任何解释，捷克国内产生了相当的焦虑不安情绪。杜布切克发表公报称，“好朋友之间不拘于外交礼节是很常见的事，”且苏联已直截了当地表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进程”并非对社会主义的攻击。但这并没能

让捷克人心情平复下来。杜布切克似乎在说，苏联人的关切是合情合理的；他并补充说，捷克共产党一贯对此类“过激行为”有所警惕。这份声明丝毫没有使捷克人民得以安抚，而其莫斯科之行似乎也没能让苏联人平息怒火。

1968年5月9日那天，想要吸引世界的目光并不容易。哥伦比亚大学和索邦大学都已被关闭。学生们在巴黎街头堆建起堡垒。罗伯特·肯尼迪赢得印第安纳州初选胜利，从而巩固了其总统竞选提名人的地位。巴黎开始举行和平谈判。投资者开始了疯狂购物潮。在这众多事件之外更有传言称，大批驻扎于东德和波兰的苏军正朝捷克边境进发。试图到边境地区一探究竟的记者们被波兰边境的路障所阻挡。一天前，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东德的乌布利希、匈牙利总理卡达尔以及波兰的哥穆尔卡齐聚莫斯科会晤，并发表过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公报。即便以共产主义者的标准来衡量，公报的措辞也算是复杂艰深且闪烁其词，没人能解读出它到底试图要表达什么意思。他们已经决定要入侵了吗？

第二天，捷克新闻通讯社报道称，这些不过是华沙条约组织正常的军事调动，他们预先也进行过警示。捷克国内外无人对此深信不疑，但至少危机似乎已经解除——就眼前来说。

随着捷克新自由而来的是文化领域的蓬勃发展。留着长发的瘦弱青年穿着蓝色牛仔，叫卖着刊载有摇滚乐、爵士乐以及戏剧消息的小报。1968年春天，素有戏剧之城之称的布拉格拥有22家上演戏剧的剧场。《纽约时报》的塔德·肖尔茨充满激情地断言，“布拉格根本就是一个西方化的城市，从其文化生活的类型和质量到最近对高领毛衣的狂热等各个方面。”他注意到，不仅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而且各部的官僚们甚至是出租车司机都穿着五颜六色的高领毛衣。

由于混合了斯拉夫和日耳曼文化，布拉格的确较其他中欧城市看起来更加西化。这是产生了卡夫卡和里尔克的城市，德语是他们共同的第二语言。



1968年布拉格五一劳动节游行
(约瑟夫·寇德卡 摄/玛格南图
片社)

这一点是其与斯洛伐克根本不同之处。斯洛伐克的首府布拉迪斯拉法不讲德语，并且具有鲜明的中欧特色。

那年春天，布拉格顶尖的爵士俱乐部是在绿树繁茂的林荫大道，即著名的温塞斯拉斯广场附近的雷杜塔。雷杜塔俱乐部是一个仅能舒适地容纳不超过百人的小房间，但却经常人满为患。在杜布切克时期之前，这家俱乐部以捷克第一支摇滚乐团“阿科多俱乐部”而闻名。曾经常光顾那里的哈维尔写道，“我不太懂音乐，但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就能看出，他们演唱的歌曲与

当时流行的官方歌曲《克里斯汀》或《布拉格是条金色的船》之间的基本差别。”当肖尔茨在1968年春造访此处时，他发现那里一支乐队在以“一种巴萨诺瓦式的新派爵士乐的韵味”翻唱戴夫·布鲁贝克的乐曲。

那年春天上演的戏剧中，有一出名为《谁害怕弗朗茨·卡夫卡》。这出戏始演于1963年，时值此前因资产阶级思想而遭禁的卡夫卡作品再度被允许演出之际。该剧名有意模仿爱德华·阿尔比的作品《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上演的另一出戏是弗朗齐歇克·朗格长期遭禁的《马背巡逻队》，一部关于1918年时期捷克反革命分子与布尔什维克战斗的作品。那年春天还有一出戏是伊日·塞克斯特和伊日·苏希的《最后一站》。塞克斯特和苏希二人被视为1968年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两位剧作家。该剧描写的是人们对杜布切克的改革可能被废除以及捷克可能又回到1月之前的老路的担心。

那年的国际电影节在卡罗维法利温泉胜地举行，这让人们兴奋不已。三周前，为表示对学生以及罢工者的同情和支持，导演让-库奇·戈达尔、弗朗索瓦·特吕福、克洛德·勒卢什、路易·马莱以及罗曼·波兰斯基等人抵制了戛纳电影节。包括阿兰·雷斯内的《我爱你，我爱你》等在内的戛纳电影节影片将有望在卡罗维法利上演。当戛纳电影节不顾雷斯内意愿试图放映《我爱你，我爱你》一片时，演员让-皮埃尔·莱奥德极力阻止幕布拉开让银幕投射影像。莱奥德在戈达尔关于新左派的新片《中国姑娘》(*La Chinoise*)中出任主演。卡罗维法利电影节也放映了三部无法在戛纳上映的捷克电影，包括伊日·门策尔导演的《严密监控的列车》(*Closely Watched Trains*)，该片后来获得196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那年春天，瓦茨拉夫·哈维尔并未和那群布拉格的文人置身一处，因为他在纽约，是1968年时出国旅行的50万捷克人中的一员。在很多年里，第一次旅行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在“布拉格之春”发生的那六周里，31岁的哈维尔正效力于约瑟夫·帕普在东村的莎士比亚戏剧节。他创作的一部关于办公室新式语言的荒诞喜剧《备忘录》(*Memorandum*)在此上演并很快

为其在西方戏剧界赢得声名。克莱夫·巴恩斯在《纽约时报》撰写的评论文章中指该剧“机敏睿智，发人深省”、“风格奇特，动人心弦”。其后，该剧还赢得了著名的“奥比奖”（Obie Award）。与此同时，哈维尔或许还对自托克维尔以来的美国民主有了较为感性的认识。他经常去东村的东费尔默剧场以及其他一些组织机构，在那里和备受骚乱困扰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们交谈。等返回捷克时，他带回了充满迷幻色彩的摇滚乐海报。

6月30日至7月10日，捷克举行了一次关于希望国家继续保持共产主义还是转向资本主义的民意调查。捷克人民的回答十分明确：89%的人想要保留共产主义，仅有5%的人表示想要资本主义。当被问及他们对现任政府的表现满意与否时，33%的人回答满意；54%的人表示部分满意。只有7%的人表示不满意。正与莫斯科虚与委蛇的杜布切克在国内却领导着一个快乐幸福、充满希望的共产主义国家。

但苏联人却不太高兴。到7月时，他们从三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中拿定了主意。要么设法让老谋深算的杜布切克就范，或者让捷克国内仍效忠苏联的领导人——苏联人似乎过高估计还有多少人仍然效忠——以武力夺取政权，或者苏联武装入侵。武装入侵是三种方案中的最后之选。在苏联1956年入侵匈牙利之后，经过了12年艰难的外交努力才缓和了西方世界的敌意和愤怒。入侵捷克将更难找到托词，因为杜布切克已不遗余力地表明自己并不反对苏联，而且，两国保持的长久友好关系可追溯至30年代。然而匈牙利曾是纳粹盟国且与苏联为敌。苏联人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于是捷克民族自愿选择了共产主义并欢迎与苏联结盟。正如在7月举行的调查所显示的，捷克民族仍然对共产主义情有独钟。

最后，正如动荡不稳的经济所要求的，苏联和西方的关系开始升温。这就是所谓的缓和。约翰逊政府一直都在努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在长时间的磋商谈判后，双方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7月底，经过10年断断续续的冷战式谈判，泛美航空公司和苏联国家航空公司开通了苏联和美国之间的首条

直航线路，这是其他更重要事件的良好开端。

然而，苏联已决意有一件事情他们不能冒险，那就是让捷克脱离自己的轨道，否则在其看来，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会随之效仿，而当时波兰的学生运动正势不可当。12年之后，匈牙利局势也难说平静。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杜布切克所有的声明和文章中，根本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想过要脱离苏联阵营。他清楚地将其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但苏联并不信任杜布切克，因为他不愿意以苏联要求的方式去治理自己的国家。

第二个选择，即内部政变的可能性不太可能。苏联希望选择方案一，在武力入侵前最后一次努力劝说“杜布切克同志”改弦易辙。很显然，在此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柯西金似乎是反对入侵的。西方两个最大的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致函莫斯科表示反对入侵捷克。

尽管如此，苏联还是将入侵作为选项之一。而一旦有所决定，它就可以易如反掌地付诸行动。大批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大多为苏军——全副武装地包围着捷克，从东德到波兰以及乌克兰并横贯匈牙利。据信有数以几十万计的部队正随时待命。边界唯一没有被坦克包围的是小国奥地利。在捷克国内，一场规模不小的关于反社会主义恐怖罪行的运动正在上演，这意在为苏联的入侵打算作准备。东德和波兰领导人已经准备就绪。7月时，苏联领导人与匈牙利总理卡达尔会晤以进行劝说。在7月3日会晤后，卡达尔和勃列日涅夫发表了有关“保卫社会主义”的措辞强硬的声明。

作为劝说杜布切克的最后努力，苏联命其来莫斯科商讨捷克局势。杜布切克对此种颐指气使的态度不满，认为这是对捷克内政的非法干涉。在他将苏方要求提交捷共中央主席团后，主席团以压倒性多数拒绝了莫斯科的邀请。很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史学家在场记录下勃列日涅夫对布拉格婉拒其提议时的反应。这是捷克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拒绝赴莫斯科出席会议的要求。

杜布切克自信他可以应付苏联人。对他来说，苏联入侵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捷克和苏联是朋友。就如同美国不可能侵略加拿大一样。他相信他

懂得如何让苏联人打消疑虑。当他与勃列日涅夫和苏联高层领导人谈话时，他知道该避讳什么。他从不会提什么“改革”或“改革者”，特别是“修正”。这些词语肯定会惹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6月时，上万名苏军被允许进入捷克境内做“军事演习”。演习是例常性的，但数以万计的兵力和上千台坦克等车辆就不同寻常了。演习原定于6月30日结束，但到7月份时苏军却仍未有撤离的迹象。捷克人民逐渐变得怒火中烧。明显是为了拖延时间，苏联人提出了一连串荒唐可笑的理由：他们需要修理装备，而紧接着“修理部队”开始进入捷克境内。备用装备出现问题，部队需要休整，他们考虑封锁交通，因为他们入境时通过的桥梁和道路看起来不太牢固，需要修整。

捷克国内流言四起，称境内的苏军带来了印刷机器以及广播干扰设备，捷克政治领导人的档案材料和要准备逮捕者的黑名单。

捷克政府要求苏军撤出境外。苏联则要求捷共主席团全体成员到莫斯科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会晤。布拉格回应称，他们认为会晤是个不错的提议，并“邀请”苏联主席团全体到捷克会面，因为苏联主席团全体成员还从未到访过苏联以外的地方。

杜布切克知道，他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但他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而捷克人显然不能接受投降之举。现在回想起来，使苏联在那年7月放弃入侵念头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捷克人民空前的团结一致。在此之前，从未有一个真正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只有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即便在捷克内部，也有摩拉维亚人和波西米亚（吉卜赛）人之别。但在1968年7月的那个时刻，有的只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即便境内外都有苏军部署以及苏联媒体舆论每日进行的非议诽谤，但捷克斯洛伐克人在用一个声音说话，而杜布切克有意加入这种声音。

7月31日凌晨3时许，一名铁道工人和几名斯洛伐克钢铁工人认出一位正在户外散步的人正是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同志，杜布切克于是邀请他们到

一间那时仍在营业的小饭馆。“他和我们在一起待了大约一个小时，向我们解释了当前的局势。”一名工人后来告诉斯洛伐克媒体。当工人们问杜布切克为何这么晚了还在外面时，杜布切克告诉他们最近几周来他只在凌晨3点到7点才能入睡。

捷克电视台采访了到访的苏联游客，询问他们有没有看到反革命活动以及是否受到了良好对待。苏联游客都对捷克和捷克人民予以极高评价并向苏联友好表示致敬。捷克和苏联最高主席团在匈牙利和乌克兰边境的斯洛伐克小镇切尔纳举行了为期四天的会议。8月2日，当会议结束时，杜布切克发表了电视讲话。在讲话中，杜布切克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保证，他们的国家主权并未受到威胁。他同时表示，与苏联的良好关系对捷克主权至关重要。他并对攻击苏联或社会主义的行为予以警告。

杜布切克要传达的信息就是，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人保持克制、不要刺激苏联人，那么就不会有入侵之事。第二天，最后一批苏军撤出了捷克斯洛伐克。

杜布切克似乎要控制言论自由。他似乎在这种对抗中取得胜利。有时候，生存即是最大的胜利。从布拉格之春到布拉格之夏，新一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已渡过难关。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撰文探讨，苏联人何以会做出让步？

东欧和西欧以及北美的青年人开始纷纷整装奔赴布拉格，想要看看这种新型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样子。布拉格那中世纪的黑砖墙上满是各国语言文字的涂鸦。布拉格仅有七千间酒店房间，经常是到处客满为患，有时候还得靠向酒店行贿才行。想要在布拉格为数不多的几家餐馆找到一张桌子变得十分困难，也很难看到没有乘客的出租车。8月的《纽约时报》写道：“对于那些三十岁以下的人来说，布拉格是今年夏天的理想之地。”

三、夏季奥运会

对宁静与和平的向往应该被抛在一边，它和对不公的接受是一致的。那些为他们过去所拥有的好日子哭泣的人承认，他们想要的不是缓解痛苦，而是对苦难的沉默。

——阿尔贝·加缪，《反抗者》1951年

禁足之地

在殖民地，真理是赤裸着的，但宗主国的公民们却喜欢它们穿上衣服。

——让-保罗·萨特，弗朗茨·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前言，1961年

1968年夏天，一切似乎都有所恶化。大学的学年度是一种灾难性的结果，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数百名学生离席以示抗议。尽管校长柯克为避免引起抗议而未出席。法国、意大利、德国以及西班牙的大学几无正常运作。6月时，在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以及厄瓜多尔和智利都爆发了学生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对抗。8月6日，里约热内卢的一场学生抗议示威活动被取消了，因为有1500名步兵以及配备有30辆轻型坦克、40辆装甲车、8辆载满机关枪的吉普车出现在现场。那些抗议示威通常是由一些基本的问题发端。在乌拉圭和厄瓜多尔，示威的最初原因是学校班车车费问题。

即便相对而言较为平静的英国最后也卷入了1968年的风潮之中。1968年底，英国学生占领了大学校园。事情最初发生在5月的霍恩西艺术与设计学院，这是在伦敦北部富人区的一所维多利亚式建筑。学生们在此开会讨论

全职学生会主席和运动计划等事务，但结果却接管了该建筑并要求对艺术教育进行根本性改革。他们的诉求传遍了英国所有艺术学校，并演变成为一场“三十三所艺术学院运动”。伯明翰艺术学院的学生拒绝参加期末考试。到6月底时，学生们仍占据着霍恩西学院。

巴黎和谈并未取得很大进展并陷入困境。那年夏天开始的第一天，《纽约时报》以措辞谨慎的标题《克利福德在越南谈判中收获甚微》为题，给美国人描绘了一幅惨淡的图景。至6月23日，越南战争已超过美国内战，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从1961年派遣第一支援助部队以来共计2376天。6月27日，越共对附近的美军和南越军队发起进攻。无意抑或有意地，他们纵火烧毁了南中国海岸边的山茶渔村，造成88名平民死亡以及一百余人受伤。同一天在美国，“全国结束越战动员委员会”主席戴维·德林杰表示，100个团体正在共同组织一系列的示威活动以敦促结束越战，所有活动都预期将在那年夏天民主党全国大会时于芝加哥举行。8月8日，在湄公河三角洲进行夜间巡逻的美军部队试图以火焰喷射器对越共发动攻击，造成72名一向对美军友好的才让村（Cairang）平民死亡。

在对弗朗哥的残酷统治逆来顺受数十年后，新一代的西班牙人开始以暴力对抗残暴的政权。1952年，五名对父辈们逆来顺受的态度不满的巴斯克青年组建了一个后来被称做“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的组织。至1968年时，以“埃塔（ETA）”而闻名的该组织主要活动是推广已被弗朗哥禁止使用的巴斯克语言。后来，埃塔组织成员开始焚烧西班牙国旗并损毁西班牙纪念碑。1968年，巴斯克语言学家创造了一种替代八种方言的统一语言。在1968年之前，语言上的困难从下面的例子中可见一斑：埃塔本来的名字用的是Aberri而非Euskadi，因此其首字母缩写是ATA。但在以ATA之名秘密活动六年后，他们发现在有些方言中，ATA的意思是鸭子，于是该组织更名为ETA。1968年的统一语言为巴斯克语言复兴扫清了道路。

但在1968年，埃塔开始转向暴力活动。当年6月7日，一名民防卫队

警察拦截盘查了一辆出租车，里面载有两名埃塔组织武装分子，埃塔武装分子开枪杀害了那名警察，其中一位名叫哈维·埃切贝里亚塔的人后来被西班牙官方抓获并处死。8月2日，为了替埃切贝里亚塔复仇，圣塞巴斯蒂安的一名令人讨厌的警察局长被埃塔组织枪杀在其住家门前，当时正在家门另一头的妻子听见了枪声。为回应此次袭击事件，西班牙政府几乎对巴斯克人宣战。至此，双方之间的围城拉锯状态一直持续至这一年年底。尽管欧洲爆发了抗议浪潮，但仍有数千人被捕并受到残酷折磨，有些被判处入狱数年。更为不幸的是，埃塔组织和西班牙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行动与反应和以暴易暴的模式，并一直持续至今。

在加勒比国家海地，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的执政已进入第11个年头。这位深受穷苦黑人喜爱的小国医生成了一名大屠杀刽子手。在一次年终记者招待会上，他教训美国记者道：“我希望你们在海地看到的民主进程将是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榜样，特别是在美国的黑人民权和政治权利方面。”

但在这位老奸巨猾且无法理喻的杜瓦利埃医生统治下，黑人甚至没有任何人能享有权利。作为世界上最为残忍暴戾的独裁政权之一，杜瓦利埃政府迫使许多中产和上层的海地人流亡海外，以致在加拿大的海地医生比在海地的还要多。1968年5月20日，一架B-25轰炸机飞抵海地首都太子港上空并投下一枚炸弹，结果只是在本已残破不堪的道路上留下又一个坑洞。第八次企图推翻杜瓦利埃的政变由此爆发。随后，从轰炸机上扔下一摞传单。传单并未四处飘散开来，因为来犯者没有解开捆绑的绳索。接着，另一枚炸弹被投向浅白色的国家宫殿。但炸弹却没有爆炸。太子港似乎安全无虞了。进攻转向了北部城市海地角。一架塞斯纳直升机在此降落后，机上人员随即以冲锋枪向一座无人值守的控制塔开火。入侵者迅即被海地陆军部队击毙或逮捕。8月7日，10名生擒者被处以死刑。

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克尔曾写过数本关于中东问题的著作。他在1968年5月撰文称，中东地区比越南蕴藏着更多潜在的危險。当年晚些时候，尼克松在其竞选演说中也持相同看法。中东局势之让世界胆战心惊，原因在于两个超级大国在该地区选边站队，从而使该地区冲突有演变为全球冲突的明显危险的迹象。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在进行军备竞赛。巴勒斯坦从苏联购买武器，而以色列人则从美国购买武器。由于以色列的盟国对其提供武器的速度赶不上苏联供应巴勒斯坦的速度，以色列也发展国产军工产业。

“逐渐地，”拉克尔写道，“全世界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即在不久的将来会爆发第四次巴以战争。”7月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预测下一场巴以战争将在五年内爆发。埃及政府坚持认为，其在“六日战争”中全面的军事溃退为一次“挫败”，以色列想以其在战争中夺取的土地来换取和平的计划未能奏效。土地涉及巨大的利益，但和平却不是。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甚至拒绝和以色列进行和谈。埃及政府发言人穆罕默德·黑卡坚持认为，另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许是因为示威抗议的埃及学生对埃及在上一次战争中的表现感到十分不满。在当时的学生运动已催生全球范围的校园反战抗议活动时，开罗的学生们抗议示威却是因为埃及在战争中表现不佳。因为自视为宗教国家，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号召发起一场圣战。但自认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叙利亚却选择发起一场人民战争。巴勒斯坦当局发动了被称做恐怖袭击的自杀式小型袭击，以色列则以猛烈炮火还击，并经常侵入约旦境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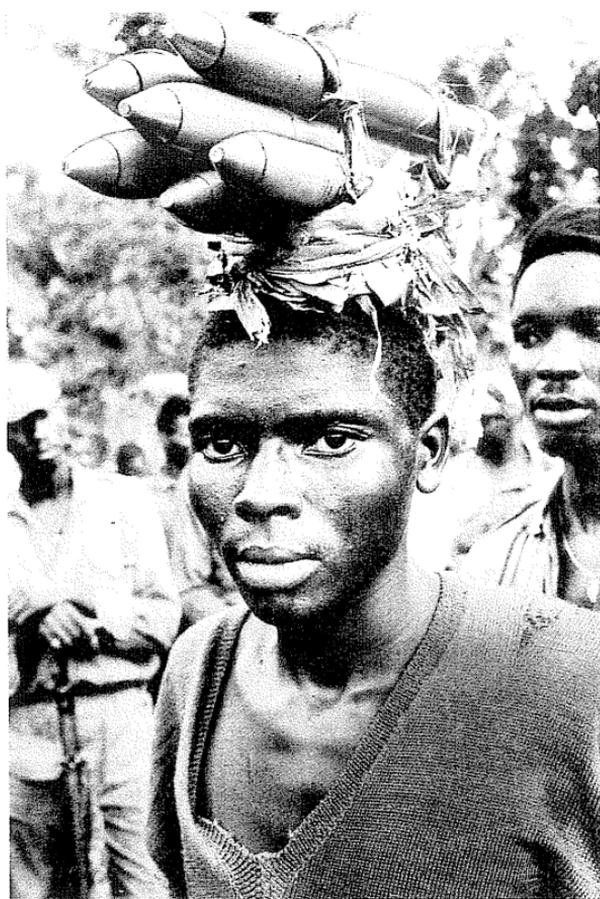
阿拉伯国家一致同意不与以色列谈判，因为这将在某种形式上表示对以色列占领的承认。然而，在拉克尔看来，有些国家开始认为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在谈判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即便取得的比实际要少得多，他们或许也会对此感到满足”。在法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9%的法国人认为以色列应该保留全部或部分其在1967年战争中新取得的领土，只有19%

的人认为以色列应将其归还。在英国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也表明，66%的人认为以色列应该至少保留部分的新占领土，仅有13%的人认为应当归还。

领土是观察者关注长达五年之久的原因所在，直到下一次战争爆发。如果说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战争中落败的话，下一次可能会更糟，因为以色列已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以及戈兰高地地区，许多人都已经在猜测纳赛尔在上次战败后可能被推翻，但现实情形却使中东局势发生了略微改变，这在当时还并不能看得十分清楚。阿拉伯国家采取了被称为“不和不战”的新政策，目的就是与以色列打消耗战。如果庞大的军队在常规战争中无法占据主导地位，那么退而求其次则是小规模恐怖行动。这里指的是巴勒斯坦。最初，巴勒斯坦的此类袭击行动是来自埃及方面的授意，在50年代得到纳赛尔资助。这种袭击成本不大，也得到阿拉伯公众的认同和接受。叙利亚从60年代中期开始提供资助。数百名游击战士在约旦和叙利亚境内受训，这大大加强了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实力，并加速了从“约旦被占领土地的阿拉伯人”到“巴勒斯坦人民”的转变进程。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都极力争夺对这些游击组织的控制权。但到1968年夏时，阿拉法特成功地使自己成为在约旦境内独立于侯赛因国王之外的一支力量。从其四年前的首次行动以来——试图炸毁一座抽水机，该组织经历了漫长的道路。

在1967年战争之前，以色列拒绝将其任何行动称做报复或是复仇。以色列官方审查机构甚至将这两个词从记者的新闻稿中删除。但到了1968年时，当以色列越过约旦和黎巴嫩两国边境打击巴勒斯坦游击队时，这两个词则成了常用语。

到那年夏天时，以色列政府提出“以土地换和平”的概念已历时一年。以色列人，如果不是以色列政府的话，已对这一想法不抱希望。他们开始纷纷迁入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这不同于他们曾梦想过的以色列，而比那领土更大。特拉维夫日报《国土报》的阿姆农·罗宾斯坦写道：“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将必须学会如何在一个长期非和平的状态下生存。”



1968年时的比夫拉军队士兵
(唐·麦卡林 摄 / 玛格南图片社)

在石油资源丰富的热带尼日尔河三角洲，人们长期生活的环境并不是非和平状态，而是公开的战争。据估计，约有五万人已在战斗中丧生。5月，在占领并摧毁了曾经一度繁荣兴盛的哈科特港后，尼日利亚军队实施了海上封锁，并以8.5万名兵力包围了比夫拉地区。比夫拉叛军被切断了同外界的所有联系。据报道称，尼日利亚军队屠杀了两家医院中的数百名比夫拉伤兵，这个不想成为尼日利亚一部分的分离小国以一支2.5万人的军队对抗有10万之众的尼日利亚军队。他们没有重武器，军火匮乏，甚至没有

足够的手持武器配发给每一名士兵。用苏联飞机并装备由埃及飞行员驾驶的尼日利亚空军对城镇和村庄进行了狂轰滥炸，以致尸横遍野，丧者无数。比夫拉人认为，尼日利亚人——他们通常指的是该国主要种族豪萨族人——意图进行种族灭绝。他们在空袭时特意将目标集中在学校、医院以及教堂。但在战争历时一年之后，最后引起世界关注的不是武器弹药的缺乏，而是食品的匮乏。

在全世界的报纸和杂志上开始出现瘦骨嶙峋的儿童的照片。他们张着满含忧伤且大得反常的双眼，看起来似乎活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些照片登载在新闻报道以及急切呼吁提供援助的广告中。但大多数的援助尝试都无法顺利进行。比夫拉人设置了一条秘密而危险的飞机跑道——一条清除了障碍的狭窄小路，并用煤油灯来指引为数不多的救援飞机降落。想要发现这条跑道，首先还不得不飞越尼日利亚方面由雷达控制的防空火力区域。

西方人学会了一个新词，“夸休可尔症（蛋白营养缺乏症）”，成千上万名儿童因致命性地缺乏营养蛋白而夭折。1963年，乌穆阿西亚市的伊丽莎白女王医院全年诊治的夸休可尔症患者为18例。然而据1968年8月的记者调查发现，这所医院收治的该症患者人数达每天1800例。据估计，每周约有1500至4000名比夫拉人死于饥饿。即便那些设法进入难民营的人也是经常挨饿。过去曾经有的食物变得不可企及。一只鸡在1967年时仅值70美分，但到1968年则飙升至5.50美元。人们被建议吃老鼠、狗、蜥蜴以及白蚁等来获取蛋白质。医院挤满了缺乏食物和药品或没有医生照顾的孩子。孩子们瘦得皮包骨头的幼小身体躺在草垫上；他们死去后，就用垫子包裹后埋在坑里。每天晚上，在掩埋好坑洞后，再为第二天挖掘一个新的备用。

尼日利亚不允许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救援飞机进来援助比夫拉的1000万人口，这其中有十分之一的人生活在难民营中。尼日利亚声称，此类救援飞行对尼空军执行任务造成不便。唯一为数不多的食物来源，是由国际救援组织资助的一些舍生忘死的飞行员送抵当地的。

由于关注于当年的繁忙事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这场战争显得并不十分热心。他们不支持比夫拉的建国要求，但却敦促尼日利亚允许救援飞机通过。然而7月31日时，尽管有迹象表明戴高乐的外交政策宏图行将终结，但法国政府却与其盟国及外交政策背道而驰，宣称支持比夫拉的自治要求。除法国之外，只有赞比亚、科特迪瓦、坦桑尼亚和加蓬等国正式承认比夫拉。8月2日，这场战争也成了美国政治的议题。参议员尤金·麦卡锡批评约翰逊总统几未施以援助并要求将此提交给联合国，同时坚持对比夫拉实施食品和药品物资空运。

美国人对此的反应就是成立了无数的援助组织。包括前“和平队”志愿者在内的“尼日利亚/比夫拉援助委员会”试图找到将援助物资运送至比夫拉的方式。21个主要的犹太组织、天主教救济会以及美国拯救比夫拉委员会均在寻求援助之道。美国红十字会从瑞士一家包机公司租用了一架DC-6型飞机，趁夜飞抵比夫拉。但慑于尼日利亚的防空炮火，在10次飞行行动之后被迫于8月10日中止。

8月13日，瑞典传奇飞行员卡尔·古斯塔夫·冯·罗森伯爵驾驶一架四引擎的DC-7飞机降落在比夫拉的一条小型泥土跑道上。这架装载有10吨食品和药品的飞机使用了一条新的航线，从而避开了尼日利亚雷达控制的防空炮火。

冯·罗森在1935年曾以类似的行动而声名大噪。当时，他突破意大利空军的防线，并成功地将首批红十字会的空中救护车运抵处于围城之中的埃塞俄比亚。1939年，作为芬兰和苏联战争中芬兰空军的志愿者，冯·罗森执行了多次轰炸俄军的任务。在“二战”期间，他每周驾机往来于斯德哥尔摩和柏林之间充当信使。

在比夫拉成功降落之后，冯·罗森前往尼日利亚海岸附近的葡萄牙殖民地小岛圣多美。那里的仓库中堆满了准备送抵比夫拉的食品、药品以及军火。在那里，他向飞行员们简要介绍了他发现的那条空中走廊。为确保安

全，他两度由那条空中走廊飞抵比夫拉。第一次是在白天，这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日间飞行得冒着被尼日利亚空军拦截的危险。但冯·罗森表示，他必须得在夜间飞行之前考察地形。他并称，不管飞行员们使用这条空中走廊来运送食品还是枪炮，自己都不会介意。“比夫拉人如要生存下去，他们两者都需要。”这位身材高大、蓝眼睛、花白头发的斯堪的那维亚人将在比夫拉所发生的事情称做“反人道主义罪行……如果尼日利亚继续射击救援飞机，那么空运物资将用战斗机的降落伞作防护。同时，我们将继续飞行行动，其他航空公司也将加入进来。”

那些成功进入比夫拉地区的记者们报道了比夫拉人热情高涨的士气。比夫拉人经常对记者说：“帮助我们取得胜利。”尼日利亚以重炮炸弹发动了更为血腥的攻击，比夫拉继续坚守阵地。他们平日以棍棒来训练，战斗时则使用从欧洲市场上获得的五花八门的武器。但至8月时，比夫拉控制的领土仅为其一年前宣布独立时领土的三分之一。每天都有数百名儿童挨饿而死，来自各地的1.1万吨食品已准备妥当只待起运。

时年34岁的比夫拉政府首脑奥朱库，一位受过英式教育的前尼日利亚军队上校表示：“我真正想要的是，外部世界能以正常人一样看待我们，而不是把我们当做只会敲打脑袋的黑人。如果三位俄罗斯作家被捕入狱，整个世界都会为之感到愤怒；但当数千名黑人被屠杀，但……”

美国政府告诉记者们，援助比夫拉将无济于事，因为美国无意给不发达国家留下干预非洲内战的印象。不知道在做出这一决策时，美国是否考虑过它已经给世界留下了干预过一场亚洲内战的印象。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非洲对西方提供给比夫拉的援助逐渐产生不满情绪。毫不奇怪的是，尼日利亚人对此感受尤为真切。一名尼日利亚官员对一位瑞士救援者抱怨道：“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奶油冻和小麦。这里的人要鱼和加里（尼日利亚人的主食，用木薯粉制成）。我们能给他们这些东西。你们为什么不去救济那些挨饿的白人呢？”

乏味政治的花招

对，尼克松仍然是电视精神所在。大众传播仍是其弊病所在——他以为自己能用它来和大众沟通。

——诺曼·梅勒《迈阿密和芝加哥之围》，1968年

1968年是美国的选举之年，而选举年在美国通常会凸显出一种独特的开拓边疆的无畏精神。其他民主体制国家无不以一种如痴如醉的艳羡之情来研究个中场景。然而，除了权力的演出、无羁的野心和夸张虚假的姿态之外，选民们有机会每隔四年就再一次满怀希望。1968年的希望在那年暮春时分加利福尼亚的一间厨房的地板上破灭了。在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以后，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称，上帝可能已经把他对美国的祝福收回去了。

1968年时，全世界都在时刻关注着罗伯特·肯尼迪的一举一动。这位肯尼迪家族中话语含糊的年轻后辈，在每次接受采访以及每次公开亮相后，说话逐渐变得条理清晰，也变得更加富有活力。他在竞选活动中所展现出的精力和毅力即便在美国政治中亦很罕见。当他穿过人群时，人们高举着“鲍比，亲吻我”的标语，并撕扯掉他的鞋子和衣服，如同他是位摇滚明星。他逐渐对电视驾轻就熟，以至于阿比·霍夫曼妒忌地称呼他为“好莱坞的鲍比”。霍夫曼无奈地表示，“基因并不重要。人们可以像为‘纽约大都会’棒

球队偷偷喝彩一样为他喝彩。很容易就知道，他永远也不会赢。但鲍比……每晚我们都会打开电视机，看见那位年轻的长发骑士伸出手……当长发的年轻人告诉你他们听到鲍比就感到热血沸腾时，你就知道异皮士们有麻烦了。”不习惯对政治人物表达钦佩之意的汤姆·海登写道：“可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发现美国唯一充满魅力的政治家就是约翰·肯尼迪的弟弟。”

叶夫图申科曾这样描述肯尼迪的眼睛，称其是“蕴涵着希望和忧郁的一双蓝色眸子”。当肯尼迪遇见这位俄罗斯诗人时，叶夫图申科向他敬酒并试图摔碎酒杯。对俄罗斯一无所知的肯尼迪想要拿廉价点的酒杯来替代。但廉价酒杯很厚，把它们摔到地板上却没摔碎。这位俄罗斯诗人将这件小插曲视做是一种十分不祥的预兆。

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洛厄尔诗歌中所描写的宿命已“交织”进他的神经之中。肯尼迪亦是如此。当得知其兄被暗杀的消息时，罗伯特·肯尼迪表示，他原本以为被杀的会是他自己。其兄的遗孀杰奎琳担心他可能会是下一个目标。在一次晚宴聚会上，杰奎琳将其担忧告诉了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你知道我担心什么会发生在鲍比身上吗？和杰克所遇到的一样。”就在被暗杀前两周，罗伯特·肯尼迪和法国作家罗曼·加里进行了一次谈话。据加里所述，肯尼迪在谈话中表示，“我知道想要暗杀我的事迟早会发生。并不完全是为了政治原因，而是一种情绪的膨胀，一种赌气心理。”

首先是政治问题。他能赢吗？普遍的说法是，如果他有可能获胜的话，他可能会被暗杀。6月4日，他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州初选，以45%对42%击败了麦卡锡，而汉弗莱则仅赢得12%选票。在那时，他最终超过了麦卡锡的明显领先优势。他只需在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运筹策略战胜休伯特·汉弗莱。“现在，朝芝加哥进军，让我们在此决胜。”肯尼迪说。几分钟后，他被射中脑部。因为支持者堵住了计划中的出口，他临时决定抄近道从厨房出门。正是在厨房中，这条本未经计划的路线，埋伏等候着一名枪手。

肯尼迪被一个名叫西尔汉·西尔汉的人开枪射杀。对美国人来说，这个

名字没有任何含义。谁是西尔汉·西尔汉？各种答案都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他是个约旦人，一个来自约旦被占领土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但并不是传统概念中的武装分子，不是个事先策划的阿拉伯人——根本就没有计划。一个似乎精神不稳定的流浪汉。我们知道谁杀了肯尼迪，但我们却从未找出原因所在。

既然肯尼迪已经离开人世，那么谁将是下一位领跑者？他也会被暗杀吗？“上帝不存在，只有死亡。”在肯尼迪下葬那天，弗林盖蒂所朗诵的致肯尼迪的诗中如是说。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所有参选人当中，都没有人像似乎本已打算退选的麦卡锡那样认定自己将是下一位人选。对两党竞选大会都进行报道的诺曼·梅勒发现，当置身人群中时，所有的候选人都显出心神不宁的模样。最有可能的受害者已经丧命，联邦政府决定必须对其他七位候选人加强保护。如果特勤部门对他进行保护的话，暗杀罗伯特·肯尼迪就不可能得逞了，因为特勤部门在肯尼迪进入厨房之前就应该已对那里进行清场了。150名特勤人员被分派给剩下的候选人，这对休伯特·汉弗莱或乔治·华莱士来说影响不大，因为他们的保安措施已十分周到了，但对从未配备过保镖的麦卡锡来说却是变化巨大。

政治已然死去，而七位候选人却还在，但政治大会却变得空荡无物，就如同在一场体育赛事中明星级运动员被除名一样。共和党和民主党不尽相同，共和党大会控制有序但空洞无物，而民主党大会则是空洞无物，混乱纷杂。

全国政党大会的创设，是为了给全美各地的政治实权人物提供聚会机会并挑选其总统候选人。首位由党代表大会推选的总统是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起初，总统候选人是由一些党内高层大佬秘密挑选。这不但看起来不太民主，而且随着国家不断扩张，这种方式也变得不便操作，因为美国所有的政党通常是地方领袖的联盟——州领袖和市领袖，比如芝加哥市长理查德·J.

戴利。当国家日益扩张时，政党也就有了更多领袖人物。

政党大会通常并非适宜的场合，充斥着冠冕堂皇而愚蠢的花招噱头。1948年对政党大会进行的首次电视直播并不成功。在那一年，民主党放飞了一群未经驯养的鸽子，结果它们栖落各处，甚至当大会主席萨姆·雷伯恩试图敲槌使大会恢复秩序时，一只鸽子停在了他的头上。雷伯恩用力把它赶走，但这只倔犟的鸽子落在了他前面的讲台上。在一群摄影记者的闪光灯和电视摄像机面前，雷伯恩抓住这只鸽子，然后把它扔了出去。

1952年夏天的政党大会开始在有空调的室内举行，这让人们脱掉了皱巴巴的西装外套并扔掉了手摇扇，也使活动看起来少了些密室交易的味道。空调也开辟了新的活动空间。在没有空调之前，在迈阿密州从未在8月举行过党代会。1960年，约翰·肯尼迪首创了关注每一个党团动向以及逐一寻求党代表支持的策略。在党代表大会之前，肯尼迪在他们身上花了四年时间，而且在每个党团中安插线人观察异动情况，从而安抚那些态度模棱两可的党代表。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时采取了相同的策略，而这也成了操作政党大会的常态并平添了些许密谋行事的意味。1968年将是这种戏剧性活动的终结。在那一年，各党意识到，如果通过电视转播政党大会实况，政党领袖们将不得不事先确定提名人选，然后就像美国小姐选美或奥斯卡那样在镜头前编排妥当——再也没有不听话的鸽子或是任何其他的惊奇之事。

但在1968年，政党的前途事实上就由一周时间的电视直播决定了，这可谓电视上最为重大的事件——超过了战争、饥荒或是入侵。许多媒体机构都移师到举行政党大会的城市，也从此造就了一批媒体明星。通过主持报道政党大会实况，亨特利、布林克利以及克朗凯特等人确定了自己的明星地位。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丹尼尔·肖尔从芝加哥党代会抽调出去去报道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他抱怨称自己被从报道主要事件的队伍中排挤出来了。

至1968年时，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区别更多的是在形式上而非在思

想观念上。民主党发动了越南战争，但反战态度最为鲜明的候选人也是民主党人。共和党候选人中也有反战者，比如纽约州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1968年时，他以呼吁结束越战而掀开寻求第三次连任的竞选活动。还有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这位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黑马之选也是一名积极的反战者。

最受欢迎的共和党候选人是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确切说他并不反战——他支持这场战争，认为它能使南越人民的“自决权利得到保障”。但到1968年时，洛克菲勒的论调有所改变，称这场战争是“寻求正义的承诺”，并呼吁美军单方面从越南撤军。洛克菲勒是一位社会自由主义者，在黑人选民中拥有广泛的支持者。作为州长，他一直以来努力推动纽约州议会将堕胎合法化，该州85年前制定的法律仅允许在拯救母亲性命时选择堕胎。洛克菲勒号召共和党成为“穷人和受压迫者的代言人”。他甚至因为尤金·麦卡锡将年轻人吸引进政治活动而向其示好，并承诺将降低选举年龄至18岁。

洛克菲勒是一位有着巨大魅力的候选人——深受新闻界欢迎，在电视上的表现可圈可点。他那低沉浓重的“嗨呀”招呼声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亲近之感，尽管很显然他“和大亨洛克菲勒一样富有”。8月他参加共和党代表大会时，民调显示他颇受欢迎并将轻松战胜休伯特·汉弗莱或是尤金·麦卡锡。而同一调查显示，其对手理查德·尼克松谁都无法战胜，甚至连民主党人都十分喜欢洛克菲勒。他在共和党内的唯一障碍是党内的极右派。他们不无怨恨地认为，洛克菲勒在1964年时没能对他们心目中的殉难烈士式的保守派巴里·戈德华特施以援手。

但他确实面临着难题。总统提名人在是党代表大会上由党代表所选出，而大多数的党代表都积极支持看似无人喜欢的理查德·尼克松。很少人支持似乎人人喜欢的“洛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历史中有些关键的时刻被人们遗忘了，有时候它们在当时看起来并非举足轻重。3月22日，洛克菲勒宣布他不会参选，这一声明让政治圈甚感震

惊和迷惑不解。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策略，或许洛克菲勒想以选民提名的方式来获得压倒性胜利，从而证明自己的受欢迎程度。《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公开建议他重新做出考虑，称“洛克菲勒放弃竞选意味着理查德·尼克松将自动获得提名”。该社论也表示，“洛克菲勒的决定让共和党内的中间派群龙无首且无所作为。”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两句论断是正确的。尽管最终发现这是个失误的策略，洛克菲勒也重新回到竞选中——事实上他从未离开过——但他的上述举动让尼克松轻而易举地在党代表中获得了无可动摇的领先优势，而尼克松在共和党内的受欢迎程度远高于全国范围。为重新投入竞选，洛克菲勒前所未有地花费了一千万美金。但梅勒却讽刺说，如果他以每人2.5万美金的代价去收买400名党代表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

在一切形势都对其有利的时候，洛克菲勒对1968年选战的错误操作意味着其政治生涯的结束，这也相应导致共和党内的自由派陷入孤立无依的境地。在尼克松不体面地下台后，杰拉尔德·福特自动继任总统，洛克菲勒则接受了副总统一职。除此非常时刻之外，共和党内的中间派则再未产生过一位总统或副总统。1968年时，共和党变成一个具有更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党——一个保守政党，其中前途有望的中间派已被边缘化。

共和党另外的唯一候选人是罗纳德·里根，正值其任期第二年的新任加州州长。里根行事独树一帜，他不仅解除了警方对加州州立大学校园的残暴行动，而且也削减了教育、健康以及其他社会工程项目的开支，这让许多保守派人士印象深刻，但里根看似根本不可能当选。他成了许多笑话取笑的对象，这使得本来就是漫画题材钟情对象的尼克松看起来更像一个严肃的竞争者。至少尼克松好像很聪敏，即使他的认知会经常不断地改变立场。

后来在里根担任总统期间，人们往往将他很明显的思维混乱归咎于其年龄。但即便在1968年他只有57岁的时候，里根也经常会展露出十分困惑迷惘。5月21日，里根出现在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节目中，并应询解释他和巴里·戈德华特之间有何不同。“有许多具体的不同方面，我尽力回想

一下。”他说。“老实说，我的记忆力不太好。就在不久前，我发现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如果问我的话，我不能赞同他这一声明。”6月时，有50万人签名陈情，要求在州选举时就里根的资质能力进行公投。加州的民调显示，仅有30%的人相信他“干得不错”。喜剧演员们经常喜欢拿尼克松开玩笑，但开里根玩笑的也逐渐变多起来。作为代表自己政党并由选民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说：“里根（Reagan）就是把黑鬼（Nigger）这个词倒过来拼写。想想看，我们有一个倒过来写的黑鬼在加州当政。”

还有艾森豪威尔，一个来自50年代的幽灵。他坚持认为，美国在越南的战略是奏效的，并且应该继续加以推行以防止共产主义在全球占据支配地位。这是艾森豪威尔独具特色的自相矛盾之处。在当总统时，他冠冕堂皇地谈论人民的和平诉求。但在60年代，当人民终于要求平时，艾森豪威尔却指责反战运动为“造反”和“给敌人提供帮助和喘息”。和戴高乐一样，艾森豪威尔经常提及他在“二战”中的经历。的确，他承认美国可能会在越战中失利。但他想起在阿登战役后阅读有关新闻报道时竟有同样的感受。在心脏病再次复发后，他出现在报纸头版上。他躺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的病床上，身穿宽大的长裤和一件写着“祝你再次康复”字样的浴袍。他警告人们防范共产主义的危险，并且在病床上现场广播，呼吁迈阿密的选民支持其前任副总统尼克松，似乎50年代仍不愿离去。10个小时后，艾森豪威尔经受了第六次心脏病发作，而他也死里逃生。

政党大会通过一系列的投票来选择候选人——每个州的每位党代表都很重要。尽管电视播出要求在黄金时段，但这类投票可能会持续到深夜，直到仅有一名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的代表支持。通常上，举行的投票越多，领先者获得的支持就流失得越多。洛克菲勒料想，在经过几轮投票后，党代表们会转而支持他。里根则幻想着，在经过一轮轮的投票后，洛克菲勒和尼克松将陷入僵局。最后，党代表们将转而支持他以此作为出路。尽管没有人会相信，林赛也持有与此类似的幻想。

尼克松赢得了第一轮投票。

唯一具有戏剧性的是尼克松自己和自己的战争。人们认为，尼克松的政治生涯在1948年攻击前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时就已宣告结束了。当在1952年被发现涉嫌一起筹资丑闻时，其政治生涯再次被视做有完结之虞。在总统竞选中败给肯尼迪两年后，尼克松在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一职时再次失利，于是便自行宣布告别政坛。现在，他又卷土重来。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这是自“拉撒路（Lazarus）以来最伟大的死而复生之举”。

于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在其获选致辞中，尼克松开始变得貌似马丁·路德·金。梅勒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但这并不属于他那些稀奇古怪的遐想之列。尼克松也效法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使用代表和平之意的双指手势。只要是能加以利用的，他都来者不拒。在被暗杀后的四个月时间里，马丁·路德·金就从一个暴乱煽动者一跃成为美国社会的良心。在大会堂外，其所建立的机构被重点保护起来。距其六里之外，迈阿密市爆发了首次种族骚乱。佛罗里达州州长提议以必要的武力加以镇压，其后即有黑人被枪弹击中。理查德·尼克松此时正在发表演说。

“我看见有一天，”他说这句话时抑扬顿挫的语调和“我有一个梦想”极其类似，并且分别重复了九次。在接下来的演讲中，他显然陶醉在他自己或别人的华丽辞藻中，大声说道：“登上高山之巅，我们可以看见美国灿烂的新时期的到来……”

据民意测验专家的说法，1968年8月的第二周在迈阿密举行的共和党大会无聊透顶，以致让青年人和黑人都敬而远之，几乎吸引不了任何人的兴趣。甚至连有可能产生戏剧性效果的事件也未能上演：黑人代表被不公平地排除在佛罗里达、路易斯安纳、密西西比以及田纳西等州的党代表团之外，黑人团体对此深感不满，因为这一问题很快就被掩饰过去了。诺曼·梅勒写道，“人们普遍都在抱怨，这可能是记忆中最无聊的党代表大会。”一位电视

评论家说，长篇累牍而又无聊乏味的电视报道对人们来说是“残忍而罕见的惩罚”。但无聊乏味却成全了共和党人。这使人们无法集中精神，最终也让他们对街头发生的骚乱毫不知情。对1968年时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佛罗里达州白人公立学校的调查显示，59%的白人学生对马丁·路德·金被刺杀的消息要么感到兴高采烈，要么根本无动于衷。当尼克松在迈阿密的海滩接受加冕时，由已故的马丁·路德·金所创办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组织领导人拉尔夫·阿伯内希正在户外领导每日的黑人示威活动。在迈阿密湾对面名叫“自由之城”的黑人聚集区，警方和黑人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汽车被掀翻并遭纵火焚烧，国民警卫队奉命赶来。当尼克松在挑选其竞选搭档的时候，有三名黑人在此次“自由之城”骚乱事件中丧生。

现在只剩下副总统人选的问题了。按道理来讲，似乎应该任命一位能吸引洛克菲勒支持票的自由派——要么洛克菲勒本人，或者正在努力寻求提名的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抑或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查尔斯·珀西。洛克菲勒在1960年时即已拒绝作为尼克松竞选搭档，现在似乎也不大可能接受。

最终，尼克松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最后的惊奇——他选择了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尼克松称做此选择是为了团结党内，但共和党的不满情绪却溢于言表。整个共和党内半数的温和派都被忽视了。对于南部那些长年经受民权运动纷扰的白人，以及北部部分不满于过去两年来的骚乱无序状态、信奉法律和秩序的反党派选民来说，共和党或许有着巨大吸引力。然而仅此而已。共和党将全国大部分的选民推向了民主党。民主党叛将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一位老牌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正以独立身份参选。他不但会分流民主党的选票，而且也可能夺取共和党的不少选票，从而动摇该党在南部各州的选票并危及其整个南部选举策略。因为自由派副总统的有力竞争者林赛市长支持尼克松选择阿格纽为副手，令试图迫使尼克松另选其他搭档的行动不得不中止。

尼克松辩解称，阿格纽是“被严重低估的美国政治家之一”。第二天，

较为温和的黑人团体——“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声明反对这项提名，称其为“对抗性的白人候选人”。这对尼克松来说是坏消息吗？或者这有任何新闻价值吗？在鲜有人注意的情况下，理查德·尼克松已经重新塑造了共和党。

接下来进军芝加哥——一场不会令人感到无聊的政党大会。

肉类加工厂旁幽灵般的警察

和警察打过多次交道的让·热内表示，他此前从未在据说是人类的脸上看见过如此表情。从芝加哥到柏林，从墨西哥城到巴黎，如幽灵般的警察为何在厉声咆哮？“我们可不是玩虚的，绝对货真价实！就像这根警棍一样！”正如他们迟钝的动物本能所感觉到的，现实正从他们身边悄然溜走。

——威廉·巴勒斯，《较好紫色的到来》，
《君子》杂志 1968 年 11 月号

有关芝加哥的一切都绝无虚假。那是千真万确的！治理城市的那位市长是个名副其实的人。他是旧时代唯利是图的政客。我要谴责那些对他进行美化的东部权势集团。整个一副“最后的希望”的模样。他是个唯利是图的政客，一个比邻而居的恶棍。你必须亲眼看到他才会相信。

——斯特兹·特克尔，1968 年 8 月 18 日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

前往芝加哥的人们必须准备好经历为时五天的能量转换。

——阿比·霍夫曼，《革命不过儿戏》，1968 年

对8月底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来说，一切似乎都不太顺利。大会会议中心被付之一炬，最激动人心的候选人被刺杀后空留愤怒，还有那位因使用警方暴力而臭名昭著的市长。

芝加哥的迈考密会展中心或许正是斯特兹·特克尔所称的“一个真正的芝加哥传奇”。该中心建于几年前，造价3500万美元，并以臭名昭著的右翼分子、《芝加哥论坛报》出版商的名字命名，他也是芝加哥市长戴利身边少数支持这一工程的人。环境保护主义分子反对该工程，认为它会造成芝加哥湖畔的环境下降，而大多数的芝加哥人则认为它奇丑无比。于是，很奇怪地，或者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很神奇地，这座建筑在1967年时遭火焚毁，这让民主党大会无处举行，而芝加哥人所思考的则是这3500万美元是如何花费的。

在1967年竞选连任时，理查德·戴利市长因迈考密会展中心丑闻而面临严重挑战。他不想因为火灾或是丑闻而使芝加哥失去举办一场重要会议的机会。在旧时的“联合肉类加工厂”（美国的牛肉中心，直至1957年时关闭）旁边，矗立着一座露天运动场。此处离市中心不过数里，自肉类加工厂关闭后，这里就成了芝加哥郊区的好去处。人们在此进行摔跤比赛，偶尔也会有汽车或划船比赛。只要戴利把它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并派警卫把守四周，民主党全国大会就可以在芝加哥的露天运动场举行。党代表们可按原先安排下榻于六里之外的康拉德·希尔顿饭店，这里靠近市中心风景优美的格兰特公园。

在近乎一年的时间里，汤姆·海登、伦尼·戴维斯和其他新左派领导人都在计划着鼓动人们到芝加哥抗议示威。3月，他们在芝加哥郊外靠近威斯康星州边境的树林营地中举行了秘密会议。约有两百名受邀的活动分子出席了海登组织的此次会议——其中包括戴维斯、戴维·德林杰以及康奈尔大学天主教牧师丹尼尔·贝利根。不幸的是，这次“秘密会议”被报纸进行了报道。戴维斯和其他人提及要“瘫痪整个城市”，但理查德·戴利市长却斥

之为夸夸其谈。这些人现在来到了芝加哥：海登、戴维斯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阿比·霍夫曼、杰里·鲁宾以及异皮士们。戴维·德林杰和“结束越战全国行动委员会”（国家终战动员委员会）誓言将鼓动数十万名反战示威者。“黑豹”组织也计划派遣其小分队到场。德林杰出生于1915年，“一战”停战是其最早的记忆之一。因在“二战”时拒绝应征服役而入狱，他进行反战抗议示威活动的经历已有30年之久，也是芝加哥反战运动最为资深的领导人。人们纷纷涌向芝加哥，这或许也是戴利市长为何在马丁·路德·金于4月被枪杀后在骚乱事件中显示其残酷镇压的姿态。

与时俱进在1968年并非易事。起初，芝加哥的示威运动是为了抗议现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加冕礼。麦卡锡及其支持者将在会场内抗议，而示威者则在会场外的电视摄像机前抗议，提醒美国人有许多人并不支持约翰逊和他发动的战争。但由于约翰逊并未参选，他们到芝加哥是来支持麦卡锡及其反战政策。接着宣布罗伯特·肯尼迪参加竞选，而当一度看起来他可能获胜时，包括海登在内的有些人开始怀疑示威者是否会在芝加哥举行抗议。但当肯尼迪和麦卡锡仍在奋战以求初选胜出时，休伯特·汉弗莱——没有麦卡锡和肯尼迪所拥有的忠实志愿者，但却有着经验丰富的专业机构——正在非初选州的党团会议上寻求党代表支持。一俟肯尼迪遭暗杀后，抗议计划就带上了苦难和宿命意味。到芝加哥去阻止汉弗莱窃取党代表大会的成果，从而确保民主党的舞台是用于反战的，或者……到芝加哥去，因为除此之外亦无事可做。

即便以全国政治大会的标准来衡量，媒体也对芝加哥抱有很高的期望。不但有大批电视和平面媒体记者计划赶赴芝加哥，作家们也是如此。剧作家阿瑟·米勒是支持麦卡锡的康涅狄格州党代表。《君子》杂志向威廉·巴勒斯、诺曼·梅勒以及让·热内等人约稿。曾创作经典反核题材剧本《奇爱博士》的泰瑞·索恩在那里，而诗人与和平主义者罗伯特·洛厄尔也在场。艾伦·金斯堡自然也不会缺席。他既是以诗人身份，同时也是活动积极分子。金斯堡



28 E JACKSON
CHICAGO

427-7773

抗议联邦检察官控告芝加哥民主党大会示威者的丝印海报
(美国政治海报研究中心)

试图通过重复朗诵他那绵长而深沉的“Om”声调来传播内心的和平与精神力量。

除了戴利之外，想必任何一位市长都会意识到压抑过甚将会最终爆发，

并做好准备应对传言可能会有百万之众参与的示威活动。虽然不一定必然演变成暴力活动，但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出现暴力是不可能的，可能会使用催泪瓦斯并导致个别人头破血流。戴利不想电视对此进行报道，但媒体却热衷关注党代表大会内部必然会出现的激烈和情绪化的争斗场面。

但个子矮小且有着双下巴的戴利却是个粗野的家伙，一个属于传统政治学派的“老板”。芝加哥是他的管辖之地，同大多数具有工人阶层背景的美国人一样，他憎恨嬉皮士。首先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就是：他拒绝审批示威许可证。示威者们想要从格兰特公园游行至露天体育场，这是党代表们从其下榻的酒店到大会现场的必经之路。戴利不会允许此类事情发生。从市区的任何地方到露天体育场他都不允许发生示威活动，其理由是，从市区到露天体育场必须经过一个由整齐的砖瓦房屋和小院组成的名为“桥港”的中产阶级社区。这正是戴利所在的社区，他一辈子都居住在那里。戴利的许多邻居都是城市工人，他们因戴利的庇护之故得到工作机会，而这位芝加哥本地政治人物也以此建立了自身的政治基础。没有人能统计出到底戴利施舍了多少这种庇护性的工作。芝加哥的政治根本就是地盘之争。根本没有任何环境、交换条件或是约定安排能让戴利同意一帮嬉皮士游行通过他所在的社区。

考虑到4月间的一次反战游行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人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一说法，即在8月芝加哥党代表大会期间所发生的灾难性事件是由戴利策划并授命的。在4月的时候，无数的请托和恳求同样也没能让游行从市政厅那里获得准许证。那个时候，警察也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以警棍攻击并残酷殴打示威者。

戴利和警方最害怕的并不是示威者，他们担心的是另一场种族骚乱，而这类骚乱已经频频爆发。黑人社群和市政府之间是一种敌对的关系。炎热而潮湿的夏天正是骚乱爆发的季节。在那年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就连从未发生过种族冲突的迈阿密也爆发了一次骚乱。芝加哥警方严阵以待，如临大敌。

起初，拒绝示威申请似乎奏效了。到芝加哥的嬉皮士、异皮士和活动分子比料想的要少得多，不过几千人而已。参与者估计，大约半数的人都是芝加哥当地的年轻人。对“结束越战全国行动委员会”来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糟糕的参与阵容。麦卡锡将军呼吁支持者不要前来。黑人领袖们，包括亲身前往的迪克·格雷戈里以及杰西·杰克逊在内，都建议黑人远离此处。根据其翌年在“芝加哥八人阴谋案”中的证词，对芝加哥警方已十分熟悉的杰克逊告诉伦尼·戴维斯，“或许黑人不应该参与其中……如果黑人受到殴打镇压，没人会予以关注。那只会被写入历史而已。但如果白人被殴打，那将会成为新闻事件。”

阿比·霍夫曼和异皮士们来到芝加哥时制定了他们称之为“生命之节”的计划——与他们称做“死亡之节”的露天体育场党代表大会相对。在他们散发的“生命之节”小册子上所列的为期一周的活动计划包括以下几项：

- 8月20日至24日（上午）蛇舞、空手道、非暴力自卫训练
- 8月25日（下午）音乐节—林肯公园
- 8月26日（上午）毒品问题、地下通讯、自由生活、街头剧、自卫术、拒服兵役以及公社等问题研讨会
- 8月26日（下午）林肯公园附近湖畔晚会
民谣演唱、烧烤、游泳、做爱
- 8月27日（黄昏）诗歌朗诵、梵语颂歌、宗教仪式
- 8月28日（上午）异皮士奥运会、异皮士小姐大赛、寻找候选人、给候选人贴上“尾巴”、给教皇戴上安全套以及其他正常和健康的游戏

上述很多活动都是阿比·霍夫曼的典型戏谑之作。其他则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庆祝活动也在筹划中，并准备邀请阿洛·格思里和朱迪·柯林斯

等明星歌手。异皮士们已为此准备了数月之久，但几个月来芝加哥市政当局一直拒绝发放准证，这让他们无法向明星歌手们发出邀请。阿比·霍夫曼和芝加哥副市长戴维·斯塔尔举行了会谈，其实双方不欢而散是可想而知的。霍夫曼点燃了一根大麻烟，但斯塔尔却告诉他不要在他的办公室抽大麻。“我不抽大麻。”霍夫曼一脸正色地回答道。“这不是事实。”斯塔尔在记事录中指异皮士们是些革命分子，他们到芝加哥来意在“继最近的伯克利和巴黎事件后发动另一场革命”。

在异皮士们的活动日程上，8月28日下午是由“结束越战全国行动委员会”组织的一场从格兰特公园到大会会场的游行活动，这是他们唯一一场标明了确切时间的活动——下午四点。但整个活动和芝加哥警方相互冲突，因为他们认为届时所有的参与者将睡在林肯公园里。市政当局否决了这一想法。郊区的林肯公园绵延着大片的起伏不一的山丘和荫凉的斜坡草坪，童子军和其他青年组织经常在那里露天野营。公园长约数公里，但从格兰特公园到康拉德·希尔顿酒店——或者像阿比·霍夫曼所称的“康拉德·希特勒酒店”——所需的车程时间并不长。即便在大会召开之前，警方就已在林肯公园张贴告示称，“公园于晚上11时关闭。”鉴于芝加哥所有的道路均已被占用，示威者转向联邦法院，请求批准使用林肯公园。法官威廉·林奇是戴利的前法律事务所合伙人，也正是戴利让其出任法官一职。他否决了示威者们的请求。

异皮士们真正付诸行动的活动吸引了电视媒体的注意力。蛇舞是一种武术技巧，由日本学生运动“全学联”在突破警方封锁线的实战中完善得炉火纯青。绑着头巾和带着珠链的异皮士们不停地自己列队训练，但却屡屡失败。但在电视上看起来却很有异域情调。拍摄他们在公园练习武术的场景，电视媒体工作人员就难免会报道称，嬉皮士们练习武术是以备和芝加哥警方应战之需。一名工作人员甚至还拍到阿比·霍夫曼亲身在练习。他把霍夫曼称做“一位电视演员”。

另外一件他们确实想做的事情就是提名异皮士的总统参选人，“皮加索斯先生”（Mr. Pigasus），一头用绳子拴着的猪。“以猪作为我们的领袖的想法再真实不过了。”霍夫曼在一篇名为《制造完美的混乱》的文章中写道。猪那个时候对警察的常用蔑称，但霍夫曼坚持认为，在芝加哥事件中，“猪们”确实看起来像猪，“有着硕大的啤酒肚、三层的肥下巴、红扑扑的脸庞以及小眯缝眼。”这种愚蠢是有着传染性的。他指出，休伯特·汉弗莱与戴利两人都和猪十分相似。而霍夫曼越解释，似乎所有的人都越发开始看似一头猪了。

然而问题在于：出现了两头猪。阿比·霍夫曼找到一头，杰里·鲁宾也找到一头。在提名哪头猪的问题上，双方产生了争议。和他们各自的行事风格类似，鲁宾挑了头难看的猪，而霍夫曼则找了头可爱的猪。两人之间关于选哪头猪的问题几乎演变成暴力冲突。鲁宾指责霍夫曼企图将异皮士变成他自己的个人崇拜。霍夫曼则称鲁宾总是想挥舞拳头，而“我想握紧拳头并保持微笑”。

双方争执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决定“青年国际党”的正式总统参选者是鲁宾挑的那头十分难看的猪。当杰里·鲁宾表示“我们很荣幸地宣布，由一头猪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站在芝加哥市政中心的霍夫曼对这一争议耿耿于怀。警方随后以滋事行为为由逮捕了鲁宾、霍夫曼、那头猪以及歌手菲尔·奥克斯，但却很快将他们释放了。第二天，在林肯公园又放出一头猪，显然是头母猪，据说是候选者的妻子“皮加索斯太太”。当警察追赶那头猪时，异皮士们高喊着“猪头！猪头！”来逗乐，因为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在喊追逐者还是被追者。当警察最终抓住那头猪时，有人高喊道，“小心对待下一任第一夫人。”有些警察笑了，其他警察则怒目而视。他们把那头小猪扔到警车后面，并威胁到有没有人想和这头猪一起走。几名异皮士说可以并跳上了警车。警察们关上车门后驱车扬长而去。有些记者乘机对异皮士进行采访。异皮士称，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因为他们在芝加哥郊外有一农场的

猪。一名记者想知道异皮士对失去那头猪有什么想法，一位异皮士称，要求对候选者和第一夫人实施特工保护。一名电台记者一本正经地问那头猪代表什么含义，答案不一而足：食物！火腿！属于猪的公园。

异皮士们很快发现，如此众多的媒体都在如饥似渴地抢新闻，以致其任何活动都会得到报道。他们威胁要把迷幻药投入芝加哥的供水系统，来让整座城市都来一次“旅行”，这一事件被予以广泛报道。异皮士的其他威胁还包括：将私人汽车喷绘成出租车来绑架党代表并把他们带至威斯康星州；装扮成越共在市内沿街发放大米；从数公里外以迫击炮弹轰击露天运动场；组织一万名赤裸人体漂浮于密歇根湖上。芝加哥市政当局似乎明白这些威胁不可当真，但他们还是宁可信其有地毫不放松。可惜的是，没有记录显示当阿比·霍夫曼威胁要脱掉休伯特·汉弗莱的裤子时警方有何反应。异皮士的每一个威胁，不管有多么稀奇古怪，都被警方通报给了媒体。在询及新左派领导人后，《芝加哥太阳时报》和《纽约每日新闻》了解到这些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但在数年致力于揭露共产主义阴谋之后，《芝加哥论坛报》以耸动人心的标题报道了每一个计划，不过这却只能吓唬到警方。异皮士们乐得看见因警方如临大敌而引起媒体的关注。事实上，在芝加哥的几千名示威者中，来自芝加哥以外地区的可能不到两千人，多数人和异皮士或任何其他组织并没有关系，因此到场的异皮士本身就是个谜，但到场的执法者却不是。芝加哥警察多达 1.2 万名，另外还有五千名陆军军人以及六千名国民卫队作后盾支持。军人们和示威者年龄相仿，很多还是黑人。因此，示威者期望他们会更有同情心。事实上，43 名军人因为拒绝奉命前往芝加哥执行镇压骚乱的任务而被控上军事法庭。和一开始就准备开战的警方不同，军人通常具有安定人心的效果。如果不是因为警方的如此反应，芝加哥的示威者将会视做是一次失败，如果还有人关注的话。

《芝加哥太阳时报》专栏作家迈克·罗伊科写道，“泱泱之众却对这么少的人如此害怕，这种情形还从未有过。”

党代表大会还未开始，而关于冲突、暴力和摊牌的谈论和报道却已不绝于耳。这些话题既用来形容党代表大会本身——休伯特派将和麦卡锡以及反战的党代表们狭路相逢，它也用以指在距会场数里之外的芝加哥市区数千名示威者和警方之间的对峙。

8月20日（星期二）晚上11时，苏联坦克越过了捷克边境。星期三早上，捷克斯洛伐克遭受入侵。人们可以在电视上看见苏军坦克在捷克的城市中行进的画面。在芝加哥，苏联的入侵随即被当做一个隐喻。阿比·霍夫曼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在会上，他将芝加哥称做“捷加哥”，并表示美国是一个警察国家。的确如此：警察无处不在，迎接党代表们的露天体育场也环绕着铁丝网。霍夫曼邀请媒体拍摄当天的“捷克斯洛伐克示威”。得克萨斯州的约翰·康纳利认为，苏联入侵证明民主党应支持越战行动，而同样来自得克萨斯的参议员拉尔夫·亚伯勒却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上表示，政治权力不应该被他们滥用来粉碎“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就如同苏联人凭借武力想要做到的那样。示威者开始以“西布拉格”来指称芝加哥。当听说捷克斯洛伐克的示威者迎面冲向苏联坦克并质问“你们为何来此”时，他们也开始直面芝加哥警察并提出相同的质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警察们的回答如此雷同：“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新左派们对发生在芝加哥的冲突极为关注。有些人甚至认为，俄国人蓄谋选择此时入侵捷克是为了摧毁麦卡锡的竞选活动，因为苏联真正害怕的是一个真正进步的美国。人们还从未对任何苏联的决策进行如此缜密的分析研究，却并未能发现有关企图妨碍麦卡锡竞选的证据。然而，苏联入侵对反战运动而言殊为不利，就如同它摧毁了戴高乐要建立一个“涵盖乌拉尔山脉”在内的欧洲的梦想。它强化了一种共产主义霸权企图主导世界的冷战思维，而事实上这正是发动越战的理由。但这并未阻止戴维·德林杰和数名反战活动在波兰旅游办事处外举行抗议示威。该办事处是他们在芝加哥能够找到的唯一一处代表华沙条约组织的办事处。但一贯对政治权谋麻木迟钝的麦

卡锡却试图化解危机。他坚持认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非什么大事，这让人们愈发怀疑这位参议员是不是天外来客。

星期六晚上，示威者似乎特别不愿离开林肯公园。他们高呼“现在开始革命”以及“公园属于人民”等口号。正当警方聚集人马准备发动攻击时，艾伦·金斯堡突然神秘地出现了。他带领示威者高声哼唱着“Om”曲调离开了公园。

在星期天党代表大会开幕当日，休伯特·汉弗莱抵达了芝加哥。汉弗莱在社会问题上一贯表现积极进步，但他与约翰逊的越战政策不无关联，且不愿与之进行切割。但即便没有越战问题，57岁的汉弗莱也会成为年龄代沟的牺牲品。他有着金属般的颤抖声调和中西部乡野人的身材以及言不由衷的态度；在所有严肃场合都使用“我的天啊”这类语言；他微笑时看起来永远似乎刚刚咬过什么东西一样。这一切都让他看起来如卡通般滑稽可笑。其传记作者卡尔·索尔伯格将这位政治人物戏称为“幸福武士”，他这样描写汉弗莱起程赴芝加哥参加党代表大会时的情形：

在通往街口的电梯里，他吻了吻妻子，跳了一两步舞步，并拍了拍朋友伯尔曼医生的肩膀。“我们开始投入战斗——我都等不及了。”他说道。

麦卡锡和罗伯特·肯尼迪的支持者不可能转向这样一位候选人，而他也无法安抚平息涌到芝加哥的青年示威者。

当其专机降落在芝加哥时，这位“幸福武士”皱了皱眉，而这不过只是开始。戴利派了一支风笛乐队到机场迎接。没有人群相伴，风笛的声音可谓冷清至极。到场欢迎他的支持者寥寥可数，而更令他恼火的是，戴利市长本人并未出现。去欢迎麦卡锡的人群却十分踊跃。“有五千名支持者，”汉弗莱嘟哝着，对这种反差表示不满。而更大的失望在于，戴利试图撤回对汉弗莱

的支持。戴利发现，很难相信汉弗莱能够吸引加州那些支持罗伯特·肯尼迪的选民。戴利和一些党内大佬试图在最后一刻转而支持另外的候选人，特别是肯尼迪的最后一位兄弟——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尼克松一样，汉弗莱对选择一位肯尼迪家族成员深感震惊。

星期天晚上，警方从9时开始强行清空林肯公园。阿比·霍夫曼冲上前去，以一种嘲弄的斥责语调说道，“难道你们就不能再等两个小时吗？芝加哥的法律和秩序到底到哪里去了？”警察们于是不得不后退，直到11时发布宵禁令。

想起5月间的巴黎学生，异皮士用垃圾桶和烧烤台筑起了街垒。警方严阵以待，并命令示威者和媒体接着离开公园。警察们三人一行排成一长排准备发动进攻，于是电视台记者们打开了摄像机。为使简陋的街垒看起来更坚固，他们以深黑的阴影镜头作背景。记者们开始戴上头盔。到处飘扬着旗帜：越共的旗帜、代表革命的红旗以及代表无政府主义的黑旗。警察出动了。异皮士们显然是感到有些害怕了，但他们还是坚守阵地。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蜂鸣声。艾伦·金斯堡再一次带领一群哼唱“Om”的人出现了。

但本来想让双方平息下来的“Om”声这次却未能奏效。警察开始向后推搡人群，人们高喊着“蠢猪”和“咕噜噜”的猪叫声，警察则开始挥舞警棍。当警察进攻时，他们听见有人大喊“干掉他，干掉他，干掉这些狗娘养的！”“狗娘养的”成了那年家喻户晓的词语。警察见人就打。在将人群赶出公园后，警察开始在街上追打人群。他们拉住过往的行人开始殴打。他们殴打记者，砸坏他们的相机。他们搜寻了公园附近几个街区的范围，见到人就用警棍殴打。在那晚的战斗结束后，警察们冲到林肯公园的停车场，将每辆贴有麦卡锡竞选标志的汽车的轮胎全都刺破。

《花花公子》创办人休·海夫纳从其芝加哥的住所出门时挨了一警棍。恼怒不已的海夫纳于是在党代表大会期间出资出版了一本名为《法律与无序》的关于警方暴力的书。

警方后来承认，他们被人们喊叫的污言秽语激怒了，尽管芝加哥警方不大可能会被这些猥亵之言所吓倒。警方也表示，当电视摄像机的灯光让他们什么也看不清时，示威者就开始向他们扔东西。但大多数公众目击者并不支持这一说法。那晚，有 20 名受伤记者需住院治疗。当被问及此事时，戴利称警方无法分辨记者和示威者。但戴利自己却是经常以言语攻击媒体，现在他手下的警察很显然是在蓄意进行身体攻击了。芝加哥当地的记者们越发感到无可奈何。他们遭到殴打，相机被砸坏。有些重要的细节从照片中被



1968年8月民主党大会期间芝加哥格兰特公园里的示威者（罗杰·马洛赫 摄/玛格南图片社）

删除了，比如警察挑选麦卡锡竞选者的汽车进行破坏的照片。为以示回击，一群芝加哥记者发起成立了自己的月刊《芝加哥新闻评论》，该刊后来成为著名的新闻媒体评论刊物，创刊号上即对芝加哥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的新闻报道提出批评。

民主党全国大会不得不和捷克斯洛伐克入侵事件同时登上报纸头版。此外，党代会会场内的争斗与街头的争斗也不相上下。在大会召开的四天里，警方每晚都会清空林肯公园并在附近地区挥舞着警棍横冲直撞。示威者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已十分危险。芝加哥警方的残暴行动是有组织的，没有人知道他们还会干出什么过分的事来。奇怪的是，他们可以在公园里共同度过一个美丽的夏天。天空蔚蓝清澈，气温降到华氏 70 度。警察有时会带来草坪躺椅，并把他们蓝色的防暴头盔放在草地上。他们会以好玩的态度或不无困惑地阅读关于性爱自由和滥用毒品以及反战运动和革命的小册子。有时候，警察甚至会在那里抛掷垒球。异皮士则会加入到接球的游戏中去。当他们离开时，警察会预告性地表示，“晚上 11 点再见，孩子们。”

星期二时，麦卡锡表示他可能会输掉选举。在支持肯尼迪的选民仍在参与选举而且他那帮年轻尽职的竞选团队仍在希尔顿酒店的总部辛苦奋战的时候，麦卡锡如此表态显得有些让人不可思议。直到星期三时，他都不可能输，因为加州所发生的事已说明如果反战的候选人有望获选的话会有何下场，所以麦卡锡想以此表明他不想获胜吗？想要追踪麦卡锡参选的竞选活动，揣测经常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星期三，芝加哥市区遍布示威的人群——嬉皮士、异皮士、“结束越战全国行动委员会”以及载满一小型电动车的“穷人运动”成员，他们曾由马丁·路德·金领导但现在已处于孤立无援之境。戴维·德林杰呼吁示威者保持非暴力，同时也呼吁芝加哥市政当局允许群众游行到露天运动场。市政当局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还在纠缠这个早已解决的问题。但示威者挤满了希尔顿酒店对面的格兰特公园，他们正准备开

始游行。没有人领导他们，除非是领着他们到露天运动场。他们通过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会场内的实况。这时，政纲委员会宣布了其支持越战的立场——这意味着民主党将不会参与反对继续越战的运动。美军的“新年攻势”、约翰逊辞职、麦卡锡参选、马丁·路德·金之死、罗伯特·肯尼迪参选及被刺，以及历时四个月而一无所获的巴黎和谈——在这年发生过这么多事情后，民主和共和两党都采取了支持越战的立场。

约翰逊宣布，既然民主党已采取其越战立场，那么他准备到芝加哥并在大会上致辞。戴利甚至还在露天运动场附近的 Stockyards Inn 为约翰逊准备了一场 60 岁生日庆祝活动。当初，约翰逊原本料定他会在此次党代会上获得加冕，因此他坚持在其生日那一周召开大会。现在，有些知情者仍在怀疑，他可能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芝加哥并在其生日晚会上宣布自己参选。汉弗莱一定会让位，而约翰逊将轻松赢得第一轮投票。但民主党的领导人建议约翰逊不要到场，因为那份支持越战的政纲并不受党代表们欢迎，他可能在会场上受到抵制，在街头就更不用提了。阿比·霍夫曼和异皮士已宣布其为约翰逊庆祝生日的计划。

因为爱德华·肯尼迪拒绝参选，汉弗莱最终得到了戴利的支持，同时伊利洛伊州党团也对其表示支持。汉弗莱在党代会上重又恢复了兴奋之态，而没有任何其他人有此同感。“我感觉要跳起来了！”当宾夕法尼亚州党团的选票确保了其首轮投票胜出之时，汉弗莱如是说。在起程飞往芝加哥的当天，汉弗莱在接受“与媒体会面”节目采访时称，“我认为总统所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合理可行的。现在，他将成为民主党候选人。这意味着民主党将继续实施约翰逊总统的政策。”

在星期三晚上，艾伦·金斯堡——在哼唱“Om”，朗诵完布莱克的神秘诗句，以及每晚在骚乱活动中高谈阔论并起床后在密歇根湖畔进行印度日出祷告仪式后——在哼唱“Om”或是说话时几近失声了。

在希尔顿酒店对面的格兰特公园里，那些领导人那晚努力试图控制示威

人群，但却无人约束警察。警方其后声称，示威者向其投掷充满尿液的气球和装满大便的袋子。有些示威者对此予以否认，但很显然，在遭警方殴打了四个晚上之后，他们已筋疲力尽并失去了耐心。伦尼·戴维斯正试图安抚平息一群示威者，但在警察认出了他后，他们开始以警棍对其进行攻击，并重重地打在他的脑袋上，导致其不得不送院就医。

警察开始见人就打，示威者则开始还击，最后变成了赤手空拳的肉搏战。芝加哥市医院警告示威者不要将示威伤员送来，因为警方正守候在医院外把他们推进警车。格兰特公园到处都是催泪瓦斯和受伤者。在希尔顿酒店前，开始了一场静坐示威活动，很快示威人群便拥挤到了公园内。电视摄像机的白炽灯光几乎让人睁不开眼。警方称人群向其投掷物体，但在当晚所拍摄的无数影片中却找不到任何证明。影片确实记录了警察和国民卫队以警棍和枪托在人群中左突右支，殴打孩子和老者以及那些站在警方封锁线之外的旁观者，甚至连那些已跌倒后躺在地上的人也不放过。他们拖着妇女穿街过巷。有一群人——据《纽约时报》称是一群中年妇女和小孩——被逼靠在一家酒店餐厅的窗户上，由于用力过猛致使窗户向里凹陷，人群则逃向餐厅里面。警察从窗户进入餐厅后紧追不舍，见人就打，甚至连酒店大堂里的人也不放过。“示威者、记者、麦卡锡竞选党工和医生，所有的人都开始踉踉跄跄地涌向希尔顿酒店大堂。鲜血从他们的头部和脸上的伤口处喷涌而出。”梅勒在报道中称。警察杀气腾腾地冲到酒店前，架设在酒店入口遮阳棚处的电视摄像机将这一切都拍摄下来了。有关芝加哥警方暴行的17分钟影片可能会通过一颗名为Telstar的通讯卫星传遍全世界。警察砸毁了摄像机，但似乎没有意识到——或许是根本不在乎——其他的摄像机正在拍摄他们的暴行。在摄像机拍摄范围之外的地方，他们追赶着人群把他们逼到芝加哥市中心的街道上，看到人就挥舞警棍殴打。

这是1968年展示电视神奇力量的时刻，这在今天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是新奇无比。凡是打开电视机的人都不会忘记。没有对影片进行编

辑、处理、分析以及包装然后作为第二天的晚间新闻——这是人们认为的电视新闻的通常做法——电视台就这么播出了。德林杰曾力劝示威者不要以武力还击，称“全世界将会看到”谁在使用暴力。摄像机记录下了芝加哥警方的暴力行为，它们也记录下了人群的高呼声——一点没错——“全世界都在看！全世界都在看！”

在露天体育场内，民主党大会休会以研判当前形势。当轮到威斯康星州党团投票时，该党团团团长唐纳德·彼得森表示，有数千名青年人在街头遭受殴打，因此大会应该暂时休会并另择城市举行。一名牧师于是起身带领与会者进行祈祷。对当时正在会议大厅的艾伦·金斯堡来说，这位牧师是在为大会的举行以及它所代表的制度祈福。金斯堡跳了起来，尽管那天没人听见他那疲惫不堪的嗓子说过任何大声的话，他却迸出一句“Om”声，高亢的声音压过了那位牧师并持续了五分钟之久。据金斯堡所称，他这么做是为了驱逐伪善行径。

戴利怒气冲冲地盯着会场，似乎准备召集他手下的警察来保护这些代表们。这时，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前州长亚伯拉罕·里比科夫走到主席台前并提名乔治·麦戈文——这位最后一刻才参选的反战候选人——为候选人。“在乔治·麦戈文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有芝加哥街头的那些盖世太保的伎俩。”

大会似乎僵持了片刻，但这是此次大会最令人难忘的时刻。电视摄像机四处搜寻并发现了脖子短小、脸庞肥厚的理查德·戴利。或许忘记了对准他的摄像机的存在，戴利隔着大厅向里比科夫喊话，但麦克风却未能录下来。数百万名观众都尝试了他们读唇的技巧，这似乎是和一句辱骂犹太人并和性有关的话。据大多数研究过那段影片的观众意见，戴利是在说，“操你妈，狗日的犹太人。”许多人认为，他还加了一句，“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滚回家去！”在1968年时，连里比科夫都是狗娘养的。

然而，戴利却坚称他根本没说这些话。库克县委员会主席乔治·邓恩解

解说，他们都在吼叫——芝加哥人包围住了戴利。他们都在大叫，“骗子！”里比科夫是个骗子。如果听起来像那个四字脏话，也不能怪他们。

暴力冲突从星期四持续到星期五上午。警察冲进了希尔顿酒店 15 层楼的麦卡锡竞选总部，把竞选工作人员从床上拖下来进行殴打。麦卡锡参议员用自己的私人飞机将工作人员安全送出芝加哥。

和 1968 年的美军“新年攻势”一样，在电视年代到来的时候，芝加哥事件也将产生延宕性效应，但主角不是休伯特·汉弗莱，而是在希尔顿酒店前拍摄的那段 17 分钟影片。《芝加哥太阳时报》和《纽约时报》以及许多其他报纸都刊载了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电视报道。这正是异皮士，或者说是阿比·霍夫曼的梦想。后来，阿比·霍夫曼对由政府指派来调查芝加哥暴力冲突事件的沃克委员会解释称，“我们想让他们在电视上曝光。主要就是破坏形象，一个治理得和平有序、并一切遵照商业规则的民主社会的形象。”

霍夫曼和许多其他报道此次事件的记者们都相信，数以千万计的人目睹了芝加哥警察疯狂地殴打孩子，这将改变美国社会并使年轻人更趋极端化。或许的确如此。美国有少数人对此兴高采烈并表示，“就应该这么对付那些嬉皮士们。”而据迈克·罗科表示，戴利在芝加哥的支持率上升了。1976 年，在戴利去世后的第二天，罗科记叙了这位市长对里比科夫的反犹咒骂，“数以千万计的电视观众们都深感震惊，但这却没有伤害到大多数芝加哥人的感情。这是芝加哥方式的一部分……”。戴利十分愤怒并且坚称警方执法妥当，而错就错在媒体的“扭曲和歪曲报道”。但现在时代不同了。人们观看未经剪辑过的影片，许多人都被所目睹的情形惊呆了。十分奇怪的是，汉弗莱却声称他从未看到过该影片。“我在忙着会客。”他说。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民主党内各派系间都在静观其变。如果芝加哥的事态发展使得人们对执政当局幻想破灭并导致民主党出现低投票率的话，能从中获得最大好处的莫过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了。

当汉弗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对电视媒体播出会场外的暴力事件

而非会场内的情况十分不满。“有一天我会成为总统。”这位候选人说，听起来已经有些不太肯定，“我将任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将对此进行调查。”

在芝加哥，你站在哪一边？这成为1968年众多分歧中的一个。你要么站在甚至连沃克调查报告都予以严厉谴责的戴利和警方一边，要么你就站在示威者一边——那些嬉皮士、异皮士、反战运动分子、麦卡锡竞选工作者等。当从党代表大会会场出来时，汉弗莱已成为民主党新的候选人。他说道：“骚乱、纵火、袭击、抢劫、走私毒品以及藐视法律，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的先兆。”不管这话还包含着什么其他含义，但它意味着汉弗莱是站在戴利和警方一边，在“法律和秩序”一边，这是其他人所称的新名词“白人反弹”。在他看来，除了他自己之外，左派没有其他的选项。华莱士曾经说过，芝加哥警方“或许过于保持克制”。

在离开芝加哥之前，汉弗莱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罗格·马德专访。在采访中，他放弃了“在忙着会客”的说法并表示：

我的天啊，任何目睹此情此景的人都会感到难以忍受。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我认为应当指责那些该谴责的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认为戴利市长做错了什么。他没有……

我知道是什么引起了示威抗议。这些活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在这个国家里，有些人认为他们能做的就是发动骚乱并以此达到目的。他们不想通过和平手段来获得。我没工夫理会这些人。他们每晚不停地在酒店门前叫骂的那些污言秽语和亵渎言论对每一名女性、母亲和女儿，事实上，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种伤害。这种言语是没有人能够忍受的……警方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对一个和林登·约翰逊在一起共事过多年的人来说，会对污言秽语感到

震惊似乎让人感到有些惊讶。但约翰逊确实不曾在女性面前如此说话，这是传统的规则。1968年春天那场骚乱期间，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精神病学家表示，在骚乱之时，与哥大的男生相比，伯纳德学院的女生更可能会辱骂警察。这或许让汉弗莱震惊不已。“她们意识到，辱骂是她们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武器之一。”威廉·津瑟在《生活》杂志上就此撰文指出：“女性主义者发现了其终极性武器——四字脏话，”但金瑟在其文章中所指的是“伯纳德女生”和“哥大男生”。

对与汉弗莱存在年龄代沟的大部分年轻人而言，汉弗莱对在女性面前出言不逊所表现出的厌恶并不能让他们感同身受。为什么戴利的反犹主义没有让汉弗莱感到震惊？更不用提和母亲的肉体关系有关的那句时髦用语？无论如何，他可能已失去了多数爱说“我的天”的选民。而1968年时仍然爱说“我的天”的人并不多。

在后来的听证会上，阿比·霍夫曼表示同意戴利市长的看法，即正是电视摄像机将抗议示威者带到了芝加哥。在9月时，霍夫曼曾自夸称，“因为我们在芝加哥的行动，理查德·尼克松将会当选总统。”许多人都倾向于同意这一判断。但这最终仍还是要归结到两位候选人的选战中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越南战争第一次在1968年时没有成为大选中的决定性话题。

不可思议的是，并没有人在芝加哥的殴打事件中丧生，尽管有一人在逃跑时中枪。警方声称此人持有武器。同时，越南经历了那年夏天最艰难的一周。308名美军丧生，1134人受伤，越共则估计有4755人丧命。

东布拉格之殇

我想，从长远来看，我们的非暴力道路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侵略者所具有的道义优势，曾经而且仍然具有道德价值。当回顾历史时，可以说和平道路有助于“侵略性”集团的土崩瓦解……我之所以确信道德考量在政治中拥有其一席之地，并不仅仅是出于小国必须具有道德感，因为它们无力对抗强权国家。没有道德感，国际法也就无从谈起。倘若在政治领域无视道德原则，那便将回复到丛林法则的时代。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1990年8月

8月20日星期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杜布切克的私人朋友安东·塔兹奇正驱车从斯洛伐克远郊区返回布拉迪斯拉法市。他看见前方有奇怪的白光，当开近一点时，他意识到那是坦克和军车的前灯灯光，车上满载着身穿外国制服的士兵。他以为自己遇见了电影拍摄场景，回家后就上床睡觉去了。

8月20日是一个烟雾朦胧的夏日。杜布切克的妻子安娜因为胆囊问题造成的剧烈疼痛而几乎彻夜未眠。星期二早上，杜布切克把她送进了医院。他对妻子解释说，因为下午召开的主席团会议可能会持续到很晚，他星期三早上才能再来看望她。这是在三周后召开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之前的最后

一次主席团会议。杜布切克和他的同事们希望以此次党代会为契机，在法律上巩固布拉格之春所取得的成果。

在周末期间，当抗议者刚开始进驻林肯公园，芝加哥警察尚未挥舞警棍时，东布拉格——芝加哥人这么称呼——的命运已经由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决定了。苏联人相信，一旦已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会议看到坦克进驻，他们就会让杜布切克及其团队下台。有情报显示，杜布切克和其他主要人物将随即接受审判并被处决。东德官方报纸《新德意志报》相信苏联的计划会取得成功。该报在苏军入侵当晚刊载了一篇关于捷克起义以及新成立的革命政府请求苏联军事支持的报道。

然而，没有成立什么新政府，也没有人请求苏联的介入。正如预期一样，主席团会议开会直到晚上。与会者共进了工作晚餐。主席团两位成员提议回复到改革进程之前，这让其他成员颇感失落。但这一提议并未得到多少支持。11时30分，在没有任何权力转移的情况下，总理切尔尼克召见了国防部长。其后宣布：“五国联军已越过共和国的边境并正在入侵我们。”

如同和其家人独处时一样，杜布切克轻声地说道，“这是个悲剧。我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丝毫未曾怀疑过他们会采取这种方式来对付我们。”眼泪开始顺着他的脸庞滑落。“我毕生都致力于与苏联合作，而他们竟然这么对我。这是我个人的悲剧。”据说，他曾经表示，“他们最终还是下手了——对我！”似乎在那个时候，他才生平第一次放弃了他父亲将苏联当做未来承诺的梦想。包括杜布切克在内，许多官员的第一反应就是辞职下台。但很快，杜布切克和其他人意识到，如果拒绝辞职并坚持他们是唯一的合法政府，这将给苏联人带来更大的难题。其后，莫斯科的领导人只花了一天时间就开始明白苏联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三天前的8月17日，杜布切克秘密会晤了匈牙利总理卡达尔。杜布切克那一代的布拉格人对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并无多

少敬意。一位名叫兹德涅克·姆利纳日的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将他们称做“心怀敌意、愚蠢自负、老朽不堪的老家伙”。保加利亚总理托多尔·日夫科夫与杜布切克年纪相仿，但人们认为他反应迟钝或者说是愚蠢。相反，亚诺什·卡达尔却被认为是一位聪明睿智且与杜布切克理念相似的共产党人，他希望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取得成功的理由和哥穆尔卡反对捷克改革的理由如出一辙：他认为改革会蔓延到自己的国家。但卡达尔却不得不认识到，他已与匈牙利领导层的其他人脱节了，他也正在冒险将匈牙利带离莫斯科的轨道。在12年前经历过入侵后，匈牙利不想再次成为一个反叛的国家。卡达尔或许已获悉苏联已决定或正准备入侵捷克。在会见杜布切克时，他对后者提出了警告并劝说他改变立场。他甚至还提醒杜布切克，苏联人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他并不了解他在和谁打交道。这可能为时已晚，但杜布切克却始终没能理解卡达尔的言外之意中不无绝望的警告。

7月初，在召开完切尔纳会议之后，危机似乎已得以化解。苏联也确曾决定放弃入侵行动，但迄今仍不清楚是什么使其改变了主意。1989年，曾经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一名亲苏官员的瓦西尔·比拉克在其回忆录中透露，8月3日，即切尔纳会议结束后两天，他和其他18名亲苏的捷克官员曾经致函勃列日涅夫。这19名官员私下表示拒绝支持杜布切克并请求苏联为其政变行动提供军事支持。他们希望能在8月19日之前得到答复，因为捷克政府主席团将于8月20日召开当月23日党代会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这些亲苏的密谋者坚持认为那将是一次“反革命会议”。

因此，正如他们所声称的那样，苏联人最终是在那些急于推翻政府并欢迎苏军的亲苏分子邀请之下入侵的。但这些人只是一个小集团，密谋者们并未得到足够的支持来实施其计划。当联军进驻时，这些亲苏的密谋者根本无法掌控任何东西，他们试图夺取电视台亦未能成功。

克格勃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阴谋的夸大报告或许是另一个促使苏联决定入侵的因素。苏联在华盛顿的消息来源报告称，与莫斯科某些人所认为



苏军入侵捷克后粘贴在布拉格街道橱窗的一幅描绘列宁落泪的海报
(约瑟夫·考德尔卡 摄 / 玛格南图片社)

的相反，布拉格事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并无关联。事实上，中央情报局对布拉格之春深感意外。但上述报告被克格勃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毁掉了，他并称，“我们不能让领导人看到这种东西。”

中欧时间8月20日晚上11时，这个夏日夜晚的空气中突然充斥着声音，地面轰隆隆作响。代号“多瑙河行动”的入侵计划开始了。这不是在拍电影。那晚，4600辆坦克和16.6万名华沙条约组织士兵侵入捷克。他们越过西起东德、南起波兰、东起苏联以及北起匈牙利的20个边境点进入毫无防范的捷克境内。包括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象征性军队，共有五国参与了此次侵略行动。东德和波兰各派遣了一个师；苏联出动了13个师。在7个小时之内，250架飞机空投了整整一个空降师的兵力，包括小型装甲车、燃料以及补给在内。此次行动是苏军在其境外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投行动。从军事上来看，这堪称蔚为壮观，只不过并没有军队进行还击。

杜布切克和其他领导人等候在中央党部大楼内。杜布切克一直盯着电话机，半信半疑地希望有电话来向他解释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误会。凌晨4时，一辆黑色豪华轿车带领着一个坦克纵队驶向中央党部大楼。面对愤怒的人群，苏军坦克用机枪扫射。一名年轻人中弹身亡，这时杜布切克正和其他领导人愤怒无助地站在窗前目睹着一切。

尽管捷克斯洛伐克被公认为在华沙条约组织内拥有最为训练有素以及装备最为精良的武装部队，但杜布切克命令其不准抵抗。杜布切克及其政府在紧急讨论后排除了武装抵抗的可能。同所有的华约组织军队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并不拥有独立的指挥系统。如果没有苏军领导，他们将难以有效运作。杜布切克等人一致认为武装反抗不可行，那不仅会造成过多人命伤亡，而且还会为苏联所谓的镇压反革命动乱提供口实，正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一样。最好让全世界都亲眼目睹残暴的外国军队是如何镇压爱好和平的捷克。据知，捷克边防军队未曾开过一枪或是试图阻止装甲部队前进，也没有

人试图阻止军队及其装备抵达捷克机场。但在第一天结束后，有 23 名捷克人丧生。

伞兵部队包围了中央党部大楼。大楼内所有的电话都被切断了。直到早上 9 时，伞兵部队冲进了杜布切克的办公室，封锁了窗户和门口。杜布切克走上前去拿起电话，他忘记电话再也无法接通了。一名士兵用自动步枪对其进行恐吓并从墙上拔掉了电话线。五六名高级官员和杜布切克一起目睹了这一切。这时，一名身材十分矮小、别着勋章的克格勃上校冲进了办公室，身后跟着几名克格勃官员和一名翻译。在将在场的政府官员清点登记后，他宣布所有的人都将“接受其保护”。于是，所有人都被命令坐在一张长条桌上，每人背后站着一名士兵持枪对着他们。然后，杜布切克被带走了。当经过其办公室主任身旁时，他对他轻声耳语要其妥善保管自己的公文包，那里面装着他不想让苏联人知道的文件。一周后，当返回布拉格时，他发现公文包空空如也。杜布切克终于明白，自己的办公室主任一直是苏联间谍。

华约组织的士兵们被命令不要被挑衅所煽动，同时只有当被攻击时才能开火还击。但在侵略盟国的敏感行动中，这些侵略军队的士兵们却并未严格遵守这一基本的纪律。大体上而言，这些全副武装的部队所面对的是手无寸铁的年轻人。起初，青年们试图通过在坦克纵队面前静坐来阻止其前进。和经验丰富的 1968 年学生一样，他们用汽车、巴士以及所有他们能堆集到一起的物体堆起街垒。但他们很快就发现无法抵挡住苏军的坦克——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堆在路上的路障。这些坦克会从人群、汽车以及围墙上冲碾过去。偶尔间，一辆坦克停了下来。一位失去双腿的“二战”老兵拦下了布拉格街上的坦克，并挑战说让它从自己身上碾过去。星期三早上，芝加哥警察在同一天的早些时候被拍摄下暴力行径，布拉格街道上都是愤怒的青年。他们准备奋起反抗，尽管不知道该如何付诸行动。考虑到布拉格电台所在的广播中心是重要目标，许多人到那里去保卫电台。他们赶在坦克之前到达并用

自己的身体封锁了道路。坦克停了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眼看着捷克青年用汽车和推翻的巴士设置起路障。布拉格电台正在广播中报道对峙局势。通过扩音器，他们给这些年轻抵抗者的指示和那些入侵者所得到一模一样：不要使用武器，不要被挑衅所煽动。

捷克群众开始用俄语和坦克上的士兵对话，质问他们为什么会在此地，为什么不离开。年轻的坦克兵被激怒了，他们不顾禁令向人们头顶开火，然后直接向人群扫射。人群没有四下散开，当周围有人受伤倒地或丧生时，他们就将自制的燃烧瓶扔向坦克。有坦克着火后冒出黑烟，几名坦克兵亦受伤，甚至还有人丧命。但一辆巨大的T-55型坦克开进了着火地点，布拉格电台播送了有关消息：“悲伤的兄弟们，当你们听见国歌响起时，你们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了。”当坦克开火时，人们听见捷克国歌开始部分的旋律。随后，布拉格电台陷入了沉寂之中。

在布拉迪斯拉法，身穿迷你短裙的年轻姑娘让裙子翩翩飘扬。当苏联坦



1968年8月21日，布拉格广播电台门外
(约瑟夫·考德尔卡 摄/玛格南图片社)

克上的那些俄罗斯农场小伙子停下来欣赏姑娘们的大腿时，捷克男孩们则冲上前去用石头砸毁了坦克的前灯，甚至还设法朝一些坦克油桶里放火。一列匈牙利坦克纵队轰隆隆地从布拉迪斯拉法的多瑙河桥上碾过，大学生们朝他们投掷砖块并大声辱骂他们。一名苏军士兵从坦克上方下到位于坦克后部的开火点并朝人群扫射，一名 17 岁的护士学生当场丧命。这让学生们更加怒不可遏，但苏军回击的炮火也更为猛烈。学生们投掷的石头和砖块暴风雨般地砰砰地砸在苏军坦克上，又有四名学生殒命。在捷克全国范围内，学生们都在扔掷燃烧瓶。不懂如何制作燃烧瓶的学生干脆就丢掷燃烧的碎布。不时有坦克着火。年轻人将捷克国旗包裹在身上，冲向坦克并将随身携带的铁罐扔进坦克的炮管中。

坦克很快就控制了捷克全境，但街头仍可看见类似“伊万滚回家”的反抗标语涂鸦。全国的道路指示标志都被扭向北方并代以“莫斯科——2000 公里”的文字。街头上贴满了谴责侵略行为的海报以及诸如“社会主义，是；占领，不”、“俄罗斯国家马戏团来了，还有大猩猩表演”、“这里不是越南！”、“列宁醒来！勃列日涅夫已经发疯了！”等涂鸦之作——或者就是以巨型字母拼写出杜布切克和斯沃博达（SVOBODA）的名字，或者是苏联（USSR）的首字母缩写，但将其中的两个 S 字母写成好似纳粹徽章的闪电标志。

愤怒的捷克人民冲向坦克上的侵略者，试图劝说他们让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应该离开这里。这种徒劳无功的对话，就如同芝加哥的示威者曾试图向年轻的国民卫队高喊“加入我们中来”一样。最后，捷克群众拿出他们曾在学校中必修的俄文初级课本质问坦克上的士兵们为什么来到一个不属于他们的国家。苏联坦克士兵大多是未受过教育的 18 岁农民，他们无奈地看着面前的人群，辩解称他们是奉命而来。到处可以看到群众包围并质问坦克兵的情形。布拉格的外国人也并不罕见，直到那个夏日夜晚都是人们的“理想之地”。在数天内，他们全都平安无恙地离开了布拉格，包括 5000 名美国

游客在内。

在被关闭之前，捷克电视台设法将记录入侵行动的胶片偷运出境。一个特别震撼人心的场景显示，年轻人静坐在一辆苏联坦克面前拒绝离开，而坦克上的炮塔似乎正在疯狂地扫射。一名英国广播公司监制安排了欧洲广播联盟——一个西欧广播网络机构——在布拉迪斯拉法的多瑙河桥对面建立维也纳分站，在此记录可能取得的河对岸的一举一动。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之所以在捷克设立分站，是因为它曾是共产主义阵营向西方传送信号的广播中心，过去，它主要被用来转播体育赛事。捷克斯洛伐克人设法将一卷记录抵抗情形的45分钟的影片送至国外，同时还有一份致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陈情书。通过仅仅几分钟的画面，该影片就彻底驳斥了苏联所有有关其在捷克受到欢迎的谎言。影片的部分内容在美国、西欧和全世界各国的晚间新闻节目中播放。

这相应也导致了一场美国式革新。现在，为时30分钟的晚间电视新闻可以播放几分钟的广告，再加上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会场内和街头局势、苏联入侵捷克、联合国有关入侵事件的辩论和越南最糟的一周以及其他事件。自1963年秋以来，有线电视成功地将15分钟的新闻节目扩展到30分钟，这使得他们有更多的空间报道民权运动。沃尔特·克朗凯特则一直在推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新闻时间延长至一小时。反对者的理由同当初不同意将时间延长至30分钟时如出一辙：其下属的电视网将不会购买节目。在8月21日民主党大会和芝加哥骚乱期间爆发捷克入侵事件后，《纽约时报》电视节目评论家杰克·古尔德撰文称赞公共电视的灵活作风，称新闻时间能得以延长来报道现时的大量突发事件。他将其与有线电视进行对比，指出后者因拘泥于半小时的模式而无法进行充分报道。沃尔特·克朗凯特最终如愿以偿。8月22日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其晚间新闻时段延长到一个小时。古尔德对这一“试验”感到十分欣喜，并特别称赞其留出时间播放从捷克境内偷带出来的那段影片。但电视产业界却认为，大多数人不会愿意坐在那里观看整

整一个小时的新闻，更重要的是，下属的电视网——和多年前曾阻止延时至30分钟时的理由一样——不想失去半个小时的宝贵节目时间，他们可以用来播放自己利润丰厚的当地广告节目。这项试验结束了。克朗凯特赢得了这一次战役，但他却失去了整个战争。然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9月开播了一档每月两期、时长一个小时的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

捷克流行歌手卡雷尔·切尔诺赫录制了一首新歌：《我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

但对莫斯科来说，这同样也是一场噩梦。有关的画面被迅即传送到世界各地的电视台，并成为各家报纸的头条新闻和各家杂志的封面报道。画面所展示的不是计划中新的亲苏政府欢迎解放军队的到来，相反却是手无寸铁的捷克青年挥舞着沾满鲜血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冲到苏军的巨大坦克前，向他们投掷石头并点燃浸满汽油的碎布。有些时候，是长发蓄须的布拉格青年和魁梧金发、凶神恶煞般的俄罗斯乡下小伙子展开的辩论。

此前，莫斯科的部分人曾反对入侵，这或许一直是他们所最为担心的。官方的说法，即他们是来帮助捷克被证明是虚假的谎言。杜布切克发表广播讲话称，在总统、国民大会主席以及他本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国家遭受了侵略。苏联人很快就明白，捷克人民信任他们的政府并且相信他们的领导人所言，特别是杜布切克、切尔尼克以及斯姆尔科夫斯基。苏联想要反驳他们是徒劳无功的。接着发生了一起阴谋事件。政府中的一名苏联间谍企图中断广播，但却被抓住了。苏联的第一方案失败了，主席团没有推翻杜布切克并未使人感到吃惊。但那些亲苏分子在苏军进驻后仍难以控制局势却颇令人感到意外。五国全副武装的军队却无法让手无寸铁的群众屈服难免让苏联感到愤怒。而侵略行动被拍摄下来并在全世界播放和印刷出版，这则是难以想象的灾难。

苏联人还剩下一张可打的牌：年逾七旬的军官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其

出任总统一职曾让年轻人失望。捷共书记兹德涅克·姆利纳日这样评价斯沃博达：“他不但不曾参与政治改革，而且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个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捷克第一共和国期间，他是军队的一名军官。机缘巧合，他成为捷克军队总司令，并在‘二战’期间与苏联军队并肩在苏联战场作战。很显然，从战争开始那一刻起，他即对捷克应该无条件支持苏联这一观念深信不疑。”

但当一群亲苏人士到赫拉德卡尼城堡造访被苏军武装警卫控制的斯沃博达总统，并要求其签署一份允许苏军进驻的文件时，这位72岁的老兵怒吼道：“给我滚出去！”

一切似乎都并未按照苏联的计划发展。通常情况下，侵略军队或即便是政变阴谋都会将夺取电台和电视台作为第一要务，但这却并未曾包含在苏联的计划之中，因为他们本指望当苏军进抵布拉格时，捷克全国都将在其掌握之中。当他们最后关闭布拉格电台后，秘密地点的地下电台开始广播苏军镇压和捷克民众奋起抵抗的消息。这些电台同样也对苏军的宣传起到破坏作用。当苏军宣称斯洛伐克已经投降时，地下电台则广播称那是个谎言。它们也报道苏军的有关动向。苏军正在逮捕什么人以及已经逮捕了什么人。只要捷克电台在广播，人们就会觉得苏联并没有完全征服捷克。地下电台的口号是：“我们和你在一起。请你和我们在一起。”一名捷克内政部官员扬·扎鲁巴宁可自杀也不愿泄露电台发射机的地点。苏军破坏地下电台的努力一无所获，于是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电台，但却找不到能流利说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的播音员。苏军试图空投传单，结果散落在捷克境内的传单却印着斯洛伐克语。

当人们在电台中听到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那平静的声音时似乎感到难以置信。哈维尔称：“我碰巧是少数能仍然在这个国家自由使用电台发射机的捷克公民之一。因此，我以捷克和斯洛伐克作家的名义向你们呼吁，请求紧急支援。”他请求西方作家发声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径。

南斯拉夫的铁托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公开谴责苏联入侵，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的街道上到处是示威抗议者。齐奥塞斯库将入侵行为称做“一个严重的错误”。另一方面，波兰的哥穆尔卡则宣称捷克斯洛伐克是反革命政府，已脱离华沙组织集团，并企图阴谋推翻波兰政府。然而，只需假以时日，波兰人和东德人就会发现，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阴谋背后是“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者”。

意大利与法国共产党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动，日本共产党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三个月来，东京大学校园在被学生占据后已陷入停滞状态。学生们第一次在苏联大使馆前游行示威。菲德尔·卡斯特罗赞成苏军入侵，称虽然痛苦但却是必须的。在非东欧国家中，仅有古巴、北越以及朝鲜共产党支持此次入侵。在全世界 88 个共产党中，仅有 10 个对此表示支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将苏联入侵称做“战后最为悲剧性的事件”。

有一些东德青年散发表示抗议的传单，数百名东德工人则拒绝在支持侵略行动的请愿书上签字。少数未被捕入狱的波兰持不同政见者写信抗议侵略行为。波兰著名小说家耶日·安杰耶夫斯基致函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谴责波兰参与侵略行动，并表示，“波兰同道和你们在一起，尽管在波兰没有言论自由。”他补充道：“我意识到，我的政治和道德抗议的声音既不会也不可能弥补以全世界的进步观念来看波兰所背负的耻辱。”更为严重的是，有报道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分别与保加利亚部队和匈牙利部队之间爆发枪战交火。

即便在苏联国内，有七名抗议者高举写有“远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字样的横幅在红场静坐，其中包括已故苏联外长之孙帕维尔·利特维诺夫、入狱诗人尤利·达尼埃尔之妻以及著名诗人纳塔利娅·戈尔巴涅夫斯卡亚。他们暂时被拘留。据戈尔巴涅夫斯卡亚在给外国记者的信中所称，有些人遭到殴打，但“我和我的同志们都很高兴，能够，哪怕只是短暂地打破由肆无忌惮的谎言和胆小懦弱的沉默所形成的泥淖，从而表明我们国家并

非所有公民都对以苏联人民的名义所犯下的这种暴力罪行表示赞同”。苏联入侵后的第二天，诗人叶甫根尼·叶夫图申科给总理柯西金以及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发去一封电报，并将其散发给了西方媒体：

我不知道如何入眠。我不知道如何延续余生。我只知道，我有道德义务向你们表达占据我全身的这种感情。

我深信，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并将沉重打击苏捷友好关系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它降低了我们在世界上以及我们自己眼中的声望。

这对世界和平以及人类对未来手足情谊的梦想等在内的任何进步力量而言都是一种挫折。

同时，这也是我个人的悲剧，因为我在捷克斯洛伐克有许多私人朋友。如果我再次遇见他们时，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凝视他们的双眼。

在我看来，这是给世界上所有反动势力的一份厚礼。我们无法预测这一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热爱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我谦卑地继承了诸如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索尔仁尼琴等作家所代表的俄罗斯文学传统。这些传统告诉我，沉默有时候是一种耻辱。

请把我对这一事件的意见记录在案。这是一个自己祖国的赤诚之子以及曾写过《俄罗斯人想要战争吗？》这首歌的诗人的意见。

戴高乐和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在众多世界领导人中首先对苏联入侵者发表谴责，这也是二人首次观点完全一致。戴高乐进一步将苏联入侵比做1965年4月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位将军试图再次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凸显自己的政策主张。戴高乐的这一想法并不会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因为在苏联入侵的影响之下，许多欧洲人感觉相较于美国而言，苏联更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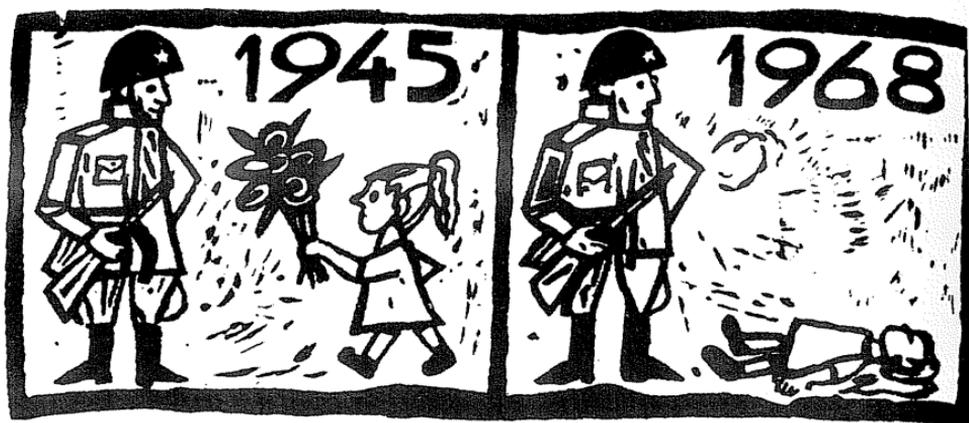
个迫在眉睫的威胁。然而，戴高乐在8月24日却时来运转——他当天宣布，法国已成功地在太平洋试爆了一颗氢弹，戴高乐将此次试爆称做“一次伟大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成功，这是法国的精英儿女为了法国的独立和安全所取得的成就”。

和戴高乐一样，苏联入侵事件也使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和乔治·麦戈文在政治上造成了伤害。他们同样将其与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越南相比。苏联入侵捷克同样也让尼克松面临尴尬。就在几周前，尼克松软化了其长期以来的反共立场。他表示，苏联已非昔日的威胁，现在是该坦诚相见并谈判协商的时候了。对许多西方政治家来说，问题在于，苏联入侵事件偏偏发生在当外界认为它应该不会再做此类事情之时。

奇怪的是，最为温和的谴责表态之一来自于美国。在入侵事件发生后不久，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随即拜会了约翰逊总统。约翰逊总统则召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在会上，试图谴责苏联入侵的尤金·麦卡锡对约翰逊提出了批评。在芝加哥，民主党政纲中尚有一线希望的和平计划似乎也随着苏联的入侵烟消云散了。冷战再次卷土重来。但很显然，除了在联合国发表措辞强烈的谴责之外，约翰逊并不想采取其他的举措。他表示，在美苏会谈中已取得的进展至关重要，不能轻易放弃。事实上，当苏联坦克跨越捷克边境时，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正在民主政策委员会就美苏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发表演讲。

联合国对苏联的入侵行为给予谴责，但苏联却轻易地以其否决权推翻了谴责提案。

莫斯科的重点集中在他们从未想过会是个麻烦的捷克总统斯沃博达身上。如果斯沃博达不同意苏联更迭捷克政权的话，苏联入侵就几无获得合法性的可能。但以往总是首先向苏联表示忠诚的斯沃博达迄今为止却仍拒绝签署任何文件。苏联人对其进行恐吓威胁，而斯沃博达则以自杀相回击。若



苏军入侵后，捷克斯洛伐克学生创作的丝印海报。海报将苏军在1945年和1968年进入捷克时受到的欢迎场面进行了对比。

果真如此，这对苏联来说无疑是个灾难。在大棒政策未能奏效之后，于是胡萝卜政策登场。苏联许诺向捷克提供前所未有的援助。在这位年逾七十的老者并未为其所动后，苏联又提出对其委以高官以及有权委任其他捷克高级领导人。苏联尝试过的所有办法在斯沃博达身上都未能奏效。对这位老迈的将军来说，苏联唯一可以接受的做法就是从克格勃的军营监狱释放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以及其他依宪法所产生的捷克领导人，然后将他们送至莫斯科谈判解决问题。只要苏联和这些领导人达成协议，在斯沃博达看来，不管协议的条款如何，它都将被视做是合法的解决办法。他相信，只要他让各方坐在同一张桌前，他就可以解决问题。“当苏军最终离开这里时，”他平静地表示，“你们会看到，人们会像1945年时一样再次朝他们献上鲜花。”

斯沃博达并不支持布拉格之春。事实上，在苏联入侵之后，他还支持实施多年的镇压行动。但在此关键时刻，他阻止苏联人完全将捷克置于其坦克铁蹄的蹂躏之下。他不承认苏联侵略行为的合法性。但他也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强烈的情绪忧心忡忡，认为他们的执著固执十分危险。一位不知名的妇

女竟接通了他的电话并建议这位将军自戕以示抗议。他对那位妇女解释道，这并非有用的办法，而且还要依靠他来解决危机，但那位妇女坚持称，“哈，总统先生，如果你开枪自杀的话，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当被捕入狱的捷克领导人抵达莫斯科时，从他们的面容就可以清楚看出他们饱受残酷折磨。他们脸色苍白，满脸病容，神经处于崩溃边缘。杜布切克似乎已筋疲力尽且额头上还有伤口，据说是在浴室睡着时所致。在莫斯科谈判的整个期间，杜布切克都在治疗其紊乱的神经。有时候，他还会出现结巴口吃的状况。

在哈维尔于苏联入侵一年多以前所创作的戏剧《备忘录》中，有一场戏里那位阴谋以一种假造语言将克劳斯赶下主任职位的人意识到，包括那种语言在内的整个阴谋计划纯粹是个灾难。他们将克劳斯赶走，后来又请他回来，并且破天荒地以“朋友”称呼他，似乎他们是老朋友一样。勃列日涅夫正是如此对待杜布切克。

在提到杜布切克时，勃列日涅夫称其为“我们的沙夏”。在相互交谈时，他也以俄语中用于朋友之间的称呼 TY 来表示“你”，这让杜布切克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此前并非很熟悉。杜布切克则坚持用俄语中“你”的敬称形式 VY 来称呼勃列日涅夫。

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与苏联人举行了为期四天的会议，有时和勃列日涅夫，有时依次和苏共政治局成员，有时则是和整个政治局成员。他们在一张长桌旁就座，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一边，苏联人则在另一边。并没有讨论座次的安排问题。他们隔着桌子相互交锋并和坐在同一边的人相互打气。斯沃博达急于想要达成一份协议，认为没有协议的时间越长，双方关系受到的损害将会越发不可挽回。他也担心苏军的紧张压力将会过大，军纪或会松弛。截至9月2日，已有72名捷克人丧生，702人受伤。由醉酒的苏军士兵所引起的伤亡事件持续上升，有时是胡乱开枪射击，有时则是交通事故。因为害怕驻扎在森林中的苏军士兵酗酒闹事，伐木工人不敢前去上班工作。

当莫斯科正在召开会谈的同时，在布拉格的扬·奥普勒塔尔大街——这条街以被纳粹杀害的一名学生命名——一位名叫米罗斯拉夫·巴拉内克的年轻学徒被一名醉酒的苏军士兵近距离地射杀。

试图推动捷克政府尽快达成协议的斯沃博达不免怒火中烧。他向杜布切克声称：“你什么事也不做，就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唠叨。因为你的胡言乱语导致自己的国家遭到占领，这难道还不够吗？从过去中吸取教训然后有所行动吧。”

但杜布切克却并不如此急于求和。他显得更为犹豫不决和更加谨小慎微，其立场也一如既往地让人难以捉摸。据姆利纳日称，杜布切克身边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或是回旋余地，“因为苏共政治局的所做所为就如同一帮强盗”，正如被激怒的卡达尔在入侵前的最后一次会晤时曾警告杜布切克的那样，“难道你真不知道你在和什么样的人在打交道吗？”

即便苏联在从自身一方向捷克施压，捷克一方也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也凸显出杜布切克政府的本质所在。斯沃博达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敦促达成协议。由捷共中央委员会选举进入主席团的60岁的医生弗朗齐歇克·克里格尔是联合政府中的三名自由派之一，其态度则更为灵活。他是来自波兰南部加利西亚地区的犹太人。克里格尔曾和杜布切克一起被逮捕入狱。当他和杜布切克一道抵达莫斯科时，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吼道，“这个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在这里干什么？”苏联方面禁止其参与谈判，但捷克方面则坚持让他加入，表示没有他就拒绝谈判。克里格尔一直是捷克政府中的激进分子，他推动捷克与中国发展关系以平衡苏联。克里格尔身患糖尿病，现在苏联方面则试图以削减提供胰岛素迫使其在谈判中就范。有几次，克里格尔会让斯沃博达变得哑口无言。他对斯沃博达表示，“他们能强迫我做什么？我有两个选择：要么他们送我到西伯利亚去，要么他们枪毙了我。”克里格尔是捷克谈判代表团中唯一始终未签署该协议的成员。他最后说道，“不！如果你们想的话就杀了我吧。”

苏联人不仅将许多反犹指控的矛头指向克里格尔，同时也包括捷克副总理奥塔·希克和布拉格第一书记博胡米尔·西蒙。事实上，西蒙并不是犹太人，只不过他的名字在斯拉夫人听起来像犹太人而已。

当勃列日涅夫召开会谈时，杜布切克的情绪似乎十分低落，服用了过多镇静剂，因此切尔尼克不得不替他做捷克方面的开场发言。切尔尼克的发言直截了当，毫无避讳。他并没有强调惯常都会谈及的与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相反却为布拉格之春以及捷克共产党的行动辩护，并坚称苏联的军事干涉对社会主义并非好事。勃列日涅夫数次打断了他的话并予以反驳。当切尔尼克讲完后，杜布切克要求发言。这不符合会谈的程序规则，但他仍然坚持。起初，他讲的俄语有些结结巴巴，但几分钟后已十分流利。姆利纳日形容其发言是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鼓动人心并激情洋溢的辩护”，并对苏联的干涉予以谴责。杜布切克是临时发言，勃列日涅夫也当场给予回应。他坚持认为，布拉格之春损害了苏联的利益，并解释了其关于主权和苏联阵营的看法。他转向杜布切克说，“我起初曾试图帮你对付诺沃提尼。”他似乎因为杜布切克从未信任过他感到受到了伤害。“我信任你并且替你在其他人面前辩护。”他对杜布切克表示，“我说我们的沙夏绝对是个好同志，但你却让我们失望了。”

勃列日涅夫明确表示，杜布切克最大的过错在于不征求苏联的意见——未将自己的讲话稿送到莫斯科核准，在人事变动上也不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你看，即便是我自己也要将讲话稿事先交给政治局的所有成员征求意见。是不是这样啊，同志们？”勃列日涅夫转身面向坐在他身后一排的全体政治局成员，他们则全都迫不及待且顺从地点头表示同意。当然还有其他的过错：“强化反社会主义倾向，允许媒体随心所欲地进行报道，反革命组织的不断施压……”最后，就像在和各级苏联官员交换意见时都会出现的情形一样，勃列日涅夫提到了苏联在“二战”中的牺牲。双方都不曾忘记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过程中苏联牺牲了145000人。

杜布切克总是毫不犹豫地指出他与勃列日涅夫意见不同之处。最后，勃列日涅夫涨得脸通红并吼道和这帮人谈判是白费工夫。他慢慢地走出会议室，整个政治局成员们都顺从地跟在后面缓步而行，如同在举行某种仪式。

这无异于威胁恐吓。当杜布切克刚开始被带走时，他被告知将会受到审判。当苏联人以为他们可以扶植卖国的捷克政府来取代杜布切克和其同事时，杜布切克面临着被处死的现实可能。但当斯沃博达一再坚持且局势发展越来越对苏联不利时，那些被囚禁的捷克领导人得到的待遇逐渐有所改善。双方都需要一份协议。没有协议的话，苏联就不会有合法性，而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者们则会丧失影响自己国家未来的可能性，他们也可能会有性命之虞。勃列日涅夫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让他们不得不思考，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的话，自己的国家以及他们自身的命运将会如何。

最后，双方终于反复推敲出一份彼此都可以签署的文件。这份文件几乎并未反映任何捷克方面的意见，对杜布切克政府已取得成绩的合法性和价值都未予以确认。而事实上，捷克方面鲜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逼不得已，即便没有合法性，苏联也将实施残酷的统治。当协议准备妥当、几近签署之时，杜布切克因意志消沉而情绪沮丧，他的身体摇晃颤抖，人们担心他可能无法参加最后的签字仪式。他注射了更多的镇静剂。从说明上看，这些药物的药性不太清楚。让所有参与谈判者都突然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杜布切克拒绝再注射更多镇静剂，“否则我不签字。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我不会签字。”在彻夜的漫长谈判过程中，他最终还是注射了一针。

最后，在捷克已被坦克占领的情况下，已成为阶下之囚的捷克领导人被迫忍气吞声所接受的《莫斯科协议》准备正式签署。突然，巨大的双扇门被推开了。苏共政治局的每位成员立刻站了起来，满脸堆笑，伸出双臂，走到会议室另一边去拥抱他们已精疲力竭并甘拜下风的捷克囚犯。

当谈判代表团赶赴机场返回布拉格，他们突然发现落掉了克里格尔。有人表示回国代表团中没有克里格尔可能会更方便，但包括斯沃博达和杜布切

克在内的其他人都坚持苏联方面交出克里格尔。最后在经过两个小时的协商之后，苏联将克里格尔送到了机场。

带着一份毫无所获的协议，代表团回到了布拉格。苏联同意予以捷克共产党“理解和支持，并设定完善社会管理方法的目标”。根据“正常化”进程的进展情况，联军将逐步撤出捷克境内。捷克人民对苏联的欺人之谈十分熟悉。正常化是个新词，但他们知道它意味着什么——重新回到过去的独裁统治。苏联人的要求已在《莫斯科协议》中得到切实的确认，然而捷克人的要求，比如撤军，却仍有待时日并取决于苏联的主观意愿。在入侵一周之后，占领捷克的总计有 50 万名外国军队和 6000 辆坦克。

8 月 27 日，看似已无法站立的杜布切克发表了一次演讲。他要求人民再次给予他本人以信任，并表示这些都是“暂时措施”而已。他几乎不能说一句流利的话，但他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相信，他们将会寻找到改革的时机。在杜布切克重新上台后，捷克政府起初凸显出其独立性。国民会议甚至还通过一项决议，称苏联占领为非法并违反联合国宪章，领导人能够解除其内部的亲苏官员的职务。

9 月时，捷克被迫采取措施限制媒体自由，尽管以苏联阵营的标准来衡量它仍然十分具有反叛和独立意识。杜布切克采取了一种近似精神分裂的方法，一方面屈服迎合苏联的意图，另一方面则坚持自己的原则。10 月时，在同五个侵略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后，勃列日涅夫宣布“多瑙河行动”取得圆满成功。但他指出，接下来的局势发展却是灾难性的。哥穆尔卡甚至更为激进，坚称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危险的反革命分子的温床。在成功地镇压了自己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后，他对仍然存在着学生与警察之间对抗情形的捷克斯洛伐克鲜有耐心。

成千上万的人逃离捷克，许多在国外的人也决定不回国。切尔尼克鼓励移民入境。边境很快就会被封闭了，他解释称他甚至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更不用提其他人的。在入侵发生一个月后，1400 万捷克人中已有 5 万人逃

离出境，他们中的1万人已在其他国家申请了难民资格。大批第一次出国度假的捷克人被迫滞留国外，许多人不得不等待了二十多年才得以再次回国或出国。

与此同时，曾在杜布切克1月份上台时大力推动其进行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力劝其会员不要流亡国外；如果已身在国外则在边境关闭之前返回国内。因为其新书在法兰克福出版，剧作家和小说家帕维尔·科胡特一直在布拉格和法兰克福之间来回穿梭。他在法兰克福探访捷克作家，劝说他们回国重建作家协会，使其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中心。在曾遭到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特攻击过的法兰克福书展上，科胡特联系到了几位作协成员。出席1968年的法兰克福书展的捷克作家人数空前，同样的原因，林肯中心电影节骤然间也聚集了许多捷克导演。支持捷克艺术已成为一种政治反抗的行动，许多捷克艺术家也仍能出国旅行，但没人能肯定这还能持续多久。

怀着接管权力并引导方向的想法，青年人加入共产党的人数出现空前的高潮。在入侵发生后的一个月內，有7199人入党。根据官方数字，其中63.8%，即三分之二的人年龄在30岁以下，这似乎必然给主要由中老年人组成的捷共带来冲击。

苏联军队已悄无声息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他们仍然存在。当捷克青年在9月末发起示威抗议活动时，苏联不得不警告捷克警方称，如果他们不驱散示威游行，那么苏联军队将会出动。捷克警方最后阻止了游行活动。

青年人也在全国各地成立了杜布切克俱乐部。许多俱乐部都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会员，他们收集整理杜布切克的演讲稿并在一起讨论。

1968年秋，杜布切克致函给在墨西哥市的捷克斯洛伐克奥运代表团称，如果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并不如预期中的好，“你们不要垂头丧气：今天不能取得成功的，明天或许可以。”

惨淡忧郁的笑容

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逐渐变成女人的。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中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

——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1949年

我认为，缺乏私人形象是长期以来美国妇女问题中不为人所知的关键所在。与理性相悖且和妇女自身并无太多关联的公众形象过多地决定了她们的生活。如果女性不存在身份认同危机的话，这些形象将不会具有此种力量。

——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1963年

把它记在备忘录里，史密斯先生：如同其他所有奋起反抗的被压迫者一样，我们站出来要求我们的自由——这无论如何是必要的。

——罗宾·摩根，《记在备忘录里，史密斯先生》，
《赢》杂志，1968年11月号

如果美国小姐选美得以一帆风顺地举行，那么此次活动也就没有太大意

义了。毕竟，这是1968年。在目睹了芝加哥的骚乱事件后，电视观众可以暂时从苏联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以及间或有关湄公河边燃烧的村落报道中转移注意力，去看装腔作势的伯特·帕克斯主持人在舞台上暴红。他身穿燕尾服，就像扁平足的歌舞之王弗雷德·阿斯泰尔；对那些从大学校园中精心挑选出来角逐据称是代表理想的美国女性桂冠的年轻、白皙、金发碧眼的女孩子们，他们则会给予不满的嘘声。为了符合要求，她们需要展示诸多技巧，比如毫无犹疑地回答提问，身着泳装时如何展现身材但又不可过于暴露，以及始终保持灿烂微笑以致嘴唇变成直角？——一种不同于休伯特·汉弗莱的那种肉食动物的笑容。此次选美活动可能在种族问题上面临挑战。理想的美国女性总是白人吗？身为黑人，棕色人种、红色人种或是黄色人种本身就差强人意吗？

但这并不是攻击行动的主要内容。沿袭异皮士一贯的做戏传统，一百多名妇女于9月7日聚集在选美会场外的木板路，并在那里为一只绵羊加冕。当媒体蜂拥而至时——通常在美国小姐选美时没有太多突发新闻——抗议者坚持只接受女记者的采访，而在1968年时女记者还不是很常见。

在吸引了媒体注意力之后，这群自称是“纽约激进妇女”的人开始向一个标着“自由垃圾桶”——故意从民权运动中借用的语言——的垃圾箱内投掷东西。在那个自由垃圾桶中，人们扔进了束腰带、乳罩、假睫毛、卷发夹以及其他“美容产品”。有大约二十名“激进妇女”成员仿照从电影《阿尔及尔之战》中学来的样子，发出一种阿拉伯妇女的尖锐笑声，从而导致会场内的比赛中止了20分钟。他们高喊着“争取妇女自由！”的口号并高举写有“妇女解放”字样的旗帜。

在这次分水岭性质的事件之后多年，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被冠以“乳罩焚烧者”的称呼，尽管她们根本就未曾焚烧过乳罩。起初的乳罩焚烧者们表示，她们是在抗议美国小姐“所代表的低级堕落和愚笨无知的傻姑形象”。

以此次事件初试啼声的纽约激进妇女组织成员曾广泛参与过新左派或是

民权运动，她们中的大多数也曾参与组织许多示威活动。但这是她们中有人第一次在抗议示威中发挥关键性的组织作用。她们的领导人罗宾·摩根说，“我们也都感觉到成熟了，我们做这件事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男人……”

1968年也爆发了其他妇女游行活动。1月时，5000名妇女在华盛顿举行反战示威游行。示威活动由以第一位女议员珍妮特·兰金之名命名的“珍妮特·兰金旅”组织，87岁高龄的兰金仍是一个狂热的活动分子。尽管5000名游行示威者全部身穿黑色的丧礼服装，这对电视转播来说应该效果不错，但有关此次示威活动的新闻报道却十分少见。《纽约时报》执行编辑克利夫顿·丹尼尔在电视访谈中解释称，之所以报道较少是因为爆发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不大。那些和民权运动打过交道的人多年前就已知道，女性在场将减少暴力冲突的危险性，而这则大大减少了媒体报道。

摩根将她们决定只接受女记者的采访视做是此次美国小姐选美活动事件中最大的成功。和其他抗议的想法一样，这一想法来自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纽约激进妇女组织在坚持这一原则上较为成功，或许是因为她们的运动对报纸来说属于未曾报道过的新鲜事物。在此后的几年中，这已成为女性主义的标准做法，新闻媒体也自觉地派女记者去报道女性主义活动。当女性主义方兴未艾而女记者正在努力超越有关时尚、文化以及美食等版面的报道内容时，这对新闻编辑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摩根也有遗憾之处。示威者似乎在攻击参赛者而不是比赛本身。在事后反思时，她认为让示威者高喊“美国小姐滚下去”以及翻唱那首改编过的歌曲“她很甜美，以她的肉体来赚取利润……”是个错误。参赛者应该被视做是受害者。

1968年9月7日通常被视做是现代女性主义的发端之日。女性主义运动已有时日，但正像60年代早期的新左派运动，当汤姆·海登首先在文章中提及时仅有少数的人知道，直到它们在电视上出现。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来说，“妇女解放”开始于9月7日大西洋城的那只绵羊和垃圾桶。不远

处，另一群抗议者正在举办一场美国黑人小姐比赛，以示抗议美国小姐的种族主义倾向。但在那个时候，黑人运动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不是因为美国小姐选美是一个不受人尊敬的活动，而是到60年代末期时，它已经失去了光环，并被普遍视做种族主义或是没有头脑，正像大西洋城本身一样褪去了颜色。莎娜·亚历山大在《生活》杂志中撰文称：

在18岁的女孩中，智慧比美貌更为难得。智力竞赛让她们的微笑变成了惨淡苦笑。一位表演杂技蹦床的女孩头朝下地放肆大笑。一位芭蕾舞女在表演“垂死的天鹅”时始终保持微笑，似乎在暗示是在家禽冰柜中死去。还有一个女孩的智慧似乎在于将咀嚼口香糖和跳查尔斯顿舞同步进行。随着旋律有节奏的间隔，当一个大大的粉红色水泡破裂时，她的笑容消失了。

当美国小姐选美出现在电视上，许多事情看起来都漏洞百出且沉闷和愚蠢，以至于人们努力按照重要性顺序来排列犯规的例子。它充斥着无聊无趣，自命不凡，种族主义，自私自利，令人作呕，沉闷压抑……

领导纽约激进妇女组织的摩根是一位从儿童演员转变而成的政治活动家。对她以及她组织中的所有人来说，大西洋城是她们首次展现激进女性主义之地。她们的思想明显根植于新左派。摩根在谈及目标的选择时表示，“从哪里还能找到如此完美集中地体现美国价值观的目标呢——种族主义、物质主义、资本主义——所有这些都包含在一个理想的形象之中——女人。”至于1968年的美国小姐，当然是获胜的伊利诺伊州小姐，摩根称她“脸上的微笑仍带着因被戴利市长吻过而留下的泛红痕迹”。最后，参赛获奖者前往越南慰问美军。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路人都抱着同情之心。男人们强烈质疑和谴责示威者，并建议她们应当把自己扔进自由垃圾桶内。他们还不怀好意地吼叫道，

“回家去洗乳罩去吧！”——人们再次接受了这一观念，即不遵守传统规范的人是可耻的。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前美国小姐参赛者马上义愤填膺地打出了她自己刚漆好的标语：“美国小姐的唯一过错在于——她拥有美貌。”当前美国小姐参赛者特莉·缪森在衣服上缝上“支持尼克松当选总统”的纽扣时，也就没人会对此表示惊奇了。

在9月7日之前，女性主义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一些身穿长裙、头戴无边女帽的女性所从事的运动。她们从1848年开始直到1920年都在努力争取女性获得选举权。随着1920年时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的通过，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主义运动已得偿所愿，达到既定目标，并停止存在了。在1956年《生活》杂志的一期关于女性问题的特刊中，科妮莉亚·奥蒂斯·斯金纳谈及女性主义时称：“我们已经获得了胜利，但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不要总是试图一遍遍地去证明这一点。”这种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1968年当媒体和公众意识到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处于方兴未艾之势时，他们经常将其称做“第二次浪潮”。

第二次浪潮所带来的首批惊喜之一，即是由贝蒂·弗里丹所著的《女性的奥秘》一书成为60年代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贝蒂·弗里丹住在郊区，有三个孩子。弗里丹为心理学研究生，于1942年毕业于史密斯女子学院。60年代初，该学院曾邀请她对学生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200名女性回答了调查问卷，其中89%的人成为了家庭主妇，而多数的家庭主妇们表示，她们生命中的遗憾在于她们未能将所接受过的教育用于有意义的地方。通常的观念认为，受过教育的女性之所以感到不幸福是因为教育让她们“心浮气躁”。弗里丹对此并不予以认同。相反，她认为受过教育的女性是被一系列她所称做的“女性奥秘”观念所束缚——认为女人和男人存在根本差异，追求事业是男性特质，而女性特征就在于服从于丈夫及其事业，以及在忙于抚养孩子中寻找幸福。不想要这些的女人一定有问题，是不正常且没有女性气

质的。因此，应当压抑这种不正常的冲动欲望。《生活》杂志在介绍弗里丹时，称其为“非家庭妇女贝蒂”。电视访谈节目想邀请她做嘉宾。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过着“正常生活”，而这种“正常生活”却是与其格格不入的。媒体似乎对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十分感兴趣。虽然媒体对她欢迎有加，但弗里丹所在的郊区社区却并不欢迎她，而且开始排斥她和她的丈夫。但全国的妇女都为之着迷。她们阅读并讨论那本书，而且成立了妇女团体并邀请弗里丹前来演讲。

弗里丹逐渐意识到，全国上下不仅已组织成立了妇女团体，而且像华盛顿的凯瑟琳·伊斯特等积极的女性主义分子也正在争取妇女的合法权利。1966年，在纽约激进妇女组织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之前的两年，政治经验丰富的伊斯特和享有全国声誉的弗里丹共同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NOW)。

最初的斗争主题之一集中在空乘服务小姐。根据要求，空姐应该是体端貌美的女性，她们可能会因长胖而被辞退，在达到32岁时也会因超龄而失去工作。这一年龄要求并未受到许多女性的质疑，因为她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女性到32岁时就应该结婚生子。事实上，32岁也被认为是相当迟了。一旦结婚，空姐们就可能被要求离职，于是许多空姐秘密结婚并继续工作直到达到年轻的退休年龄。4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女性结婚要比20世纪其他年代的女性都要早，显然部分原因是没有战乱的干扰。平均的结婚年龄是20岁。许多夫妻在大学期间结婚，因此在毕业后就可以赢得时间。那些未曾上过大学的人在高中毕业后就可以自由结婚了。

与此同时，如果一位女性非常漂亮并希望在结婚前有所作为的话，她可以做几年的空姐，这被视做是一份有吸引力的工作。空姐们按照要求打理发型和化妆，而且必须束腰带。监管人员甚至会以“逐项核对”的方式来确信她们保持顺从态度。

由达斯汀·罗兹和南茜·柯林斯所领导的一群空姐组织成立了工会，她们为迫使航空公司停止在年龄和婚姻方面的歧视而斗争了近十年时间。直到1968年，就在电视观众们发现了大西洋城的女性主义者们的三周前，她们才赢得了新的指导原则和工作合同。

逐渐地，妇女开始在求职市场上占有其一席之地。1968年，当缪里尔·西伯特成为第一位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席位的女性时，她仍然不得不努力说服其客户相信女性所给出的市场建议和男性所给出的建议一样具有价值，尽管到1968年时，美国女性股民的人数已超过男性股民。但当到1968年年底时，其业绩证明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年”。在购得自己的交易席位之前，西伯特总共赚得了50万美元。而在1968年获得交易席位之后，她总共赚取了超过100万美元，主要是航空和航天股票。数家纽约大银行以及25家最大的共有基金都是其客户。

在密西西比州，女性第一次赢得进入陪审团的权利。两位女性第一次获得职业赛马骑师资格，尽管其中一人凯茜·库斯纳随后因摔断腿而退出了该赛季。北越全国解放阵线指派一名女性阮诗萍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出席巴黎和谈，这无疑给西方上了一课，中尉护士简·朗巴蒂成为第一次获得格斗勋章的女性。

然而进步姗姗来迟且步伐缓慢，这也是为什么女性主义组织以“现在”(NOW)命名的原因。到1960年时，在16岁以上的美国女性中，40%的人拥有工作。女性不过是家庭妇女的观念正越来越变成一个神话而非现实。真实情况是，多数劳动阶层女性的工作并不理想，其工资报酬也难尽如人意。1965年，当联邦政府立法禁止就业中的种族、宗教和族裔歧视时，虽经过大力游说，但性别歧视仍被置于考虑之外。

全国妇女组织首先试图改变报纸以性别排列求职招聘广告的做法。现在，分别刊登白人职位和“有色人种”职位的招聘广告是非法的，但将低薪工作单独挑出来给女性并冠以“男性职位”和“女性职位”的做法却仍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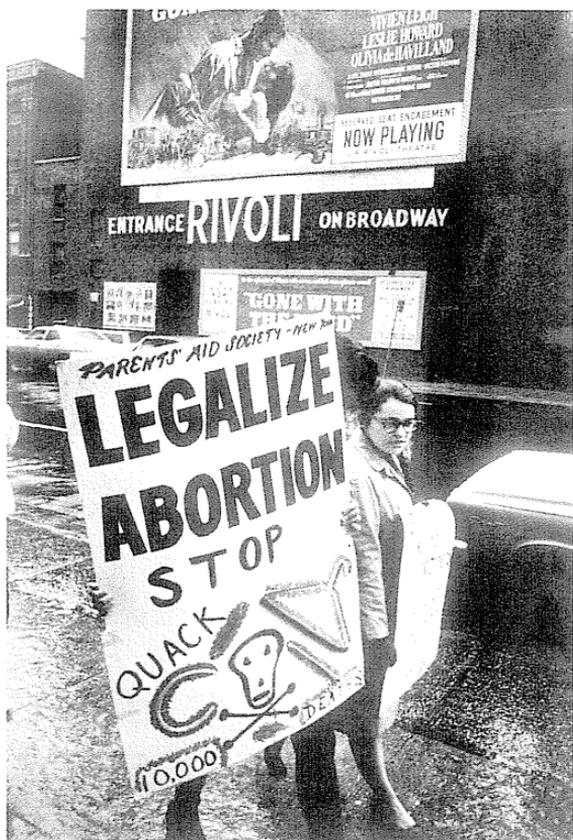
普遍。通过打出写有类似电视广告语言的“每家锅里有只鸡，每家屋里有娼妓”的巨型横幅来冲击“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听证会等手段激烈抗争。1967年，纽约市的主要报纸都停止了分别排列的做法，但美国全国范围内仍有许多报纸继续沿用这一做法，直到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的匹兹堡出版社诉讼案中将其否决。

1968年，全国妇女组织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抗争活动，包括修改纽约州法律、使堕胎合法化这关键一役。与此同时，她们希望国会就保障妇女平等权利问题通过宪法修正案。自1923年以来，此类修正案，即平权修正案，曾被提交给历届国会但却屡被否决。

如同1968年时其他所有的伟大社会运动一样，女性主义运动根植于民权运动之中。经常会在法庭中被提及的旨在维持女性分隔状态的法律被称做是“对妇女歧视的法律”。许多女性主义者将全国妇女组织比做女性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其主要领导人则坚持认为它更为激进——女性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或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贝蒂·弗里丹把甘于容忍男人性别歧视的女性则称做“汤姆大婶”。

“她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弗洛伦丝·亨德森认为。她是一名纽约律师，曾因替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领导人H·瑞普·布朗辩护而名声大噪。“在法庭上，你对黑人和妇女经常会比白人更有一种恩赐怜悯之心：‘法官阁下，我从这个孩子小时候就认识他了，他母亲替我家工作……’。‘法官阁下，她不过是个女人而已，她有三个孩子……’我想白人男性社会通常也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女人和黑人：‘如果我们想给你权力，没问题。但不要表现得似乎你们有权如此。’这太过于大男子主义，太过……白人意识。”

如果不是因为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那些最有才干、最为勇敢以及最富理想主义的女性都参与到民权运动之中，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或许可能会早些爆发。60年代末期，新左派的关注重点在于结束越战。而长期以来



1968年纽约支持堕胎法案游行示威
(艾略特·兰迪 摄 / 玛格南图片社)

参与民权运动的白人女性感到，在面临更为严重的虐待黑人问题的情况下，提出妇女权利问题有些不合时宜。毕竟，女性并未被处以私刑或遭到枪杀。

有些有教会教育背景的白人女性到美国南方，冒着生命危险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一道奋战，她们中就包括玛丽·金和桑德拉·卡森——后来卡森与汤姆·海登结婚并最终离异，其名字也改为凯茜·海登。有些往日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女性成员，如大名鼎鼎的埃拉·贝克，对年轻女性有着巨大影响力。对玛丽·金和其他人来说，贝克是其重要的灵感来源。她开始时在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组织中担任马丁·路德·金的顾问，但1960年时，

她转投至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对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组织，她表示：

我很难选择。我并不是一个容易被打败的对手，因为我经常会据理反驳——不仅仅是会，而且确实如此在做。因此，这对那些从未遇到过这种经历的人来说会感到十分难堪。和一帮被认为是“新潮人士”的人在一起也是件很尴尬的事；如果从来就不曾认识一个会说“不”并且毫不含糊的女性，他们有时候会不知所措。特别是如果你能大声说话，有着我一样的嗓门。如果有必要，有时候你在一里外就可以听见我说话的声音。

事实上，除了他那些风流韵事之外，马丁·路德·金自己的婚姻中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科雷塔忿忿地抱怨称自己被排除在社会运动之外。“我希望我能够参与其中。”她在一次访谈中表示。科雷塔设想自己能在民权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马丁·路德·金却让她的美梦破灭，这是他们婚姻生活中持续不断发生龃龉的根源，而据马丁·路德·金的助手称，这也经常让他一天工作完后不愿回家。曾在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组织中与马丁·路德·金密切共事的多罗茜·科顿说：“马丁……绝对是个大男子主义者。他认为，妻子就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孩子，而他则到外面去打拼。他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仍有许多事要做才会成熟。我总是被要求去做笔记，总是被要求去给金博士冲咖啡。我也照做了。”在她看来，这是时代使然。“他们是性别歧视的鼓吹者，也成长在一个男性主义至上的世界……我热爱金博士，但我知道他身上同样有那种印记。”只有在金死后，科雷塔·斯科特·金才得以成为民权运动中的重要声音。

60年代所有的社会运动——直到全国妇女组织和其他女性主义团体趋于活跃——都是由男人来领导。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女性曾谈及汤姆·海登和其他男性领导人是如何凶神恶煞。一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

宣传册子写道：“这个社会体系就像一个女人。你必须和她做爱，然后让她有所改变。”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海登表示问题部分在于，“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开始兴起时，妇女运动还处在休眠状态。”但他将这一问题主要归因于自己以及其他领导人的“无知”。言论自由运动（FSM）领导人、马里奥·萨维奥的首任妻子苏珊·古德伯格说道：

我是言论自由运动执行委员会以及指导委员会成员。当我提出一个建议时，没人对此予以反应。30分钟后，马里奥或是杰克·温伯格会提出相同的建议，而每个人都表示那是很有意思的想法。我想或许是我的意思表达得不够清楚。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年。但在言论自由运动25周年纪念日，我碰到了雅姬·戈德堡，她告诉我，“不，你表现得很好。太棒了。我曾经把它用在我的街头剧中。被忽视的苏珊。”

言论自由运动的另一位领导人贝蒂娜·阿普特克说：“妇女做了大多数的行政和筹款工作并提供食物。从来就没人特意提到这些是工作，我从未对这种工作分工提出过质疑，甚至根本就沒把它看做是一个问题！”

或许在所有团体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工作分工是最为公平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工作十分耗费体力，而且也总是充满危险。尽管有时候也有质疑指获得媒体曝光机会的领导人都是男性，但工作和危险的分配是公平的。到1968年时，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问题不再是付诸暴力并吸引媒体注意，而是如何脱离暴力而继续存在下去。一旦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员意识到，正如珍妮特·兰金旅后来一样，如果有女性在场的话，他们就会较少受到暴力攻击，那么他们就会要求更多的女性在场。尽管他们始终面临着恐惧、挨打、被捕、恐吓、中枪以及被狂吠的警犬攻击，女性不得不承认，她们相对于男性来说面对的 danger 要少，而白人女性比黑人女性要更少。黑人男性总是处在最为危险的境地之中。在1964年10月的密西西比

州，民权运动活动分子 15 人身亡，4 人受伤，37 座教堂被炸或遭焚毁，还有 100 多人遭到逮捕。

至少在这一方面，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比反战运动较少性别歧视观念。在组织 1967 年和 1968 年的和平游行活动时，戴维·德林杰发现曾为儿科医生的反战活动分子本杰明·斯波克以及最早的妇女反战团体“妇女反战求和平”，都力劝妇女和儿童不要参与示威游行以避免暴力威胁，这令其深感震惊。

除了弗朗茨·法农和加缪的著作之外，一本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流传的书，一本因阅读过多而变得页码卷角、破损以及失去封面的书，就是西蒙·波伏娃谴责婚姻制度以及检讨女性社会角色的著作《第二性》。女性主义的观念慢慢地渗透到运动之中。正如贝蒂娜·阿普特克所指出的，在未受到波伏娃和弗里丹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影响之前，女性没有语言来阐述她们对不公正的那种模糊感觉。

1964 年，玛丽·金和凯茜·海登共同给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工作人员提交了一份女性在运动中作用的报告。首先以这种方式提出建议，然后开会并逐一仔细讨论，这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风格。该报告包括了一份清单，上面列有女性成员被排除在外的会议以及在项目中一些优秀女性被忽略在领导层之外。

毫无疑问，这份清单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莫名其妙，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无关紧要，多数人则可能会觉得可笑。只要运动中有妇女存在，这份清单就会继续存在。然而多数妇女并没有谈论这些事情，因为整个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

因为担心被奚落嘲讽，这份报告并未署名。鲍勃·摩西以及其他一些人对此表示了钦佩赞赏之情。朱利安·邦德则挖苦冷笑地表示，“根本就不值

得他过目”。但基本上这份报告遭到了冷嘲热讽。玛丽·金表示，有些人猜测到该报告是她所写，于是对其进行了“嘲弄和辱骂”。在其后的一个月夜，金、海登以及其他一些人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围坐在一起。时刻不忘其演艺才能的卡迈克尔在表演一段独白，对所有的人和事都予以冷嘲热讽，惹得听众们哈哈大笑。然后，他提到了那天的会议以及那份报告。他注视着玛丽·金问道：“妇女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占据什么地位？”他停顿了片刻，似乎在等着回答，然后接着说道：“妇女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是面向下躺着。”玛丽·金和其他人大笑表示肯定。

自那以后的数十年里，卡迈克尔的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以此证明激进民权运动的性别歧视立场。但当时亲耳听到这句话的女性却坚持认为那是故意说的，听的人也不过把它当做一个笑话。

1965年，玛丽·金和凯茜·海登写了另外一份报告：

从整体上而言，在我们的社会中黑人和妇女所受到的待遇似乎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具体来说，那些我们与之交谈过的女性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女性工作人员似乎被一种习惯法的等级制度所束缚。这种等级制度有时候是悄无声息地起着作用，迫使她们在一种将其排斥在外的权力等级结构周遭徘徊。在个人关系中，妇女也似乎处在同样一种假定的从属地位。最糟糕的是，这种等级制度对妇女进行利用和剥削。

她们的这份署名报告成了女性主义运动中一份具有影响力的文献。她们将该报告分送给了黑人妇女、民权活动分子、朋友以及同事等40人，但没有一个人予以回应。

全国妇女组织的创始人——比如弗里丹、伊斯特、威斯康星州教育工作者凯瑟琳·克拉伦巴赫博士、知名律师艾琳·埃尔南德斯、底特律汽车工人

联合会执行经理卡罗琳·戴维斯——都是些事业有成的女性。该组织在1968年时拥有1200名会员，她们之中有律师、社会学者以及教育工作者。其中也有100位男性，几乎全部都是律师。她们试图帮助那些没有工作的女性、家庭妇女以及职位低、薪水少的职业女性。但和反战运动十分类似，第二次浪潮发端于一些反对传统社会偏见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

在1968年时，一位女性主义者仍被人视做是一个有问题的女人，她有些不对劲，很可能是缺乏魅力。据信，女性主义者——焚烧乳罩者——是因为自身不美而反对美貌的怨妇。打破这种陈腔滥调的是全国妇女组织纽约分会负责人蒂-格蕾丝·阿特金森。在每份报纸的报道中，它们都不厌其烦地把这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29岁未婚女性称做“魅力无穷”、“美丽动人”，或者用《纽约时报》的话说，“温柔性感”。

在1968年时，即便试图对婚姻做些微改革也会被公众视做是思想激进。一名已婚妇女不在名字后冠以夫姓仍然会被认为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行为。像西蒙·德·波伏娃这位极具影响力的法国女性主义者，她和萨特生活在一起但却从未和他结婚。许多6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对婚姻制度有着极度的不信任感。阿特金森说：“婚姻制度和奴隶制度具有一样的效果，它以同样的分类方式把人分隔开来。它将把他们分开，使得他们无法相互认同。广大的奴隶们同样也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说一个照顾家庭和孩子的的女人感到‘幸福’，就如同说黑人在主人們的照顾下感到‘幸福’一样是无稽之谈。维持性工作决定了女人的角色。生产性工作则决定了她丈夫的角色。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在社会中承担生产性工作的角色。”她自己在17岁时就结婚了，这无疑影响了她对婚姻的看法。在离婚后，她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艺术学位，成为费城当代艺术学院首任院长，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她表示，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改变了我的人生”。她致函给德·波伏娃，波伏娃则建议她参与到一个美国团体中。就在那个时候，阿特金森刚开始创办全国妇女组织。

在法国，德·波伏娃的祖国，女性主义运动也被认为是诞生于1968年。然而，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于1949年在法国首次出版。到1968年时，它已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众多女性，而她们的女儿们也正在阅读这本书。1968年时，正是活动分子组织团体向政府施压让堕胎合法化、并放宽只能以处方购买口服避孕药的限制。医生经常会以各种理由拒绝为妇女开具处方，包括武断地认为她们年龄不足。

在德国，女性主义运动也可以追溯到1968年。当年，在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于法兰克福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黑尔克·桑德尔呼吁两性平等并要求未来的计划应将妇女的关切考虑在内。当会议拒绝深入讨论桑德尔的提议时，愤怒的妇女开始朝男人投掷番茄。但事实上，在此次事件之前，数座城市已成立了妇女团体。1968年1月，第一个妇女团体在柏林成立。

德·波伏娃与萨特之间那段漫长和深厚的关系为世人所熟知。波伏娃表示，人们应该因爱而结合，而并非法律许可。阿特金森以及1968年的许多其他美国女性主义者称，女性和男性为了实现地位平等，孩子应该由公社集体抚养。公社因此成为流行的解决方式。公社在美国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有研究过以色列“基布兹”制度的儿童成长专家却对此不以为然。密歇根州立大学儿童精神病医院塞尔玛·弗赖伯格博士在1968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根据其研究结果，那些在集体农庄成长的儿童最终成为她所谓的“一堆堆的冷甜饼”——冷漠且不友好的人。但公社中的妇女们开始抱怨，在那里同样也存在着性别等级体制，妇女们做清洁工作，而男人们则思考大事。

1968年的美国女性主义者分为两个团体：政客派和激进派。政客派是成熟的活动分子，许多人都有着长期参与民权运动以及新左派的经历。全国妇女组织就是政客派团体。激进派则包括纽约激进妇女组织以及芝加哥的一个类似团体。纽约激进妇女组织不仅发动了美国小姐行动，而且还发起了

更为重要的革新之举：意识提升。1968年，当纽约激进妇女组织想出这一概念用来招募女性主义分子时，包括全国妇女组织在内的政客派都认为这一想法会产生使男性敬而远之的相反效果。在意识提升的时候，妇女们相互之间交谈，说出她们为取悦男人而违心所做的事情，比如显得很愚笨，假装表示同意，穿一些让她们感到疼痛的不合身的鞋子、衣服以及内衣。通过意识提升的环节，女性将会意识到，因为害怕男性可能会发现她们不可爱的真实一面，她们扭曲自己的本性到了何种程度。正是通过这种意识提升过程才导致了美国小姐的抗议行动。弗朗茨·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中对殖民地人民的被殖民心态曾如此写道——他们接受了其宗主国给予他们的地位，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正在接受这种角色。纽约激进妇女组织相信，男人对女人所做的同样如此。让她们意识到这一点是将女性主义理论转变为群众运动的关键所在。这种看似只是一种自我治疗的形式需要招募上千名女性献身于女性主义事业。她们无疑是正确的。在以后数年间，多数的女性主义者都把意识提升当做一种说服妇女参与女性主义运动的方法，其例子之一就是畅所欲言，比如让妇女公开讲述非法堕胎的梦魇般经历，这对推动堕胎法案变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8年，当开始采用意识提升方法的时候，人们对十多年来民权运动所关注的种族问题有着高度认识，但却对性别问题鲜有认识。在《冰上灵魂》一书中，埃尔德里奇·克利弗详细描述了他所称做的在“一种暴动行为”——强暴白人妇女——中所获得的快感：“让我感到很痛快的是我在藐视和践踏白人男性的法律，他们的价值体系，而且我在侮辱他们的女人。”作为一种时代观念的反映，这通常被视做是后来已被放弃的种族主义仇恨的自白。然而却很少有人提及其中所包含的白人女性不过是男性附属品的性别歧视内涵。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研究员夏莱恩·亨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该书评论文章，其中强调指出克利弗将“一位在自己国家里的黑人”的怨恨之情描述得淋漓尽致，但却根本未提及他对待女性的态度。

直到1968年时，一种对现今的认识来说似乎是震惊的性别歧视仍然被人们广泛接受，即便是新左派的青年也是如此。在由简·方达出演的1968年电影《太空英雄芭芭丽娜》中，方达饰演的女武士穿着性感的小衣服，并以性来实现征服。电影《人猿星球》中的女性都一言不发且毫无个性，除了那个女人猿之外衣着都十分暴露。或许是因为根本就没人会对一个穿着暴露的人猿感兴趣。1969年，罗伯特·奥尔特曼导演的《陆军野战医院》在大学生中十分流行，因为它似乎是一部反战影片。主演埃利奥特·古尔德和唐纳德·萨瑟兰在剧中扮演的是喝马提尼酒的部队军医，他们对那些不愿和他们上床的女人极尽侮辱之能事。摇滚乐文化就更是充满性别歧视。在埃德·桑德斯那本自称是小说的书《上帝的碎片》中，从来都没有过女人的名字和容貌，她们的出现只是为有着诸如阿比·霍夫曼和杰里·鲁宾等名字的男人提供性服务。

1968年年底，妇女的流行时尚表明时代再次发生了改变。在那年3月，纽约爆发了“打倒紧身连衣裙”运动，以此反对“那些肥大、收紧式灯笼短裙和紧身连衣裙，以及旧式腰围的裙子……裙子和外套中间那宽大丑陋的腰带使妇女看起来像全线溃退的庞然大物”，一份由66人签名的请愿书上如此说，这其中有17名男性。这次运动由28岁的伯克利大学毕业生多纳·福勒·卡明斯基领导。她到百货公司抗议从迷你短裙改变成长裙“长大衣”的新风尚。他们威胁称，将要用写有“长大衣是畸形怪物”的标语在百货公司前抗议示威。在那年初春，《时代》周刊的时尚专栏作家们预测那年夏天将是“史上最裸露的”——穿上透视衬衣，下面赤裸，露出小腹，领口突出，后背开衩，如《时代》周刊所说的，“直到尾骨部分”。鲁迪·吉恩莱希在1964年时设计出上空泳装，苏联称之为“下流野蛮”，而法国南部也禁止穿着。吉恩莱希预测，“露胸装”将在五年内得到人们的完全认可。芝加哥设计师沃尔特·霍姆斯设计出超短袖女裙以及超短教士服，它们都带有可拆卸

兜帽，因此可露出突出的领口。这些并不是为修女所设计的。

但到 1968 年底时，让大多数男人颇感惊愕的是，这种衣裤配套的便服成为了“时尚”装扮。妇女想让男人们严肃地看待自己并和他们竞争，而迷你裙显然让她们更难做到如此。很少有人注意到，社会中有些新鲜且激动人心的东西将要给女性，即便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时尚。似乎不公和嘲讽都结束了，60 年代已接近尾声。威廉·津瑟在《生活》杂志撰文称，“城市的衣裤配套便服是尼克松的新潮款式。第一次派送时无人问津。第二次派送时不讨人喜欢。不要紧，它会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卷土重来。下一次会招来人们的认同。和尼克松十分相像，衣裤配套便服知道机不可失，否则就永远没有机会了。而我十分担心就是现在。”

在阿兹特克人的地方

每个民族的全部历史都是象征性的。这就是说：历史和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都与另外一部秘而不宣的历史相关，是一种隐藏的事实的外在体现。

——奥克塔维奥·帕斯，Posdata，1970年

墨西哥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是个极其丑陋的人。对于他们的总统，墨西哥人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派认为他像一只蝙蝠，另一派则认为他更像一只猴子。他的矮小身材，扁平鼻子，长牙齿，所戴的厚厚眼镜把他的虹膜凸显得十分异常，这都增加了人们争论的话题。“类猴派”给迪亚斯·奥尔达斯起了个绰号“猿猴”，即墨西哥语中猴子的意思，尽管他挥动那长长的手臂时看起来确实像蝙蝠的翅膀。但他却有着不错的幽默感。据称，在一次回应有关指他是两面派的指责时，他表示：“荒谬可笑，如果我有另外一副面孔，你们难道认为我不想用它吗？”虽然并不特别善于言辞，但他有着一副浑厚有力的嗓音。他的嗓音是他生理特征中唯一的优点。对一位墨西哥总统来说，一副好嗓子是十分重要的优势。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写道：“由于习惯了发表独白演说，并陶醉于如同云朵一样包围着他们的冠冕堂皇的言辞之中，我们的总统和领导人们几乎无法相信还有和他

EXIGIMOS!

DESLINDE DE RESPONSABILIDADES



“让我们搞清楚谁该为此负责”。1968年墨西哥学生的丝印海报，画中将墨西哥总统迪亚斯·奥尔达斯描绘成了一只猴子。

们不一样的想法和意见存在。”

1968年时，这位墨西哥总统忧心忡忡。他提心吊胆的，有些是他自己所想象的，有些则是真实存在的。他有理由为当年的奥运会担忧。那年截至奥运会召开之前，几乎所有的文化和体育赛事都受到了干扰。在法国格勒诺布尔举行的冬奥会得以顺利举行，尽管人们将太多注意力集中在苏联—捷克的那场比赛。但冬奥会是在4月之前举办的，那个时候法国人还感到十分无聊。为纪念马丁·路德·金之死，4月的奥斯卡金像奖推迟了两天举行，而

这也使其蒙上了政治的阴影。因为其为越战美军的低俗表演而不受左派欢迎的鲍勃·霍普对颁奖推迟所开的玩笑让观众们深感震惊。两部关于种族关系的电影——《炎热的夜晚》和《猜猜谁来吃晚餐》——获得了奖项。尽管它们故事情节简单，说教色彩也显得十分无聊。作为当时时代背景的反映，捷克导演伊日·门策尔的《严密监控的列车》赢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而 he 也有行动自由来领取奖项。这是一次完全被政治化的活动。

干扰活动比政治化更为糟糕。抗议者使当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和戛纳电影节被迫中止，他们攻击了法兰克福书展，还干扰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甚至连肯塔基赛马获胜者也因吸毒而剥夺获奖资格。当然还有芝加哥民主党大会。这种事情是不会在墨西哥发生的。

作为墨西哥总统和指定的革命制度党(PRI)领导人，迪亚斯·奥尔达斯是墨西哥革命的继承者，同时也是精心命名的执政党名字本身所反映出的矛盾事物的捍卫者。1910年，墨西哥处在政治混乱和社会不公的泥淖之中。数世纪的无能殖民统治之后，接着是贪污腐化的独裁统治以及外国占领。最后是一个人长达30年的统治。这一模式并不罕见。在数年的混乱之后，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带来了稳定局面。但1910年时，已80岁高龄的迪亚斯没有安排继任者或是任何可以延续其统治的机制。墨西哥没有政党，他也不代表任何意识形态。墨西哥分散着许多有着截然不同诉求的各种文化、种族群体以及社会阶层。当1910年爆发墨西哥革命时，墨西哥陷入了一系列无休止且极具破坏性的内战之中，他们中许多人各自占据地盘而展开混战。领导人众多，军队也不少。然而，这是埃尔南·科尔特斯于16世纪初期发现的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组织不同团体的联合领导来实现统治，科尔特斯则通过分化联盟来争取部分领导人效忠的手段击败了阿兹特克人。墨西哥的政治游戏即是如此。

来自墨西哥北部的中产阶级弗朗西斯科·马德罗领导了其中一个派系。他以其平和的政治主张吸引了墨西哥的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

在墨西哥北部还有残暴的马上游击队——那些从事革命事业的叛匪，有些还是雇佣军，而潘乔·比利亚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比利亚是唯一获得美国媒体好感的革命领袖，即便是马德罗也因建议向美国石油公司控制和出口到美国的墨西哥石油征收些许税收而遭到强烈抨击。但潘乔·比利亚几无“反美主义”情绪，而美国却怀疑其他人都有。他本人确曾强暴过数百名妇女并滥杀无辜，他也是个种族主义分子，曾杀害过在采矿场中劳作的中国人。他手下的中尉军官们更为残酷暴戾，发明出许多骇人听闻的刑罚手段。但比利亚将军并不反美。美国人向他提供军火武器。跟随比利亚的人有一万之众，多半在北部的奇瓦瓦州活动。他们抢夺劫掠，恣意妄为，甚至有一次还在萨卡特卡斯为革命赢得了一场壮观的军事胜利。

在中部地区的莫雷洛斯州活动的是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他和其他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尽管他们都是混血儿——欧洲人和土著人的混合。有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的萨帕塔在墨西哥的中部高地领导着一场农民起义运动，其追随者是墨西哥农民，要么是混血儿，要么是土生的非西班牙语裔族群。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在墨西哥为其土地而战。他的目标是夺回富有地主手中的耕地，并将其平均分配给农民。他和追随者决意继续战斗而不顾其他人的所作所为，直到农民得到他们的土地。

在1911年马德罗当选总统后，他们的抗争仍然在持续，马德罗却无力加以阻止。萨帕塔对马德罗颇有好感，但他来自于邪恶的阶级。马德罗是一个在墨西哥北部拥有一座大农场的地主，而他周围的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等人在金融资本界拥有利益，他们对萨帕塔试图将大革命变成另一场革命的努力深感不安。马德罗不可能给萨帕塔自己的土地，他也无法贿赂那些叛匪，那些北部的“将军们”，让他们相信达成和平对他们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同许多革命领袖一样，马德罗被大革命的支持者所暗杀。

1914年年末，卡兰萨和潘乔·比利亚以及萨帕塔所领导的革命联合武装已牢牢控制了墨西哥，并击败了波菲里奥·迪亚斯所遗留下来的联邦军队。

当新的革命政府成立时，萨帕塔和比利亚将其部队迁入首都。卡兰萨宣布自己为总统，他虽十分不情愿但迫于巨大压力而采取了萨帕塔的土地改革方案，尽管他并未采取多少措施将其付诸行动。

同那一时期的大多数领袖人物一样，阿尔瓦多·奥夫雷贡拥有将军的头衔。他是来自墨西哥北部索诺拉州的一名教师，刚开始时带领了一支游击部队，但后来学会了机关枪和战壕等现代战争方式。他有来自于欧洲“一战”时期的军事顾问。奥夫雷贡的性情和政治品格十分中庸平和，对现代墨西哥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对工人和农民给予同情，但并不想采取任何过于革命的行动。他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支持，并将他们编入其军队中，称之为“红色军团”。1915年4月，奥夫雷贡以铁丝网和机关枪掩体筑成的战壕将比利亚的骑兵部队团团围住，二人面临着一场决战。比利亚能娴熟使用野战炮兵，作战也十分勇猛，但他却不懂得现代战术。他的部队被机关枪消灭并被铁丝网围困。奥夫雷贡自己被炸掉了一条胳膊，而放在泡菜坛中的一只手也成了奥夫雷贡的“红色军团”的象征，后来它又成了墨西哥革命军这支被认为是体现了革命理想的“人民军队”的标志。

萨帕塔坚持其土地改革的主张。有些固执的当地酋长们通常可以行贿收买，但萨帕塔不愿意用钱收买或是妥协让步。一名政府军队的双面间谍渗透到其组织之中，他得以发动了几次秘密行动并消灭了大批政府军士兵，以此向萨帕塔表明心迹。一旦萨帕塔对其信任有加之后，这名间谍便将骑着栗色战马、身穿黑色骑装、意气风发的萨帕塔引导至600步兵包围之中而将其射杀。在萨帕塔于1919年去世后，这位被谋杀的革命者成了他那个时代的切·格瓦拉，成了谋杀他而不是推行其革命事业的新的革命政府的年轻代言人。

在墨西哥上演着许多谋杀事件——从1910年到1920年，墨西哥全国总人口减少了几十万人。1920年11月，独臂的奥夫雷贡成为墨西哥总统。他

将所有已经没收充公的土地合法化，而这是卡兰萨所不愿意做的。通过此举并将谋杀萨帕塔的凶手予以枪决，奥夫雷贡最终和萨帕塔在莫雷洛斯州的部队达成和平协议，虽然大多数没收的土地被分配给了将军们，而只有少部分分给了穷人。在被收买后，比利亚答应做一个悠游自在的农场主以度余生。但在1923年，那些曾被其杀害以及遭其强暴者的家人和朋友在比利亚驾驶新车出游时将其射杀。

墨西哥从1917年宪法开始所建立起的政府体系，其主要目标并非实现民主而是维护稳定。1928年，墨西哥几乎又跌落回革命的境地。奥夫雷贡在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参选总统并最后当选。如果不是因为一名画家在为他绘制总统肖像时掏出手枪将他射杀，奥夫雷贡或许已走上独裁之路。

总统人选的更迭似乎总是会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墨西哥的解决之道是于1929年成立全国革命党（PNR）。通过这种机制，可以选出合格的总统人选并将其推荐给公众。总统在六年任期内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不可以做的只有三件事情：向外国割让领土，将土著人的土地没收充公以及自己继任总统。在“二战”期间，为了试图看起来更为稳定和民主，全国革命党将名字改为独有的墨西哥式的自相矛盾，“革命制度党”（PRI）。

这就是墨西哥所演变的结果，不是一种民主制，而是一种制度化革命——一种害怕革命的“革命”。革命制度党对农民领袖进行收买或是谋杀，始终在口头上对萨帕塔表示敬意，但却尽量不推行其土地改革措施。它买通了工会并将其纳入该党之内。它收买媒体，每次买通一家报纸直到完全控制所有媒体。革命制度党并不使用暴力，它尽力采取吸收拉拢策略。只有在极少数无法奏效的情况下，它才会付诸谋杀行动。

1964年，革命制度党推选前内政部长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为下一任总统。在所有的可能人选中，迪亚斯·奥尔达斯是最为保守者。作为内政部长，他同美国建立了非同寻常的良好关系。他似乎是能领导墨西哥渡过危机四伏的60年代的合适人选。

迪亚斯·奥尔达斯急于将墨西哥推向展示舞台。这是墨西哥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平均年增长率为5%到6%，1967年更高达7%。1968年1月，《纽约时报》报道称，“在稳定的政治和金融结构下，稳健的经济增长让墨西哥在主要的拉美国家中脱颖而出。”奥克塔维奥·帕斯带着一种怀疑的语气评论这段时期，“国家的经济取得了巨大进步，以至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都援引墨西哥的情况作为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榜样。”

1968年夏季奥运会是墨西哥自1910年来举办的首次大型国际活动。1910年，当波菲里奥·迪亚斯30年的独裁统治摇摇欲坠之时，他曾试图举办一次纪念墨西哥独立运动100周年的国际性庆祝活动。1968年奥运会是墨西哥大革命第一次将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展示在全世界面前，这其中包括新兴的中产阶级、墨西哥城的现代化发展以及墨西哥能举办一场大型国际赛事的效率。通过电视向全球转播，人们将看到墨西哥不再处于落后和内乱之中，而是成为一个新兴、成功的现代化国家。

但迪亚斯·奥尔达斯也知道，全世界正在经历1968年的动荡时期，可能会有麻烦出现。即将爆发的最为明显的矛盾是，美国的种族冲突有可能将奥运会政治化，正如同马丁·路德·金被刺使奥斯卡奖政治化一样。1967年夏，在爆发过骚乱的纽瓦克城召开的一次黑人力量领导人会议上，黑人抵制奥运会的想法首先被提出来。1967年11月，哈里·爱德华兹，这位和蔼可亲、深受欢迎的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州立大学社会学黑人讲师在一次黑人青年大会上再次提出此议。大多数的运动员和黑人领袖都认为黑人抵制活动不会奏效，但在爱德华兹首批追随者中，汤米·史密斯，这位圣何塞州立大学学生以及已在田径比赛中获得两项世界纪录的非凡运动员，即是其中之一。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另外一位短跑冠军李·埃文斯也表示将进行抵制。1968年2月，作为一种双方交易的象征性姿态，国际奥委会决定重新接纳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队加入奥运会，此举再次激起了抵制奥运会的想法。

时年25岁的哈里·爱德华兹身高六尺八寸，蓄着胡须，戴着太阳镜和

黑色贝雷帽。以前是大学运动员的他坚持将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称为“私刑·贝恩斯·约翰逊 (Lynchin' Baines Johnson)”。在他位于圣何塞的“抵制体育运动”办公室内，他不仅关注着如何抵制奥运会，同时也不想抵制大学以及职业性赛事。在1968年时，其主要目标是在墨西哥城。他办公室墙上的一幅招贴画上写道：“与其为了奖牌而奔跑跳跃，我们不如为了人道而站出来。”他的墙上也张贴了一张“本周黑人叛徒榜”表格，罗列出反对抵制的著名运动员，其中有备受尊敬的棒球运动员威利·梅斯、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以及十项全能冠军雷弗·约翰逊。有人曾建议约翰逊总统抵制1960年的奥运会，迪克·格雷戈里也曾呼吁抵制1964年的奥运会。但1968年，在哈里·爱德华兹办公室的大力鼓动下，抵制的想法似乎正在集聚力量。

1968年3月，《生活》杂志发表了一份对一些顶尖黑人大学运动员的调查，结果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普遍相信为了改善黑人的生活环境而放弃获得奥运会奖牌的机会也是值得的。《生活》也发现，黑人运动员们对他们在美国大学里受到的待遇十分不满。他们被许诺给予住房，但当他们遇到住房方面的歧视待遇时却得不到任何援助。在圣何塞州，白人运动员可以到兄弟会的运动员部进行娱乐休闲活动，但他们却不接待黑人会员。在全美前150支大学运动队中，仅有七名黑人教练。在更衣室或是旅行途中，白人教练总是让黑人运动员拥挤在一处；学业导师们总是建议他们选修一些特别容易的课程以便能够考试过关。黑人运动员们也会发现，大学教职工或者学生团体从不和他们讨论体育之外的话题。

在成功举办了冬奥会后，国际奥委会已决定让南非于年初重返奥运。但它可能还不明白1968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至少有40支代表队威胁将抵制奥运会后，墨西哥人似乎在那年春天时感觉到了灾难，于是要求国际奥委会重新考虑其决定。国际奥委会取消了自己的决定，再次禁止南非参赛，此举让包括史密斯和埃文斯在内的许多美国黑人运动员表示将重新考虑参加墨西哥

哥奥运会。美国人竭尽全力试图避免黑人抵制奥运会，因为他们组织了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甚至现代体育史上最好的一支田径队伍。在那年夏末，爱德华兹在一次黑豹党的会议上表示，抵制奥运会活动已被取消，但运动员们将系上黑纱并拒绝出席颁奖仪式。到9月时，墨西哥政府有充分理由相信会举办一次非常成功的奥运会。

墨西哥政府并不认为自己是独裁体制，因为总统尽管拥有绝对权力，但在任期届满时则必须下台，不会再出现像波菲里奥·迪亚斯那样长达30年的独裁统治。政府对人民的诉求做出反应。如果工人们想要工会，革命制度党将允许他们成立工会。想要改变事物、改进状态以及改善生活的墨西哥人都需要加入革命制度党；只有革命制度党成员才可以参与游戏之中。即便是埃米里亚诺·萨帕塔的三个儿子，其中一人遗传了父亲那张让人印象深刻的脸，也都在为革命制度党工作。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仍然会遇到像比亚一样可以被收买的人，同时也会遇到一些像萨帕塔一样不愿被拉拢的顽固分子。他们要么被无限期地关押在监狱中，要么被谋杀。当农民不断地意识到，革命并没有将其有关土地的许诺付诸实践时，他们便投奔完全被革命制度党所控制的农民组织。间或有代表农民的新组织出现。它的领导人太难收买或是谋杀其领导人，就像新的工人组织和新的记者组织。

当经济正在年复一年地经历着似乎是奇迹般的增长时，有关新生财富分配极其不公的质疑也日益增多。1960年，一位经济学院研究员伊菲杰尼亚·马丁内斯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墨西哥大约78%的可支配收入被10%的墨西哥上层阶级所占有。此前从未有人对此做过科学研究，这一结果似乎也很难被人接受。因此，墨西哥银行等其他机构也进行了相同的研究，但却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这类研究只是对一种可观察到的现象的统计学解释：在高速增长、快速发展的墨西哥，还有许多人感到不幸福。从50年代后期开始，爆发了一系

列的抗议运动——农民运动、教师工会抗议活动、社会保障医生罢工以及激烈的1958年铁路工人大罢工，它们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不是被拉拢、逮捕入狱就是被杀害。铁路工人罢工后10年，其领导人德梅特里奥·巴列霍·马丁内斯仍被囚禁在狱中。

在1968年，当奥运会临近时，只有一个群体不在革命制度党的控制之下，那就是学生，这是因为在墨西哥，学生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还是一种新的概念。学生们是墨西哥新的经济成长的产物。在“二战”以后，墨西哥城的增长速度开始加速。到1968年时，墨西哥城是世界上增长最为快速的城市之一，其人口每年大约增加3%。同快速发展国家中的典型金字塔式人口结构一样，墨西哥人口的很大部分，特别是墨西哥城的人口，都是年轻人。随着中产阶级的增长，墨西哥的学生数量空前增加，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蜂拥进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以及墨西哥国立工学院，在首都每年都吸纳几公里的新区域而形成的新的一部分上，建立起宽阔延伸的新校园。

同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学生一样，这些学生敏锐地感受到他们比起起父辈来享有着更舒适的经济条件。但就墨西哥的情况而言，他们同时也意识到，他们所享受的经济增长成果并没有让他们周围的许多人从中受益。

成为1968年学生领袖之一的罗伯特·埃斯库德罗说：“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父母那代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们非常传统。他们从墨西哥革命中受益，萨帕塔以及其他革命者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也把他们当做英雄，但我们也将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视做英雄。我们更倾向于把革命制度党看做是独裁者，但他们却将其视做是革命的解放者。”

萨尔瓦多·马丁内斯·德·拉·罗卡，这位身材矮小、生气勃勃的金发男子，人们通常以“皮诺”来称呼他，也是1968年时的一名学生领袖。他出生于1945年，1968年时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攻读核物理学。皮诺是一名北方佬，来自墨西哥北部州县，那里和美国更为接近，美国文化的影响也更

大。“在50年代，我们很喜欢电影《飞车党》中的马龙·白兰度和《无因的反抗》中的詹姆斯·迪安。”他回忆称，“我们比我们的父母更加对美国文化感兴趣。在50年代时，学生们都穿衬衣打领带。我们则穿牛仔裤和土著风格的衬衫。”

对他来说，国立自治大学也给他展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国立自治大学的电影俱乐部放映的电影，在墨西哥任何其他地方都是看不到的——法国电影。我所看的第一部关于同性恋的电影是《逍遥骑士》。文化反叛现象开始出现。我们喜欢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和穆罕默德·阿里、安杰拉·戴维斯、琼·贝兹、彼德·西格。”他说。像《我们一定会胜利》这类民权运动歌曲广为人知，马丁·路德·金，特别是在其被刺杀后，成为国立自治大学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其地位几与切·格瓦拉和萨帕塔相当。黑豹党在国立自治大学中也享有一定知名度。和弗朗茨·法农和加缪一样，诺曼·梅勒的著作广受学生欢迎。但正如马丁内斯·德·拉·罗卡所言，“最重要的是古巴革命。我们都读过雷吉斯·德布雷的《革命中的革命》一书。”

在著名的1968年事件之前，国立自治大学就发生过许多罢课和游行活动。1965年，学生支持医生为争取更好薪水的罢工。1966年，国立自治大学学生持续罢课三个月，反对独裁的校长伊格纳西奥·沙维斯。1968年3月，在欧洲的大游行之后，墨西哥城同样发动了反越战游行活动。但与美国、欧洲或是日本的游行活动相比，墨西哥的学生运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仅有几百人参与。

1968年时，小规模的学生运动第一次成为墨西哥政府的麻烦，因为它不想在奥运会期间有任何麻烦，也因为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看待世界的特殊方式。自发性运动在无人组织的情况下通过电视电波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还是很新鲜的事，对这位墨西哥总统来说也难以置信。他确信，革命分子在各个国家之间流窜是一个国际性的阴谋，他们试图传播动乱和不安。古巴人是这一阴谋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当墨西哥政府无视美国禁

运的禁令并公开与古巴保持友好关系时，事实上，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对古巴人却有着一种妄想狂式的害怕。他小心地监视着飞往古巴的航班，保留并研究旅客名单。当公开拒绝对古巴实施禁运时，他却不允许墨西哥和古巴进行贸易往来，同时和美国情报部门商讨“古巴的威胁”。当迪亚斯·奥尔达斯任内政部长时，他就和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培养了密切的关系。对美政策的这种公开立场和私下沟通之间的矛盾是墨西哥政策的本质所在，正如 1916 年时，卡兰萨假装反对美国干涉，但实际上却鼓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派遣军队到墨西哥来镇压麻烦棘手的潘乔·比利亚。

勒卡巴里，这座墨西哥城市中心的黑色城堡，看起来就像是巴士底狱。事实上，它也是一座法式风格的监狱，有着圆形的中央院子并向外延伸出一圈圈的单人牢房。单人牢房约有 14 英尺长，6 英尺宽。1968 年时，这里是臭名昭著的关押政治犯的地牢。今天，保存着国家机密的国家档案文件被存放在勒卡巴里。这里的监狱栏杆已被换成了大窗户并安装上了澄亮的镶木地板。这些 14 英尺长、6 英尺宽的狭窄单人牢房里装满了明显已清理过的文件，但这些文件确实也勾勒出困扰着迪亚斯·奥尔达斯政府的那种全国性妄想症。

内政部有着许多的告密者。每个学生组织中，哪怕只有 20 名成员，至少有一名向政府报告的人。他们事无巨细地撰写汇报记录，即便什么事也没发生。各种共产主义分子受到特别的留意，而任何与墨西哥共产党人交谈的外国人更是受到关注。政府保存着详细的报告记录，比如谁唱古巴歌曲，谁提议竖立越南雕塑而谁又支持这一建议，以及谁飞往哈瓦那，特别是在 7 月 26 日左右古巴每年庆祝卡斯特罗首次起义的时候。那些参与向若泽·马蒂致敬活动的人的名字也被记录在案，即使支持和反对卡斯特罗的人都对这位古巴独立之父的著作钦佩有加。

迪亚斯·奥尔达斯也被法国所深深困扰，这或许是因为墨西哥学生对于完全名不副实的法国五月运动的着迷。尽管美国和德国的许多其他运动时间

更早，持续更长，组织得更好而且影响也更大，但对许多墨西哥学生来说，巴黎的五月才是1968年的重大时刻。

这部分是因为墨西哥长久存在的一种19世纪时的观念——即法国是帝国主义全球霸权。法国曾短暂地统治过墨西哥。在1968年时，一张法国毕业文凭仍然是墨西哥声誉最高的文凭。萨特被认为是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来自墨西哥学院的墨西哥杰出历史学家洛伦索·梅耶尔本身即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他对这种持续的亲法情节表示，“我认为这是由惯性所引起的……一种与过去事物的藕断丝连。”

然而，不管是学生们对法国学生运动的钦佩，还是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对其的忧虑，它们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神话上，即巴黎的学生能和工人联合起来并一同使法国陷入瘫痪。5月31日，墨西哥城的托洛茨基派革命工人党呼吁学生和工人召开会议以“做法国所做的事情”以及“将法国的经验应用于墨西哥”。6月4日，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政治与社会科学院，一份出自托洛茨基派革命工人党第四国际墨西哥分部的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称：“所有工人阶级政权都应支持旨在建立新的工人阶级政权的法国革命运动。历来出卖和背叛法国革命运动的法国共产党（PCF）法国劳工总会（CGT）已在谋求法国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并要求工人和学生以及农民与世界资本主义对抗。此次法国革命运动是对法共遗产以及世界官僚政治的沉重打击。”7月24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院与两名来自南泰尔的法国学生德尼·德克热内和迪迪埃·库斯扎举行了一次会谈。

在这些小的左派学生组织中的政府告密者将所有这些上报给了内政部。激进的学生与工人相互联合，正如人们认为法国学生所做的那样——对多数的现有政权来说都是危险的想法——而这一主张对革命制度党的领导地位来说更是极大的威胁。理应由革命制度党来把社会中的各种因素整合在一起然后对其严加控制，这才是制度运作的方式。

7月18日，墨西哥政府注意到，一个共产主义学生组织召开会议，讨

论发动学生绝食运动，以支持仍在狱中的 1958 年铁路工人罢工领导人德梅特里奥·巴列霍·马丁内斯。巴列霍·马丁内斯是最为知名的政治犯。实际上，学生们的绝食行动并未发生，但巴列霍·马丁内斯自己进行了绝食抗争，除了喝加糖的莱姆水外拒绝进食任何东西，直到他于 8 月 6 日因体力不支被送进医院并通过导管进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次将墨西哥学生和法国组织团结在一起的认真努力却因为缺乏兴趣而破局。在 5 月底，著名的共产主义作家以及墨西哥国家文学奖得主何塞·雷韦尔塔斯和一群学生谈话，呼吁在被称做切·格瓦拉礼堂的哲学学院礼堂举行声援法国的集会。但这一计划被拖延到 6 月份，而 7 月份时墨西哥学生们感觉他们自己有太多的问题。“毕竟，”罗伯特·埃斯库德罗说，“他们的生命只有一次，而那却是个意外。”

对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来说，这些都是法国和古巴激进分子试图在全世界扩散混乱局面的全球性阴谋的蛛丝马迹。他们一直以来都屡试不爽，现在随着奥运会临近，阴谋逼近了墨西哥！内政部的文件不断显示，学生们的宣传小册子上总是以“全世界学生运动万岁！”结尾。

这些小型的学生组织加上那些世界性事件在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的脑海中激起了一种独特的墨西哥式的仇外情绪，而这可以追溯到阿兹特克人的经历——一种对外国阴谋破坏和控制的恐惧。内政部小心谨慎地监视着那些到墨西哥来度暑假的美国学生，那个时候墨西哥的学校仍未放假。他们也关注着那些在伯克利和其他加州大学读书而回家过暑假的墨西哥学生。事实上，这些从加州回来的墨西哥学生在墨西哥的学生运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1968 年 7 月时，罗伯托·罗德里格斯·巴尼奥斯是墨西哥首家新闻通讯社 AMEX 国内新闻部主任，这家通讯社系以替代官方控制新闻机构而起家。他说：“1968 年时的墨西哥学生们如痴如醉地阅读着有关巴黎、捷克斯洛伐克、伯克利、哥伦比亚以及其他美国大学的消息。自从 1965 年洛杉矶发生‘瓦特斯暴动’事件以来，许多墨西哥学生都相信美国正处在内战状态。

他们通过电视看到，一个美国大城市的大型社区烈焰滚滚。目睹了在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墨西哥政府相信整个世界都在摇摇欲坠。在学生运动中，同样也可以发现有来自外部的势力正试图颠覆墨西哥。”

墨西哥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之一。革命制度党不再对革命情有独钟。政府准备尽一切所能来阻止革命蔓延到墨西哥境内。墨西哥政府对古巴人和苏联人以及其南部邻国危地马拉和伯利兹的局势感到忧心忡忡，而对伯利兹的忧虑也意味着对在该国仍设有军事基地的英国的担忧。波菲里奥·迪亚斯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如此远，却离美国如此近。”但现在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对迪亚斯·奥尔达斯来说，应该是，“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如此远，却离每个国家都如此近。”

让革命制度党心烦不已的是，它不知道该如何控制那些不谋求稻粱、土地、工作或是金钱的学生。革命制度党可以成立学生组织，正如它成立工会、记者组织以及土地改革组织一样，但学生们却无意加入革命制度党的学生组织。学生领袖之所以是领袖，就在于他们时刻都能获得学生们的支持。如果一名学生领袖被革命制度党所拉拢，他也就不再是领袖了。洛伦索·梅耶尔说：“在这个社会，学生们能够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到夏天时，墨西哥政府日益增加的焦虑变得清晰可见。与家人度假后重返芝加哥的艾伦·金斯堡被拦截在边境并被告知必须剃掉胡须才能入境。就在几个月前，迪亚斯·奥尔达斯以一种好似在动荡不安年代的和平温和派口吻对墨西哥媒体表示：“如果他们想的话，每个人都可以让其胡须、头发或是鬓角自由生长，不管身穿华服或是蔽衣，只要他们觉得合适……”

如果将 1968 年的所有学生运动放在一起比较一下，看一看哪一次的初始阶段破坏性最小的话，这种比较可能会很困难。但墨西哥的学生运动将极有可能获得第一名。直到 7 月 22 日，它还是一个规模较小且涣散的运动。

奥运会的筹备进展顺利。来自 16 个国家的 18 名雕塑家，包括亚历山大·卡尔德和亨利·摩尔在内，已抵达墨西哥安置其作品。卡尔德那尊重达 70 吨的钢质雕塑将被安放在新建成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前面。其他雕塑则拟安放在通往奥运村的友谊路沿线。负责文化项目的官员奥斯卡·乌鲁蒂亚在向媒体宣布所有相关计划时引用一首古代墨西哥诗歌结尾称：“然而我更加热爱我的兄弟同胞们。”这将成为此次奥运会的主题。

在 7 月 22 日所发生的就是两所对立中学学生之间的斗殴事件。没有人能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场斗殴。这两帮学生相互打架已成为常事，名为“蜘蛛”和“堡垒”的两个当地的帮派组织或许牵涉其中。那次斗殴后来波及到墨西哥城内的重要商业中心城堡广场。第二天，学生们遭到上述两个帮派的袭击，但他们并未予以还击。警察和特别防暴武装部队站在一边旁观，过后他们开始驱赶学生并施放催泪瓦斯炮弹。正当学生退回至学校时，军警穿过街区追赶并殴打他们。暴乱持续了三个小时之久，20 名学生被捕，不计其数的学生和老师遭到殴打。袭击事件的原因到现在仍然不得其详。

忽然之间，学生运动有了能令墨西哥民众产生共鸣的目标——政府的暴行。下一步行动发生在三天以后。一群学生决定发起游行示威，要求释放被逮捕的学生并抗议政府的暴力行为。直到此次活动，所有的学生抗议关押政治犯的活动都是声援此前运动的积极分子，比如支持铁路工人罢工的示威。在此之前，学生中从来没有人被捕入狱过。不同于其他的示威活动，此次示威吸引了不少学生。

命运似乎喜欢和妄想狂们开玩笑。示威游行的那一天正好是 7 月 26 日，市区学生游行队伍遇见了数名菲德尔·卡斯特罗支持者的年度游行队伍。两支队伍会合后，当年的 7 月 26 日游行活动成了墨西哥政府所见过的最大规模的行动。在军方的阻挠下，游行队伍被引导进了小巷中。有些示威者对军人投掷石块。学生们并不熟悉那些投掷石头的示威者。他们在垃圾桶内发现了石块，这不免令人生疑，因为墨西哥城的垃圾桶内通常不会藏有石块。随

后爆发了持续数日的巷战。公共汽车被征用，乘客们被赶下车后，车子被开着撞墙然后放火焚烧。

学生们称，这些暴力行为是那些混在游行队伍中的军方间谍所为，其目的是为军方的残暴镇压行动找借口，这一指控在1999年解密的档案中大部分都得到了证实。墨西哥政府指责共产党青年团的暴力行为。到7月底时，最少有一名学生身亡，数百人受伤，被捕入狱者则人数不详。每次对抗过后都导致更多的人加入下一场行动：受伤和入狱的人越多，示威抗议政府暴行的学生就越多。

8月初，学生们成立了由墨西哥城各所学校学生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名为“全国罢课委员会”（CNH）。与墨西哥本身不同，全国罢课委员会十分类似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以及其他许多60年代的抗议活动组织，拥有着高度的民主。学生投票选举代表，全国罢课委员会的一切决议都通过这300名代表投票决定。罗伯特·埃斯库德罗是年龄最长的代表，由他曾就读过的哲学系研究生院选举产生，他在那里攻读马克思主义。罗伯特表示，“全国罢课委员会可以就意识形态问题展开10到12小时的辩论。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政府提出进行对话。全国罢课委员会称对话必须公开举行——因为他们掌握着所有非公开的信息。这是问题所在，政府想所有的事情都秘密进行。于是政府致电讨论这一对话的话题。全国罢课委员会则进行了长达10小时的辩论，就这通电话是否违背了他们只举行公开对话的原则而展开讨论。”

如同四个月前的波兰学生，墨西哥的学生示威者举起抗议媒体完全顺从政府指示的标语，然而他们却别无选择，无法将正在发生的事实以及他们为何抗议的真实信息传递给普通大众。因此，为了应对革命制度党已控制了所有新闻媒体这一事实，学生发明了行动队形式。每支行动队由6至15人组成，同时每支队伍都以一个60年代的事件或人物命名，其中一支被称做



“寻求墨西哥问题的解决之道”。1968年墨西哥全国罢工委员会的丝印海报。画面中后排手持书本者系取自中国“文革”海报。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分队”。行动队上演了街头剧，他们到市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展开对话，有时候甚至是辩论，每人扮演一个角色并将正在讨论的时事事件表演出来。那些无意中听到这些大声对话内容的人们得知他们从报纸上无法了解的信息。此举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在媒体已堕落腐化的社会中，人们已学会从街头巷尾获取消息。

在9月时，迪亚斯·奥尔达斯的噩梦变成了现实。一名曾参与5月巴黎运动的法国学生来到墨西哥对学生们进行指导。但他所教的并不是革命理论，或如何构筑街垒或是怎么制作燃烧瓶，墨西哥学生似乎对所有这些都已略知一二。在法国学生造反运动中，这名建筑专业学生让-克劳德·莱韦克受过艺术学院学生的训练学习制作丝印招贴画。现在，墨西哥城到处都贴满了印在廉价墨西哥纸上的宣传画，上面印有朝着学生挥舞刺刀和警棍的士兵的阴影轮廓，一个嘴巴被封住的人，或是把媒体画成蛇的舌头并用美元盖住其眼睛。甚至出现了奥运会的招贴画，上面是一只凶残可恶的猴子，它看来十分像某位戴着战斗钢盔的总统。

然而墨西哥不同于法国。在墨西哥，当学生们试图在街头张贴招贴画或是涂鸦时，许多人都遭到开枪射击。

到8月时，学生示威运动以及随之而发生的军方暴力事件蔓延到其他各州。据报道，一名学生在塔巴斯科州首府维拉埃尔莫萨市丧生。在墨西哥城，全国罢工委员会召集了五万名示威者抗议军方的暴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8月份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墨西哥在奥运会前夕面临着骚乱危险。这正是迪亚斯·奥尔达斯所不愿意看到的，墨西哥市奥运会开始看起来和芝加哥民主党大会十分相像了。“在军队恢复稳定局面之前，约有一百辆公共汽车被焚烧或损毁，商店被洗劫一空，四名学生被杀，一百人受伤。”官方当局将暴力归咎于“墨西哥国外的共产党煽动者的指挥”。据墨西哥政府称，在被捕者中有五名法国人，他们被认定是5月巴黎学生反抗运动中的“煽动

老手”。没有更多人或是进一步的信息被披露。但该杂志指出，还有“其他的因素”，包括对一党专政的不满情绪。

到8月底时，参与学生示威游行的人数超过十万人，有时达到数十万人。然而学生们怀疑，许多游行者事实上是安插其中来挑动暴力事件的政府特工。迪亚斯·奥尔达斯决意要效法戴高乐——通常是任何一位国家元首都会犯的错误——发动一场支持政府的浩大示威行动。但很显然，他不认为自己能吸引群众参加。于是，他强令政府工作人员乘车进入墨西哥城市中心。其中一个更为令人难忘的场景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脱下高跟鞋并用其愤怒地敲打坦克车外壳，以此发泄他们被迫参与的不满。

除了决心要避免奥运会受到干扰外，对政局不稳的担忧以及对无力控制学生的无奈感都想必让迪亚斯·奥尔达斯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不已。他是个十分拘谨的人，来自在墨西哥城附近火山另一侧的普埃布拉州附近。普埃布拉州是个十分保守的地方。迪亚斯·奥尔达斯所来自的地方，男人们，即便是年轻男子，仍然穿西装打领带。在他看来，在鸡尾酒会上以机智话语和总统开玩笑是能够容忍的，但在公共场所公开嘲弄总统，或是在公开游行时把总统画成猴子或蝙蝠却是难以接受的。这些年轻人对权威没有任何敬畏之感——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每年9月1日，墨西哥总统都要发表国情咨文。1968年9月，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在其国情咨文中表示：“我们是如此宽容，以至于我们因过于宽容而受到批评。但什么事情都是有有一定限度的，最近发生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无法挽回的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不能再继续容忍了。”对听众来说，迪亚斯·奥尔达斯的讲话经常带有威胁的意味。而此次他向全世界保证奥运会将不会受到干扰的讲话则听起来无异于恐吓。每个人都记得那句话：“我们将做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正如同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和苏联人之间一样，墨西哥学生也不知道他们在和什么样的人在打交道。马丁内斯·德·拉·罗卡说：“那是一种威胁，但我们没有在意去听。”

抗议示威活动在继续。9月18日晚上10点30分，军队和装甲车包围了国立自治大学校园。他们以分路夹击之势，在逼近后把大楼里的人统统赶出来，将数百名学生和教师聚拢在一起，命令他们举手站在那里或是躺在原地。当军队继续逐一包围每座大楼时，很多时候师生们都被枪口或刺刀所押送。不清楚有多少师生被捕，有些人在第二天获得释放。据信，有超过一千人被捕入狱。

9月23日，警方闯入了墨西哥理工技术学院，学生们则以木棍进行还击。军队于是随后介入——奥夫雷贡的人民的军队——他们第一次对学生开了枪。据《纽约时报》报道称，有40人受伤。报道也称双方进行了交火，一名警察丧生，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学生曾经拥有武器。一些身份不明的“义务警员”，或许是脱下军装的士兵，开始攻击学校并朝学生开枪射击。

暴力事件正在升级。最终，政府和全国罢课委员会在10月2日举行了会谈。据一位名叫劳尔·阿尔瓦雷斯·加林的全国罢课委员会代表称，此次等待已久的对话是个灾难。“和政府之间没有什么对话。我们根本什么都没说。”在当月的一张街头招贴画上，画着一把刺刀并配上标题“对话？”。“会议结果不欢而散。”罗伯特·埃斯库德罗回忆称。全国罢课委员会则继续举行集会，他们将在会上宣布为声援政治犯举行为期10天的绝食罢课，直到奥运会开幕那天。在集会那天，他们将再次试图与政府进行磋商谈判。举行集会宣布该项计划是在一个叫做特拉特洛科的地方。

学生们不知道，计划早已经决定了。政府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学生们不是潘乔·比利亚——他们是萨帕塔。

如果由古希腊的悲剧作家来写这个故事，它的最后一幕大抵会放在特拉特洛科。似乎命中注定将要在这个地方结束。在墨西哥，事情开始时一般都是关于威吓外国人的，但却总是以墨西哥人结尾，正如奥克塔维奥·帕斯所称的“它不为人知的一面：一张印第安、混血儿的脸，一张愤怒的、溅满鲜

血的脸”。马丁内斯·德·拉·罗卡喜欢谈论美国的影响，谈及黑豹党和民权运动。然而回顾全国罢工委员会的讲话，他吃惊地发现，他们的讲话违背了宪法和萨帕塔的思想，洋溢着民族主义的情绪。因此，他们的故事证明并非与切·格瓦拉、索邦、科恩-本迪特或是伯克利有关；它与阿兹特克帝国皇帝蒙特祖玛、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以及卡兰萨有关，与奥夫雷贡、比利亚和萨帕塔有关。事发地点在被墨西哥政府称做“三文化广场”——然而被人们一般以该地的阿兹特克语名字“特拉特洛科”来称呼此次事件。

如果有一个地方，它能够包含墨西哥的历史：被征服、遭屠杀、野心、失败、胜利和梦想，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特拉特洛科。那时候，蒙特祖玛统治着特诺奇蒂特兰岛上的阿兹特克帝国，该岛位于现在的墨西哥城所在的高山湖上，其附属盟国之一包括附近的特拉特洛科王国，一个帝国中的繁荣商业中心和市场中心，其最后一任统治者是年轻的科特默克特金。他在1515年登基，四年后西班牙将其征服。西班牙人摧毁了特拉特洛科城，然后在废墟之间建起了教堂。这是他们在摧毁伊比利亚的穆斯林地区时形成的惯例。1535年，在此建立起以新近统一的西班牙的国家守护神“圣地亚哥”命名的一间方济各会修道院。

在60年代时，墨西哥政府在这片曾经被征服和摧毁的地方强化了自己的存在。他们在那里建立了高耸的外交部大楼以及一大片广阔的中产阶级住宅项目。这些以混凝土构筑的长长的街区每个都以墨西哥的一个州或是墨西哥历史上的重要日子命名。楼房绵延数英里——以房租津贴提供给那些忠诚的革命制度党成员的家庭居住的高档公寓，堪称革命制度党在市中心的据点。并没有任何的反对意见，但是这些建筑作为革命制度党所展示的一种证明之物耸立在那里。1985年，这一样板性建筑工程被证明并不具有革命制度党所自夸的那样的品质。在一场地震中，大多数的房屋都摇摇欲坠，有些则完全倒塌，这已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一桩丑闻。而那些阿兹特克废墟和那间方济各会修道院却几乎丝毫未损。

在特拉特洛科有一个两边围着黑色石头的石板地广场，以及一片由阿兹特克废墟组成的白色石灰城墙。那座教堂也面对着这座广场的一侧。广场前面以及其他一侧是住宅项目。前方那座名为奇瓦瓦大厦的大楼的三楼有一条露天走廊。人们可以站在那齐腰高的混凝土围墙前面远眺广场。

任何经验丰富的政治活动组织者都不会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警察只需控制几条大楼之间的出入通道，广场就会被封锁。即便军方在国立自治大学的行动都让几名敏捷的学生得以脱身，但没人能从特拉特洛科广场逃之夭夭。

集会预定在下午4:00开始。到3:00时，警察已经禁止车辆进入市中心地区。意志坚决的民众于是采取步行方式——他们中有夫妇，也有带着孩子的一家人。最终抵达广场的仅有5000到1.2万人，要看谁的估计更可信——这是自7月爆发动乱以来规模最小的一次活动。这是一次对外宣示立场的集会，而并不是一场群众示威活动。

米斯沃克雷娅·冈萨雷斯·加利亚多，这位时年22岁、来自理工大学学院的全国罢课委员会的代表不顾其父母的请求而前往集会现场。她的父母担心可能会发生某些可怕的事情，但她却认为自己非去不可。墨西哥的进步人士才刚开始考虑妇女权益的问题，而她则是300名全国罢课委员会代表中的九名女代表之一。“全国罢课委员会不太听取女性的意见。”她回忆称。但她却被推选出来介绍四位演讲者出场，这对女性而言是非同寻常的高调角色。

“当我和四名演讲者抵达特拉特洛科广场时，由我来做介绍。”她回忆说，在再次忆及34年前的那一个月让她不免哽咽流泪。“我们被警告说要小心，附近到处都可以看见军人。但我并不害怕，尽管我们决定缩短集会时间。在广场上的，有工人、学生以及全家老少，他们把广场都挤满了。我们在广场上没有看见任何军人。”

一行人上了通往奇瓦瓦大厦三楼阳台的电梯。他们可以把那里作为指挥台，从那里向广场上的人群发表讲话。“我们在三楼站定位置，然后开始发

表演讲，”她说。“突然之间，在左边的教堂那边，出现了发出绿光的直升机。下面广场上的所有人也突然开始倒下。随后，戴着白手套、全副武装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可能是从电梯上来的。他们命令我们下到一楼，然后开始殴打我们。”她隐隐听见背后传来机关枪“嗒嗒嗒”的开火声。

墨西哥军队拥有两条指挥系统，一个是向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的常规军，另一个则是直接向总统报告的奥林匹亚营。两支部队的士兵似乎都出现在广场上。奥林匹亚营的士兵穿上平民衣服作为伪装，但为了便于相互之间容易辨认，他们每人都戴上一只白手套，似乎其他人不会发现这一线索一样。这些士兵们冲上奇瓦瓦大厦的三楼，和全国罢课委员会的领导人混合在一处。然后，当米斯沃克雷娅·冈萨雷斯·加利亚多开始发言时，他们便朝着下面的人群开枪射击。许多目击者将这些人形容为狙击手，意思是射击精准的神枪手。但事实上，他们胡乱朝人群扫射，既击中了抗议示威者，同时也有正规军中弹。首先中弹者中有一名陆军将军。

阳台下的士兵朝戴着白手套开枪扫射的人愤怒地予以还击，而全国罢课委员会的领导人也站在那里。戴着白手套的人显得十分恐惧，竟至于忘记了他们卧底的身份。“不要开枪！”他们大声喊道，“我们是奥林匹亚营！”

据目击者称，广场上的机关枪并未停火。许多目击者开始议论起奇瓦瓦大厦窗户边的狙击手。在阳台上的全国罢课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劳尔·阿尔瓦雷斯·加林和其他许多人被带到阿兹特克废墟和古方济各会修道院之间的广场另一侧，并被迫脸靠墙站着。这些阶下囚们什么也看不见，但阿尔瓦雷斯·加林清楚地记得，他听见持续不断的机关枪声响了两个半小时之久。

人群开始跑向修道院和奇瓦瓦大厦之间的空地，但却发现通道被士兵们给封锁了。有些人试图取道废墟之间的修道院另一侧，但所有逃脱的道路都被士兵控制住了。人们于是试图冲进原本全天开放给人提供庇护的修道院中，但那扇建于16世纪的大门却被关上了。狙击手们则沿着教堂圆顶的摩尔人风格扇形围墙处开枪射击。这是一个完美的圈套。有少数幸存者则讲述

称有些同情他们的士兵帮助他们逃生。

机关枪的声音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这是目击者叙述中最为一致的说法之一。其他人，比如冈萨雷斯·加利亚多还记得军人们用步枪和刺刀攻击的情景。在市中心的好几处地方，可以看到被层层垒起的死尸。马丁内斯·德·拉·罗卡被逮捕关进了勒卡巴里的单人牢房中，她看见监狱中关满了鲜血直流的犯人，有些人身上还有枪伤。

墨西哥政府称有四名学生丧生，但死亡人数逐渐增加到十几个。官方控制的报纸即便进行了报道，其所说的死亡人数也很少。电视则简单报道称发生了警方冲突事件。《宇宙报》于10月3日的报道称，有29人死亡，八十多人受伤。《墨西哥太阳报》报道称，狙击手朝军队开枪，结果致使一名将军和11名士兵受伤以及二十多名平民死亡。《纽约时报》也报道称“至少二十人死亡”，但伦敦的《卫报》却报道称有325人死亡。这一数字随即被奥克塔维奥·帕斯所引用，他因抗议行为而结束了其外交生涯。还有人称有数千人死亡，同时还有数千人失踪。米斯沃克雷娅·冈萨雷斯·加利亚多的父母曾警告她不要前去参加集会，他们和红十字组织一起经历了10个痛苦不堪的日子，到处在死尸堆里寻找自己的女儿。10天后，他们在监狱里发现了她。许多人都被关进了监狱。阿尔瓦雷斯·加林在勒卡巴里监狱的狭窄单人牢房中度过了两年零七个月。他被选为自己那一监区的领头者。“那是我唯一获胜的一次选举！”他表示。马丁内斯·德·拉·罗卡也在监狱中服刑三年。

在之后很多年里，失踪者都很难确认到底是被杀掉了，还是被关进监狱，或者加入了游击队。他们中许多人的确加入了在农村地区的武装游击组织。那些有儿女失踪的家庭也不愿意大肆声张，因为如果一旦确认失踪的话，政府可能会把他们的孩子和武装组织联系起来。今天，人权团体声称，在70年代有500名被怀疑与游击队组织有关联的墨西哥人遭到政府军队枪杀，但却并未发现在特拉特洛科广场屠杀或随后的屠杀事件中丧生者的大规

模性墓碑。还有因坚持寻找 1968 年时失踪的亲人而全家都受到恐吓威胁的事情。马丁内斯·德·拉·罗卡说：“那些家人们不敢深究他们失踪的孩子，因为他们接到匿名电话称，‘如果你们乱说话的话，你所有其他的孩子都会没命。’我能够理解他们。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人谋杀了我父亲并且告诉我说，如果我不守口如瓶的话，他会杀了我哥哥。所以我什么也没说。”

2000 年，米斯沃克雷娅·冈萨雷斯·加利亚多偶然邂逅了一个学生时代的朋友。那位朋友看到她时感到惊讶不已。这么多年来，这位朋友都以为米斯沃克雷娅已经在特拉特洛科广场遇害了。

在 1993 年大屠杀 25 周年之际，墨西哥政府准许在特拉特洛科广场上竖立一座纪念碑。大屠杀幸存者、历史学家以及新闻记者们搜寻罹难者姓名，但只找到了 20 个。1998 年所进行的再次努力也只好找到了寥寥几个。多数试图解开这一谜底的墨西哥人都估计约有一百到二百人遇害。有些人估计的数字更高。有人曾看见某人在外交部大楼上远远地拍摄现场情景，但其所拍摄的影片迄今未被发现。

10 月 2 日以后，学生运动便土崩瓦解了。奥运会的举办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墨西哥国内的干扰。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所选定的继任者、时任内政部长路易斯·埃切维里亚也和他一起参与了镇压学生运动。直到 1979 年去世时，迪亚斯·奥尔达斯仍坚称他作为总统的最大的功绩之一便是处置学生运动的手法以及避免了奥运会期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干扰。

然而，正如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意味着苏联的终结一样，特拉特洛科广场事件是革命制度党终结的潜在开始。阿尔瓦雷斯·加林在墨西哥记者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于 1971 年所著的一本异常大胆的关于特拉特洛科大屠杀的书中写道：“我们所有的人都在 10 月 2 日得到了重生。在那一天，我们也决定了我们将会如何死去；为了真正的正义和民主而奋斗。”

2000 年 7 月，革命制度党自成立 71 年以来首次在选举中失去政权。这是以民主的方式实现的，经过了数十年的渐进过程，没有诉诸暴力。今天，

墨西哥的媒体享有更多的自由，墨西哥也更接近于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革命制度党已不再掌权，许多墨西哥人仍旧表示他们害怕就波尼亚托夫斯卡的书接受采访，有些人虽然同意了，但在思考再三后又退出了。

为纪念大屠杀 25 周年所竖立的那座高高的矩形石碑上篆刻了 20 名受难者的年龄。许多人年仅 18 岁至 20 岁。在纪念碑的底部还加上了一行字：“还有许多其他姓名和年龄都不为人所知的同志。”

每年的 10 月，1968 年代的墨西哥人都会伤心不已。墨西哥人的记忆力十分持久。他们仍然记得阿兹特克人如何虐待其他部族，同时也在争论玛琳切公主背叛阿兹特克联盟与科尔特斯通敌是否自有其道理。人们对科尔特斯仍然怀有难以磨灭的怨恨之情。人们也不会忘记法国人在 1862 年如何密谋占领墨西哥。墨西哥农民依然记得埃米里亚诺·萨帕塔未曾实现的诺言。十分肯定的是，墨西哥人将会永远记得 1968 年 10 月 2 日在特拉特洛科广场的阿兹特克废墟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四、尼克松下台

如果说整个人类的命运决定于今天在美国所发生的一切，这并非夸张的说法。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他们肯定感觉像是在一架超音速喷气机上的乘客，被迫眼睁睁地看着一群酒鬼、瘾君子、畸形人和疯子为了控制权和驾驶员位置而相互争夺。

——埃尔德里奇·克利弗，
《冰上灵魂》，1968年

秋季学期的理论与实践

你意识到了我所承担的责任了吗？我是在尼克松和白宫之间唯一的人。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1960年

我相信，如果我对美国和美国政治传统的判断和直觉以及胆量是正确的话，这将是我最获胜的一年。

——理查德·尼克松，1968年

“在墨西哥城奥林匹克体育馆的十万观众面前和一派盛大壮观、团结友爱以及和平肃穆的气氛中，墨西哥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昨日正式宣布第19届奥运会开幕。”《纽约时报》头版头条以及世界各国主要报纸都如此进行了报道，迪亚斯·奥尔达斯得到了曾被扼杀掉的新闻报道。和平鸽是奥运会的象征，在由它们所装饰的那条大道上，学生们后来被殴打，宣传板上张贴着“和平之下万事皆有可能”。人们普遍认为，墨西哥举办的运动会不错。开幕式上，各个代表队举着各国旗帜出现在帝王般端坐在上的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以前的那只“猴子”——面前时的空前盛况亦备受好评。当捷克斯洛伐克队走进体育馆时，各国代表都情不自禁地起立鼓



¡LIBERTAD
DE EXPRESION!



“言论自由”。1968年学生
丝印海报。画面下方印有
墨西哥城奥运会标志

掌。奥运会火炬历史上首次由女性点燃，这被视做是自古希腊奥运会以来相当大的进步。在古希腊，妇女如被发现出现在奥运会场则会被处死。墨西哥再也没有丝毫的学生运动迹象。如被提及时，政府则干脆理直气壮地解释称学生运动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策划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但对墨西哥主办方来说，出席运动会的人数规模有些令人失望。墨西哥城甚至还有空置的酒店房间。

正如预期，美国组织了历史上最好的田径队伍参赛。然而，政治随即开始使之逐渐褪色。当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登上领奖台领取200米短

跑金牌和铜牌时，他们没有穿鞋，只穿着黑色长袜。当美国国歌奏响时，他们每人都举起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拳头，象征着黑人力量。这看似一种自发的举动，但以1968年的政治传统来看，这一举动事实上是运动员之间召开一系列会议的结果。他们之所以买黑色手套，是因为他们估计会从81岁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弗里·布伦戴奇手中领取奖牌。布伦戴奇多年以来致力于将南非的种族隔离运动队带进奥运会。因为有信心会赢得奖牌，所以他们就计划用手套来避免接触布伦戴奇的手。但由于安排有所改变，布伦戴奇改为另一场赛事颁奖。细心的观众可能会注意到，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两人各分了同一双手套。史密斯用的是右手，而卡洛斯用的是左手。圣何塞州的哈里·爱德华的队友和同学、400米短跑选手李·埃文斯戴了另外一双手套。埃文斯在领奖台上再次做出黑人力量的手势，但却没人注意到。

第二天，卡洛斯在墨西哥城的一条主要大道上接受了采访。他说：“我们想要世界上所有的黑人——小杂货店老板、修鞋店老板——都知道，当奖牌挂在我或是汤米胸前时，就像挂在他们胸前一样。”

国际奥委会，特别是布伦戴奇震怒不已。美国队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怒不可遏，一派试图保持这支非凡队伍的团结。而国际奥委会则恫言禁止整个美国队参赛。最终，他们迫使美国队禁止史密斯和卡洛斯参赛而了事。史密斯和卡洛斯两人被限令在48小时内离开奥运村。其他黑人选手也做出了政治性手势，但奥委会却似乎不厌其烦地为这些违规行为不那么严重而寻找开脱理由。当美国队包揽了400米短跑奖牌时，李·埃文斯、拉里·詹姆斯以及罗恩·弗雷曼等人戴着黑色贝雷帽出现在领奖仪式现场并举起他们的拳头。但国际奥委会马上指出，在国歌奏响时他们并未如此，因此没有对国旗表示不敬之意。事实上在演奏国歌过程中他们都取下了贝雷帽。同时，也有不少人指出，他们举起拳头时脸上保持着笑容。史密斯和卡洛斯两人则表情严峻。同样地，正如同在奴隶制时期，一个做出不具威胁性姿势且面带笑容的黑人不会受到惩罚的。赤脚登上领奖台的跳远铜牌获得者拉尔夫·波士

顿同样也未因其抗议行为受到谴责。跳远运动员鲍勃·比蒙在第一次试跳时跳出了29.25英尺的成绩，超出世界纪录约两英尺。当登台领取跳远金牌时，他将身上的长运动裤挽起，露出脚上的黑色袜子。人们也未对此提出异议。

在拥挤喧嚷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中，史密斯和卡洛斯两人原本在领奖时的行动几乎没有吸引多少人的注意。只是通过电视转播，在电视摄像机对两人的聚焦下，似乎体育场中的每个人都和他们一样在做相同的事情，这也使之成为1968年奥运会最令人难忘的瞬间之一。史密斯以19.83秒打破200米短跑所有纪录，其运动生涯也因此次事件受到影响。但每当问及此事时，他总是说：“我并不感到后悔。”他在1998年时对美联社表示：“我们在那里挺身而出，是为了人权，是为了美国黑人。”

另一方面，一位来自休斯敦、籍籍无名的19岁黑人拳击手因为做出了和史密斯相反的举动而使其运动生涯受到奥运会的影响。当乔治·福尔曼在1968年奥运会击败苏联冠军爱约纳斯·切普里斯获得重量级拳击金牌时，他从身上抽出一面小的美国国旗。难道他在搏击的时候都把它带在身上吗？他开始头顶不断挥舞国旗。尼克松对其举动大为赞许，并将他与那些总是批评美国的美国反战青年进行对比。休伯特·汉弗莱指出，这位在拳击台上受访时挥舞国旗的年轻人是在向尼克松威胁要予以解散的“职业队计划”表示敬意。但对许多拳击爱好者，特别是那些黑人来说，那却似乎是黑人在向白人表示屈服服从的一刻。当福尔曼进入职业拳击赛时，有人将其称做是“白人的伟大希望”，特别是当他面对备受尊敬的默罕默德·阿里时。阿里在扎伊尔使其遭遇惨败。扎伊尔的所有非洲黑人以及世界上许多人都为阿里的胜利而欢呼，这让福尔曼好几年都无法从这一耻辱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是充满动荡不安和流血冲突的一年，当年的棒球赛季的进展亦十分怪异，就如同诺曼·洛克韦尔的画作一样既是艺术虚构，同时又栩栩如生。像米基·曼特尔和罗杰·马里斯（现已转会至圣路易斯红雀队）等人不断涌

现，这些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物。在60年代之前，在“东京湾决议”之前，那个时候大多数的美国人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叫做越南的地方。4月27日，在距离被包围的哥伦比亚大学不到一英里的地方，米基·曼特尔在与底特律猛虎队对抗中打出其第521个全垒打，从而将特德·威廉姆斯保持在职业全垒打的第四名位置上。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遭枪击的那天晚上，道奇队正在该市比赛。时年31岁的右手投手唐·德赖斯代尔投出了连续第六次完封，这次是对阵匹茨堡海盗队。这打破了多克·怀特保持了64年之久的连续完封纪录。9月19日，即墨西哥军队占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前一天，米基·曼特尔击出了他的第535个本垒打，打破了吉米·福克斯的纪录而成为历史上排名第三的职业本垒打选手，仅次于威利·梅斯和巴贝·鲁思。特拉特洛科大屠杀和红雀队的鲍勃·吉布森一起登上报纸头版。大屠杀揭开序幕时，吉布森在职棒大联盟开幕赛中将底特律老虎队的17名队员三振出局。1963年对阵扬基队时，他以15次三振出局击败桑迪·考费克斯，让他记忆深刻。

棒球赛季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想要吸引人们注意却不太容易。除了底特律之外——底特律猛虎队拥有其历史上最好的一支队伍，几乎所有其他的体育场上座率都很低。有些体育场临近发生黑人暴动的地区。有些球迷认为，投球技术过于完美但却以牺牲安打技术为代价。有些人则认为随着观众的快速增加，足球更具有攻击性，因此也更适合当时的时代氛围。在人们的期待中，1968年的棒球联赛总决赛将是历史上最好的一次投手对决，即底特律队的丹尼·麦克莱恩和圣路易斯红雀队的鲍勃·吉布森之间。比赛采取7场4胜制，其中猛虎队在4场比赛输掉3场后，在米基·罗里克出其不意的精彩投球进攻下赢回后面3局。对棒球迷来说，这是自1968年开始的7场4胜制比赛的分水岭。对其他人，比如麦卡锡将军表示——据说他曾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半职业性——垒手，最好的球员是那些“有足够的智慧理解这项运动而又不因聪敏过头而对其失去兴趣的人”。

唯一和棒球一样与时代脱节的就是加拿大，他们陷入了一种难以理喻的“特鲁多狂热症”之中。这个接纳了约有五十到一百名美军逃兵以及数百名逃避兵役者的国家已经成了一个殊为奇特的逍遥乐土。皮埃尔·艾略特·特鲁多成为加拿大自由党的新任总理。特鲁多是加拿大历史上鲜有被形容为具有“浮华魅力”的总理，年逾46岁却仍未结婚，他是那种民众愿意接近、接触甚或亲吻的政治人物。他那与众不同的衣服、凉鞋、绿色皮草外套以及其他一些出人意料的奇思异想都让他颇为知名。有一次，他甚至抱着一大摞法案文件顺着众议院的楼梯栏杆滑下楼去。特鲁多练习瑜伽，喜欢裸体潜水并且获得了空手道棕带资格。他有一大堆哈佛、伦敦以及巴黎等名牌大学的毕业证，直到1968年时，他更多的是以学者而非政治人物为人所熟知。事实上，他的为数不多的不甚了了且无太多经验的事情之一就是政治。

当美国人面对着必须在汉弗莱和尼克松之间做出选择而感到前景黯淡时，《时代》周刊捕捉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

美国很少会把目光转向北方的加拿大去关注激动人心的政治事件。然而就在上周，美国人或许会嫉妒加拿大人那位新总理皮埃尔·艾略特·特鲁多的浮华风格。他拥有学术知识和政治技巧，并展现出一种时髦人物的华丽做派，风格明快，对国家难题的解决之道极富想象力。这正是许多美国选民所渴求的一种全新的政治经历……

在一个极端主义盛行的年代，特鲁多是一个带有左翼色彩的温和派。然而，想要明白无误地确认其立场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来自魁北克省且具有法裔血统，但他的英语和法语都很流利。人们不清楚他到底站在哪一边，许多人都希望他能解决困扰着加拿大政治辩论的法语和英语之间的纷争。尽管大多数加拿大人都反对越南战争，而特鲁多也表示他认为应该停止轰炸，但他却不准备告诉美国如何去做。一句经典的特鲁多式言论称：“我们加拿大

人必须记得，美国同样是一个主权国家。”他曾因在莫斯科朝一座斯大林的雕像投掷雪球而遭拘捕，但他有时也会被人指控是共产主义分子。当有一次有人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是共产主义者时，他回答道：“事实上我是一个独木舟爱好者。我曾经划着独木舟沿着马更些河、科珀曼河以及萨格奈河顺流直下。我想要证明，独木舟是最适宜航海的交通工具。1960年，我从佛罗里达州出发到古巴去——一路都是湍急险峻的河水。有人认为我试图向古巴偷运军火。但我想问你，一条独木舟能偷运多少军火？”

以类似这样的回答来轻松应对的政治家十分少见，但在1968年，当世界上其他的人们都变得执著不懈时，加拿大人却付诸一笑。由于缺乏政治经验，特鲁多总爱说选民们让他来治理国家不过是在开玩笑而已。而现在，他们“都为我着迷了”。加拿大人马歇尔·麦克卢汉形容特鲁多的脸是一张“肉身的部落面具”。“没有人能看透它。”麦克卢汉称。“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个人的观点。”

然而特鲁多在社会问题上的立场却十分明确。尽管有着喜好女色的声名，但他在妇女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立场，包括使堕胎合法化，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支持保障同性恋权利。在4月大选之前，人们总看见特鲁多开一辆梅赛德斯跑车。一名记者问他，现在作为总理是否会考虑放弃梅赛德斯，特鲁多回答道：“梅赛德斯这辆车还是梅赛德斯这个女孩？”

当特鲁多于2000年以80岁高龄去世时，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曾作为荣誉送枢人为其扶灵。

甲壳虫乐队也因为缺乏鲜明的观点，或者说缺少坚持而让所有人都颇感意外。1968年秋，他们推出了第一张自己公司发行的唱片——一面是一首名为《革命》的单曲，另一面则是一首名为《嘿，裘德》的单曲。《革命》这首歌表达了“我们所有人都想改变世界”的信息，但我们应该平和渐进地推进。披头士的这一立场遭到了许多人的非难，包括苏联的官方媒体。但到

1968年年末时，许多人都对其立场表示认同。1968年秋，当人们普遍感觉到有一股革新的气息时，相反却也让人感到不无厌倦。

并非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这一点。返回校园的学生活动分子们试图重新恢复在春天中断的事业，而校方则希望回到动乱之前的状态。当柏林自由大学在10月中旬开学时，校内的女生宿舍已被男生们占据了几乎整个暑假。校方因此做出妥协，宣布将从此实行男女混住宿舍。

在哥伦比亚大学，激进的学生们希望继续开展运动甚至想把运动国际化。6月，伦敦经济学院和英国广播公司邀请了来自10个国家的新左派参与一场名为“反叛中的学生”的辩论会，学生运动于是抓住了此次机会。戴高乐等反对者认为这是一场国际阴谋，而学生们则认为这可能是个不错的主意。事实上，除了那些春天时到柏林去参与反对越战游行的人外，他们之间几乎从未谋面。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决定派刘易斯·科尔出席辩论会，而拉德则不屑地表示，“就因为他是那个抽高卢香烟的烟鬼。”事实上，科尔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熟稔的知识分子。科尔和拉德经常会被邀请参与戴维·萨斯坎德和威廉·巴克利等主持人的知名脱口秀节目。

在哥伦比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学生感觉需要有一种符合其行动计划的意识形态。马丁·路德·金自有其道德感召力，但因为这些学生并非来自宗教背景，所以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并不合适；共产党人的模式——即参与到一个庞大政党、一场伟大运动中——过于专断；古巴模式则过于穷兵黩武。“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有人认为，我们进行实践，而欧洲人拥有理论，”科尔表示。科恩-本迪特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表示：“美国人没有耐性研究理论，他们只是付诸行动。美国人杰里·鲁宾的那句‘想做就做’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然而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一直以来都善于吸引外界的注意力，他们感觉到应该有一种能够解释他们所作所为内在原因的深刻理论。科尔坦承，想到要和那些经验丰富的欧洲理论家们辩论就会感到有一丝胆怯。

此次伦敦会议差点儿就被英国移民当局所阻止，他们想要将激进主义者拒于国门之外。保守党人不想让科恩-本迪特入境，但内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居中说项表示，让科恩-本迪特感受一下英国的民主制度对其不无坏处。刘易斯·科尔被拦截在机场，英国广播公司不得不联系政府渠道以让其入境。

科恩-本迪特立即向媒体澄清，他们并不是学生领袖，而只不过是“扩音器，你们知道，运动中使用的喇叭”，这的确是对他自己和很多其他人的准确描述。科恩-本迪特搞了一次恶作剧。戴高乐在1940年离开法国时才开始脱颖而出，他在流亡英国时对法国人民发表了一次著名的广播讲话，呼吁他们坚持抵抗德国侵略并拒绝服从菲利普·贝当的卖国政府。科恩-本迪特现在也宣布，他要求英国给予庇护。“我将请求英国广播公司重组自由法国电台，正如他们在‘二战’中所做的那样。”他并表示将模仿戴高乐讲话全文，但只把他所说的纳粹改为法国法西斯以及贝当改为戴高乐。

塔里克·阿里主导了此次辩论。这位出生于巴基斯坦的英国学生领袖曾经是著名的辩论社团牛津辩论社的主席。阿里表示，学生抵制选举以示要求社会变革。

随后，他们全体前往卡尔·马克思墓地并在那里合影留念。

科恩-本迪特回到德国后宣布将放弃学生领袖职位并消失在运动之中。他表示自己已成为“个人崇拜”的牺牲品，并认为“权力会导致腐化”。他对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称，“他们不需要我。五个月之前有谁听说过科恩-本迪特吗？或者甚至两个月之前？”

科尔对此感到困惑不已。他从不曾理解科恩-本迪特的思想观点，并且认为塔里克·阿里的辩论技巧令人感到不舒服。他接触的人中多数来自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后来他和卡尔·D. 沃尔夫一起到访德国。“最后，”他表示：“德国人是具有最多相似之处的民族。德国人有着许多共同的文化影响——马尔库塞和马克思。德国人有着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年轻人与社会格格不入。在德国，一个身着年轻人服装的青年人走在街上，那些年长的德

国人则会对其怒目而视。”

但到那年秋天时，科尔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他从法国人那里带回了一种被称做“示范行动”的理论。法国人所做的正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们想要做的事情——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分析，然后从行动中总结出一套理论。示范行动理论认为，小部分人所采取的行动可以作为大多数人的示范样本，占领南泰尔大学就是这样的一次行动。

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对这类理论往往不屑一顾，并将其称做“幼稚病”。6月，西欧最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指导委员会委员、理论家乔治·阿门多拉攻击指责意大利学生运动为“极端的幼稚病”。他对学生们认为不用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方式建立群众基础就能够领导一场革命的想法也嗤之以鼻，他将此称做“革命的浅薄主义”。刘易斯·科尔表示：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宣布在1968年大选日前举行示威游行的海报
(美国政治海报研究中心)

“示范行动成为我们的首个指导理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会议如此之多的缘故。经常会出现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在拥有了指导理论之后，他们就准备妥当作为一个革命中心，正如 Hayden 所说，预备催生出“两个，三个，许许多多的哥伦比亚大学”。这一理论也让快速壮大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总部办公室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指挥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次行动是抗议入侵布拉格的示威活动。但那仍是 8 月的时候，参与的人并不多。据科尔称，“活动不算很成功。此次活动的口号是‘西贡，布拉格，全世界的猪都是一样的’。”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寻找重新推动学生运动的契机。他们想到了主办一次国际学生大会，但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灾难。在会议召开前两天就爆出了墨西哥学生遭屠杀的消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感到十分羞愧内疚，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曾知道墨西哥有学生运动。于是他们试图在大会期间组织一次抗议示威活动，但未能就此形成任何共识。第二天时，那些法国的情境主义者整天就在模仿每一个发言者的讲话。对有些人来说，这是在长篇累牍的发言之余的开心消遣节目。科尔回忆称，“我们发现我们所有人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所能取得的所有共识就是反对专制主义以及与社会之间的疏离感这类文化问题。”渐渐地，其他学生代表都开始反感法国代表。特别是美国代表，他们觉得法国人在给他们上课，告诉他们越南局势。但他们不知道，越南在美国国内是怎样一个热点话题。”

根据马克·拉德的判断：“欧洲人过于自命不凡，过于耽于理性。他们只是想夸夸其谈。还不仅是空谈而已。人们发表演讲，但我意识到其实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拉德毫不怀疑他正处在一个历史性时刻，一场革命正在逐渐地展开，而他的任务就是助其一臂之力。他的思想中有一丝切·格瓦拉的影子——“一个革命者的首要职责就是发动一场革命”——再加上“把战争带回家”的主张以及示范行动理论。1969 年 6 月，他提出组建“气象人组织”，这是一个

付诸暴力的地下游击组织，其名字来自鲍勃·迪伦的歌词“你并不需要气象员才知道风朝哪里吹”。1970年3月，他们把该组织的名字改成了“地下气象”，因为他们意识到原来的那个名字带有性别歧视色彩。从事后来看，似乎很明显的是，一个由中产阶级男女发起成立、并以鲍勃·迪伦的歌曲命名的游击组织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他们唯一的受害者是自己的三名成员，他们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幢房子里制作炸药时因炸药爆炸身亡。但其他成员依然付诸暴力行动。那个时代充满暴力，革命近在咫尺。曾首次敲响拉德的宿舍大门来招募其加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戴维·吉尔伯特在70年代中期“地下气象”组织解散后仍坚持抗争。二十多年后，他因为涉嫌参与1981年的一次枪杀事件而入狱。在墨西哥、中美洲、法国、西班牙、德国以及意大利等国，许多1968年时期的学生激进分子都成了70年代的地下游击队员。

政治的触角有时候比想象中的还要长。当洛克菲勒让共和党内的自由派势力土崩瓦解的时候，那年春天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引发了一系列自那以来就一直存在于美国社会的事件。一个崭新的共和党在1968年诞生了。当6月底约翰逊总统任命法官阿贝·福塔斯接替厄尔·沃伦出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职时，这一点已经十分明朗了。沃伦在约翰逊政府任期届满之前即提出辞职，因为他认为尼克松将会赢得总统选举，而他不想看见自己的职位被尼克松所任命的人取代。福塔斯是意料之中的人选，他是约翰逊的朋友，约翰逊三年前曾任命他取代阿瑟·戈德堡大法官。福塔斯以自由派法官的领袖人物而为人所称道，他自50年代中期开始就使最高法院带上了他个人的色彩。尽管他是最高法院第五位犹太裔法官，但却是第一位犹太裔首席大法官。

在那个时候，参议院极少会对最高法院的人事任命提出异议。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参议员都认可总统在这方面拥有自己做主的权利。事实上，自从赫

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任命约翰·帕克为首席大法官以来就未曾有过争议，1930年的这项任命仅有两票表示反对。

然而福塔斯刚一任命，随即就有人抗议称此举为任人唯亲。福塔斯是约翰逊总统长期以来的挚友兼顾问，但他也具有非凡的才干。任人唯亲的指责或许用在约翰逊以霍默·索恩伯里接替福塔斯的任命上更为合适。索恩伯里是约翰逊的老朋友，他曾建议约翰逊不要接受副总统的提名。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并在约翰逊接替遭刺杀的肯尼迪出任总统时跟随其左右。在担任国会议员14年后，索恩伯里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巡回法庭法官。他一直是一个种族隔离主义者，直到约翰逊上台之后，他才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几起备受关注的案件中挺身站在废除种族隔离主义者一边。

但任人唯亲并不是主要问题；任命最高法院法官是约翰逊的权利。在过去的36年中，共和党人主导白宫的时间仅有8年时间。他们认为1968年是夺取政权的好机会，而部分共和党人想要任命自己的法官。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人罗伯特·格里芬联合19名共和党参议员签署了一份请愿书，称约翰逊的任期只剩下七个月，他不应急于再挑选任命两名法官。但这一说法并没有任何法律或是先例可予以支持。在20世纪的那个时候，曾六度在选举之年任命最高法院法官。艾森豪威尔在选举前一个月任命了威廉·布伦南。约翰·亚当斯就在杰弗逊就职前几周里选择了朋友约翰·马歇尔。这是历史上最为人所折服的任命之一。格里芬只是想否决约翰逊的任命。“当然，一位跛鸭总统有权按照宪法提名最高法院法官，”格里芬表示，“可参议院不会批准。”但格里芬和由共和党右翼以及南部民主党人组成的盟友们并不完全是独自行事。据后来成为尼克松总统特别顾问的约翰·迪安称，总统参选人尼克松通过后来成为其国内问题首席顾问的约翰·埃利希曼与格里芬保持着经常性联系。

但几乎拥有二比一多数的民主党人支持约翰逊的任命，而且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在内的许多共和党领袖都同样予以支持。

在其任命听证会上，福塔斯作为候任首席大法官受到了史无前例的严厉质询。共和党右翼联合南部民主党人对其进行攻击指责，主要质问者包括南卡罗来纳州的斯特罗姆·瑟蒙德和密西西比州的约翰·斯滕尼斯。他们指责福塔斯在“最高法院自认为可以修改宪法的判例”上持放任态度。这是一股新的联合势力，他们用精心措辞的语言攻击福塔斯以及沃伦主政最高法院期间所形成的反对种族隔离和支持民权的判决，以及有关维护被告权利和容忍色情书画的裁定。在所提出的 52 宗案件中，据称有 49 宗是由于福塔斯的投票而致使有关资料无法被裁定为色情；在随后举行的秘密闭门会议上，参议员们观看了那些涉嫌违禁物品的幻灯片。斯特罗姆·瑟蒙德甚至攻击在福塔斯就任首席大法官之前由沃伦所做出的一起判决。10 月时，他们成功地以故意冗长发言的形式——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打断——挫败了对福塔斯的提名。支持福塔斯的参议员缺少 14 票，因此这一任命被成功冻结，直到国会会议闭幕。这还是美国历史上首次运用冗长发言的形式来试图阻止最高法院的任命。因为福塔斯无法出任首席大法官而空出大法官职位，所以索恩伯里的提名也因此难产。

尼克松上台后开始抨击最高法院，试图排除自由派法官并以那些来自南部、有反民权运动记录的法官代替，矛头首先便指向福塔斯。于是一起由白宫策划的丑闻事件指其收受贿款，那其实是最高法院法官们的常见做法。福塔斯黯然辞职。下一个目标是威廉·道格拉斯，一位由罗斯福总统任命的 70 岁高龄的自由派法官。杰拉德·福特为白宫充当弹劾道格拉斯的急先锋，但却以失败告终。将有反民权运动记录的法官安插进最高法院的企图也落空了。尼克松的人选之一克莱门特·海恩斯沃斯遭到仍因福塔斯受攻击而耿耿于怀的民主党多数派的拒绝。另一名人选哈罗德·卡斯韦尔却不无尴尬地被发现根本无力胜任。但福塔斯的去职以及高龄法官们身体状况欠佳，尼克松在其第一个任期内难得有机会任命了四名最高法院法官，包括幕后策划攻击最高法院的司法部法律专家威廉·伦奎斯特。

对于敏锐的观察者来说，当尼克松在迈阿密召开的共和党大会上选择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为竞选搭档时，他的战略——新共和党战略——就已经首次显露无遗了。许多人认为，这个选择是个错误。鉴于洛克菲勒的声望，尼克松—洛克菲勒将是一个梦幻组合。即便洛克菲勒不愿意屈居副手之位，纽约市长约翰·林赛——这位仪表堂堂、深受欢迎的自由派，曾参与撰写有关种族暴力问题的《科纳委员会报告》——他已明确表示期望作为尼克松的副总统参选。保守派的尼克松和自由派的林赛将使共和党涵盖美国政治的所有派系。但尼克松却转向右翼，选择了一位鲜有人知且并不受人欢迎的极端保守派，其在种族和法律秩序上的态度反动至极，以至于对许多人来说他就如同彻头彻尾的顽固分子。

阿格纽对其提名所引起的罕见敌意十分敏感，他抱怨道，“看起来我稍微在李尔王的右边。”媒体于是紧接着追问下面的问题，为什么李尔王是个右派？阿格纽微笑着回答道，“嗯，他保留了对民众实行斩首的权力，这是一个右派人士的立场。”当谈及他在党内及媒体中的受欢迎程度时，阿格纽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如果约翰·林赛成为候选人，那么同样会有南部人士对此表示不满而东北部人士则会表示欢迎。”问题恰恰就在这里。阿格纽不过是地缘战略的一部分，即政治学中为人熟知的“南方策略”。

近一百年来，美国的南部政治一直停滞不前，民主党始终保持着约翰·考德威尔·卡尔霍恩时期的状态。卡尔霍恩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曾在维护州政府权利的名义下为保留南部种植园或奴隶制生活方式进行了数十年的抗争，结果是导致美国内战的爆发。对于南部白人来说，共和党属于迫使他们放弃黑奴财产的亚伯拉罕·林肯这些可恨的北方佬的政党。在战后重建时期，共和党和民主党对黑人没有太多施惠政策，因此一个世纪以来，南方白人一直都支持自己的政党，而民主党人在南方拥有可靠的民主党大本营。乔治·华莱士在独立参选总统时指出，南部民主党人所想要的和民主党所能给予的并不相同，即便他们并无意转为共和党人。早在1948

年，南卡罗来纳州的斯特罗姆·瑟蒙德就曾表达过与此相同的看法。那时，他代表“州权党”这一拥有别具深意党名的政党同杜鲁门竞争总统宝座。

在1968年时，曾对阿贝·福塔斯进行过最为严厉质询的瑟蒙德成了共和党人，尽管这曾一度是不可告人的做法。在尼克松向他保证不会选择一位南部人所反感的竞选伙伴后，瑟蒙德成为尼克松的早期支持者并在迈阿密共和党大会期间竭力为其效劳。因此，林赛根本从未真正参与竞选，尽管他对此毫不知情。

1964年，在约翰逊签署《民权法案》后，其亲近幕僚表示，约翰逊感到十分沮丧，并说他将整个南部都签字让给了共和党，这也是他和汉弗莱为什么极力反对让“密西西比自由党”在1964年民主党大会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总统、司法部长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对民权运动的支持立场历经反复，其中原因在于民主党人力求保持一种不可能的平衡——推动民权，同时维持南部的选票。

许多白人自由派以及包括马丁·路德·金在内的黑人始终都不信任肯尼迪兄弟和约翰逊，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想要维持南部白人的选票。由于得到南部白人的支持，约翰·肯尼迪才能险胜尼克松。约翰逊，这位带有迟缓口音的得州佬十分不可信，但约翰·肯尼迪的南方战略选择其作为竞选搭档。喜剧演员兰尼·布鲁斯以他罕见的微妙讽刺手法创作了一个固定演出节目：

林登·约翰逊——在刚开始的六个月里，他们甚至不让他开口发言。

他花了半年时间才学会如何说“黑鬼”这个词。

“活……鬼……”

“很好，呃，现在让我们再说一遍，林登。”

“活……鬼……”

在签署《民权法案》后，那些白人顽固分子，如果不包括黑人和白人自

由派在内的话，毫无疑问都清楚约翰逊站在哪一边了。在1964年的大选中，约翰逊以压倒性胜利击败了戈德华特。共和党人不无怨恨地将其归咎于北部的自由派共和党人，特别是责怪纳尔逊·洛克菲勒没有支持投票。但在南部，共和党候选人第一次赢得了大部分白人的选票。在若干个州里，包括那些不久才注册的选民在内的许多黑人选民，加上那些传统顽固的南部民主党人以及那些想改变南部的自由派，都出来投票让戈德华特在本地区无法取胜。然而除了他的老家亚利桑那州之外，戈德华特成功夺取的几个州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以及南卡罗来纳州。

现在，尼克松正着手重组共和党。“州权”以及“法律和秩序”这两个略微伪装后对种族主义具有吸引力的概念成为此次运动的主要目标。自卡尔霍恩的时代开始，州权即意味着不允许联邦政府干预南部各州剥夺黑人权利的状况；法律和秩序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用戴利那种使用警力的手段来对付反战示威者以及黑人骚乱者。每当一场黑人骚乱过后，就会有更多想要法律和秩序的白人选民站出来。那些和诺曼·梅勒一样的人“对黑人和他们的权利诉求渐感厌烦”。一个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流行词汇就是“白人反弹”，而尼克松则支持这些白人反弹选民。即便连最为温和的黑人团体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也承认这一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分会会长菲利普·萨维奇称阿格纽和尼克松为“白人反弹候选人”。他表示，让阿格纽参与竞选将使“共和党在11月份的大选中绝对无法赢得很多黑人的选票”。

在1968年，共和党内仍有黑人员工。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布鲁克就是共和党人，他是唯一的而且是战后重建以来的首位黑人参议员。他是一位温和的社会进步主义者，曾经协助林赛一起在科纳委员会工作。而民主党还尚未成为一个黑人政党。正是阿格纽的提名使情况发生了改变。在代表2666名黑人员工出席迈阿密共和党大会的78名黑人员工代表中，大多数人都因不愿或无法支持这一提名而打道回府。一名黑人员工代表对《纽约时报》表

示：“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向黑人们解释为何支持尼克松和阿格纽。”一名芝加哥的黑人代表称：“他们在告诉我们，他们想要白人反弹者，却根本不在乎我们。”当杰基·鲁宾逊，这名首位打破种族界限跻身棒球大联盟的黑人球员、美国最为人所尊敬的体育英雄，宣布将退出洛克菲勒的共和党竞选班子而转向协助民主党打败尼克松、并称尼克松—阿格纽搭档为“种族主义分子”时，共和党失去了最为知名的黑人支持者。

鲁宾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未来政党的分野：“我认为共和党已经忘记了，正直的白人会十分认真地看待此次选举，他们也会加入美国黑人以及犹太裔和波多黎各裔美国人的行列。我们不能走回头路，也无法容忍有着种族歧视本质并可能会允许南部人对正在发生的不公行使否决权的竞选人。”

以阿格纽为竞选搭档的一个有利之处是，他能稍微激进一点以迎合右翼，而尼克松则可以如政治家一般保持克制姿态。阿格纽坚持认为，反战运动是由外国共产主义阴谋分子所领导。而当被问及这些阴谋分子是谁时，他只是简单地表示有些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领导人曾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后将会有更多相关信息。“公民不服从，”他在克利夫兰时表示，“当它妨碍到其他人的公民权时，就不能被宽容。而大多数时候它的确造成了妨碍。”此语言下之意是：民权运动已经侵犯到了白人的公民权。他称休伯特·汉弗莱“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但在共和党国会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和吉拉德·福特表示抗议后收回了这一言论并做道歉。阿格纽表示：“引起骚乱的不是恶劣的条件而是邪恶的人。”阿格纽的另一著名言论是：“当你看过一个贫民窟后，你就等于看过所有的贫民窟。”当他因使用“日本佬”和“波兰佬”而受到批评时，这位副总统候选人反驳称美国人“失去了他们的幽默感”。

自由派共和党人努力不让他们对总统候选人的厌恶之感表现出来。在纽约经历过由黑人、学生以及反战抗议者所引发的骚乱和示威之后，林赛写道：

今年我们听见了大声的呐喊，我们不得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布防荷枪实弹的士兵，肆意冲撞那些在街上静坐的和平示威者，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安全。

你现在可以发现我们的社会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看一看布拉格的街道，你几乎可以发现我们的士兵随处可见。你可以看见那些蓄着长发、奇装异服的年轻人流淌着鲜血——坦克从他们身上碾过，也粉碎了他们反抗当局暴政的非暴力抗议示威。如果我们抛弃了我们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的传统，那就可能变成是我们的坦克和我们的孩子。

至于从芝加哥步履蹒跚地溃退的汉弗莱竞选团队，似乎很清楚汉弗莱不得不和尼克松在右翼势力上决战。汉弗莱的竞选搭档，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艾德蒙·马斯基，是一位有助于其巩固自然根基的东部自由派。左派或许对汉弗莱心存不满，但他们也不会转向尼克松。关于越战的立场，汉弗莱认为并非是一个问题，因为北越“认为那是个军事问题”，而在他1月份就职之前可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然而在大选之前的最后几周里，汉弗莱开始大力反击充斥着恐惧和种族歧视的选战，并开始取得压倒尼克松的优势。“如果偏执和恐惧的声音占据上风，那么我们将会失去我们如此辛勤努力而取得的一切。我无法向你们提供简单的解决办法，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办法。我无法向你们提供庇护之所，根本也没有庇护所。

通过在地方电视台上开展选战，汉弗莱为快速发展的电视时代增添了新的一页。传统上来说，政治人物通常会深入乡镇，在机场组织一场尽可能大规模的集会，并安排一场演讲活动。汉弗莱也常这么做，但在很多乡镇他却并没这么做。每到一处，汉弗莱必做的就是出现在当地电视台的节目中。至于尼克松，他或许并不是对电视最不热衷的总统候选人，但他却根本不会自己承认这一点。人们普遍相信，正是因为尼克松在选举辩论时在电视上的“五点钟阴影”使他在1960年的选举中败北。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只通

过电台收听尼克松辩论的大多数人却以为尼克松获胜了。1968年时，有专门的营养师团队为其制定了薄饼和淡饮料食谱，这样当摄影机灯光打开时，尼克松看起来就不像无声电影中的恶棍了。尼克松的电视媒体顾问罗杰·艾尔斯——他以其28岁的年纪而自傲——认为，“尼克松不是电视的宠儿，他是在选举中最不可能在卡森的脱口秀节目中得分的候选人。”在1968年的时候，出现在电视脱口秀节目中已成为一种最新的竞选方式。艾尔斯认为尼克松“在电视上能进行沟通并展现个人特质，但他在访谈节目中却不在最佳状态。现在出场的是……迪克！”

在距选举仅有数周之时，汉弗莱—马斯基的竞选团队开始刊登构思新颖但十分有效的平面广告，此前还从未有一个竞选领先者受到过如此的攻击指责。“八年前，如果有人告诉你考虑迪克·尼克松，你或许会耻笑他。”广告继续写道：“11月5日是面对现实的时候。如果你十分清楚你不能投票给迪克·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你最好振作精神，参与我们之中。”该广告还夹带着一张竞选捐款礼券，上面写着：“不让迪克·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价值 ____ 美元。”

乔治·华莱士是个未知因素。他能否吸引足够的南部选民来对抗支持尼克松的州，从而摧毁其南部策略，或者像过去的州权党一样，可以拉拢到仍然忠于他们政党的传统南部民主党人。华莱士告诉南部民众称，尼克松和汉弗莱都不适合入主白宫，因为他们支持民权法案。面对着欢呼的人群，华莱士称这是“破坏了这样一个信条，即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一个人的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尼克松称华莱士“不适合”担任总统。华莱士回应称，尼克松“是东部的有钱佬之一，他瞧不起所有的南部人和亚拉巴马州人，并把我们将做红脖子、羊毛毡帽、摘豌豆者以及啄木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尼克松一直自认为对“东部的有钱佬”很反感。

绝望之余就会产生轻佻言行。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耶塔·布朗斯坦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表示“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位犹太母亲在白宫管事”。喜剧

演员帕特·保尔森参选总统很好地体现了许多人对此大选的感受。保尔森满脸忧伤、语调低沉地说道：“我认为我是极佳的候选人，因为首先我隐瞒了自己参选的动机。一直以来，我对任何问题都保持模糊态度，我也仍会一如既往地许诺空头支票。”保尔森面无表情地表示：“许多人都认为我们现行的征兵法令是不公正的。就是那些被称做士兵的人……”保尔森的竞选活动成为了流行电视节目“斯摩特斯兄弟喜剧时间”的固定演出节目。汤姆·斯马瑟斯是保尔森官方竞选活动的负责人，大选前夜的民意调查预测，保尔森将吸引数百万张自填选票。

在选战的最后两周里，民意调查开始显示，尼克松正在失去在政治斗争以及棒球比赛中人们常说的“气势”这种神奇的助力。尼克松的支持者数量陷入停滞而汉弗莱的支持者却持续增多，这一事实表明正在出现一种推动汉弗莱的趋势。

众议院的选战日渐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较之多年以前，其竞选资金更为雄厚，竞争也更为激烈。其中原因在于，如果汉弗莱和尼克松的选举得票最终十分接近，而且华莱士能夺取南部几个州，那么就有可能没有人能在各州选举中获得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众议院将决定谁是最终获胜者。广大选民并不认为这是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事实上，一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81%的美国人赞成废除选举团制度而改由普选产生总统。

然而在选举日那天，华莱士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他从尼克松手中赢得了五个州，而尼克松则囊括了除得克萨斯之外的南部各州。尽管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全民投票——尼克松仅以7%的微弱多数获胜——但他却在选举团中取得不错的成绩。民主党人同时控制着众议院和参议院。仅有60%的合格选民愿意投票。有20万选民在选票上填上了帕特·保尔森。

捷克人将尼克松这位老牌冷战斗士的胜利视做美国反对苏联占领政策的延续。许多西欧人担心白宫易主可能会延滞巴黎和谈的进程。发展中国家认为美国会因此削减援助。阿拉伯国家对此无动于衷，因为尼克松和汉弗莱一

样对以色列十分友善。

雪莉·奇泽姆被选为众议院第一位女黑人众议员。黑人在南部赢得 70 个席位，包括在佛罗里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出现了 20 世纪以来的首位黑人议员，以及在佐治亚州赢得另外三个议席。但尼克松在南部白人选民中赢得绝对多数选票。除掉阿贝·福塔斯的策略同样也让尼克松当选，这也变成了共和党的策略。共和党人赢得了种族主义选票，民主党则赢得了黑人选票。而事实证明，美国的种族主义选民多过黑人选民。自约翰·肯尼迪以来，民主党还未曾赢得过多数的南部白人选票。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南部白人选民都是种族主义者，但共和党人在南部所诉求的是什么样的选票却十分清楚。每个共和党参选人现在都在谈论州权。1980 年，罗纳德·里根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偏僻无名的乡村小镇揭开其总统选战序幕。这个小镇唯一为外界所知是由于 1964 年的切尼、古德曼和施韦尔纳的谋杀事件。但这位共和党参选人却对这几位殉道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员只字未提。他在费城和密西西比州启动竞选活动时谈了些什么呢？州权。



最后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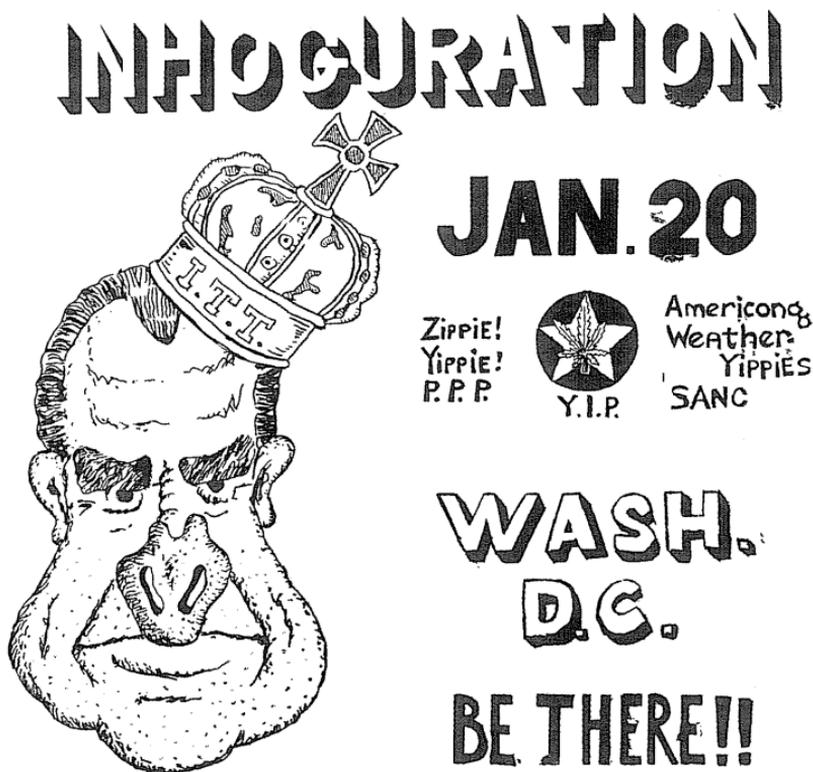
我现在越来越对琐事无动于衷了；当我手下的两个人来到我面前，面红耳赤地就一些小纠纷争吵不休时，我总是告诉他们：“好，地球照样转，不会受到你们的问题的干扰。好好想想吧……”

——迈克尔·柯林斯，《传播火种》
(*Carrying the Fire*), 1974 年

汤姆·海登在后来写到 1968 年时说：“我想，这样一个厄运之年以理查德·尼克松当选为总统而终结也算是恰如其分。”一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1% 的美国人期望尼克松会是位好总统，6% 的人希望他是位“伟大”的总统，而另外 6% 的人则认为他会“很糟糕”。看起来就像乔治·华莱士所指责的加州“东部有钱佬”一样，尼克松在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纽约皮埃尔酒店 39 层的豪华套房内组建了其内阁班子，那里便利地靠近他在第五大道有着 10 个房间的寓所。尼克松是个刻苦勤奋的人，他每天 7 点起床，吃一顿清淡的早餐后，步行走过一个半街区到达皮埃尔酒店，穿过酒店大堂——据说是“几乎没人注意到”，然后工作 10 个小时。在所有来访者中，最让他感到心情愉悦的似乎是南加州大学的新星 O.J. 辛普森。辛普森是当年的海斯曼奖得主，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球员所前进的码数都要多。“你会选择转会吗，

辛普森？”这位当选总统十分好奇。

至于在内阁之下的 2000 个高级职位，尼克松对其助手表示，他想尽量广泛地寻找可能人选。将尼克松的指示牢记在心后，他们让尼克松草拟了一封征求意见函并将其发送至《美国名人录》中收录的 8000 位名人手中。因此有传言称，尼克松曾征询正好名列书中的“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意见。虽然按照惯例，总统会逐一公布其内阁人选，但尼克松却安排在华盛



1968 年异皮士呼吁在尼克松就职时举行示威游行的海报
(美国国会图书馆)

顿的一间酒店内一次性地宣布了其整个内阁成员名单，全美的三家电视网都在黄金时间进行了转播。尼克松试图以此举来整治那让他困扰不已达10年之久的新闻媒体。

这是尼克松难得的电视革新创举之一。然而，他却显示出对另外一种最终导致他身败名裂的技术的奇特偏好——磁带录音机。约翰逊政府在使用偷录和窃听装置方面的管制一直十分严格，但国会于1968年春通过的打击犯罪法案大大放松了可以使用此类设备的联邦部门的范围以及使用的场合。约翰逊于6月19日签署了该法案，但他认为国会“批准联邦、州以及地方官员几乎在不受限制的场合使用偷录和窃听设备是一种不明智的和具有潜在危险的举动。”即便在该法案通过之后，约翰逊仍指示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继续限制窃听设备的使用。但当选总统尼克松却批评约翰逊政府不行使新的打击犯罪法案所赋予的权力。尼克松将偷录和窃听设备称做“执法部门对付犯罪的最有效工具”。

他对监听装置也有许多新的想法。12月时，尼克松的助手宣布了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和纽约州的威彻斯特设立情报站的计划。这样的话，这位当选总统就可以倾听来自“被遗忘的美国人”的声音。这项计划拟通过志愿者对各种不同邻里街区、市镇会议、学校以及集会中的谈话进行录音，因此当选总统就可以听到美国人的言谈话语了。“尼克松先生说，他可以为被遗忘的人找到一种和政府对话的方式。”一名威彻斯特的志愿者如是说。

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仍是美国日渐热门的争议话题——所谓的法律与秩序问题——的主轴。尽管人们对此次骚乱的第一反应是反感戴利和芝加哥警方的所作所为，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戴利和他手下的警察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举动无可厚非。12月初，一个由蒙哥马利百货公司副总裁和法律总顾问丹尼尔·沃克牵头的政府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冲突中的权利》的关于芝加哥骚乱事件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结论指出，此次事件完全是“警察暴乱”，

但警方是被示威抗议者的污言秽语所深深激怒。左派和当局的报纸都指出，警方对猥亵性言语都已习以为常。他们十分怀疑，这是否就是导致警方纪律彻底废弛的真正原因。众所周知，戴利市长自己就常发表一些难以见诸报刊和广播电视的言论。

根据报告所述，因为受害者躲避警察的殴打，于是警察便见人就打。报告并未说明为什么麦卡锡的竞选工作人员及其支持者也成为遭到殴打的目标。《生活》杂志报道称，最腐败的警察部队也是最具暴力性的，言外之意这都是些不听从命令的“坏警察”。但包括戴维·德林杰在内的许多示威者都依旧坚信，“警方有组织的暴力是计划中的一部分”——正如德林杰在国会作证时所说，而根本不是什么因为纪律松弛。

另一方面，仍有许多人相信芝加哥警方的行动完全是有理有据的，因此，《沃克报告》既没有消弭分歧或是解决问题，甚至也未厘清事实真相。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自行召开听证会并传唤了汤姆·海登和其他新左派分子，但他们并未听取杰瑞·鲁宾的证词，因为他穿上租来的圣诞老人衣服并拒绝脱下。阿比·霍夫曼因为身穿仿美国国旗制作的衬衫而遭逮捕。一条刚通过的联邦法律将对国旗的“不敬”行为列为罪行，霍夫曼正是因此而被控。调查委员会执行主席、密苏里州民主党人理查德·艾科德称《沃克报告》反应过度，正如报道此次事件的新闻记者一样。毫不出人意料之外，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关注重点显示，整起事件是共产党人的阴谋，其证据在于：德林杰和海登曾在巴黎与北越和越共官员有过会面。“暴力与这些先生们如影随形就像黑夜紧紧跟随白天”，艾科德以近乎模仿莎士比亚的语言说道。

政府印刷局拒绝印制《沃克报告》，因为调查委员会不同意删除作证者所指称的示威者和警察互相叫骂时使用的污言秽语。沃克表示，删除这些词语将“严重破坏该报告的基调”。戴利本人对报告予以好评，只是对其结尾表示不满。当 he 从记者招待会会场走出来时，记者们高喊，“你手下的警察

施暴是怎么回事？”但戴利市长却一言不发。

致使阿比·霍夫曼因其衬衫而被捕的这条法律是国会通过的旨在困扰反战运动的数条法律之一。在一个日渐变得专制压抑的美国社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正相互争夺那些渴望法律与秩序的选民。在1968年通过的法律中，其中一条将有暴力倾向意图并跨越州边界的举动定为犯罪行为。芝加哥的联邦检察官正考虑以这条未经付诸实践的法条来控告芝加哥示威运动的领袖们。但约翰逊的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对如此阴谋审判却并不热衷。当尼克松上台后，情形发生了改变。尼克松任命纽约的合同律师约翰·米切尔为司法部长。米切尔曾经表示，克拉克的“问题”在于“他总是从哲理的角度关注个人的权利”。米切尔急于进行秘密审判，于是在1969年3月20日，汤姆·海登、伦尼·戴维斯、戴维·德林杰、阿比·霍夫曼、杰里·鲁宾、博比·西尔、约翰·弗罗因斯以及李·韦纳——即所谓的“芝加哥八君子”——被提起公诉。海登、戴维斯、德林杰、霍夫曼和鲁宾公开承认组织了芝加哥示威活动，但他们否认激起暴力活动。即便是官方的《沃克报告》都将暴力归咎于警方。但他们对黑豹党领导人博比·西尔知之不多。在审判期间，法官朱利斯·霍夫曼下令捆住西尔并用东西塞住他的嘴，因为他不停地大叫霍夫曼为法西斯分子。没有人知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活动分子弗洛尼斯和韦纳为何会被列入名单之中。事实上，这两人是唯一被判无罪者。其他人的定罪判决则上诉失败。而后来约翰·米切尔自己也因在“水门事件”的调查中作伪证而入狱。

1968年11月，意大利人曾一度被弗兰卡·薇奥拉的故事所吸引。弗兰卡所嫁的男人是其真爱，她旧时的一位同学。两年前，她拒绝了一名富家子菲利波·梅洛迪亚的追求，梅洛迪亚于是绑架并强暴了弗兰卡。一般来说，妇女在遭强暴后会嫁给强暴者，因为其名声已被玷污，再没有其他男人会娶她，这一习俗已在西西里岛的男人中流传了将近千年之久。但在许多意大利

人的掌声中，弗兰卡却入禀法庭并对梅洛迪亚表示：“我并不爱你。我不会嫁给你。”这对梅洛迪亚而言不啻是个打击，不仅因为他遭到了拒绝，而且因为按照西西里岛的法律，如果一个女人不和其强暴者结婚，那么那名强暴者则将受到审判。梅洛迪亚因此被判入狱 11 年。

12 月 3 日，在两名罢工工人在西西里岛遭枪杀身亡后，由工人和学生发起的罢工和抗议活动使得意大利陷入瘫痪状态。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引爆的炸弹摧毁了位于热那亚的一间政府的食品办公室。实施爆炸者所散发的传单称，“推翻政府！”到 12 月 5 日时，一场大罢工导致罗马城陷入瘫痪。但 12 月 6 日，工人们在获得增加工资后结束了罢工，剩下数以万计的示威学生孤军奋战。

在法国，把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结合起来的想法依然存在，但却依旧归于失败。12 月 4 日，雅克·索瓦诺与工会领导人会面，期望建立起春天时未能达成的统一战线。戴高乐人为地支撑法郎币值已一年多，就是因为他相信“强势法郎”。现在，法郎被严重高估，其币值在国际货币市场正急剧下跌。戴高乐没有通过使法郎贬值这一正常的财政手段，相反，他下令采取削减社会支出等一系列激进手段来稳定法郎贬值的态势，这令欧洲和金融界无不大感震惊。法国工人被激怒了。12 月 5 日爆发了罢工行动。但 12 月 12 日，政府通过谈判使罢工偃旗息鼓，而当学生们关闭南泰尔大学以抗议警方审讯学生时，他们又一次发现自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法国政府威胁将开始从大学校园中清除“学生煽动者”。

在遭受一次次打击后，人们以为戴高乐将会变得平和温顺——在经历春天的骚乱和罢工后其威望开始下降；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其外交政策发生动摇；法郎严重贬值使其经济成果前功尽弃。在年底之时，让其欧洲同行们彻底感到无可奈何的是，戴高乐第三次阻止了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11 月 7 日，犹太裔法国幸存者、著名的纳粹追捕者贝亚特·克拉斯费

德的非犹太裔德国妻子泽格·克拉斯费德到柏林参加社会民主党大会时，冲到总理基辛格面前，怒斥其为纳粹分子并打了他一记耳光。到1968年底时，西德政府以其在纳粹统治时期所犯的罪行将6221名德国人送入监狱——被定罪者堪称甚为可观，但其中极少部分是纳粹罪犯。1968年，西德政府总共仅判决了30名纳粹分子，几乎都是些不知名的小角色。相反，在希特勒统治期间异常活跃且杀人无数的许多纳粹法庭法官却无一人被送进监狱。12月6日，柏林的一家法庭对曾判处230人死刑的纳粹法官汉斯·约阿希姆·雷泽宣告无罪。检方本来以七条肆意滥用司法的罪行对其进行起诉，但法庭却裁定有关指控仅表明滥用法律而非故意行为，这一判决借鉴了此前的一例案件。根据该案裁定，“如果法官系被纳粹的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的法律体系所蒙蔽”，那么他们则是清白无辜的。当雷泽离开法庭时，法庭外的人群高喊着“可耻！可耻！”一名老者冲上前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接下来的一周里，有8000人在柏林全城游行并前往市政厅前抗议释放雷泽。时间已所剩无几。起诉纳粹罪行的联邦法令将在一年后，即1969年12月31日失效。

1968年夏，西班牙政府已在吉普斯夸巴斯克省份实行无限期戒严。在拉斯卡诺村，村里的牧师谴责教堂的管风琴手在“举行神圣的圣礼仪式”时演奏西班牙国歌。这名牧师因其批评言论而受到罚款，因为那位管风琴手恰好是该村的村长，所以处罚是轻而易举之事。当那位村长离家外出时，其房子被人纵火烧毁。五名巴斯克青年遭到抓捕并被拘留了五天。据目击者称，他们被铐在椅子上，遭拳打脚踢三天之久。他们最终承认所犯罪行。检方请求法庭对其判处死刑，但审判中除了警方的证词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证据。12月，他们中的三人被判处入狱48年，一人被判处入狱12年，一人被无罪释放。

然而在12月6日，西班牙政府宣布由费迪南德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于476年前所颁布的驱逐所有拒绝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的训令无效，试图以此显示其对司法公正的关切。

在6月时，当汤姆·海登呼吁建立“两所、三所甚至更多所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补充表示，“这样的话美国政府要么改弦易辙，要么就派遣军队攻占美国的大学校园。”到12月时，他有了第二份行动计划。12月5日，在警察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学生以及教师之间的骚乱和混战持续了一周之后，全副武装的警察拉开枪栓并释放催泪瓦斯，开始对校园实行清理。在一周前走马上任时，旧金山州立大学代理校长S.I.哈亚卡瓦公然抨击1964年的“言论自由运动”，这无疑让其立场凸显无遗。他对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两千多名学生表示，“警方已奉命清理校园，因此再没有什么无辜的旁观者了。”此次抗议起因于黑人学生要求设立黑人研究课程。在当年的最后三周里，旧金山州立大学只得靠大批荷枪实弹的警察部队不断攻击聚集抗议学生才能保持开放。

位于旧金山州立大学附近且曾因暴力活动而一度关闭的圣马地奥大学于12月15日重新开学。整个校园里都驻扎着防暴警察，用该校校长的话来说，就“如同一个兵营”。

在饱受校园骚乱之苦的大学校长中，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是最受非难指责的一位。在8月辞职之后，他在12月时搬迁到纽约布朗克斯河谷区的一间拥有20个房间的公寓内，该公寓由拥有其产权的哥伦比亚大学提供。

12月初，一直支持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的英国开始改变其对比夫拉战争的看法。此前，英国人坚持认为尼日利亚政府将很快取得胜利，现在他们则逐渐意识到这场战争将陷入令人绝望的胶着状态。美国也开始改变其政策。约翰逊为比夫拉制定了总值高达两千万美元的海陆空联合救援计划。法国已开始向比夫拉提供援助，尼日利亚人愤怒地表示正是法国的援助才使比夫拉得以支撑下去。每晚6点都有救援飞机从加蓬首都利伯维尔飞赴比夫拉。但比夫拉只坚持了一年多，终于在1970年1月15日屈服，估计有100万平民死于饥谨。

经过历时 11 个月的谈判，在美国政府承认其进行间谍活动之后，美国军舰“普韦布洛号”上的 82 名船员被朝鲜释放。在确保这 82 名美国人处境安全后，美国拒绝承认此前的声明。有人认为一个国家如此开展外交难免有些不同寻常，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了使被俘船员获释而又避免战争所付出的微小代价。“普韦布洛号”被朝鲜拦截之时到底在做什么，这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在越南，有关美军所实施的“米莱大屠杀”（My Lai Massacre）的传言广为流传。1968 年秋，美军第 11 旅士兵汤姆·格伦汇报此次屠杀事件的信函被送到师部总部。美军司令部新任副指挥官科林·鲍威尔奉示对此回函答复。在未和格伦面谈的情况下，鲍威尔回复称，这项指控不值一提——那根本是毫无根据的谣言。翌年 9 月，仅仅 9 个月之后，威廉·卡利上尉被控以多重谋杀。到 11 月时，这已成为一个轰动性事件。但鲍威尔声称，直到两年后他都从未听说过这起屠杀事件。鲍威尔在此次隐瞒事件中的角色一直不为人所知——在大屠杀发生时他甚至并不在越南，直到有传闻称鲍威尔有意竞选美国总统时，《新闻周刊》才于 1995 年 9 月报道披露此事。

尽管约翰逊于 11 月时宣布单方面停止轰炸北越，并表示希望这将推动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的谈判。但 12 月 6 日，征兵事务处宣布称，征兵人数将每月增加 3000 人。到 12 月中旬时，在巴黎进行和谈的各方认为，由于大选的临近，约翰逊正过度鼓吹达成和平的可能性。

在巴黎，年终的和谈最终归结于一个有待解决的棘手的难题……谈判桌问题。河内坚持安排一个正方形桌子，而南越则表示完全无法接受。各代表团就此进行讨论，有提议使用圆桌，两个弧形相对又不分开，或者相对但将其分开。到年底时，关于谈判桌的形状已有了 11 种不同的安排方案。在谈判桌问题背后是更为棘手的现实问题，比如北越坚持越共参与谈判，而越共则拒绝和南越对话但却愿意和美国人对话。

参议员乔治·麦戈文，这位民主党芝加哥大会最后一刻的和平候选人，



1970年，“米莱大屠杀”事件曝光后，弗雷泽·道赫蒂、约翰·汉德瑞克和欧文·佩廷根据R.L.海伯尔所拍摄照片设计的海报。（玛丽·哈斯科尔收藏）

出言不逊地称呼南越副总统阮高奇（Nguyen Cao Ky）为“自命不凡的独裁者”，并谴责阮高奇以及其他南越官员阻碍和谈进程，这正是其他许多人试图努力避免的。“当阮高奇流连于巴黎的豪华场所并为了到底是坐在圆形还是长方形桌子边时，美国人却正在越南为支撑其腐败政权而丢掉性命。”避免直接出言批评南越是支持反战的参议员一贯以来的原则，有些是出于对约翰逊的尊重，有些则是担心因此干扰到谈判进程。当约翰逊下台之后，他们则倾向于更为清楚地表达意见。有人表示他们将等到尼克松就职以后，但麦戈文却提前两周即开始直言不讳了。一份盖洛普民调显示，微弱多数的美国人现在支持从越南撤军，而让南越独自支撑越南战场。

麦戈文敦促对越南战争的教训进行深入检讨。对他来说，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即是“借鉴历史先例的危险”，尽管60年代初期在东南亚和30年代末期在欧洲所发生的一切根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经历过“二战”的那

一代人却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之中，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曾目睹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

麦戈文表示：“这是一场每日清点尸体的战争，就像多年来清点橄榄球得分一样。”军方也意识到其中所犯的错误。他们甚至对清点尸体进行了夸大渲染。未来的战争将看起来尽可能地兵不血刃，因为军方会尽可能少地透露敌方的伤亡情况。

军方本身也在从中吸取教训，但并不是麦戈文试图发起这场讨论时所设想的那样。军方的结论认为，在一个电视流行的年代，应该对新闻记者实施更为严厉的管制。战争场面应该受到严格监控。将军们将不得不考虑战争会如何在电视上呈现以及如何控制相关场面。

义务兵役制这一做法将被废除，因为这导致许多士兵消极懈怠以及极大的负面社会观感。最好是实行全部自愿兵役，主要从少数的社会群体中征集，即那些急需就业和工作机会的人。如果学生们不再被迫上战场的话，战争也将不再是大学校园里的重要话题了。

但如果开战的话，也只会和相对来说几无防御能力的国家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优势至关重要，或者和只会抵抗几周而非数年的军队作战。

当美国指责越共破坏其圣诞节停火协议时，1968年刚开始时其实就已经结束了。但在那一年里，14589名美军士兵在越南战死，从而使美军伤亡总数增加了一倍。当美国最终在1973年从越南撤军时，1968年是其在整个战争中伤亡最多的一年。

在1968年年底，捷克斯洛伐克仍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在蓝领工人短暂罢工斗争的支持下，10万名学生发起了历时三天的全国性罢课活动。杜布切克发表讲话称，政府正竭尽全力恢复改革政策，但民众应停止反抗活动，因为这只能导致强力镇压。事实上，当从12月开始重新实施旅行限制时，最后一项改革举措也被扼杀了。12月21日，杜布切克在斯洛伐克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上做了发言，这是他在1968年时的最后一次讲话。他依然坚定地认为改革必须进行下去，他们将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民主国家。如果不是间或提及“现在所面临的困难”，这篇讲话几乎可以被认为写于布拉格之春的全盛时期。他说：

作为1月事件之后所实行政策的一种长久的正面因素，我们必须始终确保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尊重社会主义法制，并彻底恢复遭受不公正待遇公民的名誉。

杜布切克敦促人们全都回到家中，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安享平和时光。1969年，杜布切克被迫下台。1970年，他被开除出共产党。杜布切克和其他改革派，“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逐渐消失成为历史遗迹。意识到再也不可能推行其理想中的政策后，1968年11月时即已辞职的姆利纳日表示，“我们是十足的傻瓜。但我们的愚蠢应归咎于对共产主义进行改革的想法和观念。”

1968年4月，杜布切克接受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的采访：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建立在一切民主原则可发挥积极作用，以及人民享有言论自由权利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会更加缺乏稳固性。相反，我深信党内和公共生活中的民主氛围会强化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团结，而且我们将争取到我们国家中所有具有真才实干和才华横溢的公民的积极合作。

杜布切克，这位有着亲切笑容的政府官僚，堪称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混合体。他一生都是极权主义发动机上的一个齿轮。而当其脱颖而出时，他宣称自己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他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也是一个梦想家。他可

以在共产主义复杂的政治迷宫里游刃有余，但最终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天真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

到1968年结束时，苏联人开始担忧起来，但他们尚未意识到他们扼杀了布拉格之春的美梦后代价有多大。杜布切克试图效法哥穆尔卡在1956年时重新上台的经验而东山再起。于是他克制自己的宏伟抱负，降低人们对他的期望并极力迎合莫斯科的意图。但杜布切克不是哥穆尔卡，至少这是莫斯科的结论——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却仍然试图确定他到底是怎样的人。人们通常忘记了，在1968年时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反战领导人。他从未打算采取军事手段，即便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拒绝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威逼利诱，从不玩弄冷战游戏，从不求助于资本家，从不撕毁协议或协定，甚至从不食言——他真正掌权的那段激动人心的日子不过220天而已。在此期间，不可能的事情似乎变成了可能，正如5月时写在巴黎城墙上的那句口号：“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在杜布切克下台之后，没有人记得他们曾经真正了解过他。

1968年8月20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标志着苏联终结的开始。当二十多年后苏联最终瓦解时，西方为之感到震惊不已。他们早将这抛诸脑后了。但在入侵发生之时，就连《时代》周刊也在预测其最终结局。入侵行动终结的是一个英雄主义般的俄国：一个为举世敬仰的国家，因为它曾勇敢地绝世而独立，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它曾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长般的保护者；因为它曾牺牲数百万人以便将欧洲从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它不再被人视做是温和可亲的国家，而是一个征服弱小国家的恶棍。在苏联垮台之后，杜布切克曾写到，苏联的灭亡可归咎于一个主要的错误：“苏联的社会制度扼杀了变革的产生。”

苏联的垮台比许多人估计的来得要晚。2002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位苏联最后的领导人，对其多年老友、前杜布切克政府官员兹德尼·姆利纳日表示：

布拉格之春旨在重新诠释理解社会主义，对其进行镇压同样也激起了苏联内部的强烈反弹，并进而导致针对各种形式的思想自由的正面攻击。官方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机器果断地采取了毫不妥协的行动。这对苏联的所有国内和外交政策以及整个苏维埃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苏联已然陷入了严重的停滞状态。

杜布切克的梦想——那是一条从未曾发现的道路——和实际所发生的情况，即共产主义的瓦解截然不同。他和许多其他共产党人始终相信，苏联体制中的弊端可以通过改革加以改变，而且共产主义是能够行得通的。在苏联入侵捷克之后，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而一旦丧失这一信念之后，剩下的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信赖了。

在这一梦想破灭以后，具有改革思想的共产党人别无选择，只有转向他们认为有着不可容忍的缺陷的资本主义。他们犯了在1968年时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他们现在认为资本主义是可以加以改造从而赋予其人性面孔的。

在波兰，1968年代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最终在80年代时争取让工人和他们站在一起并抛弃了共产主义制度。在2001年的一次采访中，几乎泪流满面的雅采克·库龙对新体制如是说：

我试图创造一种民主体制，但我未曾深入思考过的一个问题是，我原以为资本主义能够进行自我革新，而诸如工人自治政府等所有目标都将逐渐得以实现。但是那似乎是为时已晚。这不过是证明了我自己的愚昧无知……

波兰的问题在于，中央集权意味着独裁政治并且无法促使其改弦易辙。资本主义则是富人独裁。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中央控制无法使其中止。我感到遗憾的是曾参与首届政府（后共产主义时期）。我的参与让许多人接受了资本主义。

我原以为资本主义能够进行自我革新。但它并非如此。这正如俄罗斯一样——不过是控制在一小部分人手中，因为资本主义需要资本。现在在这里（波兰），有一半人口正处在饥饿的边缘，另一半人则感到已功成名就。

在当年年底接受采访时，时年 81 岁的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这位备受尊敬的美国历史学家表示：“在此之前，我们已度过了一段不正常的日子，一段动荡不安和充斥暴力的时光。在当时看来，它是如此的令人惊慌恐惧，也让人难以理解。但我们的国家得以幸存下来。我们的民主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包容妥协的空间以及我们在自由和威权之间保持平衡的能力。而我深信，这一次我们将取得一种新的平衡，并通过这一过程在我们的人民之中形成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领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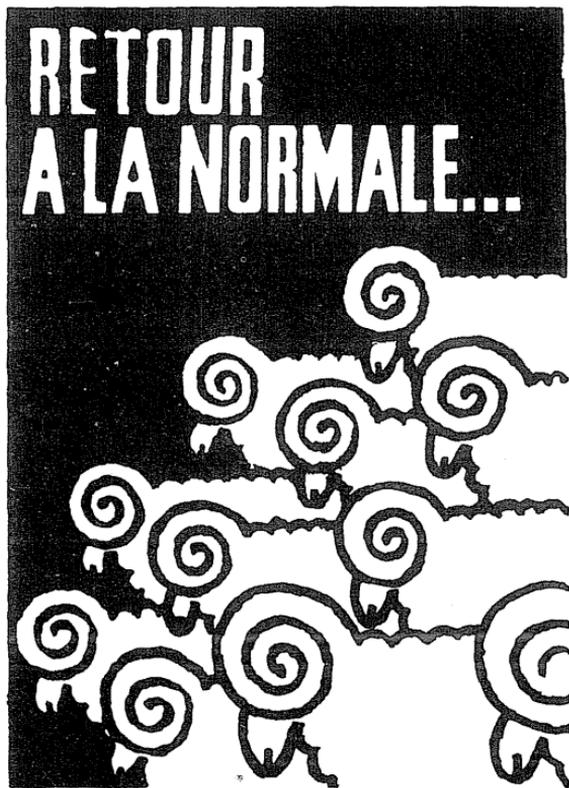
正如雅采克·库龙在波兰所发现的那样，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与那些决心要改变世界的人们所设想的相去甚远。但这并不是说 1968 年没有使世界发生改变。反战运动分子没有中止美国的霸权主义战争，但却改变了其实施方式以及其蛊惑大众的形式。在反对征兵的活动中，反战活动分子们向美军将领们表明了他们继续发动战争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从历史而言，将根本性变革的原因归结于某一具体时刻通常是不准确的。正是 1967 年和 1969 年以及此前的多年岁月，1968 年才所以成为 1968 年。但 1968 年是这一转变、一场根本性变革的中心点，即由此催生了我们后现代时期由媒体主导的社会。这就是为何当时的流行音乐，当时大众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对其后的青年人依然保持着影响力的原因。

这是冷战结束的开始，也是一种崭新的地缘政治秩序的萌芽初现。在这一秩序之下，政治和领导人的特质随之发生改变。特鲁多式的领导方式，即政治人物以其形象但非内在而为人所知，已经大行其道。马歇尔·麦克卢汉，这位 60 年代的伟大预言家预测道，“为了维护形象，政治家们将十分乐于放

弃自己的权力，因为形象对他们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力量。”1968年那一代已经掌握权力的政治领导人，比如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或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已对这种领袖方式的概念显示出一种直觉般的熟稔。

在1968年时，“权力利益集团”总是信心十足地表示，所有这些激进青年的所作所为是因为他们尚且年轻；当他们长大成熟后，必然会“冷静下来”并忙于赚钱。资本主义的长处在于，正如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一样，它从不曾怀疑自己对人进行收买拉拢的能力。然而，事实上这些年轻人始终是积极活跃的一代人。美国的民意测验专家发现，最不愿意参与选举投票的是那些年轻选民，特别是那些因1968年的社会运动而获得选举权的年龄在18至21岁的年轻人。



“回归正常”。1968年
巴黎学生的丝印海报
(旺斯，波堡画廊)

1968年10月，当海登在“暴力诱因与预防国家委员会”作证时，利昂·希金博特姆法官询问海登，他是否认为给予那些年满18岁者投票权会减轻年轻人的挫折感。海登警告称，如果他们沒有可以投票支持的人选，那么拥有投票权只会加剧他们的挫折感。1968年时的许多学生领袖要么像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特和汤姆·海登那样热衷于政治，要么就成为记者或是教师，而那是实现改变世界意图更为明显的方式。亚当·米赫尼克，这位中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编辑——他从没想过命运会如此眷顾他——经常会有在法国为人熟知的所谓“68年代人”来造访他。“我能一秒钟就认出68年代的人，”他表示，“这无关乎政治。那是一种思维方式。我曾见过比尔·克林顿，我能看出他就是一个68年代的人。”

当然，1968年的最大教训之一是当有人想要改变世界时，其他想要保持现状以维护既得利益的人不会不择手段地让他们保持沉默。1970年，四名反战示威者在肯特州立大学遭枪击身亡。

而且，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他们并非无能为力，他们可以像1968年时的人们那样走上街头。政治领袖们，尤其是60年代所催生的那些精于媒体之道的领导人，都清醒地意识到，忽视群众运动将最终导致自食其果。25岁以下的人在社会中并没有什么影响力，但如果他们准备游行示威时，其所作所为则难免令人惊讶侧目。还记得1968年吗？在90年代中期，当学生们开始在巴黎发动示威游行时，密特朗政府对此高度关注，而戴高乐政府则是等到所有大学都被迫关闭后才做出类似举动。密特朗并未忘记1968年，其政府中的每个人都同样记得。在1999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期间，在西雅图举行的世贸组织大会遭到大批愤怒的“反全球化”抗议示威者的冲击。时任总统克林顿，这位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狂热鼓吹者，对此印象深刻。自此以后，他就经常把这件事拿出来讨论。

1968年是令人不堪回首的一年，然而它也是让许多人产生怀旧之情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数千人在越南丧生，数百万人在比夫拉饿死，波兰和捷

克斯洛伐克的理想主义破灭，墨西哥发生大屠杀，全世界对异议分子进行棍棒打压和残酷镇压，两位最可能给世界带来希望的美国人遭到刺杀。然而尽管如此，对许多人来说这也是充满无限可能并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年。正如加缪在《反抗者》一书中所言，那些期望和平的人所渴望的“并不是减轻苦难，而是对苦难默不作声”。1968年的激动人心之处在于，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难以胜数的人都拒绝对世界上许多的不平之事保持缄默。不可能让他们沉默不语。他们人数如此之多，如果别无选择的话，他们将走上街头，呐喊示威，这给了这个世界一丝难得的希望，即哪里有不公，哪里就始终会有人揭露它并试图改变它。

但在1968年结束之时，许多人都感到了厌倦和愤怒，并渴望着能有一则不是过于负面的新闻。正是在那年年底，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带来了这则新闻。就在七年前，当美国似乎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当政治暗杀似乎只是发生在其他更为贫穷和动荡的国家的时候；当在越南战场上浴血奋战并捐躯沙场以及抗议越战的那一代人仍然还是学童少年的时候——肯尼迪总统曾经许诺，在60年代结束之际人类将到达月球。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说道：

我深信，我们的国家将在这个10年结束前完成一个目标，即让宇航员登陆月球并安全返回地球。这一时期，没有任何单一的航天计划会比这个更能使人类振奋，也没有任何计划比此对远程宇宙的探索更重要，也没有比这更为艰巨困难或是需耗费更多金钱才能完成的项目。从真正意义而言，登陆月球的不是单独一个人——那将是整个国家。

60年代的新人类对早期的太空发射兴奋不已。每一次的发射都由电台进行报道并转播到学校的教室中。人们似乎感觉生活在一个探索未知的新时代，就类似于15世纪时那样。然而，不知什么缘故，太空探索似乎逐渐淡

出了人们的视线，或者说至少是所有人的关注重点发生了变化。青年人不会到月球去，但他们会去越南战场。不时有文章称，不得不削减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预算经费并将其用于越南战场。肯尼迪有关登陆月球将耗资巨大的预言十分准确；从1958年10月1日成立到1968年10月1日的10周年里，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太空探索项目上已耗费440亿美元。

在9月末的时候，人们得以重新回到那更为纯真的年代。似乎从未有过苏联入侵这回事，登陆月球的太空竞赛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苏联人已经发射了环绕月球的“探测器5号”（Zond 5），似乎他们也很快会将一名宇航员送到月球。10月时，美国人通过“阿波罗7号”计划将三名宇航员送上太空。宇航员们在最终为登月而设计的太空舱中环绕地球轨道飞行了11天。太空舱首先在1月份时的一次未加命名的行动中通过测试。“阿波罗7号”计划进展如此顺利，“一次完美的任务”，国家航空航天局如是说。因此，该局决定大踏步推进。原本预计重复“阿波罗7号”飞行任务的“阿波罗8号”离开近地轨道并绕月飞行。于是，苏联人在10月底时发射“联盟3号”宇宙飞船，将一名宇航员送达太空，抵达历史上人类距离月球最近的地方。12月18日，恰值首次以卫星传送方式广播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圣诞节祝词10周年之际，“国际通信卫星3号”——首颗可向全球传送电视直播节目的新型系列通讯卫星成功发射。这或许并没有什么浪漫可言，但更多的是其产生的直接效应。这颗新卫星将通过太空传输电视和电话信号的能力提升了一倍以上。一个崭新的电视时代已经来临。

为了赶上圣诞节，“阿波罗8号”按计划将于12月21日发射升空。许多人都猜测，苏联人可能会在这三名登月宇航员之前捷足先登。英国乔德雷尔·班克天文台（Jodrell Bank Observatory）负责人、首席宇航员伯纳德·洛维耳爵士称，此次发射任务所取得的科学研究信息将不足以抵消其所冒的风险。美国航空航天局坦承，这是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危险的任务。太空舱将围绕月球轨道飞行，在此前没有任何载人飞船有过此举。而如果在绕月

飞行后无法启动太空舱引擎，则太空舱将被永久固定在轨道上，就如同月球的一颗人造卫星。国家航空航天局也确认此次任务缺乏科学性，其目的在于探索和试验登陆月球所必需的技术要求。

“阿波罗 8 号”如期发射升空，在距月球尚有一半距离之时从太空舱中传回一段电视节目，其画面清晰度尚十分罕见，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都为之着迷。当靠近月球时，太空舱绕月飞行并从太空向地球传回首张我们这颗蓝白相间的小小星球的照片，它令人惊叹不已。这张照片以黑白形式登上了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和其他 1968 年所发生的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件一样，电视转播和“阿波罗 8 号”所拍摄的照片让人们在这首个具有全球意义的一年感觉到，这是一次令全世界瞩目的事件。在圣诞节那天，三名宇航员飞向了距离他们仅有 70 英里之遥的月球。他们发现，月球表面呈现出一片灰色，那里荒无人烟且凸凹不平。随后他们点燃火箭，返回这颗有着蔚蓝色海洋、各种花草树木以及无休止争吵的星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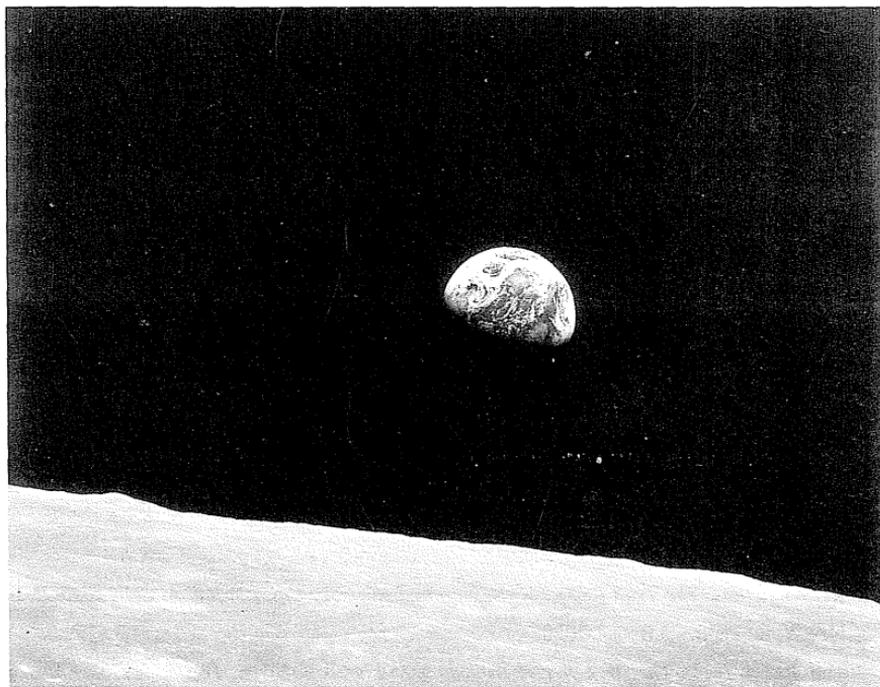
就在 1968 年行将结束之际，人们对未来曾一度产生极度的兴奋。种族主义、贫穷困苦、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以及比夫拉战争，这些都在瞬间被搁置一旁。普通大众的感觉，就如同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在 1969 年夏天环月轨道飞行而其队友登陆月球时的感觉一样：

我真的相信，如果全世界的政治领导人能从，比如说 10 万英里距离的地方遥看我们的地球，那么他们的世界观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些至关重要的国家边界根本就看不见，吵闹不休的争执也会突然鸦雀无声。这颗小小星球将会继续旋转，宁静安详。没有什么条块分割，所呈现出的是一个完整的表面。它要求我们有一致的想法，都一视同仁地对待。地球一定会变成它所显现的那样：蓝白相间，没有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之别；蓝白相间，没有贫富之分；蓝白相间，没有嫉妒或遭妒之差。

于是乎，1968年的终结就如同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那位最终从地狱重新回到地面并仰望着群星的旅行者：

导师和我沿着这条幽暗的路径，
又开始重返那光明的世界之中，
我们顾不上丝毫休整，
他在前，我殿后，我们一起攀登，
直到我透过一个圆洞，
看见一些美丽的东西显现在苍穹，
我们于是走出这里，重见满天繁星。

——但丁，《地狱篇》。



1968年岁末最后一周时的地球。由“阿波罗8号”在月球背面拍摄。
(美国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提供)

参考书目

GENERAL

- L'Année dans le monde: Les Faits de 1968, 1969.* Paris: Arthaud, 1969.
- Les Grands Événements 1968.* Paris: Solar et Presses de la Cité, 1969.
- Allyn, David. *Make Love, Not War: The Sexual Revolution, an Unfettered Histor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2000.
- Berman, Paul. *A Tale of Two Utopias: The Political Journey of the Generation of 1968.*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6.
- Caute, David. *The Year of the Barricades: A Journey Through 1968.*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 Charter, Ann, ed. *The Portable Sixties Reader.*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2003.
- Collins, Michael. *Carrying the Fire: An Astronaut's Journey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4.
- Fraser, Ronald, ed. *1968: A Student Generation in Revol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 Gitlin, Todd. *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 Toronto: Bantam Books, 1987.
- Goodman, Mitchell, ed. *The Movement Toward a New America: A New Beginning of a Long Revolution.* Philadelphia: Pilgrim Press, 1970.
- Hobsbawm, Eric, and Marc Weitzmann. *1968 Magnum Throughout the World.* Paris: Éditions Hazan, 1998.
- Katzman, Allen, ed. *Our Time: An Anthology of Interviews from the East Village Other.* New York: Dial Press, 1972.
- Kopkind, Andrew. *The Thirty Years War: Dispatches and Diversions of a Radical Journalist.* London: New York, 1995.
- Marwick, Arthur. *The Sixtie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France, Ita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 1958–197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chulke, Flip, and Matt Schudel. *Witness to Our Times: My Life as a Photojournalist.* Chicago: Marcato, 2003.

AMERICA

- The Kerner Report: The 1968 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 Califano, Joseph A., Jr.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Lyndon B. Johnson: The White House Yea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 Cohen, Robert, and Reginald E. Zelnik, eds. *The Free Speech Movement: Reflections on Berkeley*

- in the 196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Dean, John W. *The Rehnquist Choice: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Nixon Appointment That Redefined the Supreme Cour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 Dellinger, David. *From Yale to Jail: The Life Story of a Moral Dissent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6.
- Goodwin, Richard N. *Remembering America: A Voice from the Sixtie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88.
- Hayden, Tom. *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69.
- . *Rebel: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1960s*. Los Angeles: Red Hen Press, 2003.
- . *Reunion: A Memoir*.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89.
- Hoffman, Abbie. *Revolution for the Hell of It*. New York: Dial Press, 1968.
- Isserman, Maurice, and Michael Kazin. *America Divided: The Civil War of the 196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Kaiser, Charles. *1968 in America: Music, Politics, Chaos, Counterculture, and the Shaping of a Generation*.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8.
- Leshner, Stephan. *George Wallace: American Populist*. Reading, P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1994.
- Raskin, Jonah. *For the Hell of It: The Life and Times of Abbie Hoff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 Royko, Mike. *Boss: Richard J. Daley of Chicago*. New York: Plume, 1988.
- Schlesinger, Arthu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vols. 1 and 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8.
- Schultz, John. *No One Was Killed: Documentation and Meditation: Convention Week, Chicago, August 1968*. Chicago: Big Tab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Servan-Schreiber, Jean-Jacques. *The American Challenge*. New York: Atheneum, 1968.
- Solberg, Carl. *Hubert Humphrey: A Biograph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84.
- Steel, Ronald. *In Love with Night: The American Romance with Robert Kennedy*. New York: Touchstone, 2000.
- Thomas, Evan. *Robert Kennedy: His 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 Wall, Byron, ed. *Manual for Draft-Age Immigrants to Canada*.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1970.
- Witcover, Jules. *The Year the Dream Died: Revisiting 1968 in America*.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7.

CIVIL RIGHTS MOVEMENT

- Carson, Clayborne, David Garrow, Bill Kovach, and Carol Polsgrove, eds. *Reporting Civil Rights: Part One, American Journalism 1941–1963; Part Two, American Journalism 1963–1973*.

-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2003.
- Cleaver, Eldridge. *Soul on Ice*. New York: Delta Trade Paperbacks, 1992.
- Garrow, David J. *Bearing the Cross: And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 1986.
- . *The FBI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From "Solo" to Memphi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81.
- Halberstam, David. *The Children*. New York: Fawcett Books, 1998.
- Haley, Alex. *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2.
- King, Mary. *Freedom Song: A Personal Story of the 1960s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 1987.
- Lester, Julius. *Look Out, Whitey!: Black Power's Gon' Get Your Mama*. New York: Dial Press, 1968.
- Pearson, Hugh. *The Shadow of the Panther: Huey Newton and the Price of Black Power in America*. Reading, P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1994.

CUBA

- Gosse, Van. *Where the Boys Are: Cuba,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Left*. London: Verso, 1993.
- Matthews, Herbert L. *Cuba*. New York: Macmillan, 1964.
- Mills, C. Wright. *Listen, Yankee: The Revolution in Cuba*. New York: McGraw-Hill, 1960.
- Szulc, Tad. *Fidel: A Critical Portrait*.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 1986.
- Thomas, Hugh. *Cuba: The Pursuit of Freedo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CULTURE

- Cohen, John. *The Essential Lenny Bruce*. New York: Bell Publishing, 1970.
- Graham, Bill, and Robert Greenfield. *Bill Graham Presents: My Life Inside Rock and Out*.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 Herbst, Peter, ed. *The Rolling Stone Interviews: Talking with the Legends of Rock & Roll 1967–198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Rolling Stone Press, 1981.
- Heslam, David, ed. *Rock 'n' Roll Decades: The Sixties*. London: Octopus Illustrated Publishing, 1992.

CZECHOSLOVAKIA

- Chapman, Colin. *August 21st: The Rape of Czechoslovakia*. London: Cassell & Company, 1968.
- Dubček, Alexander. *Hope Dies Last: The Autobiography of Alexander Dubček*. Jiri Hochman, ed. and trans.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3.

- Ello, Hugh, and Hugh Lunghi. *Dubček's Blueprint for Freedom: His Documents on Czechoslovakia Leading to the Soviet Invasion*. London: William Kimber & Co., 1969.
- French Communist Party. *Et Les Événements de Tchécoslovaquie*. Paris: Bulletin de Propagande, No. 5, Septembre 1968.
- Gorbachev, Mikhail, and Zdeněk Mlynář. *Conversations with Gorbachev: On Perestroika, the Prague Spring, and the Crossroads of Socialism*. George Shriver,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 Mlynář, Zdeněk. *Night Frost in Prague: The End of Humane Socialism*. Paul Wilson, ed. New York: Karz Publishers, 1980.
- Piekalkiewicz, Jaroslav A. *Public Opinion Polling in Czechoslovakia, 1968–69: Results and Analysis of Surveys Conducted During the Dubček Era*.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 Salomon, Michel. *Prague: La Révolution étranglée, Janvier–Août 1968*. Paris: Robert Laffront, 1968.
- Schwartz, Harry. *Prague's 200 Days: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zechoslovakia*.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9.
- Shawcross, William. *Dubček*.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0.
- Valenta, Jiri. *Soviet Intervention in Czechoslovakia 1968: Anatomy of a Decis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Williams, Kieran. *The Prague Spring and Its Aftermath: Czechoslovak Politics 1968–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Zeman, Z. A. B. *Prague Spring: A Report on Czechoslovakia 1968*.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9.

DRUGS

- Leary, Timothy. *Flashbacks*. Los Angeles: J. P. Tarcher, 1983.
- Lee, Martin A., and Bruce Shalin. *Acid Dreams: The Complete Social History of LSD: The CIA, the Sixties, and Beyon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2.
- Wolfe, Tom. *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68.

FEMINISM

- Davis, Flora. *Moving the Mountain: The Women's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60*.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 de Beauvoir, Simone. *The Second Sex: The Class Manifesto of the Liberated Woman*. New York: Vintage, 1974.
- Evans, Sara. *Personal Politics: The Roots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New Lef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0.

Friedan, Betty.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Laurel, 1983.

Morgan, Robin. *Going Too Far: The Personal Chronicle of a Femini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7.

FRANCE

Andro, P., A. Dauvergne, and L. M. Lagoutte. *Le Mai de la révolution*. New York: Julliard, 1968.

Aron, Raymond. *La Révolution introuvable: Réflexions sur les événements de Mai*.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68.

Ayache, Alain, ed. *Les Citations de la révolution de Mai*. Paris: Pauvert, 1968.

Barbey, Bruno. *Mai 68: ou L'imagination au pouvoir*. Paris: É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Vence: Galerie Beaubourg, 1998.

Cohn-Bendit, Daniel. *Le Gauchisme: Remède à la maladie sénile du communism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68.

Dansette, Adrien. *Mai 1968*. Paris: Librairie Plon, 1971.

Dark Star, ed. *Beneath the Paving Stones: Situationists and the Beach, May 1968*. Edinburgh: AK Press/Dark Star, 2001.

Duprat, François. *Les Journées de Mai 68: Les Dessous une révolution*. Paris: N.E.L. et Défense de l'Occident, 1968.

Fabre-Luce, Alfred. *Le Général en Sorbonne*. Paris: Éditions de la Table Ronde, 1968.

Fauré, Christine. *Mai 68: Jour et nuit*. Paris: Découvertes Gallimard Histoire, 1998.

Feenberg, Andrew, and Jim Freedman. *When Poetry Ruled the Street: The French May Events of 1968*.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Filouche, Gérard. *68–98, Histoire sans fin*. Paris: Flammarion, 1998.

Grimaud, Maurice.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Le Préfet de police de Mai 68 parle*. Paris: Éditions Stock, 1977.

Hamon, Hervé, and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vol. 1: *Les Années de rêv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7.

Harris, André, and Alain de Sédouy. *Juifs & Français*. Paris: Éditions Grasset-Fasquelle, 1979.

Hartley, Anthony. *Gaullism: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New York: Outerbridge & Dienstfrey, 1971.

Joffrin, Laurent. *Mai 68: Histoire des événement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8.

Karvetz, Marc. *L'Insurrection étudiante 2–13 Mai 1968*.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1968.

Labro, Philippe. *Les Barricades de Mai*. Paris: Solar & Agence Gamma, 1968.

———. *Ce N'Est qu'un début*. Paris: Éditions et Publications Premières, 1968.

Lacouture, Jean. *Pierre Mendès-France*. George Holoch, tran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4.

———. *De Gaulle 3: Le Souverain, 1959–1970*.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6.

Les Murs ont la parole: Journal mural Mai 68. Paris: Claude Tchou, 1968.

Mai 68: À l'Usage des moins de 20 ans. Babel-Actes Sud, 1998.

Nairn, Tom, and Angelo Quattrocchi,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London: Verso, 1998.

Séguy, Georges. "*Le Mai*" de la C.G.T. Paris: Julliard, 1972.

Tournoux, J. R. *Le mois de Mai du général: Livre blanc des événements*. Paris: Librairie Plon, 1969.

GERMANY

Ardagh, John.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An Anatomy of Society Today*. New York: Harper & Row, New York, 1987.

Craig, Gordon A. *The Germans*. New York: Meridian, 1991.

Demetz, Peter. *After the Fires: Recent Writing in the Germanys, Austria, and Switzerland*.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Heimannsberg, Barbara, and Christoph J. Schmidt, eds. *The Collective Silence: German Identity and the Legacy of Shame*. Cynthia Oudejans Jarris and Gordon Wheeler, tra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3.

Raff, Diether. *A History of Germany: From the Medieval Empire to the Present*. Bruce Little, trans. Oxford: Berg Publishers, 1990.

HAITI

Burt, Al, and Bernard Diederich. *Papa Doc and the Tonton Macoutes*. Port-au-Prince: Éditions Henri Deschamps, 1986.

LITERATURE

Apollinaire, Guillaume. *The Poet Assassinated*. Josephson Matthew, trans. Cambridge: Exact Change, 2000.

Ball, Gordon. *Allen Verbatim: Lectures on Poetry, Politics, Consciousness by Allen Ginsberg*.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Camus, Albert. *The Plague*. Stuart Gilbert, tra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1.

———. *The Rebel: An Essay on Man in Revolt*. Anthony Bower, tra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1.

Ginsberg, Allen. *Planet News, 1961–1967*.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68.

———. *Collected Poems 1947–1980*.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Harris, William J., ed. *The LeRoi Jones/Amiri Baraka Reader*.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 2000.

Havel, Václav. *Selected Plays 1963–83*. London: Faber & Faber, 1992.

- .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 Paul Wilson, 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2.
- Jones, LeRoi. *Four Black Revolutionary Play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9.
- . *Home: Social Essay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 1966.
- Kramer, Jane. *Allen Ginsberg in America*. New York: Fromm International, 1997.
- Lowell, Robert. *The Dolphi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3.
- . *For the Union Dea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64.
- Mailer, Norman. *Miami and the Siege of Chicago: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Conventions of 1968*. New York: World Publishing Co., 1968.
- . *The Armies of the Night: History as a Novel, the Novel as History*.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8.
- Mickiewicz, Adam. *Dziady (Forefathers' Eve; Dresden text)*. Charles S. Kraszewski, trans. Lehman: Libella Veritatis, 2000.
- Sanders, Ed. *Shards of Go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0.
- Schumacher, Michael. *A Biography of Allen Ginsber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MEXICO

- Alvarez Garín, Raúl. *La Estela de Tlatelolco: Una Reconstrucción histórica del movimiento estudiantil del 68*.
- Fehrenbach, T. R. *Fire and Blood: A History of Mexico*. New York: Macmillan, 1973.
- García, Julio Scherer, and Carlos Monsiváis. *Parte de guerra: Los Rostros del 68*. Col. del Valle: Aguilar, 2002.
- Grupo Mira. *La Grafica del 68: Homenaje al Movimiento Estudiantil*. Tercera edición. Mexico City: Amigos de la Unidad de Postgrado de la Escuela de Diseño A.C., 1981.
- Mora, Juan Miguel de. *T-68, Tlatelolco 68: ¡Por Fin toda la verda!* Col. del Valle: Edamex, 2000.
- Paz, Octavio. *Posdata*. Mexico: Siglo xxi Editores, 2002.
- Poniatowska, Elena. *La Noche de Tlatelolco*. Mexico: Ediciones Era, 1993.
- Ramírez, Ramón. *El Movimiento estudiantil de México (Julio/Diciembre de 1968)*. Mexico: Ediciones Era, 1998.

MIDDLE EAST

- Oren, Michael B. *Six Days of War: 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NEWS MEDIA

- Gans, Herbert J.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0.

Halberstam, David. *The Powers That B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Schorr, Daniel. *Staying Tuned: A Life in Journalism*. New York: Pocket Books, 2001.

PHILOSOPHY

Fanon, Frantz.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Marchand, Philip. *Marshall McLuhan: The Medium and the Messenger*. Cambridge: MIT Press, 1998.

Marcuse, Herbert. *Reason and Revolution*.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7.

———.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91.

McLuhan, Eric, and Frank Zingrone, eds. *Essential McLuha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McLuhan, Marshall, and Quentin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Corte Madera: Gingko Press, 2001.

POLAND

Abramsky, Chimen, Maciej Jachimczyk, and Antony Polonsky. *The Jews in Polan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Kersten, Krystyna. "The Mass Protests in People's Poland—A Continuous Process or Single Events?" In *Acta Ploniae Historica Sempiter*, vol. 83, 165–192. Warszawa: Instytut Historii Pan, 2001.

Tollet, Daniel. *Histoire des Juifs en Pologne: Du XVI siècle à nos jour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2.

THE VIETNAM WAR

Appy, Christian G. *Patriots: The Vietnam War Remembered from All Sides*. New York: Viking, 2003.

Langguth, A. J. *Our Vietnam: The War 1954–1975*.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Oberdorfer, Don. *Tet!: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Vietnam Wa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rochnau, William. *Once upon a Distant War: Young War Correspondents and the Early Vietnam Battl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Sheehan, Neil. *A Bright Shining Lie: John Paul Vann and America in Vietna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